◎郭德宏
◎林小波 著

四清运动实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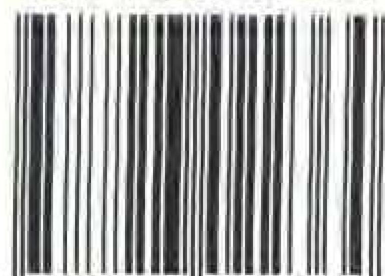
SIQING YUNDONG SHILU

SIQING YUNDONG SHILU
SIQING YUNDONG SHILU
SIQING YUNDONG SHILU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重大历史事件实录（已出版）

- 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
  张树军　高新民　著
- 延安整风实录
  高新民　张树军　著
- 中国农村改革实录
  吴象　著
- 新中国诞生实录
  庞松　著
- 文坛拨乱反正实录
  徐庆全　著
- 四清运动实录
  郭德宏　林小波　著



ISBN 7-213-02236-9
定价：25.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清运动实录/郭德宏，林小波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1（2005.2重印）
ISBN 7-213-02236-9

Ⅰ.四… Ⅱ.①郭… ②林… 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史料—中国 Ⅳ.D65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97210号

四清运动实录

郭德宏　林小波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176516
责任编辑　杨淑英
封面设计　顾　页
责任校对　叶　宇
激光照排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出版学校印刷厂
（杭州市龙驹西路）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30万
版　　次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2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236-9
定　　价　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起　　源

毛泽东："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①] 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刚从几千年小农经济传统生活中解放出来的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几乎每年都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而人民公社时期的整风整社实际上成为"四清"运动的预演。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就提出要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说："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他并且要求："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做法是“也要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根据这一指示，中共中央于8月8日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就合作社优越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工农关系、肃反和遵守法制等问题举行大辩论。

1958年，在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中，8月29日中央发出《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要求“在这个运动中，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以无数大增产的实例，来大讲特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坚定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彻底批判一部分富裕农民残存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在人们的思想上继续破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大立共产主义”。并且“引导群众回忆三年来‘马鞍形’的历史教训，彻底批判‘靠天吃饭’的‘条件论’和‘照着前人脚印走路’的‘习惯论’，大破右倾保守、甘居下游的思想，大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思想，使‘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不仅在大丰收的事实面前哑口无言，而且在思想上彻底破产。应该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插起来，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①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随着“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中央又一次提出在农村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在湖南省委进行整社试点即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经验的批示中说：“目前在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并说近几个月来有大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3—74页。

量的事实表明,"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起来坚决地抵抗、猖狂地进攻了","对此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各省、市、区党委,都应该安排一个适当的时间,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领导上一手抓政治、一手抓生产,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群众,用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一次整社、整风运动,并且结合着进行整党、整团工作"。①

从1960年起,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在农村进行整风整社、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要求"'三反'运动一定要搞,搞的原则是教育为主,惩办为辅","通过这一运动,主要地达到两个目的,即:普遍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同时,对隐藏在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加以清理,以纯洁我们的组织"。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今年冬季,必须下决心,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展开一个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②。1961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结合秋季分配、秋季征购、冬季生产、整风整社和春耕生产准备工作,针对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中间还存在的思想问题,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同时,《指示》也指出:"不断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农民,不断地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这应当是我们一项经常工作。""没有这项工作,很多农民就会迷失方向,农村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

①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258—259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8、673—674页。

顺利发展”。①

在整风整社运动初期，各地为贯彻毛泽东“旧账一般要算”的指示，普遍开展了算账运动。算账过程中，各地普遍清查了1958年的分配账、粮食账、食堂账、副业收入账以及种子调拨账等。有的地方不仅提出要算经济账，还要算思想作风账。如江苏省江宁县东山人民公社在开算账大会时认为，经济账来源于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因此在清算经济账的同时，必须下决心清算一下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算账运动的本身，就是一次深刻的整风运动。中央认为：“江苏提出不仅要算经济账，还要算思想作风账，这一点很重要。不弄通思想作风，要算好经济账是不容易的。”算账运动中也发生了“左”的错误，如陕西汉中地委在算账中发生两起自杀事件。一起是马道公社办公室主任兼会计张××，算账时自认贪污70多元，据检查有80多元，公社领导错误地采用了轮流谈话的方法，张因恐惧而上吊自杀。另一起是铺镇公社九女管理区女社员牛××，因婆婆检举她偷过一斗谷子，干部把她叫到群众大会上坦白，她见苗头不对，借口回家看娃，用刀子自刎（未死）。因此，从算账的基本内容和后果看，它实际上已具备后期经济“四清”的雏形。

在随后的整风整社过程中，各地在步骤上，大致采取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鸣放辩论，回忆对比，分清大是大非，解决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问题；第二，选择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行为的代表人物进行重点批判辩论；第三，整顿干部队伍，进行党、团组织建设；第四，制定生产计划，组织生产高潮。在整社的基本要求上，有的地方提出从思想、政治、组织和制度上巩固人民公社。如湖南省委在整社试点时，提出在思想上，要把有严重右倾思想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65—771页。

的人的错误言行，在群众中狠狠搞臭，划清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界限；在政治上，坚持政治挂帅，积极培养和扩大骨干力量，树立三部分人在生产队和作业组的绝对优势，把领导权紧紧握在这些人的手里。在组织上，把公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各级组织都健全起来。在制度上，建立和健全生产管理、生活管理、财物、分配和民主管理制度。[①] 在整社的基本方法上，有的地方，如河北保定采取了"四清"的做法，即通过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以期达到堵塞经济漏洞、加强经营管理、整顿干部作风、促进劳动生产的目的。同时，全国不少地方也在搞"三清"、"五清"、"六清"等，做法不一，但不论叫几清，"实际内容大体相同"[②]。在整社过程中也发生了违反政策的严重后果，如温州市永强公社，1959 年 11 月 3 日至 10 日，在群众大会上重点批判了 63 人。该社永新大队党总支某副书记，将套购 500 斤番薯的一个妇女，戴上四顶高帽，帽上写着"套购番薯五百斤"，在轮船埠头上挂了牌，叫她自己敲锣，叫她的女儿在旁边喊："我母亲套购番薯五百斤，大家不要学她样。"金华地区遂昌县西屏公社水南大队，从 10 月 24 日到 11 月 1 日，共开了 11 次斗争会，被斗争的 20 人中，罚跪的 16 人，被打的 4 人，受伤的 3 人。

由此可见，"四清"运动的一些做法已经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基本形成，其运动中产生的一些"左"的做法，也与"四清"时期极为相似。人民公社时期的整风整社，实际上就是"四清"运动的预演和准备，只不过由于正在进行经济调整等条件的限制，运动没有演变成像"四清"运动那样大的规模和影响。因此，20 世纪 60 年代前期，在国内，因"三面红旗"而在党内产生了不同的意

---

① 这实际上与"大四清"的要求基本一致。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21 页。

见分歧,在国外,鉴于苏联已经“变修”和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使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从而在全国再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从而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同时,对造成困难的原因,则认为是基层干部作风存在问题,从而导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而对国内严重的局势,党内特别是上层中出现了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如何看待国内的困难形势。二是包产到户问题。三是干部的甄别平反问题。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最为典型。可以说,刘少奇是党内看到困难形势的严重性并敢于触及造成困难真正原因的领导人之一。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当发现1962年财政预算中存在三十多亿元的赤字时,刘少奇更加尖锐地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

气!"同时,刘少奇说过"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之类的话。[①] 刘少奇还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问题,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②]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其他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形势,处于经济工作调整第一线并担任"瓜菜代"领导小组组长的周恩来最为清楚。1960年年底,周恩来针对农业方面由于高估产而带来的严重问题说:"这半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考虑这个问题。"面对全国性的粮荒,周恩来和陈云冒着政治风险,决定进口粮食,以纾民难。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结说:"那时,就是有点革命,不能深思熟虑,不能冷静下来","欲速则不达,跌了大跤"。刘少奇插话说:"想要快一点,结果是跌了大跤,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痛越好,跌得不痛就感受不深","问题是跌痛了没有"。周恩来说:"我是感到痛了。"他认为,工作中出现的这些缺点错误,中央应负很大责任。因此,当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到中国的严重困难时,周恩来客观地回答说:"我们钦佩你公正的判断。当然你看到的是好的一面,我们的工作也还有缺点,也许你没有说,也许你还没有发现。"苏共二十二大期间,周恩来向赫鲁晓夫告别时说:"目前,我们国内还很困难,去年遇到了那么大的灾荒,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49、551、530页。

② 王光美、刘源等著,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页。

这一年我的头发白了很多，这次一定要赶回去。"七千人大会期间，周恩来参加了福建组的讨论。发言中，地方干部反映了许多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以及党群关系紧张等情况，周恩来充分肯定这些发言"都是很健康的"，对他们的发言"都要尊重"。他说："你们已经说了很多，主要是对省委说的，但也说了许多是中央的事情，这一点我是心中有数的。"并且他还作了"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的切中时弊、感人肺腑的发言。西楼会议期间，周恩来非常赞同刘少奇对形势的看法，他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料到。"他还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①] 作为党内为数不多懂经济的、被毛泽东誉为"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陈云，也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心知肚明。他指出："你们讲话不要怕'左'和右，如果有人说你们右了，我来承担；要开除你们的党籍，找我好了。"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没有讲话，但于2月8日在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指出："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责任由谁来负？中央、省委各有各的账，但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他在讲话中谈了发扬民主问题，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句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②] 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到河南、湖北等地检查工作，看到中原大地赤地千里、灾情严重，群众衣不暖食不足，处境异常艰难时，沉重地说："浮夸

①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98、637、638、650、659、660、67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3、106页。

风给人民带来这样大的灾难,我们真是对不起人民啊!"①

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承认违背了客观规律,认为"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碰得头破血流",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求在宣讲大好形势时,"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同时,毛泽东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而且敌人有隙可乘","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②。1960年11月25日甘肃省委向中央写出报告,深入检查了一再发生"共产风"的根源,认为应当而且必须从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方面去寻找。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并检讨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呼吸、共命运的","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

① 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91页。

②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141页。

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①。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庐山工作会议上,在周总理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他又形象地说:"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② 会议结束的那天,他还书写了唐代诗人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即: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并赠送中央常委各同志。可见毛泽东的乐观心情了。1961年12月13日至16日,毛泽东在无锡听取江苏、安徽负责人的汇报时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③ 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又说:"国内形势总的是不错的。前几年有点灰溜溜的,心情不那么愉快。到1961年,心情高兴些了,因为在农村搞了《六十条》,工业搞了《七十条》,还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些具体政策都见效了。"他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话时,表示1962年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方面的工作,大抓一年,工作要一天一天上轨道。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视

①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94、56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6页。

察，听到一些地方负责人讲的都是形势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比较乐观。

因此，对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非常不满。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批评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①] 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了。他指出："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农业恢复要五年、八年，讲的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②] 他还批评李富春和国家计委"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四时八节，强迫签字。我说再看一年，不行就换班。有人劝我不要等了，现在就可以换"[③]。

二是关于包产到户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几起几落。高级社建立后，由于在分配上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产生许多矛盾。1957年春一些地方农民要求包产到户，但在两条道路大辩论中被看作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受到批判。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后的几个月中，河南、湖北、江苏、湖南、陕西、甘肃等不少省份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庐山会议后，再次遭到批判，认为"包产到户，实际是恢复单干"，"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中央还转发了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

① 王光美、刘源等著，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90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08、1110页。

③ 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605—606页。

和包产到户的通知》和河南省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认为包产到户归根到底“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实质上是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①。

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得到毛泽东“可以实验”的谨慎同意。同时，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都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支持安徽省委的意见。他指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② 朱德于1961年在浙江视察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三包到组，在一部分地区可行。”③ 陈云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叫‘分田到户’也好，叫‘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按照《国际歌》词中‘全靠我们自己’的话办，尽快恢复生产。”6月下旬至7月初，陈云就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产量问题，在北京分别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交换看法，并取得基本一致意见。④ 时任中南局书记的陶铸也多次讲到包产到户，他认为：“边远地区、山区包

---

①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248—253页。

② 金冲及、黄峥主编：《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06—90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11页。

④ 《陈云年谱》下卷，第115、119页。周恩来曾多次看望病中的陈云，就包产到户、分田等问题与他交换意见，并赞同陈云的建议。邓小平当时答复：分田到户是一种方式，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产到户，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1962 年 4 月，他到河南检查工作，提出借土地给农民自耕，有的同志认为这样做可能导致资本主义，陶铸回答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我宁可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饭、死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本来不赞成包产到户，但经过湖南农村调查后，认为包产到户在当前具有优越性。调查期间，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很冷漠，并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而陈云却称赞"观点鲜明"，刘少奇也认为很好。杨尚昆也从北京打电话给田家英："总理要我问你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回北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作了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刘少奇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①

出乎刘少奇的意料，毛泽东不仅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说："回到北京后不修改《农业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并问田家英："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为了不在中央领导层中造成裂隙，回答是个人意见。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同时，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也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② 在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批评说："1960 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分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 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单

---

① 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9—92 页。

② 金冲及、黄峥主编：《刘少奇传》下，第 908、909 页。

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①，并多次批评田家英的60%包产到户、40%搞集体的主张；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②。

三是翻案风问题。1961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中提出，为了发扬民主，有必要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过去批判和处理得正确的，应该加以肯定，不再改变。过去批判和处理完全错了的，要改正过来，恢复名誉，恢复职务；部分问题批判和处理错了的，就改正这一部分问题的结论。③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中重申了干部甄别平反的问题。1962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对于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必须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加强领导，加速进行。"④

但在甄别平反的过程中，由于毛泽东坚持认为庐山会议没有错，问题只是不该传达到县以下，因此，彭德怀的问题仍没有得到平反。当他得知在七千人大会上再次受到批判时，不得不进行辩解和申诉。1962年6月16日，他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交了一封很长的申诉信（即所谓“八万言书”）特别申明，说他阴谋篡党和有国际背景，实在腹怀委屈，是莫须有的罪名，如果发现事实确凿，他宁愿“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

---

①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08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22、1123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382页。

④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61页。

与此同时，康生等人诬陷小说《刘志丹》“反党”、“为高岗翻案”，牵连曾参加过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同志，搞了又一个“反党集团”，而且还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把小说看作是他们的“反党纲领”。毛泽东指出：“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对于这一切，毛泽东称之为“翻案风”。他指出：“近来有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1]，“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在我们中国，人民群众也有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做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以改一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2]

同时，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造成困难形势的原因之一就是基层干部作风存在问题。应该说，20世纪60年代前期，党内外的各级干部绝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特别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这些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最典型的就是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瞎指挥盛行。如湖北沔阳县在整风整社中，揭发了干部的共产风和瞎指挥。据群众反映，某些干部“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社员编快板唱：“一年忙上头，汗水白白流，年终搞结算，落个癞痢头。”群众骂干部是“臭虫”，提起生产瞎指挥，群众恼火极了。批评干部倒行逆施。群众还贴了不少大字报。如：

---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26—1131页。
② 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10—511页。

"干部主观主义大，扭转乾坤种庄稼，为了好看连片化，坏田也要种棉花。"[1] 农村中的"浮夸风"相当严重，有的地方为应付上级检查，种一些"表面庄稼"，就是在沿大路、公路、铁路的土地上，加大投人，庄稼种得特别好，一派丰收景象，而在离大路、公路、铁路较远的腹地，不是野草掩盖了庄稼，就是根本不种让其荒芜。上级派人检查，往往坐着轿车或吉普车在大路、公路、铁路旁转悠一趟，所见的全是好印象。有的地方隐瞒土地亩数，虚报高产指标。干部的打骂之风相当严重，基层干部在讲不出道理时，就骂人，骂人不解决问题，就打人。干部的多吃多占也很厉害，许多干部往往是到一处吃一处，大吃大喝。吃后嘴巴一抹，屁股一拍完事，而所谓的公共食堂，则是生产大队、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窝子，也是上级干部下基层多吃多占的据点。[2]

针对干部中的"五风"现象，一方面，中央多次发出指示，进行整风整社和三反运动，以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改善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另一方面，使毛泽东和党中央认识到，之所以出现严重困难的局面，干部的一些坏作风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这些坏干部还与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分子互相勾结。如中央在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中指出："有一些干部，不严肃对待党的政策，不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甚至标新立异，自以为是"，"还有少数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分子和拉出去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行为恶劣，违法乱纪，借刮'共产风'的机会，徇私舞弊，浑水摸鱼，甚至故意制造混乱，乘机破坏"。在《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的指示》中指出："贵州遵义和毕节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严重情况，特别是干部中的极其严重的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

①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393—396页。

② 惠文：《困难时期整风整社纪实》，大灾荒纪念馆网站。

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要知道，中国农村人口中还有百分之八的地富分子及其家属，连同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家属，总共要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左右……其中，未被改造或者不接受改造的最坚决的最隐蔽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极端仇视，有意识地随时都在准备'借尸还魂'，篡夺领导，实行复辟和疯狂挣扎。"中央对"三类队"的估计也非常严重，认为"三类队"的领导权，大致有三种情况，有一部分是被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篡夺了的，有一部分是被死官僚主义分子，即不顾党的政策、不顾群众死活、做了不少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坏事，一意孤行、屡教不改的分子，占据了领导岗位。还有一部分是主要干部软弱无能、思想糊涂、不能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以致各项工作长期落后、问题成堆、"五风"严重的。并认为我们同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矛盾，性质是敌我矛盾，应该按照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对待。我们同死官僚主义分子的矛盾，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但是也必须严肃处理。①

1963年3月1日，中央在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中指出："最近几年，在我们一部分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确实有所增长。突出的表现是：损大公、肥'小公'，打埋伏、耍手段，只顾局部、不顾大局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分散主义、特别是本位主义滋长起来了；贪图个人享受、讲排场、铺张浪费、假公济私、走'后门'、破坏制度、损人利己、多吃多占、滥用国家资财、挥霍人民血汗的现象，也滋长起来了。尤其严重的是，贪

①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389、416、433页。

污盗窃国有资财、投机倒把等资本主义活动猖狂起来了,并且新生长起来一批资产阶级分子和一股资本主义势力。"这些现象"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队伍中间的反映。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活动,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罪行,是激烈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有些领导干部中,官僚主义也滋长起来了,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满足于臃肿重叠的机构,热衷于滥发报表文件,把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变成了缺乏朝气、没有战斗力的官僚主义组织。有的简直成了坏事坏人包庇者和纵容者,有的甚至发展到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压群众,走上了非常危险的道路。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势必影响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影响党的各项工作。①

为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干部参加劳动。中央在转发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的调查材料中指出:"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认真贯彻执行这项政策,对于农村工作来说,其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农业合作化以来的无数事例证明:凡是办得好的社、队,无例外的都具备有社、队的领导干部经常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的特点。反之,凡是办得不好的社、队,往往具有一个相反的特点,即这些社、队的领导干部,不愿意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因而脱离群众,不能抵抗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袭,生活特殊化,贪污多占群众的劳动果实,有的甚至逐步蜕化变质,堕落成为富裕农民和资本主义分子利益的代言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② 毛泽东认为"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在《前十条》中,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专门写了一个问题,提出这"对于社会主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173、174、184—185页。

②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667页。

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①]。

由此可见，因对困难形势以及如何解决而产生的意见分歧，使毛泽东认为党内高层出现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对困难原因的分析，使毛泽东认为基层干部队伍也存在严重问题，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分子也极力复辟资本主义并进而篡夺领导权。这一切，促使毛泽东认为必须“重新提起阶级斗争”。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并认为“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又指出：“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年轻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的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②] 于是，在毛泽东看来，开展阶级斗争，解决干部作风问题，已势在必行。

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

“四清”运动的发生，除上述国内因素外，还有着十分复杂的国际背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以及周边局势的恶化。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由此

---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325—32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49—1251页。

而引出的毛泽东对“反修防修”的战略思考。

建国后中苏关系经历了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可谓一波三折。就“四清”起源的角度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分歧，集中在如何评价斯大林、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问题上。针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评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明确予以反对，认为赫鲁晓夫“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并认为“苏共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中共反对赫鲁晓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随意地说成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就有产生战争的土壤”。关于和平共处问题，中共反对苏共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总路线，并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处在冷战共处的状态中”[①]。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所谓“议会道路”、“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等观点，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承认不承认这一点，“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分水岭”[②]。针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问题，中共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不可能是全民的。针对“全民党”问题，中共认为：“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

---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6、70、464—465、545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页。

现。"赫鲁晓夫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根本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改造成修正主义的党"[①]。正是由于中苏两党在上述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使毛泽东明确地认识到,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认为南斯拉夫和苏联都已变成"修正主义",而且国内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是中国的"超苏"战略以及苏联对中国国内政策特别是"三面红旗"的批评。应该说,1957 年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的"超英赶美"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苏联为竞赛目标的。当赫鲁晓夫提出 15 年超过美国的口号时,毛泽东当然不甘落后,提出 15 年赶上或超过英国。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毛的目的很明显,他想如果他能够在 15 年内与英国并驾齐驱并且开始赶上美国,那他就能够把列宁的党远远抛在后面并且超过苏联人民自十月革命以来所取得的全部进展。[②] 1958 年 5 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过去林彪同志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我们这么多人,现在六亿,再过十年、十五年八亿,人多总要做事,总不能光睡觉嘛!吃了饭就干社会主义,无非是搞工业、农业、文化科学嘛!因此说,十几二十年就可以赶上世界上一切国家,还可能超过美国。""1949 年 6 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在宴会上,斯大林举杯祝贺中国将来超过苏联,要少奇同志喝酒。少奇同志说,'这杯酒不能喝,你是先生,我们是学生,我们赶上你,你又前进了。'

---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8、49、53 页。

②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19 页

斯大林说,'不对,学生不超过先生,那还算什么好学生,一定要喝。'僵持了一二十分钟,最后少奇还是喝了。先生教了学生,学生超不过先生,就是不争气。要争气,要喝这杯酒。""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是斯大林提出的;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是列宁提的。……我们口号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这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们的口号是高明些,应当高明一些。因为是先生教出来的学生,学生应当比先生强。后来者居上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① 毛泽东还表示,即使中国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也不进去,而要等待苏联。后来,赫鲁晓夫于 1959 年 12 月 1 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合乎敌人的利益。在这个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本身,领导本身就会帮助敌人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而这样做是不能容许的。"毛泽东指出:"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而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大跃进"战略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民公社化实践,苏共领导人一开始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苏联的报纸也很少介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方面的文章。但是到 1958 年年底,赫鲁晓夫开始表态了,原因之一,据苏共中央负责中国事务的库利克回忆,那时在莫斯科流传着这样的话:在全世

---

①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93、340、345—346 页。

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赫鲁晓夫没有找到这条道路。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以后非常生气。[①] 另外，据赫鲁晓夫回忆录解释说，中国开始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宣传"大跃进"的口号，并在保加利亚造成了影响，保加利亚人已经开始把中国人的这些口号运用到他们自己国家的实践中去。而且在靠近中国边境的苏联人自己出版的报纸上也出现了，我们当时很害怕中国人的这套做法，我们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了。[②] 1958 年 11 月 30 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说："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 30 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③]赫鲁晓夫还建议读一读他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所作的报告，认为"那个文件相当中肯地(而且我认为是非常准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我当时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④]。1959 年 7 月 18 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县波拉采夫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就公社问题发表讲话指出："可以理解，

---

① 丁明整理：《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参见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72 页。

②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 422—423 页。

③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杨存堂分卷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7—190 页。

④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 422 页。

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民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现在我们已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的亲切的家。”① 苏联的宣传机器也讥讽大跃进政策，并指责中国人说："他们自认为比列宁的同胞更理解列宁。”②

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激怒了正在庐山的毛泽东。胡乔木将新华社《内部参考》登载的《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以及《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等材料送毛泽东后，毛泽东批示："此三件印发各同志。印时注意，将赫鲁晓夫的一篇（连同中央社的一则纽约消息）放在前面。三篇印在一起，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那些足以使他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392页。

② 安·哈扎诺夫：《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2期。

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样一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当法宝,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毛泽东又给时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写信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到韶山,作诗一首,即: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7月1日,毛泽东登庐山,又做七律一首,即: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后来,毛泽东就这两首诗给臧克家、徐迟的信指出:"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1959年8月19日,毛泽东在关于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问题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的信中指出:"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起见,必须向这一切人作战,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为此需要大量的材料。请冷西令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将此信讨论一次,向各分社立即发出通知,叫他们对人民公社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准备"编一本书,例如1955年《农村

合作化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那样","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并"请陈伯达同志立即组织几位熟习俄国革命初期所办公社的材料、具体情况(要详细材料)及其所以崩溃的原因的同志,一定要加以分析,提出论断。这也是极端重要的。目的在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9月4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和吴冷西,将赫鲁晓夫反公社的演说在《人民日报》发表,使他越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他还指示以通讯的方式发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情况,"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①。

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对中国国内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使毛泽东加重了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认为彭德怀"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大概在莫斯科取了点经吧",并"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打着所谓'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号,发动了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因此在庐山,毛泽东发动了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批判,并对这场错误批判进行了理论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② 这样就把阶级斗争的矛头逐渐对准党内,以至最后得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央出修正主义"这一"四清"运动中对形势的基本判断。另一方面,使毛泽东更加坚定了维护"三面红旗"的决心。毛泽东始终认为,"三面红旗"是颇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其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90—392、324、325、488、489、462—463、504、506页

②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98、295、345、367页。

展，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毋庸置疑的。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怀疑甚至反对，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而且更加激发了毛泽东“和苏修对着干”的决心，为此还要“向世界宣战”，可见毛泽东维护“三面红旗”之决心。既要开展党内阶级斗争，又要维护“三面红旗”，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庐山会议、“四清”运动以至“文化大革命”，自然是当代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

从“四清”运动发生前因的角度分析中美关系，有直接影响的就是对由美国倡导的推进中国和平演变图谋的警惕。1953年至1959年，具有强烈反共意识的杜勒斯出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上台后即提出具有纲领性的所谓“解放战略”，主张用自由、民主、宗教等“精神力量”来战胜共产主义，使共产主义国家发生“和平的转变”，从而正式提出了西方敌对势力酝酿多时的和平演变战略。这个问题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大反斯大林，并引起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动荡，更使毛泽东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于是从1957年起，他开始强调反对修正主义，认为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比教条主义更危险。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上看到杜勒斯1958年10月24日接受英国电视公司记者采访时的言论后，给予高度重视。11月30日，他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一次谈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要翻英文字典。”他还指示“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①]。随着中苏两党分歧的扩大，毛泽东把美国的和平演变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密切联系起来。这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一个小型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让人印发了杜

---

① 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6期。

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三篇演说，让到会同志认真看一看，说："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① 认为杜勒斯宣称的希望"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其实"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步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②。这些讲话充分表明，毛泽东对敌人策略的变化，给予密切关注，对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目的，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并一再提醒全党，要开展反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斗争。

与此同时，中国的周边环境也日趋紧张。在客观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在继续，美苏之间既对抗又在进行单独的大国政治和军事交易；中苏关系日益恶化，1962年发生了新疆伊犁、塔城事件，大批中国居民在苏联的策划下，逃往苏联，两国边境摩擦不断；中印边境上的冲突与对抗正在加剧；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日益扩大；美国和国民党蒋介石不时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等等。总之，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的国际环境比较严峻，似有南北夹攻、四面包围之势。正如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所说："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我国人民遭遇过的暂时困难幸灾乐祸，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肆攻击，演出了嚣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③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更加警觉"中国出了修正主义该怎么办"的问题。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丹麦共产党主席

---

① 逄先知：《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② 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52—653页。

耶斯佩森时说："我国也有修正主义者，以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去年夏季向党进攻。我们批评了他，他失败了。跟他走的有七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连他自己八个。"[①]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同年8、9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当罗瑞卿谈到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的时候，毛泽东插话，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②] 他还明确指出："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9月27日发表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重申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强调"无论在现在和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③]。同时，他还批评了王稼祥的"三和一少"的所谓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不久之后，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8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46页。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81页。

第二章

发动和试点

“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与《前十条》

八届十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继续进行，毛泽东虽在会议上大谈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但由于国内日益严峻的形势，他也接受刘少奇等人的意见，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同时，处于一线的部分党内领导人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上。因之，此时各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大多未带有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而且许多地方并未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 年冬到 1963 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跑了 11 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毛泽东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各省都不讲。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高度重视。

为此，1963 年 2 月 11 日至 28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为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推荐批印《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贯

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并要求与会同志认真研究。

2月8日,湖南省委曾向中南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主要介绍了自上而下地召开各级干部会议,领导带头,层层训练干部,由点到面,有条不紊地在群众中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报告强调: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当前阶级斗争是激烈的,不论农村或城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嚣张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黑风"刮得很大。敌人的阴谋活动,最突出的是发展反革命组织,进行反革命宣传,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生产队,领导权已经落在地主、反革命手里。总之,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企图复辟,"牛鬼蛇神"纷纷出现,从各方面威胁着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严重的,一部分党员和干部,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影响之下,已经变质或者正在演变。修正主义在党员、干部中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可以说,这是一个通过大抓阶级斗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典型经验。对此,毛泽东批示:"湖南报告很好,印发会议同志研究。"2月17日,河北省委给毛泽东并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中,介绍了开展整风整社、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提出要抓"四清",即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贯彻勤俭办社。其主要做法是原原本本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的三个文件;各级党委书记带头深入社队,亲自开讲;先上后下,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群众,层层发动,步步深入;搞好试点,取得经验,指导一般。毛泽东肯定了这些做法,并高度评价:"两个报告各有特点,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

一下。"①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与会者就"四清"、"五反"、反修防修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抓阶级斗争，抓党的建设，抓阶级队伍，搞"五反"，搞社会主义教育，都是反修与防修的伟大的基本建设工作。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认为"五反"运动非搞不可，不然会出修正主义。

刘少奇主持了12日、13日的会议。12日，在彭真作关于"五反"运动的报告后，刘少奇指出："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②

当时，中苏两党论争日趋激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同国内严峻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一步认识国内、党内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2月25日，刘少奇在会议上专门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论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状况、斗争的性质、斗争的前途和方针等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25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71页。

在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当周恩来讲："在干部中反修，结合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教育，就有力量了。"毛泽东说："反对我们自己内部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这些牛鬼蛇神。"这样，就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党内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了，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初始就带有反修防修的明显目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部的共同认识。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同时，他认为，一定要把贫下中农组织好，在农村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把工人和农民这样的大多数、贫下中农先团结起来，然后团结那个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并于3月1日发出。

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各地根据中央的部署，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并陆续向中央写了报告。主要有《华北局关于华北区农村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情况汇报》、《中共保定地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向省委的报告》、《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两个问题的报告》（宋任穷）、《河南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湖南省委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湖南省委关于树立贫农优势和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问题的报告》、《邢台地委关于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报告》等。总的看来，这些报告集中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普遍认为，国内阶级斗争是存在的，而且相当严重，必须进行“五反”和“四清”。如保定地委的报告中反映，全区揭发出70%的大队有铺张浪费现象，共浪费粮食287万多斤，款260多万元；有37%的大队，1.98万多名干部（占干部总数的8.3%），挪用公款130多万元；有43%的大队，3.51万多名干部（占干部总数的14.6%），多吃多占粮食67万多斤，款25.6万多元，劳动日49.6万多个；有26%的大队，1.13万多名干部（占干部总数的4.7%），有贪污盗窃行为，贪污粮食26.7万多斤，款43.4万多元；有7.2%的大队，26.2%的生产队集体搞投机倒把，2790多名干部（占干部总数的1.1%）个人搞投机倒把。保定地委认为，上述种种损害社会主义、损害集体经济的现象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基层干部队伍中的反映；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实质上都是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罪行。事实再一次证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确实是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激烈的。河南省委的报告中说，光是90个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所揭发的材料，大小投机倒把活动就有10万多起，其中“千字号”的上万，“万字号”的近千；反革命集团活动1300多起；巫婆、神汉、“阴阳先生”5万多人；续家谱1万多宗；买卖婚姻近5万起。特别严重的是，不少党员、干部参与了这些活动，有些甚至是他们带头干的。这次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确凿地说明当前我省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十分激烈的。①

第二，向中央汇报了在农村建立贫下中农组织、树立贫下中农优势的情况。在整风整社运动过程中，为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华北农村许多地方建立了贫下中农组织。据山西省调查，全省共建立了4500多个贫下中农委员会和1.73万多个贫下中农小组。贫下中农代表会和委员会一般设在生产大队，生产队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254、301—302页。

则设立贫下中农小组或者叫贫下中农代表小组。有70%以上的贫下中农委员会或小组是在三类队中设立的，其余的都是在目前还没有建立党组织的一、二类队中设立的。湖南省委在运动开展之后明确提出了树立贫农优势和建立贫下中农代表小组问题，并且总结了树立贫农优势的四点经验，即教育干部重新认识贫农；从政治上充分发挥贫农的主人翁精神；从组织上树立贫农优势；从经济上帮助贫农翻身。华北局还对贫下中农委员会的性质、任务、权利、义务等作了明确要求，规定："贫农、下中农委员会是农村中贫农、下中农的群众性的政治组织，是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助手和党在农村工作的依靠力量。"其主要任务就是"联系贫农、下中农，反映贫农、下中农的意见和要求；经常向会员，特别是会员中的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监视和改造地、富、反、坏分子；监督干部，抵抗'五风'等"。同时，华北局的报告对这一组织的作用作了肯定，认为"这些贫农、下中农组织，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能够经常起作用，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在运动中起的作用比较显著"。湖南省委也认为，"据重点调查，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代表小组能够发挥作用"。

第三，介绍了开展社教运动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如保定地委介绍了"四清"工作的方法和步骤，即认真学习《六十条》，以《六十条》武装社员群众，统一政策思想，揭发"四不清"问题；对清查出来的问题首先由个人作检讨，并结合查证，进行组织处理和经济退赔；在经过"四清"找到漏洞，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必要的制度；按照做好"四清"工作标准进行检查验收。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介绍了在东北农村社教运动中，坚持正面教育为主，并较普遍采用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他提出用村史、合作化史、工厂史、贫下中农和老工人的家史对青年进行教育，学习雷锋等先进人物事迹，展览革命斗争、阶级斗争的实物，读红色书籍等具体措施。河南省委也介绍了开展运动的具

体办法,运动共分三步:第一步,开好县的三级干部会议;第二步,开好公社(区)的三级干部会议,这两步都是为了训练干部,组成干部队伍;第三步,在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经过扎根串联,组成阶级队伍,打击敌人。①

上述报告,得到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对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毛泽东批示:"这两个报告都好。请同志们注意研究和参考。"中共中央对河南省委和宋任穷的报告也作了重要批示,认为河南省委"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报告所说的其他各项政策也是对的"。"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②。

试点报告中所反映的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使毛泽东更加坚信,社会主义教育势在必行,"如果我们不整风,那个县都要出修正主义","如果我们不搞增产节约和五反,不搞社会主义教育,不搞阶级斗争,就要变成南斯拉夫"。但是,在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主要讨论了反对修正主义、国内粮食与市场以及1963年的计划问题,对城市进行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也原则地交换了意见,而对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没有更着重的讨论。二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去视察,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谈反对修正主义的较多,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较少。据此,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印象不深,没有引起各级干部的足够重视。于是,5月2日至12日,毛

---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257—259、295—300、301页。

② 同上,第294—295页。

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五月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于20日颁发，并带有七个附件(《湖南、河北省委报告两件》、《东北、河南报告两件》、《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四个好文件》、《河北省材料两件》、《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

《前十条》的基本内容是：第一，着重强调了认识论问题。《前十条》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而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之所以强调认识论问题，并放在《前十条》的序言中，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对许多地方半年多时间还没有认识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有所不满。会议之初，陶铸和李井泉到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说，二月会议的时候，我提了这个问题，要王延春、刘子厚同志讲一讲，这是人家劳动模范讲的，不是我讲的。他们一听，就知道这是主席对他们很严重的批评，意思就是说，我讲了你们不听。1964年8月20日上午10时半，毛泽东在北戴河找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谈话，毛泽东讲，到1963年5月杭州会议，搞了第一个十条，前面的序言是我写的，说人认识事物是不容易的，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客观事物反映到我们脑子里可不容易啦，物质变精神，精神又变物质。南昌有一个研究科学的青年说，物质变精神可以理解，精神变物质，大部分可以解释，但变石头则不能。他提的这个问题启发了我，我就考虑精神能不能变石头。例如，大理

石有许多种，有自然的大理石，有人造的大理石，人造的大理石不是石头？人民大会堂的大理石很多不是山里的，是人造的。人为什么能造大理石？因为理解了大理石的化学构成。

第二，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当前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文件列举了阶级斗争的九条表现，认为"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另外还有"反革命分子"在"进行罪恶活动"，"除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包括"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社教的目的，就是经过教育，使干部和党员"端正无产阶级的立场"，"以便正确地领导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对于"四不清"问题，虽然说"这种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四清""主要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又说"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分子来说，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它同城市中的"五反"一样，"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文件强调，"这些事实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

第三，强调防止修正主义。文件提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说来，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因为"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文件还特别引用毛泽东5月9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批语中的话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

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因此，文件中把社教看成"是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第四，强调依靠贫下中农，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文件认为，"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都要依靠他们，"他们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在农村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教育的工作，必须同农村的贫下中农的组织工作结合起来"，"贫下中农组织应当在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首先是在基本核算单位建立起来"。"贫下中农组织的成员，要以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候的贫农、下中农为基础。在开始建立的时候，要把根子扎正，把基础打好"。"贫下中农的代表、委员会和主任，都应当由贫农、下中农选举产生"。

第五，关于社教运动的方法。提出要把毛泽东的指示、中央的有关决定同当地的具体情况、具体事例、具体工作结合起来，"向干部和群众讲解，启发他们，边讨论，边提问题"，使他们接受教育，同时"使犯有轻重不同、多少不同的毛病的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直接同群众见面，解决多年存在的许多干部和群众之间不正常的关系问题"。重要的是抓好阶级斗争，要分步骤地进行，并经过试点。文件指出，在社教中，"首先应当发动群众

把去年以来的账目、仓库、财务、工分，同时把由国家投资、银行贷款和商业部门赊销所添置的资产，全面地彻底地清查一次”，即进行“四清”，并认为“这是一次同社会主义教育相结合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四清”中，“党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对于犯有一般缺点和错误的同志，要好好帮助他们洗手洗澡，下楼过关，努力工作。但是不管什么人都必须退回贪污盗窃的赃款、赃物和其他应退的财物，真正做到手脚干净，不能马马虎虎。当然，退赔也要合情合理”。今后“每年还要大清一次到两次”，使“四清”成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一项经常制度，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主义教育”。文件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但是，也要防止逼供信，严禁打人和采用任何变相的体罚。要允许被批评的干部申辩”。“对于贪污盗窃分子，一般不采用群众大会斗争的方式”。文件提出，为了搞好“四清”，“县一级干部要结合五反运动，检查、改进领导和作风”。文件认为，“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四不清的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间的矛盾”。

此外，文件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要求各级党组织的负责同志必须有计划、有选择地蹲点，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在这点上，对于某些同志，确实还有大喊一声的必要。并提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文件最后指出：“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

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就会更大了。”

《前十条》是整个“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对整个运动的进程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从文件的形成过程和基本内容看，在总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左”的错误。过分夸大了国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形势，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错误得到进一步发展。把土改时期和农业集体化时期党所实行的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路线简单地运用于三大改造完成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都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的观点，这就为后来提出“一切权力归贫协”的“左”的观点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从发展生产的角度看，这一观点不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特别是中农的生产积极性。当然，《前十条》中有些观点和具体规定是正确的，如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解决干部队伍中的“四不清”问题，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等。

中共中央在印发《前十条》的通知中明确规定：“这个决定是关于我们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几项基本建设的重要文件，它的基本原则不但适用于农村，而且适用于城市。各机关、团体、学校、军队和城市中的企业、事业单位，在‘五反’进行到一定段落，例如领导干部‘下了楼’、‘洗了澡’以后，应当组织党员干部学习这个决定和七个附件，并且运用这个决定精神，解决‘五反’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同时，《通知》也规定，在城市，凡是“五反”运动没有结束的单位，暂时不要将这个决定（草案）下达。在农村，凡是不准备开展社教运动的县、社和大

队，暂时也不要下达。[1]

由此可见，中央对“四清”运动的部署还是相当谨慎的，这也反映了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运动的基本态度。他一再强调运动不要急，要试点，要分期分批。1963年4月26日，毛泽东在接见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时讲：“我们的‘五反’报上不登。鉴于一九五二年、五三年搞‘三反’、‘五反’运动，报上一登，出了许多问题，搞错了许多人，鉴于那个经验，报上不登，在内部开大会，出大字报，在工厂、机关内部展开批评。要慎重一些，运动一来，总要出些乱子，如自杀等等。紧张了就自杀，贪污了多少，怕揭发，没面子，就自杀。如果在报上公开登‘五反’，自杀的就更多了，一九五二年、五三年就是这样，鉴于当时的经验、教训，现在要慎重一些。”[2] 5月7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讲：“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5月11日晚，毛泽东又指出：“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它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领导弱的地、县，要有意识地放到后面去搞，省委和地委要派人去搞，一下子都搞起来，搞不好。有的地方不改，就不要勉强搞。有人不改，就让他不改，云南也不要责备他。一批评，他就要搞急了，就不好。总之，这一次要搞稳一点，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开始各地都要搞试点。先要试点，分期分批，这样做得好。还有，没有蚂蚁的地区不要找蚂蚁。比如，一类队，一定要搞阶级斗争(指敌我斗争)就不一定。那些地方，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搞。”讲完话之后，毛泽东一夜未睡，于凌晨5时40分，又找六个大区书记去谈问题，再三叮嘱不要急，注意总结经验，不要一哄而起，不要打无把握之仗，并说，只要我们注意掌握正面教育，分期分批试点，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和干

---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309—329页。

② 1963年4月26日，毛泽东在接见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时的讲话。

部，干部要洗温水澡，要帮助干部下楼，要划清界限，有强的领导，就可以搞好。[1] 同时，毛泽东强调："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2]

《前十条》颁布后，各地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开始进行"四清"运动的试点工作。

"五反"试点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认为目前无论在国营企业或合作社企业中，无论在生产过程或者商品流通过程中，都存在着严重浪费国家资财的现象。在党政机关、群众团体、部队、学校以及其他事业单位中也存在许多浪费现象。同时党内有些干部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有所滋长，尤为严重的是，贪污盗窃国家资产、投机倒把、长途贩运、私设地下工厂、牟取暴利等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资产阶级活动猖獗起来了，并且新生长起来一批资产阶级分子和一股资本主义势力。因此，中央决定，必须坚决打击。5月20日，中央关于印发《前十条》的通知中，又明确规定，它的基本原则不但适用于农村，而且适用于城市。并运用这个决定精神，解决"五反"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此后，中央以及地方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相继开展了"五反"运动的试点。

从开展试点单位的基本情况看，主要集中于中央国家机关

---

① 《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9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28页。

及各省、市、区级机关，工业交通财贸单位和文教单位的企业以及军队各单位。到5月上旬，中央国家机关开展“五反”运动的单位有54个。其中进度较快的有一个单位，即公安部，已经基本结束领导干部洗澡阶段；进度较慢的有两个单位。其余51个单位，都已经进入领导干部洗澡阶段。全国各省、市、区机关“五反”运动的进度，大体上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状态。大多数地区处在反铺张浪费、官僚主义、分散主义阶段。仍处在准备阶段的，有广东、广西、安徽、河南、西藏等五个省区。正在反铺张浪费、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有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北京、上海等20个省市区。其中，领导干部“洗澡”已基本结束的或即将结束的，有四川、湖北、浙江、辽宁、宁夏等省区。已进入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阶段的，有山西、河北、内蒙古三省区及四川、云南、湖北等少数单位。其中山西进度最快。地委和省辖市机关，已经开展“五反”运动的有山西、河北、内蒙古、四川、云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吉林、陕西、甘肃等12个省区。另外，山东省的青岛、济南等四市以及上海、北京两市的区级机关，“五反”亦已开始。上述地区，大多数单位正在进行领导干部“洗澡”，只有山西、河北、内蒙古的部分地委级机关，已开始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现象。县级机关已经全面开展“五反”的，只有四川省。少数省已在部分县进行，多数省尚未开始。四川省还在少数农村人民公社搞了“五反”运动。

中南五省区文教战线的“五反”运动是从4月间开始的，到7月底止，五省区和两大市（广州、武汉）和直属文教单位，已经开展运动的180个，其中党政领导机关77个，参加运动的人数约为4万人。绝大多数单位（103个）仍处在“前三反”阶段，着重解决领导干部作风问题。少数单位已进入“后两反”阶段，解决敌我矛盾。湖北的运动开展较早，文教党政机关已经进人“后

两反”阶段，第一批铺开的单位(主要是大专院校)“前三反”阶段即将结束。解决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是第二阶段最中心的内容。①

到9月上旬，中央一级机关的“五反”运动，已经基本结束；中央局和省级机关多数单位的“五反”运动，转入“后两反”；地专一级的多数单位和一半左右的县级机关，已经开展了“五反”运动；工矿交通企业，有90%以上的单位，已经开展了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其中的绝大部分，正处在反浪费阶段，已经进入反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单位，约有2%；各地财贸系统的基层单位，普遍地开展了改善经营管理运动，并且进行了商业企业的“五反”试点；文教系统的高等院校，多数已经开始进行“五反”，其中，北京市有42所高等学校从5月起开展“五反”运动。②医院的“五反”运动，除北京市已经全面铺开以外，大部分地区正在试点，少数县以上的中学和剧团，也正在进行“五反”试点。③

上海市自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以来，在工厂企业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向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分期分批地进行了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当时，在工业交通运输系统18个试点单位以及第一批工厂、企业单位，计60多万人中，都深入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并且在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开展了“五反”运动。④

---

① 中南文教“五反”领导小组：《关于中南区文教战线五反运动情况和意见的报告》(1963年8月12日)，中南局9月12日发。

② 《中央批转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五反运动反浪费阶段的报告》

③ 安子文：《关于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63年9月12日)。

④ 上海市委：《关于在工厂、企业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报告》(1963年9月2日)。

军队的“五反”运动，自5月以来已经普遍展开了，除了福州、济南、西藏三个军区正在进行准备以外，全军军以上单位都已经开始了；师一级单位很多也已经开始；团一级的单位也有一部分开始了。多数单位还处在运动的第一阶段，即反对铺张浪费、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进入第二阶段（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阶段）的只是极少数单位。当时正是领导进行检查的时候，据15个大单位的统计，共有军以上党委167个，有90个已作了检查。参加运动的干部很普遍，机关干部一般达到90%以上，军级以上干部，据七个单位统计也达到86%。[①]

4月2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出《关于在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中如何对待党外人士的通知》，《通知》规定，对于上层民主人士，不组织他们参加“五反”运动，可以结合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适当地进行有关“五反”问题的学习。对国家机关、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学校中的一般党外人士、民主党派成员和私方人员，应当同国家工作人员一样参加“五反”运动，并且按照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要求，一视同仁地对待。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其他有关团体的中央一级的机关内，不搞“五反”运动。这些机关的干部可以适当进行学习。[②]

从运动揭发出来的问题看，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走后门、生活特殊化现象严重。从山东省“五反”运动第一阶段的情况看，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浪费现象的确是惊人的。据八个地区统计，1962年共浪费损失2.3146亿元。其中工业企业浪费1.45亿元，占工业总成本的9.86%，占工业总产值的5.05%；商业企业浪费6781万元，占商品流转费

---

① 肖华：《关于当前五反运动中的几个问题》（1963年5月21日）。

②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第4册，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4170页。

用的16.28%。工业方面浪费损失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管理不善,原材料、燃料消耗大,产品质量低,非生产人员过多,工时利用率低;商业方面则是,计划不周,商品流转环节多,商品保管不善,霉烂变质等。据济南市工业单位统计,非生产人员占职工总数的28%。肥城矿务局杨庄煤矿工人说:"杨庄煤矿十八个科,黑脸不如白脸多,有事这个科推那个科。"商业部门经营管理不善所造成的浪费十分突出,仅盲目采购一项所造成的浪费,大约占浪费总额的40%以上。有些单位在采购中不根据市场需要,竟错误提出"万担不嫌多,一斤不嫌少,弄到家里就是宝","见毛就收,见皮就要"的口号。因此,出现了到北京去采购毛竹、到南京去采购山东淄博的瓷器等现象。据省供销社调查,全省6.6亿元库存中,大约有1.7亿元是冷背残次和不适销的商品。从上海市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中暴露的问题看,浪费现象也十分严重。据222个已经开展反浪费的主要工厂的初步统计,1962年浪费金额共达2.19亿元,占这些企业生产总值的4.42%,按这个比例估算,1962年仅工业部门的浪费金额即达6亿至7亿元,加上交通运输、财贸等部门,1962年一年全市浪费金额达10亿元左右。浪费现象主要表现在:生产计划安排不当,盲目采购物资,管理不善;设计工艺不高,质量低劣,废次品很多;机构重叠,非生产人员过多,有效工时利用低;缺乏经济核算,不计成本等。由于企业的制度不严,管理不善,在生产过程中工人直接造成的浪费也很大。据工人在讨论中细算账,平均一个工人一年浪费的金额,约相当于3—5个月的工资。[1] 据北京市海淀区人委机关"五反"运动的情况看,有408位同志不同

---

[1] 《推进三大革命运动,做好上海的城市工作》(1963年9月18日),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编:《陈丕显文选》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344页。

程度地都有问题，占参加运动人员的99%。共检查交代问题5607件，其中：铺张浪费366件，占总数的6%；特殊化124件，占总数的3%；多吃多占1709件，占30%；走后门2252件，占40%；公私不分377件，占5%；违反制度、不爱护公物779件，占14%。就问题的严重性来看，主要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干什么，沾什么。如搞农业的下乡吃饭不给钱，不给粮票，到畜牧场买鸡、鸭肉；搞粮食工作，跨点买好粮食等等。

第二，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严重。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的报告中，对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作了十分精彩的阐述。他指出，官僚主义有各种表现：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抓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这是无头脑、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第六种，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第七种，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此外，还有糊涂无用的、懒汉式的、机关式的、特殊化的、摆架子的、自私自利的、争名夺利的、闹不团结的、宗派性的官僚主义等等。周恩来指出："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

分散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往往借口本部门、本地区、本单位

的特殊性，片面强调本部门、本地区、本单位的利益，破坏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在党内讲策略，弄虚作假，不报真情，不执行党中央的统一政策，不服从国家的统一调度，不遵守国家的规章制度，不积极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要东西的时候越多越好，交东西的时候越少越好，使国家计划不能正确制定和顺利执行。[1]

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惊人的。仅就10个省市和另外一些省市的92个单位的计算，由于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造成的损失，就有106亿元，如果全国算一笔总账，仅这一项数字，恐怕就不下几百亿元。据山东省人委党组检查，1961年生产救灾期间，由于不了解下情，盲目决定大量采购菜种子，造成损失1.6亿元。据有关初步清查估算，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省基本建设中报废工程和损失浪费等达4.2亿元，占这个期间投资总额的15%，五年的移民经费被挪用的达2500万元，占这项费用的16%以上。

第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比较严重。到5月10日止，全国共揭发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万字号"案件1425件，"千字号"案件1.442万件。截至8月份的统计，全国各级机关企业中，已经揭发出来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案件，作案人数将近20万人。其中"万字号"的630多人。不少较大的案件，盗窃国家财产的数目，达到十几万元，粮食几十万斤。公安部在"五反"运动中揭发出七个贪污分子。国家经委机关和国家物资总局已经初步确定的专案有六起，重要线索有九起，涉及的人员占参加运动的总人数的1%左右，大都是管钱管物的人。山东省截至7月底，共揭发和查实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9917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0.89%。上海市到9月7日止，进入放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包袱的共1000多个机关、企业单位，31.6万多人。其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372—376、184页。

中有 11182 人交代了这方面的问题，占参加运动人数的 3.53%。从交代问题的人数比例看，一般是机关约占 3%，工交系统基层占 3%，财贸基层比例较大，约占 7.3%。初步查实，已开展运动的单位，“千字号”705 件，“万字号”14 件，个人贪污最多的 6.2 万元。如果包括还没有开展运动就主动交代问题的人在内，“千字号”有 866 件，“万字号”有 17 件。上海汽轮机厂有 5736 个工人，交代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有 307 人，占 5.3%。其中贪污盗窃的 222 人，投机倒把的 85 人。1000 元以上的 6 人，500 元到 1000 元的 10 人，200 元到 500 元的 25 人，100 元到 200 元的 400 人，100 元以下的 189 人。有严重投机贩卖各种票证行为的 37 人。还有 12 人有严重问题，已掌握材料，但拒不交代。杨浦区商业系统基层商店正副经理以上干部和全体党员共 1447 人，交代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 237 人，占 16.4%，“千字号”4 件，200 元以上的 50 人。[①] 截至 5 月 20 日，军队共发现“千字号”的 51 件，“万字号”的 4 件。

各地“五反”运动的试点，大体上按照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进行的，一般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学习文件，深入进行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最近发表的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领导干部还要学习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指示。在企事业单位的干部中，还要学习工业、商业、手工业等工作条例。

同时，各单位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揭发阶级斗争的事实，开展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不少单位采取了回忆

①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编：《陈丕显文选》第 2 卷，第 340—341 页。

对比的方法，即让许多老工人用切身经历控诉旧社会的罪恶，揭露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给劳动人民造成的苦难，帮助"喝甜水长大的"青年一代不忘阶级仇，牢记阶级苦，续无产阶级"家谱"，扬无产阶级革命传统。"许多工人白天在厂里回忆对比，晚上回家还同全家回忆对比"[1]。有的人在回忆对比中写道：

这时代，是无产者的地狱，
多么"昂贵"啊，一块粮换一个奴隶！
祖辈三代给巴依当牛马，
只因为一张血迹斑斑的卖身契！
皮鞭上沾满了奴隶的血和肉，
镣铐在身上打下仇恨的印迹。
鞭子叫，使人想起代代血仇，
复仇的烈火燃烧在心里。

有的人通过回忆对比，禁不住高声歌唱：

太阳照红了青天，
粉碎了奴隶锁链，
我们无产者像花儿，
朵朵开放，火焰一般。

不忘阶级恨，
牢记过去苦，
不报三代仇，

---

①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编：《陈丕显文选》第2卷，第339页。

誓死不罢休！

毛主席是我生命的源泉，
共产党是我们的昆仑山，
三面红旗指引我们前进，
坚决把剥削者消灭完！①

其苦大仇深，坚决革命的情感，跃然纸上。

第二，开展以反浪费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针对各地暴露出来的大量浪费现象，中央决定在开展"五反"运动的同时，必须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工业部门，主要是厉行节约，降低成本，扭转亏损，增加盈利；努力提高质量；增加品种、规格，增加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商业部门，主要是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流转费用，减少中转环节，增加盈利；提高服务质量。学校，主要是检查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明确培养目标，提高教育质量，贯彻勤俭办校的方针。医院，主要是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态度，贯彻勤俭办院的方针。党政领导机关，主要是检查改进领导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分散主义，改进工作制度，转变工作作风。同时，各地广泛开展了"比、学、赶、帮"的劳动竞赛活动，形成了一套有组织、有计划的做法。例如，全国各地许多工厂和上海有关的工厂，从"比、学、赶、帮"的角度建立了经常联系，经常有计划地互相比较，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人们把这种联系叫做"对口工厂"，各地派到"对口工厂"取经的人员，采取了跟班劳动、跟班操作、跟班研究、边干边学的做法。派到先进单位取经的学习团采用"三结合"，即由领导、主要工程技术人员、生产工人三部分组成，先进单位

① 本社编：《仇恨的烙印》，新疆青年出版社1965年版，第10—14页。

帮助后进单位也采用了“三结合”等措施。[①] 有的地区采取层层树标兵，定榜样，明确学赶的方向；组织技术观摩表演，广泛传授先进经验；组织先进生产者与一般生产工人签订帮学合同，共同提高；总结和交流先进经验，开展技术革新活动，按时检查规划，定期进行总结评比等方法。

第三，领导干部“洗澡下楼”，“放包袱”，自觉革命。《前十条》中提出的“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不仅适用于农村“四清”，同样适用于城市“五反”。因此，许多领导干部纷纷引火烧身，自觉革命，检查自己存在的问题，从而放掉包袱，轻装上阵。如公安部的“五反”运动中，党组主要负责人和党组成员，带头检查，引火烧身，连续开了 13 次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全部 44 名部、局干部，在大小会上，反复洗澡，少则四五次，多则六七次。有的局长，前后经过四次处以上干部会议，三次全局干部大会，20 多天的小组会，才下了“楼”。国家经济委员会参加运动的 1595 人，共提出各种意见 1.1 万多条，对党组的领导以及党组成员和局长级干部所提的意见，共有 6800 多条。这些意见，主要是批评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河北保定地委常委向群众做洗澡检查以来，县委、地直机关的广大干部、群众共提出各种意见 2591 条，其中，给地委常委个人提的有 1366 条，给地委、专署集体领导上提的有 712 条，给部门负责同志个人和部门工作上提的有 512 条。保定地委地直部、局长级干部的洗澡，有 39 个单位、109 人，在核心交换意见后，直接和群众见了面；有 12 个单位、45 人，先在科长以上干部会上洗了第一盆水，后面向群众洗了第二盆水。面向群众洗澡，一次下楼者 124 人，占 80.5%；经过两次以上反复检查，下楼者 26 人，占

---

① 本社编：《“一分为二”和比学赶帮》，河北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63—64 页。

14.5%;思想一时认识不上去,检查不深不透,没有下楼者4人,占3%。上海市的领导干部普遍下了两个楼:即“生活楼”,集中反对铺张浪费、反对特殊化;“工作楼”,集中反对官僚主义。初步排队,在副局长以上400名主要干部中,问题比较严重的占2.5%。山东省共有中央主管和中央委托省委管理的党员干部413人,在“五反”运动中检查和暴露出问题比较严重的14人,占这些党员领导干部总数的3.3%。

多数领导干部在洗澡、放包袱的过程中,作了深刻检查。有的同志说:“原来阶级斗争很具体,我们单位有,我自己也有,这回可看得见了,摸得着了。”有的检查说,在精神状态上“安福养荣”、“保本保命”,以为年纪不小,挣钱不少,革命搞到这个样子就不错了。因此,一味追求“嘴头香点,手头松点,工作轻点”的资产阶级好逸恶劳的生活方式。有的检查到有黄昏思想,认为南征北战的时代过去了,太阳偏西完事了,于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准备后事,安排家务。有的检查到,近几年来是无病呻吟,小病大养,不是革命,而是保命。有的检查,觉得革命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多吃多占一点,特殊化一点不算什么,对自己的照顾,认为理所当然,受之无愧,对走后门,闹特殊,也是来则受之,心安理得。通过这次洗澡后认识到,走后门、多吃多占、闹特殊,是阶级斗争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反映,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在精神世界上的一种表现,是高薪阶层意识形态的反映,也即修正主义的根子在自己脑子里有了影响。不少同志还说,要没有这次洗澡检查,非常危险,感谢党的挽救,感谢同志们的帮助,使自己振作起革命的精神。

第四,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阶段。在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走后门、生活特殊化等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以后,各单位充分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据北京市公安局整理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一批典型事例反映,贪

污盗窃、投机倒把的主要表现是：有的倒卖国家统配物资、统销商品和不足商品；有的倒卖黄金和各种票证；有的城乡串通，长途贩运；有的内外勾结，套购倒卖国家物资；有的开办各种地下工厂、地下修配厂、地下修建队、地下运输队、地下描图社等；有的利用职权，监守自盗，贪污盗窃国家资财；有的已成为有组织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并且出现一批大贪污犯、大盗窃犯、大投机倒把分子。这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中有一批原来就是资产阶级分子，还有一批是国家机关、企业的干部、职工和生产队干部；他们有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支部书记，有的是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还有的是厂长、经理、科长等等。

总之，从试点情况看，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进行了学习文件、增产节约、领导干部洗手洗澡阶段的运动，少数地区进入了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阶段。由于"五反"运动是中央作为开展阶级斗争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因此，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自杀等极端现象。截至5月份，全国已发生逃跑、凶杀、自杀事件136起。其中有些自杀、逃跑事件是由于领导上交代政策不够，处理方式简单而引起的。山东省自开展运动以来（截至8月）共发生自杀事件26起，已死11人，未死15人；逃跑24人；行凶放火事件1起，伤3人。

但从总体上看，"五反"运动的部署是比较谨慎的，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处理也是比较适当的。中央"五反"指示明确规定，运动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要主观从事，要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在反对贪污盗窃的时候，不要主观地规定指标；必须正确地开展群众运动，但要防止逼供信，严禁打人和采用任何变相体罚，对于贪污盗窃分子，一般不要采取群众大会斗争的方式；不要急于作结论，运动中揭发出来的贪污盗窃分子，都放到运动的第三阶段结束以后，即是整个运动结束以后，交给专案小组，经过细致审查，根据确凿证据，

然后定案。[1]毛泽东也多次强调，打击面尽量不要宽，要努力团结。这次城市"五反"中，除去个别恶劣的、猖狂活动的，杀人放火血债民愤很大的反革命，经过中央批准，必须杀以外，其他属于"五反"的问题，一个不杀。并且多次强调这一问题。

同时，"五反"运动对改进干部作风、提高劳动效率、促进生产发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据山东省向华北局汇报"五反"的有关材料看，自开展运动以来，工交企业和商业在增产节约方面都获得了显著效果。

农村"四清"试点

"四清"是河北省保定地委在整风整社运动中为解决年终分配问题而创造的经验。其主要做法就是根据中央调整农村经济的方针和《六十条》精神，贯彻执行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方针，普遍进行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简称"四清")。保定"四清"的经验，得到了河北省委、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63年2月17日，河北省委把关于整风整社和开展"四清"安排向华北局、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批示："两个报告各有特点，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认真研究一下。"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经毛泽东推荐，会议印发了河北省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安排的报告。同时，正式介绍了保定"四清"经验。

1963年4月4日，保定地委向河北省委写出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向省委的报告》。河北省委认为保定地委的"报告很好"，批转全省参照执行，并上报华北局、中央及毛泽东。中央及毛泽东对保定"四清"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中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186—187页。

央称保定地委的报告“极为重要，写的很好”①。毛泽东在修改《前十条》时，加上“河北保定地委的同志到农村进行调查，发现了农民迫切要求社、队认真地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一段。可见毛泽东对保定地委的做法非常重视。《前十条》中专列“四清”一条，重点介绍了保定“四清”经验，并认为“这个经验是重要的，应当推广”②。

5月20日，中央将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报告随同《前十条》下发。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展农村“四清”运动的试点。

从开展试点单位的总体情况看，江苏省共组织了7000人的工作队，搞了67个公社，占全省公社总数（1847个）的3.6%。北京市郊区农村定点25个（公社21个，大队4个），其中市与县（区）合搞的有11个，县（区）试点14个，25个试点中共有266个大队，1197个生产队，6.3万户。山西省组织了2435个干部，在19个公社，166个生产大队，开展了“四清”试点工作。其中省委的试点单位有3个大队，地、市委的试点单位有3个公社，40个大队，其余为县的试点。东北三省有26个社、队进行了试点，省、地、县三级派出的工作队有6200多人，东北局和三省省委的一些负责同志参加了试点。江西省于1962年11月中旬，各地开始试点。到1963年二三月间，全省共集训生产队以上干部70万人左右，全省2.8万多个大队，有2.6万多个大队（约占90%）开展了教育。《前十条》下发后，江西省委于1963年6月底至7月初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对运动的部署作了比较大的调整。决定在153个公社进行试点，在此基础上，1963年冬至1964年春铺开第一批726个公社。这样第一年便可完成全省30.3%的公社，整个运动可在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内搞完。到1964年5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313页。
② 同上，第321页。

月，实际进行了试点的有165个公社，其中省委直接进行试点的共20个公社，有安义县的18个公社和南昌县的八一公社、东乡县的水南公社。宁夏于1963年7月成立社教运动办公室后，在青铜峡县的叶盛公社、西吉县的兴隆公社开展了社教试点。马玉槐、马信、江云等自治区主要领导人亲自带队蹲点。与此同时，由自治区和各市、县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伍，在全自治区各市、县的11个公社、113个生产大队、753个生产队开展了试点。广东省于1963年7月召开了全省县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了“四清”中组织队伍问题。会后，开始农村“四清”试点。广州市委也召开了郊区区委、县委书记会议。研究部署农村“四清”运动，决定以市郊石井公社、花县炭步公社、从化江浦公社为“四清”试点。安徽省全省抽调2万名干部到农村搞试点。山东省根据中央部署，陆续组织了2.8万多名干部开展社教试点工作。上海郊区农村从1963年3月下旬开始，先后抽调1474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分赴郊区人民公社开展“四清”试点。6月24日至7月10日，市委召开农村三级干部会议，学习贯彻《前十条》，并教育和启发干部自觉交代问题，洗手洗澡。此后，试点工作陆续开展。从一开始的6个公社，随后扩展到44个公社，直至扩展到郊区10个县的61个公社，占全郊区197个公社的31%。内蒙古自治区在华北局于6月召开的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之后，研究决定分别在农村、牧区和城市进行试点，以取得经验。试点地区有乌盟卓资县，呼和浩特市郊区桃花公社贾家营、兴旺庄两个大队。河北省组织了近3000名干部，搞了328个大队的“四清”试点。到1964年2月20日，省委搞的15个大队和地委搞的53个大队，已经结束或即将结束。县委的试点，因为开始得晚，一部分已结束，大部分还在“四清”阶段。

从全国各地“四清”试点的基本方法和步骤看，大体上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摸清阶级斗争的基本情况,宣讲中央政策,在此基础上,组织阶级队伍。

工作组进村后,先通过访贫问苦,摸清大队的基本情况,包括从土改、合作化到公社化,阶级、党组织和干部情况等。如北京市通县牛堡屯公社中街大队在"四清"试点时,工作组对大队的基本情况作了考察,认为牛堡屯的历史非常复杂。从土改到1961年民主革命补课的11年间,漏划地主、富农和一些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计拉拢腐蚀干部,钻入党内,篡夺社队领导权。虽然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先后换了七任党支部书记、九任村长或社长,仍然没有挖掉坏根。地富反坏活动猖獗,贫下中农忍气吞声,生产工作长期落后。由于没有建立阶级队伍,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封建势力没有被彻底打垮,不少地富反坏分子仍然采用请客、送礼等手段,拉拢腐蚀干部。全大队七个生产队中,有三个队重用了10个地富分子。曲阜县委工作组反映,油坊大队的地富反坏气焰十分嚣张。全大队49名地富反坏分子,有20人活动很猖狂。庞家村富农、饲养员王××,去年放火烧掉牛草1000斤,牲口喂得爬不起来。有的地富打党员、骂干部,并扬言"太阳不能光晌午",公开进行复辟活动。此外,封建迷信活动也很严重。神汉、巫婆到处行骗,"看风水"、"续家谱"和买卖婚姻的风气很流行。干部严重多吃多占、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有的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大队、生产队干部76人中,有上述行为的43人,占56.5%。

摸清阶级斗争的复杂情况后,工作组开始向干部和各阶层群众亮明政策,交底交心。首先向大队党总支交底,然后按照先党团员、干部,后贫下中农群众的步骤,传达和宣讲中央和毛泽东关于目前农村工作的指示精神,主要宣讲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前十条》和《六十条》。有的边读边讲,有的集中讲解分散讨论。工作组宣讲后,群众有的反映:"中央文件是开心的钥匙,让穷兄

弟爷们们都来听听,长长见识,心就更齐,事情就更好办。”

在“讲”的基础上,进行“组”,就是扎根串联,访贫问苦,组织阶级队伍。一般是先寻找老贫农根子,同时进行严格的“四查”,即查成分、查历史、查思想行为、查社会关系。把苦大仇深、立场坚定、政治可靠、劳动积极、作风正派的贫下中农骨干选出来。这一步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如有的贫农积极分子说:“这回的积极分子,真是沙里澄金找出来的。”有的说:“过去划成分是草筛子过,这回是小米筛子过细箩。”如有的地区提出“四不要”,即:历史上干过坏事的不要;与地富、投机倒把分子有拉拢的不要;劳动不好,有过偷摸行为的不要;与手脚不干净的干部有拉拢的不要。山东曲阜县陵城公社鲍家庄大队汇报的 114 户贫农名单中,有一户老中农,一户来历不明,于是把这两户马上拉了下来。

在此基础上,各生产队普遍建立了贫下中农委员会,下设贫下中农小组,并选出了主任和委员。这样,开展运动的基本组织就建立起来了。一划阶级界限,一组阶级队伍,各阶层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如曲阜县陵城公社鲍家庄大队贫农鲍玉林,第一次开贫下中农会漏掉了他,让他参加一般社员会,他质问干部说:“我是贫农,为啥叫我跟中农一起开会?”有个出身贫农的社员孙光荣,因为和坏分子拜把兄弟,共同做投机买卖,大家不让他参加贫下中农会,老婆、儿女都埋怨他,后来他主动找工作组表示:要和坏分子决裂,回到贫农这边来。一部分老中农也主动向贫农接近,老中农孔光坤向贫农组长打听:“为什么开会我不在名?”另一个老中农孔凡会原来是个“老落后”,现在也积极起来。中农向党靠拢了,坏人则表现恐惧。地主孔宪动,早些日子骂社员是“狗熊”,那几天吓得不敢出门。

组织阶级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战斗”。各地工作组动员广大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一般是先由领导干部作阶级斗争的辅导报告,把资本主义倾向、封建复辟活动以

及社会上的各种“歪风邪气”、“牛鬼蛇神”拿来示众，然后放手发动群众展开讨论，背靠背地揭发问题。临沂县涑河区共揭发出地富反坏分子破坏活动事实3266起。大量的阶级斗争材料揭发后，许多人大吃一惊。说：“这几年俺是拿着老虎当狗喂，好险呀！”“这几年俺就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叫地主、富农的花言巧语把咱迷住了，如果再晚几年搞社会主义教育，天下就要大乱了。”“这几年俺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要是再不搞社会主义教育，咱贫农和地主就要串花了。”有的说：“阶级斗争由湖南、河南到了北京，由朝阳金盏村到了海淀，现在又到了咱们公社、咱们村里了。”有的说：“阶级斗争到了我脚跟前了。”

第二阶段，大放包袱，开展“四清”。

大量的阶级斗争揭发出来以后，首先是干部“洗澡”，放包袱，目的是解放90%以上的大多数，便于轻装上阵，一致对敌。“洗澡”的方法一般是“洗温水澡”，要形成一个热烈的政治空气，面对面地检讨，背靠背地提出批评意见，以便互相帮助，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由于许多农村在运动前干群矛盾比较突出，运动开始后，干部普遍比较紧张。如山东烟台诸高炉大队支书张金英从公社开会回来以后，耳朵发炎，脸也肿了，自己觉得矮半截子，没有脸领导群众，也不好意思找工作组去主动研究工作，思想斗争激烈。有一天晚上家里人都去看戏，他自己躺在家里看门，既忘了喂猪，又忘了堵鸡窝，正当似睡非睡的时候，觉着有人在窗外喊：“要交代！要交代！”自己就醒了，闹得非常紧张。荷百村会计徐丰财一次合伙贪污840元，贪污以后，就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经常有病，县里开会计会，一提到会计人员要手头干净，自己就病倒。他忍受不了这种过重的刺激，感到不交代问题，万一被法办了，对不起祖先，更对不起儿女，因此热泪夺眶而出，下决心交代问题。并对别人说：“人贪污了就像惊了枪的兔子一样，一天舒坦日子也没有过，今后一万个不敢了。”

有的干部在放包袱过程中抵触情绪较大，如北京海淀区老营房大队宽街生产队的干部在思想上压力很大，小组会上，支书睡觉，队长看报，一言不发。当和干部谈起对群众意见和看法时，支书说："当干部的就是陪灵戴孝再打幡，社员也不会说你好，我当了这几年的干部，我们家坟头不定打了多少道箍了呢。"有的干部认为："当干部没有好下场"，"受气挨骂不讨好"，"精神上受气，经济上吃亏"，"干了一年落个年终算总账，不是批评就是斗，寒心！""不如当个社员，分不少挣，累不多受，会不多开，自由自在"。

在帮助干部"洗澡"、"放包袱"的同时，开始"四清"，即清账、清财、清库、清工。大队建立"四清"委员会，小组建立"四清"小组。"四清"首先是从群众最关心的粮库清起，将库存查出后，转而进入查账。

查账是"四清"中最关键的一环。"四清"前，许多大队账目十分混乱，财物账目记载不全，财外现金、实物来往很多，会计账、保管账不符。会计调换频繁，没有交接手续，新老会计账目不衔接。实物、现金与账目不符，有的保管员根本没有账本，烟盒纸上也记着账。一年的收支分配、库存大账，社员不知道，干部也说不清楚。群众对此反应强烈。如有的群众反映："不像个起家运的日子，跟破大家一样。"说"干部穿大褂，不参加劳动，站着拿分，串亲外出也记满勤，吃喝送礼十分普遍"，"干部吃请，社员受累，请客的占便宜，集体倒霉"。有的说："集体的东西，个人的手，五湖四海交朋友。"

在查账过程中，一般采取了以下几种做法：一是"四清"小组查账与群众鸣放相结合。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有重点地查账，并且用查账的结果推动群众鸣放。二是内查外调相结合。在清理各种票证和奖励物资时，都到粮站、棉站等有关部门查出数据，与账上数字核对。三是发动干部、群众找漏账。由于账目不

全，账账不符、账实不符是普遍现象，就采取找漏账的办法，先把账补上。四是查账与调查研究相结合。有些问题账上无从查证，就采取调查研究的办法。五是小型对证会。账外的问题主要靠干部放包袱把问题落实。干部谈的情况与群众提出的情况有出入时，“四清”小组就召开有关人员的小型对证会，当面对证。六是群众运动与专案调查相结合。有的问题案情较大，问题复杂。群众提出线索后，就建立专案小组进行查证。

查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不仅包括工分账，也包括各种财物账，实际上也是一个清工分、清财物的过程。如北京郊区通县牛堡屯公社中街大队查账时，就清查了粮食账、现金账、棉花账、油料账、粮票账、油票账、布票账、针织品票账、农业券账、肉票账、工分账、财产账等。

通过“四清”，有力地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群众对此反应比较积极。有的说：“洋学生变成了庄稼汉，官老爷变成了农民，干部放下架子和社员一样了。”有的说：“过去是队长见队长，钞票哗哗响，你说买飞鸽（自行车），他说买国防（自行车）。现在队长见队长，忙着把活抢，你说买小车，他说买粪筐。”广大干部也受到深刻的教育，有的说：“四清救了命，今后一伸筷子，一动手，就得想想这次四清，再也不犯这错误了。”

第三阶段，群众洗手洗澡，加强自我教育。

在干部洗澡和“四清”工作基本结束后，有的地方专门拿出一段时间，向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号召群众自觉革命，洗手洗澡。

干部认真洗澡和积极退赔，对群众影响、教育很大。有的群众说：“干部的包袱放下了，咱们社员的包袱也得放放，洗洗思想，这样才公平合理，才能团结一致。”“人家能自觉革命，咱也能自觉革命。”“早洗水清，晚洗水浑，晚洗不如早洗。”如有一社员，偷拿过队里的豆子、玉米，十分悔恨，激动得站起来连连检讨说：

"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咱们穷人翻了身,可我不争气,办出了这样丢人的事,坑了集体,害了自己,这臭包袱不放,我的脸往哪儿搁!"随即当众表示:"以后决不再动队里的一个谷穗。"有的社员说:"要洗,就得洗个彻底,不能留下一点泥,沾在身上难受。"有一社员在小学做饭,特地赶到会场,要求给他留点时间洗洗澡,并说:"你们放了包袱一身轻,我也不能背着包袱走!"① 群众放的包袱主要是社员抄肥自搂、多种乱种十边地、弃农经商、卖高价粮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问题,巫婆神汉封建迷信活动以及小偷小摸、赌博等问题。如有的地方封建迷信活动盛行,群众说:"解放前信神、敬神,没吃过饱饭。解放后我不信它,也有饭吃。"有的把家里供奉的灶王爷、财神爷撕下来带到会场说:"这东西没用,还是相信毛主席。"

在群众放包袱的同时,各地也广泛开展了大讲"三史"、讲故事等活动,进行回忆对比、忆苦思甜,从而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用家史、合作化史、村史教育农村青年,这是东北局宋任穷向中央及毛泽东所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两个报告》中提出的。其主要做法是请一些苦大仇深、觉悟高的老贫雇农现身说法,回忆对比,讲家史、村史、合作化史,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讲村史前后,有的大队演了"三世仇",展览了今昔对比的漫画,将本村的村史及一部家史登上黑板报;有的还放映了《暴风骤雨》等影片,激发群众的阶级感情。许多人看了电影、戏剧都感动得流了泪。北京昌平县河沙公社西沙屯大队,共培养了27个贫下中农作为典型,在小组会上忆苦思甜。在典型的带动下,以苦引苦,许多人都情不自禁地要求诉苦,有的人泣不成声,掀起了群众性的诉苦高潮。第五生产队召开诉苦会,老

① 北京市委办公厅编:《郊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汇集》第2册,第24—25页。

贫农李宽带头诉苦后,立即有七八个人争着诉苦。一人苦引出众人苦,会议开到深夜人们还不愿散。贫农尹风秋,诉说了祖父三代给地主扛活的苦后,痛心地检讨了偷摸庄稼、以粮换物的错误,她说:"咱穷人做出这样事,真是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毛主席,我这是翻身忘了本!要是把集体整垮了,还得回到旧社会,受苦受穷。"诉了过去苦,对比今日甜,人们猛醒过来说:"这是好了疮疤忘了疼,自己又不知不觉地去搞资本主义,也干起剥削人的勾当来了!从今以后,咱穷人决不能再干这样没良心的事。"有的说:"资本主义道路千万走不得,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光明大道。"有的说:"这回才算找到咱村落后的病根,咱们得时时刻刻不忘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作斗争。"①

贫下中农的回忆对比,进一步激发了群众的阶级仇恨;干部洗手洗澡,轻松上阵。下一步就是集中火力,一致对敌了。

第四阶段,集中火力,对敌斗争。

前一阶段的运动,经过艰苦细致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了开展对敌斗争的基本队伍。经过"四清"和社会主义的自我教育,干部和群众放了包袱,地富反坏的破坏和投机倒把的罪恶被充分暴露和孤立起来,于是,工作组率领贫下中农,集中火力,开展对敌斗争。

下面是北京市郊区开展对敌斗争的具体场面。首先是教育分化、瓦解敌人。开始,有些同志主张对敌人"一勺烩"、"一杆子打",凑材料整他们,不主张对四类分子事先开教育会,生怕他们坦白了,就不好斗了。工作组强调,为教育改造四类分子中的多数,争取一些人投降起义,使少数顽固敌人更加暴露,更加孤立,要对敌人作具体分析,不能看成铁板一块,要区别对待,最大限

---

① 北京市委办公厅编:《郊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汇集》第2册,第28—29页。

度地分化瓦解敌人。对一贯表现较好的，教育他们继续劳动守法，有的可以摘掉帽子；对表现不好的，要首先教育他们投降起义，对少数经教育和评审后仍不悔改的，则开展说理斗争，予以揭发批判。这样做，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有的富农说："这么讲讲，明白了好多事，社会主义是光明大道，与其让政府牵着鼻子走，倒不如自个儿老老实实跟着走。"有的说："咱们一定跟着党走，往好道走，不走岔道。"有的坏分子在评审会上摘了帽子后，当场站起来，举手高呼："感谢毛主席！感谢群众宽大！"其次，组织力量斗倒最顽固的敌人。大兴县北臧村公社大臧村在说理斗争以前，开了 80 多人的诉苦会，会上揭发，1946 年地主还乡团封门杀人，被害的干部和群众，有的陈尸街头，血肉横飞，有的被活埋。许多群众听了失声痛哭，有的说："现在有党给撑腰，印把子在咱们手里，团结起来和敌人干到底。"这时，群众激愤，有些积极分子和干部就主张"武斗"，他们说："对这种人没啥可说的，就得揍。"有的提出让他们"跪砖头"、"跪木橛"，有的说："就是不打，也要弄一桶水、一条板凳、一根麻绳，吓唬吓唬。"由于斗争声势浩大，"敌人"完全陷入群众的包围之中，不得不低头认罪。群众说："这一杠子，打下了他们五百年的道行！"第三步，落实监督改造，巩固斗争成果。敌人斗倒了，如何处分？有的群众主张抓起来"上交"，有的说："对待这仇人，就得靠穿红道裤子的（指民警）治。""这帮人都是油锅里抓钱的主，什么事都敢干，趁早抓起来。"工作组经过反复教育，群众同意就地监督改造。有的贫农说："现在他们都臭得闻不得了，我看留在村里管，满成。"有的群众说："一个地主才两个眼，我们大伙有几百只眼，看，也把他们看化了。""对地主这伙人，咱们人人都是穿红道裤子的。""我看

毛主席的办法好，斗完了让群众管，是个高招。"[1] 运动中，有的地方还物色了阶级立场坚定、对敌斗争积极的治安保卫积极分子，以加强对敌斗争的力量。

第五阶段，整顿组织，巩固成果，大搞生产。

"四清"运动中，由于揭发出许多干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多吃多占、腐化堕落，因此，各地在"四清"的同时，也进行了整党工作。

整党工作的方法和步骤一般为：第一，教育党员。主要通过上党课，讲解党的性质、目的、现阶段的任务、党员十条标准以及党的团结等问题。第二，鉴定和重新登记。先由每个党员作自我检查，同时表明自己是否申请登记，愿意申请者填写申请书，然后由其他党员和列席会议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提意见，作出鉴定，同时讨论是否准予登记，是否给处分。对于不提出申请登记，即准予退党，不再进行讨论和鉴定。最后把每个党员的书面鉴定和处理意见在支部大会上正式通过。第三，组织处理。对犯有严重错误、思想认识不深刻的党员，经支部党员讨论通过开除党籍；对于性质严重，但在运动中悔改表现好的人，给予从轻处分。第四，支部改选，健全领导核心。

对于这次整党，群众反映："这次整得好，整得厉害，这下子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有的说："共产党真伟大，做个共产党员可不简单。以前我看党员做的事还不如我这个白点，现在才知道他们是不够格的党员；过去我有些自私，以后我要好好改，争取做一个党员。"不少党员反映："这次四清从脑门上敲了一下，真解渴，这场革命是解放以来头一回，从今以后，永远不犯四不清的错误，还要把这条教训传给儿孙后代。"

---

① 北京市委办公厅编：《郊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汇集》第2册，第37—39页。

经过“四清”、对敌斗争以及整党工作后，干部和群众积极组织生产劳动，掀起了一个大搞生产的高潮。

从试点的总体情况看，大部分地区搞得比较好，基本上能够按照中央制定的《前十条》的规定开展运动。如规定“四清”的基本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对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坏人坏事，处理方法必须以教育为主，惩办为辅，防止逼供信，严禁打人和采用任何变相的体罚等等。这些规定，就开展运动本身而言，是正确的，使运动能够纳人良性循环的轨道。同时，试点阶段的“四清”基本上限于经济领域，即小“四清”，而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四清”尚未大规模开展，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不太浓烈。而且各地基本上一方面成立“四清”小组，一方面成立生产小组，在搞阶级斗争的同时，也抓生产斗争。

但是，由于“四清”运动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实践产物，各地开展运动之始，先人为主，认为农村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存在地富反坏的封建复辟活动和新生资产阶级势力的猖狂进攻。因此，在运动中，人为地制造了不少阶级斗争不断激化的事实，产生了打人、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据薄一波回忆，湖北省第一批试点铺开前后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在25天内就死了74人。广东在试点中，共发生自杀案件602起，死亡503人。[①]

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第472号摘录刊载的湖南、湖北的两个材料反映，不少地方发生乱斗现象。据常德地委监委重点检查和各县反映的问题有：(1)乱搞斗争、打人。常德县有3个公社、13个大队发生非法斗打现象。(2)乱搜查。常德县六坪公社赵家湾大队第八生产队，过去因农具保管不严，失散很多，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干部挨户到社员家搜查，引起社员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50页。

严重不满。(3)重点集训。华容县万庾公社,从10月6日起集训了12人(做生意的社员3人,四类分子9人),白天无偿劳动,晚上集中讨论。(4)乱扣帽子。常德县长岭岗公社新华大队,把搞家庭副业、多搞自留地的,都称为“资产阶级”。(5)乱立“罚规”。常德县有7个公社出现了这种现象。该县韩公渡公社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规定“运动工分”,即积极参加会议的奖工分,参加会议不积极的罚工分。该县谢家铺公社党委在自己所搞的重点大队规定,在运动中,干部不参加会议,初犯检讨,再犯罚工分50分;社员不参加会议,初次当众检讨,再次罚工分100分。(6)评“五坏”、“无好”社员,侮辱人格。汉城县护城公社周文庙大队黄家湾生产队,在这次运动中,评了6个“五坏”社员,并召开会议发动群众向“五坏”社员提意见,挖思想根子。常德县周家店公社,在运动中首先评出“无好”社员,然后进行大会批判。汉寿县毛家滩公社和平大队第八生产队,在评出的“无好”社员门上贴一白条,进行侮辱。上述问题,虽然只在少数地方发生,但在政治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使得一些社员惶恐紧张,有的因害怕而外逃他乡“躲藏”。

196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发出《关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严禁打人的通知》。《通知》指出:根据许多地区的材料反映,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些地方发生打人和乱搞斗争等违法乱纪现象。这件事应该引起全国各地党组织的严重注意。请各地的县一级以上党委,立即进行一次检查,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防止、纠正。中央已经多次指出,不仅在人民内部的教育运动中,绝对不允许采取打人、罚跪、捆、吊这类粗暴办法,对于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等,也应该依法惩处,而不要用打人等办法对待。凡是已经发生打人现象的地方,由上级党委负责,进行严肃的处理,对犯有这种错误的人,特别是领

导干部，应该责令认真检讨，情节严重恶劣的，给以必要的纪律处分，并且向群众进行适当的解释，消除群众的怀疑误会。①

同年3月15日，帅孟奇在《关于湖南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的报告》中反映，在运动初期，有些地区发生了自杀、逃跑事件，违法乱纪的情况也有。截至2月底，全省死了76人(3月11日，王延春在中共湖南省委二届六次全会扩大会议上报告自杀了97人)，常德地区最多，达29人。并再次谈到常德地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的主要问题：(1)自杀、逃跑。自杀事件，先从地县委的试点公社开始发生的。运动中，集训、打人、罚跪、罚站；毁菩萨、拆庙，乱订规章制度，乱拿实物作物；乱划成分，牵累家属；没收群众家谱；强拉新娘的轿，等等，违法乱纪的情况也不少，有些地方比较严重。(2)有些地方贫农、中农的关系很紧张。有些地方在串联组织贫农队伍的过程中，一方面对贫农提出了“几不要”，比如，家穷无出息的不要，妇女不要，社会关系复杂的不要，出工不积极的不要，等等，有的还召开了“有问题”的贫农会议；另方面，有的地区也没有注意团结中农，引起中农的恐惧和不满。(3)经济退赔偏宽偏严的现象相当普遍。比如，有些地方在计算赔退时，农活工夫质量不好，影响生产的，撒种不匀，多用了种子的都要赔偿；或者乱搞男女关系，女方没有完成工分，也由男方赔偿，等等。“鸡下蛋，蛋孵鸡”的计算方法也很普遍。经济赔退处理的面偏宽的也很多。

《后十条》

鉴于试点中出现的问题，中央认为有必要对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作出明确的规定。1963年5月15日到6月15日，彭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84页。

真到河北、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八省视察工作，在河北，他找了县委书记谈了“四清”，在西南局、西北局，他找领导同志谈了话，并听取了一些地、县委和蹲点工作组同志的汇报。7月4日，彭真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有关当前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五反等若干问题的报告》。

在这一报告中，彭真如实地反映了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措施。第一，运动中存在急躁情绪。部分领导同志没有准备好，甚至根本没有准备，就想大干，对这次伟大革命运动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估计不足。因此，认真学习中央和毛主席的有关指示，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下定决心，充分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深搞到底；另一方面，要防止急躁情绪，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这一运动。第二，关于“四清”的时限问题。在中央指示中，尚未作统一规定，各地做法也不尽一致。看来，清得过远并没有必要，害多利少，而且群众也不一定都这样要求。一般从《六十条》草案下达到农村的时候，即从1961年下半年起，就可以了。希望中央能有一个统一的规定。第三，关于团结教育上中农问题。有些地方贫下中农很厌恶、痛恨上中农，甚至侵犯一般富裕中农，有的地方已经提出打击“单干头”，打击“暴发户”的口号，分了“暴发户”多余的粮食。对于上中农必须加以分析，区别对待。上中农的绝大多数是拥护公社集体经济的，表现是好的。因此，必须教育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了解：上中农虽然有两面性，但这个阶层是我们的朋友，绝不是我们的敌人。第四，关于工作人员中的地、富、资本家的子女问题。有的地方，对于他们中间有一般性错误的人，也采取厌恶和仇视的态度，因而有打击面过宽的倾向。要教育党员、干部，对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要区别对待，要看到他们中间，有表现很坏的阶级异己分子，有表现很好的改造好的分子，也有一些中间状态的分子，要注意区分敌我问题和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分别进行

斗争或团结教育工作。第五，对于犯错误干部的区别对待问题。在运动开始阶段，首先要在党员干部中，在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和群众中，分清两类矛盾。在共同对敌的前提下，发动党员干部主动洗手洗澡，解决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使干部轻装上阵，同贫下中农一道，团结上中农共同对敌。第六，工作组下去和依靠原有组织问题。对于领导被地富篡夺的、蜕化变质的社队，或者因为别的原因，情况很混乱，无力领导运动的社队，应该派工作组去发动群众改造领导。在正常的情况下，一般应该引导、教育并且基本依靠原来基层的组织和干部进行此次运动。第七，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处理问题。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必须坚决揭露，严肃批判，应该退赔的必须退赔。同时，要在不损害严肃性的原则下，尽可能从宽处理。对于那些老老实实地交代，退赔了款物，坚决悔改，特别是有立功表现的，纵然贪污盗窃数目较大，也可以不以贪污论罪，至于是否给以行政处分或党纪处分，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另行处理。从彭真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措施看，实际上是为中央九月工作会议制定《后十条》做了重要的政策准备。

1963 年 8 月 13 日，中央发出《关于对农村工作若干政策问题准备意见的通知》，要求各中央局准备关于贫下中农组织中的若干问题、对于犯错误干部的政策问题以及对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政策问题等材料。8 月 29 日，中央发出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决定于 9 月 5 日召开工作会议，拟讨论的问题有工业发展的方针、1964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农村工作以及国际问题。

根据中央指示，各地陆续向中央提供了有关社教运动和农村问题的材料。如国务院农林办公室秘书组整理的关于处理自留地、开荒地和宅基地问题的一些材料，公社组整理的各地对于审查清理农村阶级的一些意见案以及九个贫下中农组织条例，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的政策问题的意见，中组部关于在“四清”运动中对基层干部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公安部党组关于在“四清”运动中对敌斗争的九个问题的意见，以及安子文关于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等。

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和酝酿后，9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就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若干政策问题展开了讨论，并由邓小平和谭震林主持、田家英执笔，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纪要）。

工作会议期间，与会者就这个纪要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关于干部的处分面。纪要第一稿中，关于干部的处分面规定，以县为单位，受处分的干部控制在2%以内。对于这一规定，大家认为，这样的处分面过大了，除了蜕化变质和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分子有多少清洗多少外，干部的处理面一般以控制在1%以内为好。第二，对于一些篡夺了领导权的社队，要撇开原来的基层组织，首先夺回领导权的提法，有的同志提出，在未判明社队的领导权真正是被敌人篡夺前，不要撇开原来的组织，以免被动。另外，建议把被篡夺领导权的界限写一写，约束一下，不要轻易搞夺权斗争。第三，合作化以后，依靠不正当收入而富裕起来的贫下中农，是否要改划成分。讨论中有相反的两种意见，绝大多数同志主张不再改划。第四，新上中农和一般老中农中少数从互助组以来一直表现很好，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可否参加贫下中农组织。讨论中也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第五，对于有反动言行的地富子女，是否戴地富帽子。因为这些人在土改中年龄还小，好些同志不赞成给他们戴地富帽子，主张犯什么罪戴什么帽子。第六，关于对贪污分子的处理意见。有的同志提出，只要检讨得好，可以按毛泽

东在1962年的指示,不戴帽子,不以贪污论处,并且建议把毛泽东指示的原话写在纪要上。

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强调,现在,我们城乡的工作应该抓紧做好,刚才总理讲的城市五反,农村十条,在明年这一年要进一步展开,可能后年还需要一年,也许要三四年才能搞好。要团结绝大多数,团结95%以上的人民、同志同群众,孤立那个极少数的确是破坏分子、反动分子。也不是都要捉,也不是都要杀。杀戒要极力缩小,捉人要少。你捉起来,关起来,不好办,放出去以后还是捣乱。还是依靠群众来监督他们,用公开批评的办法,用我们农村搞十条这样的做法,使他失掉市场。

在经过多次修改后,9月27日,田家英将第五稿交送谭震林并转邓小平。同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大会上,向全体与会者宣布:这个文件大体上比较好。[①] 10月5日邓小平将文件送毛泽东,并指出:"主席,我看这个文件可以了。请你抽暇审阅修改后定稿。"同时,刘少奇、周恩来也审阅了第五稿。

10月8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贪污的一定要退赔,但运动要谨慎。他说,可否这样设想,总的这个运动特点是十年没搞(老三反起),十年积的问题很多(尽管算是从1961年),如不警惕,打击面可能大了。还有这几年党内斗争也很复杂,还有三年灾荒困难,所以要趋向谨慎。湖北农村支部书记盖两间房,就是五百元以上,现在看,只能由各省自己定农村的标准,城市五反的也许好定一些,农村还是以百分比那个杠杠为主,但不管多少钱,都要退赔,但要区别浪费与贪污。这个运动要二三年,后年还可能有个尾巴,只要政治上宽点,退赔方面、揭露方面搞严一点,也要实事求是,毛病就不会大。

---

① 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第98页。

在这之后，毛泽东又找河北省委、河南省委以及中南局和中南一些省的领导同志讨论了一次，在上面增加了一段点面结合的问题。后来又到浙江找华东局的领导同志，以及华东各省委第一书记，此外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开会讨论了一次。可见，中央和毛泽东对《后十条》是相当重视和十分谨慎的。据文件起草人逄先知的回忆，当时，党内有些人，包括某些地方上相当负责的人的议论，说是右了。这对田家英无疑形成一种压力。正在这时，从武汉传来了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要在全国宣讲两个"十条"(即"双十条")的指示。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后十条》草案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了！[①] 10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的通知》，要求将这个文件向农村全体党员和全体农民宣读，同时要向城市的一切人宣读，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

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10月31日召开第116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专门讨论《后十条》的修改。据田家英的介绍，毛泽东修改送回后，他又作了比较大的修改。

这次政治局会议基本上通过了修改后的第六稿。11月1日，刘少奇同其他领导人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并在毛泽东主持的有华东局负责人和华东各省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上，对文件作了进一步的修改。[②] 11月4日，又由邓小平主持进行了最后的讨论修改。当日，由田家英将修改稿送毛泽东审阅。11月14日，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正式通

---

① 董边、谭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第98—99页。

② 金冲及、黄峥主编：《刘少奇传》下，第950页。

过了这个文件，随即由毛泽东批准发出。这个规定草案，后来称为《后十条》。

由于《后十条》是在《前十条》的基础上加以撰写和完善的，因此，两个文件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相同之处是：第一，都强调社教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提出"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复杂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说各地的试点充分证明，社教"对于打退曾经嚣张一时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对于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对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都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并引用《前十条》最后毛泽东的话，说"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社教之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

第二，都强调阶级斗争。说"毛泽东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分析和指示，具有伟大的革命意义和历史意义"。社教问题应该抓住五个要点，而这五个问题中间，"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思想，深刻地领会这个思想，是正确地开展和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关键和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五个要点"，"这就是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

第三，都强调依靠贫下中农组织。《前十条》中说："不可忘记依靠贫下中农"，"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我们要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要发展农业生产，不依靠他们依靠谁呢？"《后十条》中专列"关于贫、下中农组织"一项，对贫下中农组织的建立以及经常性工作作了规定，并把建立贫下中农组织作为社教运动的12项工作之一。

第四，都强调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双十条"都十分重视

此问题，认为“干部按照规定的制度认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后十条》进一步强调：“动员和组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争取在三年内使全国各地农村干部都认真地参加集体劳动，并且长期地坚持下去”。还提出要“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提高参加集体劳动的自觉性”，“必须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改进各级领导机关，主要是县区两级机关的领导作风”等等。①

不同之处是：第一，《后十条》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认为工作队如果只在基层干部的圈子里打转，不去扎根串联，不发动贫下中农群众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把基层组织和原有的干部抛在一边，不依靠他们进行工作，也是不对的；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进行指导和帮助，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方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文件提出绝大多数的农村基层干部都是好的，是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在积极参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过程中，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是能够逐步改正的，他们的思想意识是能够逐步提高的。试点经验证明，团结95%以上的干部，是团结95%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文件认为，不可挽救的蜕化变质分子和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分子，不过占1%左右，对犯错误的干部总的精神是教育为主，在具体做法上要划清政策界限，做好教育工作，做好经济退赔和组织处理工作，处分要实事求是，该受什么处分，给什么处分，处分的面要严格控制。除开不可挽救的蜕化变质分子和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分子以外，这类人，有多少清洗多少。以县为单位，把受处分干部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385—389、316—317、325、411页。

的人数,一般控制在2%以内。

第二,《后十条》强调团结95%以上的群众,认为这是进行社教必须执行的一项根本政策。为此文件提出:(1)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并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具体来说,要分清以下几个方面的界限,即:必须把进行复辟活动的阶级敌人同那些一时糊涂而被敌人利用的落后群众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分子同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农民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当的集市贸易活动、临时的肩挑运销及小量的贩运活动加以区别;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同正当的社员家庭副业加以区别。(2)必须团结中农。在对待中农问题上,主要是对待上中农,文件认为这是能不能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在划分上中农时存在不同标准,文件强调,划分上中农的标准是,占有较多生产资料和进行轻微剥削。文件也指出,在组织阶级队伍的时候,需要确定哪些人是老下中农。但除了个别情况特殊地区以外,都不重划阶级。农民的阶级成分,应当以土地改革时期划分的成分并且参照合作化以前变化了的成分作为依据。对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必须教育、批评,情况严重的还要进行必要的斗争,但不能笼统地反对上中农。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少数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上中农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社员利益的思想和行为。(3)正确处理地富反坏分子问题。基本方针是:必须坚决打垮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同时,必须把斗争的锋芒,准确地、集中地指向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不要扩大打击面;对于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基本上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对于有破坏活动的漏划的地主、富农分子一定要清查出来,但不需要一般地进行清查漏划地主、富农分子的工作。(4)正确对待地主、富农的子女。团结95%以上的群众,应当包括地主、富农的子女中的大部分人,也就是他们当中一切可以争取的人。

第三,《后十条》强调必须点面结合,积极做好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因为这次社教是由点到面、分期分批铺开的,暂时不系统搞运动的社、队,在一个时期内占大多数,而且由于点上运动的开展,对面上必然引起很大的震动,如果放松了广大面上的工作,就会造成严重的损失。文件同时也规定,如果在面上发现一些情况特别严重、阶级斗争特别尖锐、问题非及时解决不可的社、队,应及时派工作队下去,进行系统的社教。

总之,从《后十条》的最初准备、起草以及修改过程看,这一文件的制定是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多次讨论后集体智慧的成果,是对社教试点的经验总结,也是"带有一定反'左'和防'左'意义的文件"[1]。如文件对团结两个95%的政策规定、强调社教必须同生产相结合、整顿党的组织、干部参加集体劳动以及对中农和地富子女的处理政策等等,这对于防止扩大打击面、改进党的作风、促进农业生产,从而保证运动健康进行,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后十条》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要"挖修正主义根子",并且提出了"一纲五点",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五个要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并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方针。这就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使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必然要把阶级斗争看得越来越严重、尖锐,从而使试点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因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理论根据而更加发展。因此,《后十条》草案的下发,并没有也不可能阻挡运动的继续"左"倾。

---

①　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第100页。

第三章

铺　开

“双十条”宣讲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在印发《前十条》时明确规定，“凡是暂时不准备执行这个运动的县、社和大队，则暂时不要传达。”[①]《后十条》制定后，中共中央于11月14日发出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对上述规定作了重大修改，决定将两个文件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发两本，由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领导干部负责向全体党员和全体农民宣读。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一切党支部都要发给两本，由市委、区委指定负责干部口头向一切人宣读。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警察，照此办理。民主党派成员，由统战部召集大会小会宣读，并发给他们阅读。同时，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以利于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

通知发出后，各地先后开始了“双十条”的宣讲活动。江苏省委于1963年12月20日向中央及华东局汇报了在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试读讲解中央两个文件的基本情况。23日，中央发

---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310页。

出《关于在春耕前讲解一次两个文件的指示》,要求各地"争取在春耕以前,在农村、城市、军队、机关、学校(小学除外)普遍讲解一次,并且略作讨论,粗线条地解决一些问题"[①]。12月14日,毛泽东就部队宣讲两个文件致林彪信,提出:"由团营两级理解力强的军政干部向连队一切人员分几次宣读、讲解、讨论,由群众提出意见,讲解员解答疑难问题,是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社会主义政策教育运动的。军师两级也可派一部分强的干部下去,杂在团营干部中,向连队宣读、讲解,作为军官当兵的一种形式。至于高级首长,例如瑞卿、肖华、杨勇、廖汉生、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等等同志也应择一二个连队去作一二次讲解。……军队一动起来,还可抽出一些干部帮助地方,向工厂、农村作宣讲工作。这样又可以使军民联合起来,人民了解和拥护军队,军队了解和帮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②] 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立即作了部署,在军队中开展了宣讲活动。1964年1月14日下午6时,华北局发出《关于在农村宣讲中央两个文件工作中几个问题的紧急通知》,此后,华北各地普遍改变了前段时间宣讲较慢的做法,重新进行了部署,加速了宣讲活动。3月2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要求两个文件"应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发问,答问,由粗到细,由浅入深,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深入调查研究,直到确实解决问题。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并指出:"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做消极怠

---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第383—384、577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49—450页。

工分子。"①

为贯彻中央指示，使"双十条"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各地组织了大量的干部和宣讲队伍，向群众宣讲"双十条"。如江苏省委组织县以上机关干部和1.7万多名工作队队员学习两个文件，并部署各地先在县、市三级干部会议上宣读讲解，还要求地市委的负责干部亲自深入一两个社队向群众试读讲解。② 河北省接到华北局的紧急通知后，几天之内，全省抽调了12万名干部参加宣讲，其中公社书记、社长以上骨干2.6万多人。从1月20日前后各地宣讲工作已普遍陆续铺开，到春节前，全省农村和城市已普遍宣讲一遍。张家口地委共组织了10519人，其中，地方各级干部9024人，驻军干部745人，中专学生750人。除2264人参加高标准"四清"外，实际参加面上宣讲的人员达到8255人，其中，地委书记4人，常委9人，市县委书记副书记46人，常委79人，专直部局长41人，市、县科局长，工委，公社书记、社长1696人。此外还组织了不脱产辅导员38190人。保定地委社社都派了宣讲队，村村有宣讲员，地、市、县共抽调8951名脱产干部，从中认真挑选宣讲员6625名。全区6184个大队，平均每个大队1.07人。为了帮助群众学深学好，全区组织训练了辅导员17.91万余人，共有生产队46556个，平均每队3.84人。基本上把中央两个文件贯彻到每个角落，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要求。内蒙古党委王铎在呼市郊区贾家营大队进行了宣讲。北京市委郑天翔在国棉二厂作了宣讲。河北衡水地委正、副书记，各县委正、副书记和常委，除因病和外出的，都已宣讲了一次。山西省已有53%的大队进行了宣讲。军队系统绝大多数高级首长和各军区、军种、兵种、各大院校的主要领导干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331—332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第578页。

部积极响应主席号召,下连宣讲,很快形成一支4万多营以上干部(内有400名将军)的宣讲队伍,在1400多个基层单位进行了试点,半个月内,就在全军范围内掀起了宣讲高潮。到1964年2月中旬,已经基本结束。有95%以上的干部、战士、学员、职工、家属以及在押犯人,都参加了学习。北京军区组成了一支有1987人参加的宣讲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有军职以上干部113人(少将以上49人),师职干部213人,科、团职干部817人,营级干部794人,连级干部50人。杨勇司令员已到某部三连宣讲,还拟到某师一个连宣讲。廖汉生政委已到某部一、二连宣讲,还拟到某部一连宣讲。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也已经或即将到连队宣讲。

从各地宣讲的基本情况来看,其方法和步骤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做好组织发动工作。在宣讲前充分做好组织发动工作,是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重要前提。宣讲队进村后,各地采取的办法一般是开好三个会:支委会,主要是说明来意,听取他们的情况介绍,安排宣讲计划;群众大会,主要是说明来意,安定人心,造成声势,发动群众都来听讲;积极分子会,动员他们在学习中起骨干带头作用。如唐山地委在宣讲前召开"三老会",即老党员、老干部、老贫下中农座谈会,或分别召开几个不同类型的座谈会,调查当地的生产情况、阶级斗争情况、干部队伍情况、各阶层的思想动向以及正反两方面的生动的典型材料,同时,还附带了解群众的理解能力以及群众常用的比喻等等,以便讲解时,根据群众的接受程度,恰当地引用群众熟悉的事例,深入浅出地把文件解释透彻,提高宣讲效果。

第二,备好课。参加宣讲的人,一般以自学为主,以集体研究讨论为辅,熟读中央文件,深刻领会文件精神,明确要点,了解各项政策界限,对两个文件要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认识。其具

体做法，大体有三种：集体备课，即一人讲大家听，然后大家提意见、总结；听领导干部示范宣讲后，集体研究，讨论补充；通过训练辅导员，总结经验，改进方法，为讲好课打下基础。同时，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讲解重点，分析当地情况和典型材料，写出讲解提纲，经过讲解人员联合研究，补充修改，随即召集一部分党团员干部和社员，作小范围的试讲，根据群众意见，再修改讲解提纲。

第三，研究宣讲方法，提高宣讲效果。在正式宣讲中，各地注意了宣讲的顺序和宣讲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如唐山地委在宣讲时，在两个文件的安排顺序上，都是先讲“决定”（草案），后讲“规定”（草案）。在具体讲法上，一般是先念一遍原文，复习讨论一次，根据群众讨论的情况，然后逐条讲解，最后再总的讨论一次。“决定”（草案）在念一遍后，一般分三至四次逐段讲完。序言和结语部分，一般是合在一起讲解，也有的先讲序言，认为这样可以说明文件的来源，有头有尾，又可以引起群众的重视。“规定”（草案）在念一遍后，一般分三次讲完。同时，还针对职工、干部、街道居民等不同对象，采取了一些不同的方法。唐山市城市居民中，一般是逐段宣读，逐段讲解；干部、教职员和其他知识分子，理解能力较强，一般是先读全文，再逐条讲；对工人、财贸业务人员，一般是读原文略加解释、讨论一次，然后逐条讲，细嚼细咽，容易消化。保定地委在宣讲时，提出了“六要六不要”，即：要原原本本，不要偷工减料；要严肃认真，不要随心所欲的解释；要适当联系实际，不要离题太远；要讲慢、讲清，不要开快车；要抑扬顿挫，不要丢句、串行；要重点复讲，不要一次讲得时间过长。同时，提出两注意，第一是不要指名道姓地揭发批判，这样容易引起群众的紧张心理，转移听课精力，影响对文件的领会。第二是对四类分子也要认真宣讲，不能形成训斥会。对四类分子宣讲能够起到瓦解分化敌人的重要作用，达到宣讲

的应有效果。

第四，组织好宣讲会。宣讲会的层次，在开过三级干部会的地方，一般分为两层，即：社员群众，包括摘帽的地主、富农以及地主、富农子女在内为一层；四类分子为一层。有些小村，或四类分子较少的村，在征得社员同意后，也有的让四类分子列席一同听讲。没有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地方，一般分三层讲，即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宣讲会的规模，大村一般分片讲，给四类分子宣讲，一般以大队为单位，规模或大或小，主要考虑宣讲能力的强弱以及会场条件好坏两个因素。宣讲会的时间，多数地方是两个小时至两个半小时不等，强调不宜过长，时间过长不仅记不住，而且群众也受不了，到最后容易发生秩序混乱、退场等现象，影响宣讲效果。如唐山地委的宣讲队伍同社员约法三章，明确规定开会和散会时间，按时到就按时开、按时散，晚到就晚开晚散。讲解人员有计划地讲，不拖长时间，防止晚到早退现象，效果很好。

第五，组织讨论，做好辅导工作，巩固宣讲成果。讨论辅导，是加深群众对中央文件的理解，巩固宣讲成果的重要环节。各地在宣讲后，十分重视组织讨论。如唐山地委为做好这一工作，专门成立了一支庞大的辅导队伍，共选拔辅导员 69439 人。选拔的条件也很严格，要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水平，受群众拥护的党团员、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成分好的荣复军人、知识青年；还注意选拔了一部分合乎上述条件的老年人担任辅导工作，以便辅导时更好地联系实际，弥补青年人员有文化、但实际斗争知识不足的缺陷。同时也注意了使妇女辅导员占一定的比重，以便于辅导妇女讨论和给妇女补课。各地在讨论时，一般都成立了讨论组，人数为 10 至 20 人。如何编组，各地有不同的做法，一般按阶层编组，即党团员、干部、贫下中农、一般社员分开编，这样可以有共同语言，减少发言的顾虑，也便于侧重辅导。有的是以生

产队为单位，各阶层混合编组，每个组中都适当搭配党团员、干部、贫下中农、一般社员。这样，干部可以在组内起些辅导作用，也能够直接听到社员的意见。有的地方按讨论问题编组，如讨论阶级斗争，老贫农和青年搭配，通过老贫农的回忆对比，忆苦思甜，加强对青年的阶级教育；讨论各项政策，分阶层编组，议题集中，便于深入；讨论“四清”，干部、社员、干部家属分别编组，便于联系实际。

第六，做好补课工作。由于在宣讲过程中，许多地方漏听人数较多，因此，补好课，是使中央文件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重要步骤。从各地反映的情况来看，漏听的人一般是孩子较多的妇女、饲养员、年老体弱的社员、使役员以及副业班子等。为此，各地采取了许多措施，以清除宣讲工作的死角。如唐山地委，为做好补课工作，抓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组织骨干力量，分头动员漏听的人去补课，并且发动已经听讲的男社员，帮助自己的家属料理家务，看管孩子，给妇女补课创造条件。二是补课的方法灵活多样，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凡是能走动、能离家的，都分片集中起来补课；不能集中的，采取人包人，送上门的办法，个别补课。三是保证补课质量。补课任务由能力较强的辅导员担任，人数较多的集体补课，由宣讲人员像在大会上宣讲一样，细读细讲，不能推给辅导员。四是边讲解、边检查、边补课、边验收，防止把补课任务拖到最后，容易不了了之，或者形成一个补课阶段。五是注意偏僻山区和沿海偏僻村落。

第七，检查验收。各地在宣讲工作铺开后，就开始重视这一问题，有的地区建立了宣讲人员责任卡片，有的地方实行岗位责任制，规定验收不合格的不能出村，由宣讲人员负责重讲。同时，各地、市、县都组织了检查组，分赴各地巡回检查。如张家口地委，在宣讲后期，从地、县、社三级先后抽调 3413 名干部组成 781 个检查组，巡回检查验收。各检查组都是听、看、查、问，全

面考核，边检查，边补课，边验收。各地在验收时，也提出明确的标准。一般包括以下几点内容：一是中央两个文件必须做到家喻户晓，力争达到人人皆知。二是原原本本地宣讲，读得清楚，讲得明白，联系实际，通俗易懂。三是宣讲后收到实际效果，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觉悟，刹住歪风，树立正气，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人们的精神面貌有变化，推动生产和各项工作等等。

"双十条"宣讲后，在各个阶层引起了不同的反应。从各地的汇报材料看，基层干部普遍反映，经过这次学习，更深刻地了解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工作上有了"方向盘"、"指路灯"。认为"学习文件，分清了敌我，明确了方向，找到了病根，清醒了头脑"，他们对文件中阐明的对待干部的方针政策有四个满意，即对干部的全面估价满意，对"十六字"方针满意，对"冷处理"的办法满意，对开头就把政策底细全部交给他们满意。认识到这次运动"不是换班子、倒干部，而是换思想、救干部"。不少干部表示："党向我们交底，我们要向党交心。"[①] 广大贫下中农听了中央两个文件的宣讲后反映："过去不把我们当作二百钱数，现在仍要我们作擎天柱，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我们贫农、下中农的心！""听了文件上的话，心里暖了，眼睛亮了，腰杆直了，腿肚子也有劲了。"[②] 纷纷表示："一定要像个当家作主的样子，保住江山，掌住印把子。"中农听了中央两个文件的宣讲后并表示："一定跟着党走，要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有的表示要坚决挖掉资本主义思想根子，并说："党的政策是团结我们，拿我们当朋友，我们得做个真心的朋友。"地富子女对于中央文件把他们列入人民之内，深受感动，感到前途有望。有的反映："现在了解了党的政策，认识了自己的前途，燃起了新的希望。"他们对于把他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第579页。

② 同上，第580页。

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划在95%以内最为满意，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党的政策合情合理，英明伟大。"有的说："自己出身在肮脏家庭，幸亏生长在新的时代，有了共产党的指引，一定要做新社会的新人。"四类分子对于向他们宣讲中央两个文件，普遍感到意外，说这两个是"两好"政策，即对四类分子好、对四类分子子女好。开始认识到只要劳动守法，自己有前途，子女也有前途。有的说："过去是生死不知何日，今天改造有了灯塔。""国民党错杀一千，不放生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仁义服人，再不真诚接受改造，真是天地难容了。"[①] 军队系统的干部战士称赞中央两个文件，是全国人民的"指路明灯"、"无价之宝"，是"威力巨大的精神原子弹"。"不仅管我们这一辈子，而且管下一辈子，管世世代代"。"主席这么大年纪，还时刻为人民操劳，实在使人感动，有了这样的好领袖，是我们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许多人表示"要紧握枪杆子、刀把子，做毛主席和人民的不卷刃的钢刀"。

宣讲活动虽然在各阶层中引起了较大的波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实际宣讲过程中，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比如，不少地区听讲的人较少，据保定地委重点检查，10%至15%的大队，听课的人数只有40%—50%，搞得比较好的队也有10%左右的成年人，因各种情况未受到教育。有少数干部在宣讲工作中马马虎虎，潦草从事。有的讲解员，在宣讲前不进行细致深入的思想发动工作，靠行政命令组织群众听讲，为了防止群众中途退场，便关紧大门，把群众圈在院里讲，结果有的群众还是跳墙走了。有的讲解员在宣讲前，不认真备课，竟把"矛盾"念成"予盾"，把"腐蚀"念成"腐虫"，把"三令五申"念成"三令五甲"，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念成"一抓就灭"。有的宣读文件时多掀过一页，竟不能觉察，仍然照文宣读。也有的讲解员在讲解中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第581－582页。

央文件时，不懂装懂，信口开河，乱加解释。如有的讲解员在讲“决定”(草案)时说：“贫农是无产阶级，中农和富农是半无产阶级，地主是资产阶级，地主不老实就惩办，严重的就宰。”还有的说：“党团员、贫下中农是一家，应该团结起来，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和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中农是一家，应该打击。”有的宣讲员存在任务观点，宣讲得很快，讲得不清，有的因方言障碍，听不懂宣讲。如广东省沙源县灯塔公社“四清”工作队员陈大中在日记中写道：“地县双十条宣讲队伍十多人也和我们同车来到灯塔公社。我住在昂塘生产队，这个小村庄只有 17 户，其中两户中农，一户雇农，其余为贫下中农，没有地主富农。这个队伍住在山区，平时上级管不到。他们对宣讲双十条毫无兴趣，他们听不懂广州话和普通话，我们也听不懂他们的话，工作十分困难。”[①]有的地方组织讨论很差，到会的人少，有顾虑，不发言，特别是干群关系紧张的生产队讨论更差。此外，有个别地方有违反政策问题，宣讲时有的在会场站岗、放哨。有的对不参加会议的扣工分，有的地方还发生自杀，如张家口地委普遍开讲以来共发生自杀事件八起，死五人。

向全党全民普遍宣讲“双十条”，改变了运动之初的谨慎做法，使“四清”运动随着“双十条”的宣讲而大规模铺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也愈加严重。

继续“五反”

试点后，各地的“五反”运动普遍进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的“后两反”阶段，并清查出了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

① 叶曙明：《百年激荡——20 世纪广东实录》第 2 卷，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70 页。

子。据1963年10月上旬不完全统计，全国计有贪污盗窃人民币千元、粮千斤、布千尺和投机倒把获利千元以上的案件2万多起，贪污盗窃人民币万元、粮万斤、布万尺和投机倒把获利万元以上的案件1000多起。[①]

由于“后两反”斗争，涉及问题很多，情况也很复杂，既有敌我性质的问题，也有大量人民内部性质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产生严重后果。1963年7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批转株洲市委《关于从宽处理丁志鹏贪污案件的通报》，并批示：“在‘五反’运动中，对于揭发出来的犯有贪污行为的人，在处理上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一方面要揭露从严、检讨从严、退赔从严；另一方面，只要他们自动坦白交代、检讨得好、退赔得好、决心洗手不干表现好的，可以从宽处理，不以贪污论罪，也可不开除公职。为使犯有贪污错误的人，取得深刻教训，今后不敢重犯，所有赃款、赃物，必须彻底退赔，不能马马虎虎。”[②]

1964年1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监委《关于“五反”运动中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在“五反”运动中，党的一贯指导方针是：敌我问题从严，人民内部问题从宽；在人民内部问题中，批评、自我批评从严，党纪、政纪、法律处分要分别情况，酌量从宽，必须严肃与谨慎相结合。在运动开始时，重点是使干部、群众认识问题的严重性，防止麻木不仁；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以后，即在运动中期和末期，不仅要防止“虎头蛇尾”、“走过场”，尤其要防止把问题扩大化，防止打击面过宽，处分人过多，而事后又要对处分过重、处分错了的人进行甄别平反、赔礼道歉。中央认为，正确处理“两反”斗争揭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11页。

②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主编：《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58—1965），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1页。

发出来的案件，关系着前一阶段运动成果的巩固，关系着今后运动的顺利开展。[1]

中央监委是于1963年11月8日向中央汇报了"两反"问题的处理意见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划分贪污盗窃与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与非投机倒把的界限问题。中央监委指出，贪污盗窃，是指侵吞、盗窃、骗取国家和集体的财物，勒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等行为。投机倒把，是指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套取国家或集体的物资，进行倒买倒卖，长途贩运，组织地下企业（地下厂、店、工程队等），以及从事其他非法商业活动等行为。公私不分，占小便宜，小量贩卖，做私活等，是属于一般性的违反制度、违反纪律和违反市场管理规定的行为。对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下列各种问题，不要视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1)私拿公家的一些价值不大的小工具、零星产品、少量材料或废旧物品的。(2)在生产、销售、运输、保管的过程中，吃用了一些价值不大的东西。(3)虚报多领了少量补助费、加班费、粮油票证以及其他物品的。(4)长期借支或挪用公款的，是违反财政制度的行为，应当令其检讨，归还公款，不要视为贪污。(5)利用职权，削价购买或无偿私分少量公物，多占少量福利款物和补助费的。(6)帮助某些单位、社队，在国家计划以外购买统一调配物资或给予某些方便，接受了对方少量而不是数量较多的东西。(7)错账、错款、错票证无法查清的。(8)违反党和国家的政策、规定，进行小量贩卖活动，或者在自由市场出卖本人的物品、票证，或者出卖自养自产的家禽家畜和农副产品的。(9)请假、旷工、私自进行加工修配、小件制造、装卸搬运等，或者受雇到地下企业做工的。(10)家属搞投机倒把与本人无直接关系的，不要牵连本人。

---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9页。

第二,关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处理原则。总的原则是"过去从宽、现在从严,坦白从宽、隐瞒从严,退赃从宽、不退从严"。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具体而言:(1)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非法所得在300元以下,能够检讨、退赃的,可不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论处,也就是不给予行政、党纪处分。个别情节严重,拒不检讨,拒不退赃的,应当给予适当的行政、党纪处分。(2)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非法所得在300元以上、千元以下,能坦白交代,认真检讨,积极退赃,洗手不干的,可以减轻或者免予行政、党纪处分。坦白、退赃不好的,应当给予应得的行政、党纪处分。个别情节严重,拒不坦白,拒不退赃的,应当加重处分,直至交司法机关依法制裁。(3)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非法所得在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能自动坦白,彻底退赔,决心洗手不干的,可以免予刑事处分;表现特别好的,也可以减免或免予行政处分。坦白、退赃不好的,应当给予刑事处分。拒不坦白,拒不退赃的,必须从严惩办。共产党员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非法所得在千元以上的,一般应当开除党籍,个别表现特别好的,也可以不开除党籍。(4)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非法所得五千元以上,能自动坦白,彻底退赃,决心洗手不干的,可以减轻刑事处分;表现特别好的,也可以免予刑事处分,不开除公职。坦白、退赃不好的,可以从重给以刑事处分。共产党员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非法所得在五千元以上的,一律开除党籍。按照上述的各项处理意见,初步估算,在"两反"斗争中,需要给予党纪、行政、刑事处分的干部,连同"五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犯有其他错误需要给予处分的干部,应当严格控制在参加运动的干部总人数的1%左右(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地富反坏分子除外)。

第三,关于退赃问题。凡属于贪污盗窃的赃款赃物和投机倒把的非法所得,不论数量多少,包括受刑事处分的,都必须彻底退还,不能马马虎虎,绝不能开不退赃的口,绝不能使贪污盗

窃和投机倒把的人在经济上占到便宜。在退赃中,是现金的,退还现金;原物在的,退回原物;已经吃用或损坏了的,应当按照现在的国家牌价退还;已经出卖了的,应当按照出卖价格退还。是票证的,未用的要退还;已用出的,应当酌情退还;出卖了的,按照出卖价格退还。对于确实没有现金可退,需要用实物抵赃的,一般应当要他们通过合法手续,把实物出售用现金退赃;如果出售实物确有困难,也可酌情收取实物,但不要收他们的基本生活资料和日常必需品。退回的赃款赃物,属于个人的,应当交还个人;属于集体的,应当交还集体;属于国家和无法交回原主的,应当交还国家。①

中央监委的报告,就如何开展反贪污盗窃和反投机倒把制定了明确的政策界限,对防止运动中发生打击面过宽等过火行为起了一定的作用,保证了运动的顺利开展。

这一时期,正在开展"五反"运动的各地工交部门掀起了大学解放军、学大庆的活动。1960 年 10 月,在林彪主持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该决议中引述了林彪关于政治工作领域中的四个关系问题,即:在武器和人的关系上人是主要的;在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上领先的应当是政治工作;在政治工作中的事务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上重点应放在思想工作上;在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关系上重要的是掌握活的思想。这就是说,人的因素第一,政治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认为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②

毛泽东对林彪在军队中所搞的这一套"突出政治"的做法很欣赏,认为加强政治工作是反修防修的一个重要方面。1963 年

---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8 册,第 10—21 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3 册,第 744—747 页。

12月16日，毛泽东专门致信林彪、贺龙等人，指出："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① 19日，薄一波向毛泽东报告了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情况，他指出，石油工业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所以抓得比较好，就是由于他们能够结合石油工业的具体情况，成功地运用了解放军的成套的政治工作经验。他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把做好人的工作，使人革命化放在第一位，正确地处理人和人、人和物的关系，把思想工作做到生产过程中去，做到科学实验中去，做到日常生活中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促进生产的发展。为此，工业、交通各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用毛泽东思想、革命精神把全体职工重新武装起来。所有工业部门都要仿照解放军的办法，从部到企业建立政治工作系统，并选拔优秀领导干部分别到政治学院或军队中去学习政治工作的经验。

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号召在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共产主义竞赛中，向解放军学习。并指出，全国学习解放军就是要学习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学习解放军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学习解放军坚持我国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三八作风"；学习解放军注重创造"四好"连队，加强基层建设等。社论希望全国人民真正活学活用这些宝贵经验，像解放军那样，做到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

---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第575页。

战斗化。[1]

与此同时，大庆油田也传来捷报。自1959年发现大庆油田后，石油工业部调集全国50多个石油厂矿和院校的4万多人、7万多吨器材设备，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开发大庆油田。经过了三年多艰苦奋战，大庆油田探明地质储量26.7亿吨，到1963年底，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国家投资的72亿元全部收回，并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重大成就。1963年12月25日，新华社报道宣告：我国石油产品已经基本自给，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在大庆油田会战中，还锻炼出一支有一定技术素养、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产生了"有条件上，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的"铁人"王进喜。12月，领导会战的余秋里、康世恩在中央机关和北京市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总结了会战的基本经验，即：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必须革命化；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精神相结合；现代化企业要认真搞群众运动；认真做好基础工作，狠抓基层建设；领导亲临前线，一切为了生产；积极培养和大胆提拔年轻干部，培养一个好作风；全面关心职工生活；全面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等。[2]

这一报告随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的通知一并下发。中央的通知高度评价了大庆油田的经验，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具有普遍意义。他们贯彻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系统地学习和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把政治思想、革命干劲和科学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把工作做活了，把事情做活了。它是一个多快

---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69—80页。

② 同上，第146—214页。

好省的典型。它的一些主要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也都适用,或者可作参考。"[1] 由此,全国工业交通战线开始了长时期的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

学解放军、学大庆成为这时正在开展"五反"运动各单位的重要内容。但是,有的单位把"五反"运动同学习解放军、学大庆对立起来,使运动陷入无人负责的自流状态,甚至半途而废停止了。同时,这一时期,有些地方的"五反"运动抓得不紧,拖拖拉拉,进度很慢。为此,中央于 1964 年 3 月 22 日发出《关于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的指示》,强调:"这个运动也像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样,是重新教育人、改造人的革命运动,是防止和克服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打退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革命运动。""是推进工作和生产的一个巨大动力。"要求"'五反'运动必须坚持进行。搞深搞透。凡是放松的或者停顿的地区和单位,一定要重整旗鼓,把'五反'进行到底"。[2]

1964 年 3 月 28 日,毛泽东视察河北邯郸,当地方领导汇报有人想以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代替"五反"、"四清",并且说,这样做是从正面搞社会主义,"五反"、"四清"是从反面搞社会主义时,毛泽东说:"那是代表那些不愿搞阶级斗争的人的意见。难道解放军、大庆就不反官僚主义?不反贪污盗窃?不反投机倒把?不反分散主义?五反、四清就只有反面吗?就不是从正面搞社会主义吗。要团结 95%以上的干部和 95%以上的人民嘛,对地富子女要争取嘛。五反、四清有正面、反面,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也有正面、反面。"当汇报有人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挑起来的怪论时,毛泽东讲:"什么挑起来的呀,共产党是反映人民的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8 册,第 136 页。

② 同上,第 313—314 页。

要求。人民要求四清，反贪污，反浪费，反多吃多占，反对反革命破坏。因此，才写了五反指示，才出了双十条，然后发下去，到农村、工厂去念，看他们赞成不赞成，有无修改。你说这些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是主观挑动起来的吗？说是共产党想出来的，为什么群众欢迎？”

4月2日，王任重向毛泽东汇报，“五反”不仅是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同时是政治战线上的革命。对于隐藏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和极端反动的右派分子，应当发动群众进行揭发和批判，根据他们的反动情节和坦白程度，实行区别对待。同时，王任重还提出在城市街道上应当划阶级，搞清楚依靠谁、团结谁和向什么人进行专政的问题。据王任重介绍，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未表示肯定的意见。不过，听毛泽东的口气，似乎是赞成这样做。4月18日毛泽东在长沙同张平化、李瑞山、王延春谈话，当张平化说陶铸、王任重让他请示城市街道成立劳动人民协会进行划阶级的问题时，毛泽东讲：“赞成嘛！农村有阶级，工厂有阶级，城市无阶级，那是全民党全民国家了。城市也有阶级，过去没有划就是了。”4月28日，毛泽东在杭州同江华、霍士廉、林乎加等同志继续谈“五反”。当江华、霍士廉说到，省、地、县于1963年将“五反”中的“前三反”都搞完了，有一部分“后两反”还未结束，县只搞了常委，工厂只搞了几十个工厂，“五反”搞完的只占3%，准备1964年7月搞完县的“五反”时，毛泽东插话说：“你们经验还不足。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5%，五反还只进行了3%，‘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5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三五”计划设想时讲：“五反，从去年算起，搞五年，工业、农业、商业都要划阶级，学校、机关、军队、文化团体也要划阶级。此外，街道、小市镇也要划，小市镇那个地方是藏垢纳污之所，每次运动坏人都朝那儿集中，搞不到他们。小镇，几百户、一两千户、三四千户，不

叫城，也不叫乡，要划。”

考察毛泽东这一时期对“五反”的态度，发现与试点阶段的谨慎、小心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变，最突出的就是强调城市划分阶级，这一问题也成为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在城市强调重划阶级，组织阶级队伍，无疑加大了运动发生“左”的过火行为，影响了城市正常的生活和工业生产。

这一阶段“五反”的内容与做法，与试点相比，也有明显不同。主要表现在：第一，在企业中广泛宣读“双十条”，学习讨论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学习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大庆油田会战经验以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指示，以解放军和大庆为榜样，促进领导机关革命化、企业工作革命化和人的思想革命化。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评功摆好活动和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比学赶帮运动，大揭阶级斗争盖子，深入进行回忆对比教育，造成人人自觉革命的形势。第二，大张旗鼓地进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的斗争。大讲开展“两反”斗争的必要性，揭露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种种手段，反复交代政策，号召坦白检举。如新疆商业厅运用开坦白示范大会的做法，只用了十多天时间，就掀起了三次高潮，90%以上的干部职工参加了检举揭发，共检举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近3000件，自动坦白交代的433人，占总人数的13%，其中千元以上的31人，300元到1000元的78人，总金额达到11万元，人数和金额都比摸底所掌握的数字增加了三倍。第三，强调必须通过运动组织好一个有阶级觉悟的纯洁的阶级队伍，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绝对不可忽视，有的地方在领导干部“洗澡”以后，集中一段时间对职工群众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经过串联发动，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并进行清理工会组织的工作，把混人工人阶级队伍的地富反坏分子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清除出工会组织，有的地方还结合运动进行了整党工作。

总之,从1963年"五反"试点到1964年4月底,全国县以上工交企业大约已经有40%的企业,70%的职工,开展了"五反"运动。华北局已经在22%的企业,55%的职工中铺开"五反"。中南各省已经结束和正在开展"五反"职工人数都占该省区职工总数30%以上,其中,广西35%,广东约30%,湖南40%,湖北56%,河南40%多。各地揭露出来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也相当惊人。如华北地区工交系统就揭发出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错误的2.34万多人,占参加"后两反"斗争职工的2.43%,其中"千字号"1000多人,"万字号"14人。上海市工交企业已查出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错误的2.18万余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2.7%,其中"千字号"952人,"万字号"25人。

但总的看来,这一阶段的"五反"运动对改善干部作风、加强经营管理、巩固集体经济、促进工业生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央规定的各项政策也是稳妥的,如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敌我问题从严,人民内部问题从宽,必须同生产紧密结合等等,都对运动的正常开展产生了积极效果。

"四清"铺开

在经过"四清"试点,特别是普遍宣讲"双十条"后,农村各地陆续铺开了运动。一方面,进行了面上的运动,另一方面,又先后铺开了系统进行"四清"运动的第一批社队,个别地方开展了第二批。

据统计,截至1964年4月,面上的运动已基本结束。系统进行"四清"运动的社队,已经结束的和正在进行的,共15.33万多个大队,占全国大队总数的19.85%。其中,华北占12.17%,东北占10.24%,华东占15.6%,中南占21.59%,西南占

50.5%，西北占23.34%。从各地的基本情况看，四川省从1963年10月到1964年2月，开展第一批社1600多个，占21.8%，工作团干部5700余人，平均每社30余人。从1964年1月至4月，开展第二批社2200多个，占29.9%，工作团干部6万余人，平均每社30余人。其中第二批约有7%的社，因生产大忙季节到来，只搞完一两个阶段就暂停下来了。尚未开展运动的3200多个公社，都进行了"双十条"的宣讲工作。黑龙江省从1963年冬至1964年春普遍召开了县社两个三级干部会议，训练了各级干部和骨干53万多名，组织了3.2万多名公社以上干部，在全省1200万农村人口中进行了"双十条"和反修文件的宣传教育，在72个公社、884个大队进行了系统社会主义教育，分别占全省公社和大队数的7.4%和8.15%。河北省在全省进行了粗线条"四清"，这些试点有138个已经结束，一般的搞了五六个月，个别的搞了10个月。1964年春铺开的第一批"四清"，共有4498个大队，占大队总数8.3%；301个公社，占公社总数7.4%。山东省1615个公社（区），8.08万多个大队，到1964年4月底，先后开展运动的有324个公社，占公社数的20%，1.667万个大队，占大队数的20.6%。江苏省、地、县三级共组织1.9万人的工作队，搞了125个公社，占全省公社总数的6.7%，一般一个县搞一两个公社，部分县搞三个公社，实际上是扩大试点范围，目的在于使各级党委取得系统开展农村"四清"运动的领导经验。中南区开展系统"四清"运动的有3.1万多个大队，占21%，分布在377个县，占全区总县数的75%。

与试点阶段相比，这一阶段运动的明显特点就是点面结合。既有面上开展粗线条"四清"，又在点上开展细线条"四清"，运动的范围明显扩大。点面"四清"的最大区别就是点上派出了强有力的工作队，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对农村各家各户的阶级成分进行复议、审定和重新登记，突出了阶级斗争等。面上主要

就是宣讲“双十条”，干部和群众洗手洗澡等。除此之外，在运动的内容和方法以及激烈程度上，与试点阶段略有不同。

首先，在运动的内容上，有的地方揭发了政治“四不清”的内容，即立场不清、方向不清、阶级路线不清、真假革命不清，为下一阶段提出“清政治”打下了基础。如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四清”中，发现经济“四不清”和政治“四不清”常常联系在一起，凡是有严重经济“四不清”的人，大都有政治上“四不清”。在群众揭发经济“四不清”的同时，也揭露出一些被群众称为“活阎王”、“土皇帝”、“南霸天”、“北霸天”、“座山雕”等等人物。据初步揭发和不完全统计，全社大队、生产队干部有政治“四不清”问题的共135人，占干部总数的35.9%，其中党员干部76人，占党员干部总数的59.3%。其主要表现形式有：(1)严重的组织不纯，被敌人直接或间接篡夺了领导权。(2)阶级路线不清，敌我不分。(3)接受敌人小恩小惠，重用坏人，甚至放纵敌人的破坏活动。(4)安插亲属“家天下”，实行家族统治。(5)严重地打人、骂人，作风不纯。(6)封建迷信活动复辟。(7)巧立名目，侵占集体耕地等。

其次，在运动方法上，这一阶段，各地普遍召开了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进行面上“四清”。如山西省文水县召开四级干部会就是一个典型。1963年11月21日至12月22日，山西省文水县召开了四级干部会，会议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七天时间学习了《前十条》，作动员报告，并开展讨论。会议一开始，许多干部把这次会议看成是“鸿门宴”，说什么“酒没有好酒，饭没有好饭”、“有去无回，凶多吉少”。有的含泪登程，全家送别。有的带上棉衣棉鞋，准备坐牢。有的自己量刑，多则三年，少则一载。开会讨论时，形成一阵“交印”小台风。闹“交印”的干部，竟达与会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的60%。针对这种情况，文水县委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对浙江七个材料的批语。经过讨

论，把“交印”风刹下去了。第二阶段，揭盖子，查上当，开展诉苦。开始时，许多人认为，“眼不见战争，耳不闻炮声，那有什么阶级斗争？”“地主、富农老的老了，死的死了，谁跟谁斗？”“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打垮了，几个地主、富农还值得大惊小怪！”随着触目惊心的大量事实被揭出后，到会干部大吃一惊，说：“敌人大闹，我们睡觉，真危险。”接着，启发干部开展诉苦。开栅大队的副大队长张楞三，诉苦中哭了三场。他说，他父亲是打短工暴死的，弟弟是饿死的，自己身上还有讨饭时被地主的狗咬伤的疤痕，现在把这些苦难都忘记了，学习剥削阶级那一套，贪污了3600元。他说了哭，哭了说，哭得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别人把他拉起来以后，他又说：“还有800元，给我记上，革命要彻底，不能再背这些包袱啦！”第三阶段，学习《后十条》，洗手洗澡，放包袱。文水县委认为，放包袱的形势已是“十月怀胎”，只等“一朝分娩”了，要求放几个“万字号”，一大批“千字号”，“千字号”以下横扫。南张大队民兵营长任马根（转业军人）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决心放下包袱，并说：“过去敌人一个营包围我们一个连都冲出来了，难道现在就让500块钱的包袱包围冲不出去！”最后统计，共有1088人放了包袱，占到会社队干部的46%，总值30.1万元。第四阶段，挖思想根源，做到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从而明确奋斗目标。

1964年1月20日，华北局作出重要批示：“文水县的四级干部会方法对，效果大，开得好，报告写得也很生动。凡是正在开三级干部会的地方，可以马上参照采用文水县的做法，还没有开三级干部会，或者虽已开过但开得很不好的地方，在面上宣讲完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两个文件’以后，可以仿照文水的办法，再开一次三级干部会。”此后，华北各地以及其他地区大都采用召开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的方式开展面上“四清”，成为开展面上“四清”的一个主要方法。

最后，在运动的激烈程度上，这一阶段有些地区明确提出“搞高潮”的计划，强调运动要搞深、搞透、搞彻底。如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四清”时，就强调鼓足干劲，放手发动群众，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掀起“四清”运动的高潮。为此，他们加大了运动的力度。一是壮大阶级队伍，提高战斗力。一方面全面发动群众，不仅发动贫下中农，而且对中农，对青年、妇女、民兵等有组织的群众，以及社会上和“四不清”干部有关系的家属、亲戚、朋友，都应该全面发动。另一方面对根子情况重新进行了审查，纯洁了阶级队伍的核心。同时，改变了过去工作组研究决定，贫协小组去执行的做法，实行工作组和贫下中农混合编组，共同制定战斗计划，日夜在一起工作。实际上把贫协骨干变成了工作队员，从而壮大了阶级队伍，提高了战斗力。二是狠抓查证工作。要使贪污盗窃干部服输，必须有真赃实据，准备大量“子弹”。对于查账查出的问题，必须及时梳辫子，认真分析，多方查证。对大部分“四不清”重点人，分别配备五六发到四五十发“子弹”，为掀起高潮做好准备。三是适当提高温度。认为革命不是谈恋爱，不是绣花，是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针对某些有问题的干部打算“在温水池里泡一个冬天”的思想，适当地加高温度，帮助干部卸包袱。对较顽固的“四不清”重点人，普遍采取中型洗澡会的办法。实际上，卢王庄公社的“四清”运动，已经初步具备了后期“大兵团作战”搞“四清”的一些基本做法。

这一阶段的运动也产生了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在运动中发生干部对社员打击报复的案件。如房山县良乡公社徐庄大队原治保主任兼民兵连长孙××等人，对揭发他们“四不清”问题的贫协委员、“四清”积极分子王××，经常进行辱骂、刁难、威胁。在工作队到县整训期间，王××又遭到他们的一再毒打。怀柔县北房公社梨园大队一队队长于××，在工作队到县整训期间，借机毒打了给他们提意见的贫农社员陶×

×。通县尹各庄公社富豪大队生产队长赵×、副队长刘×，对揭发他们“四不清”问题的贫协委员、“四清”积极分子石××，百般刁难。[①]

第二，运动中，群众打骂、体罚犯错误干部以及其他斗争对象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如河北省张家口地委宣化县沙岭子公社南兴渠大队，在“四清”运动中，连续发生了打骂和体罚犯错误队干部的严重问题。据工作组初步检查，从1964年3月下旬到4月底，有10个生产队连续发生21起打骂和体罚犯错误干部，被打骂和体罚的干部有12人。此外，还有2名干部外逃，7名干部被停职反省。打骂和体罚的形式有十种：(1)打人两起。(2)罚跪两起。(3)推搡三起。(4)吐唾沫一起。(5)罚站两起。(6)熬夜两起。(7)留队反省三起。(8)通宵开会一起。(9)搜查粮、账四起。(10)让犯错误干部跟随工作组干部想问题一起。此外，有的生产队还对不彻底交代问题的干部，采取过威胁逼供、停职、白天反省、不让劳动等简单粗暴的做法。

北京市昌平县东小口公社兰各庄大队、中滩大队，丰台区黄土岗公社白盆窑大队，平谷县张各庄公社杨各庄大队，也发生了体罚、拘留斗争对象的严重问题。

第三，运动中，发生了多起自杀性事件。如北京市郊区自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1964年1月23日，先后发生自杀事件40起，其中，丰台8起，平谷、大兴、朝阳、通县、密云各4起，昌平、顺义、怀柔各3起，房山2起，门头沟1起。40起自杀事件中，从成分上看，贫下中农14人，中农6人，上中农2人，富农4人，地主7人，反革命3人，小业主1人，地富子弟2人，工人1人；从职务上看，干部11人，社员29人；从政治面貌上看，党员3

---

① 《北京市委关于严肃处理四不清干部打击报复事件的通报》，见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64年，第163页。

人，团员1人，群众36人；自杀结果是已死27人，未死13人。据上报材料反映，在40起自杀案件中，有33起已查明情节，其中确有罪恶、畏罪自杀的有16起。这些人在建国前都有罪恶，建国后仍不老实。如密云县沙南寨公社沙务大队富农分子石××，建国前在村里打人、抓人、卖兵，为非作歹，民愤很大，建国后一直对社会主义不满，破坏生产，反攻倒算。运动中群众要求斗争，在说理斗争期间，畏罪自杀。有较大问题，在运动中已进行了交代，也未发现有追逼现象，但本人顾虑大，怕拘留法办而自杀的有3起。问题不大，思想负担重，感到有压力而自杀的11起。贫农代表在运动中被揭露和地富有关系或者有偷摸行为以后，感到羞愧而自杀的有3起。

由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虽然中央对"四清"运动的开展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其中有些政策就是专门为防止运动发生过火斗争而制定的，但在实际运行中，这些规定走了样，并没有防止打击报复、打骂体罚以及自杀等极端事件的发生，特别是中央领导人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从而导致以后运动过火斗争的进一步加剧。

毛泽东视察"四清"

在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曾举杯祝酒：为城市"五反"，农村"四清"，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可见。毛泽东对开展这场运动的决心和豪情。但运动之始，由于毛泽东对全国各地的阶级斗争形势尚未掌握，只有湖南和河北印证了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阶级斗争的判断，因此，毛泽东对运动的态度是十分谨慎的。在各地纷纷反映阶级斗争的严重尖锐的情况后，毛泽东进一步增强了大规模开展运动的决心。其主要表现：一是提出点面结合，齐头并进推开运动；二是大张旗鼓地向全国各个阶层、

各个党派宣讲"双十条",使之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从而使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起来。为进一步了解运动的进展,毛泽东于1964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一路南下视察,向各省负责人了解"四清"运动的开展情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总的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强调要加强阶级斗争思想教育。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早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全党集中搞经济调整时期提出阶级斗争的题目,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单干风以及黑暗风、翻案风的。不过,这时毛泽东只是出了题目,尚未有充分有力的实践检验,他需要把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付诸实践,指导现实。1963年2月,湖南省汇报了农村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但毛泽东还是有点把握不大。他到了河北问,到底有没有阶级斗争?河北说,有。毛泽东追问,真有,假有?回答真有。① 但毛泽东还未得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证据。所以,考察这一阶段毛泽东的谈话,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泽东的思想深处有一些明显的矛盾:一方面突出强调阶级斗争,号召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另一方面,却不断地强调不要急,要谨慎,要抓生产,用《六十条》教育干部和群众等。其思路还带有1960年以来调整初期的不少观点。1963年6月间,制定完《前十条》,在返回北京的路上,毛泽东又得到了一个对他决策十分重要的情况,湖北、河北反映,大约三分之一的队不是社会主义。他由此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更加严重了。6月4日,他同外宾谈话说:"我们农村经过几次整顿,总是整不好,现在找出原因了,一是过去土改不彻底,领导权并不真正在共产党手里。二是有些共产

---

① 张素华:《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党人起了变化，名为共产党，实际上不是了。”[①] 与此同时，各地反映上来的材料也证明阶级斗争形势非常严重，于是加大了进行社教的决心。

1964年3月28日下午和29日下午，毛泽东在邯郸召集了山西省委、河北省委及河北南部几个地委同志汇报工作，参加的人员有：山西省委的陶鲁笳、阴发祥，河北省委林铁、刘子厚，保定地委陈子瑞，石家庄地委康修民，衡水地委赵树光，邢台地委刘琦，邯郸地委庞均、刘英。当有人汇报工作组有的人不承认有阶级斗争时，毛泽东说：“现在到公社去搞五反的，要加强阶级斗争思想教育，现在恐怕没这样做。”当汇报到1963年见到主席批示湖南那个材料时，曾强调是湖南特殊，结果一搞，牛鬼蛇神并不少。毛泽东讲：“牛鬼蛇神不一定每个村都有，但相当普遍。我主张牛鬼蛇神统统出来，它不出来你就打不倒它，出来一半也不行，你一打它就抽回去了。”当汇报到有人说，有砖无墙（指有分子，没阶级），搞好生产就没有阶级斗争问题时，毛泽东讲：“就是不承认有阶级，让大家讨论讨论，要加强阶级斗争教育，中央五反指示对阶级斗争没有那么强调。”当汇报到有人说哪里有什么阶级斗争呢？是你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毛泽东讲：“是的，工作也是没搞好，我们十年没有讲阶级斗争了，1952年搞了一次三反五反，后来1957年搞了整风反右，没有触及农村，只是机关学校搞了一下。”当汇报到有人谋杀劳模陈永贵时，毛泽东讲：“这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不能把没有说成有的，也不能把有的说成没有的，我们十年没搞了。”当汇报到文水县乐村老贫农韩七十说，社会主义是生道道，走不好还要滑下来时，毛泽东讲：“这是上太行山嘛。阶级斗争搞三四年还不行，三四年也

---

① 张素华：《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不解决一切问题，你说一切问题就能解决了。再搞若干年，还要搞的，过几年又要进行教育。资本主义是熟道道嘛！你看吧，只要不搞五反、四清、干部参加劳动，资产阶级、牛鬼蛇神又要出动，修庙宇、祠堂，续家谱又要出现。"针对有些和平演变时，毛泽东讲："有些地方是和平演变，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进行民主革命，有些地方民主革命搞得不彻底，是夹生饭。"针对有些支部书记被地富拉了过去，毛泽东说："他为地富服务了，他们是夺取政权，他们用各种手段腐蚀干部，几包纸烟收买一个支书，一个女人一拉更不得了。赫鲁晓夫、国民党在我们这个地方是有一定基础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在中国几亿人口中间，是有他一定基础的。"当陶鲁笳说有 1%、2%、3%的支书不能依靠时，毛泽东说："支书当中只这些？还多一些，有的地方达到 20%，有的村里的情况是，去不了罗加，卡斯特罗就进不来，有 70%到 80%的干部有大小不同的问题，靠他们扎根不行。不是有 10%到 20%的大队很坏吗？我们真正有三分之二就了不起了，天下三分，我们占二分。古代时说，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一分属殷，当时那种说法是假话，没那么回事，那是两个民族互相争，纣王客气点，没杀掉他，关了他没杀头。说文王是圣人，不见得。纣王是吃了这么个亏，他征伐俘虏了很多人，弄得自己的队伍净是些俘虏兵，没有骨干，乱了自己的基本队伍。我们有三分之二就不错，三分之一也要具体分析，大部分是可以争取的。"

第二，强调大力宣讲"双十条"。毛泽东指出，凡不是年老有病的，比如徐老、吴老，凡不是不认识字的，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就是说不是右派，比如彭德怀，都去读。军队中的将军都下去读了，说行嘛，其他的人为什么不行？实际上，向群众宣读文件，就是向群众学习。有人汇报说杭州会议精神传达贯彻时，只念一本香山记，毛泽东说："几十年前，我看过香山记，一开始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就唱一本香山记，七个字一句。唱那个戏，别的

戏就不能唱了。这个方法是个普遍的方法，如你们河北梆子唱劈山救母，也是一段一段的唱，这个方法要普遍运用。"有人汇报说河北宣讲"双十条"，群众总结了这么几句话："贫农笑，中农靠，地富分化子弟跳，四类分子要改造。"毛泽东讲："很有意思，记下来，革命这些年，公开宣讲也是第一次。对六亿人，包括反革命，把政策交代清楚，他们搞阴谋，我们搞阳谋。"并询问："你们宣读了吗？你们地委书记都宣读了没有？宣读要准备，重点在那里，要讲好还要调查当地情况。"当刘子厚说因嗓子坏了没宣读时，毛泽东讲："还有机会嘛，三年到四年嘛。"有人汇报"双十条"一个大队只一份，有的念破了，文件不足，毛泽东说："一个大队只有一份，有两份就好了，书不多呀。"并指示："花一点钱、用一部分纸，不仅每个大队要有，每个生产队都要有一份。"4月2日在汉口时，毛泽东问王任重是不是去向群众宣讲过。当王任重说省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都下去宣讲过了，自己还未去时，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你为什么不去，你又不老，又没有病，又不是右派，应当亲自向群众去宣讲两个十条。"①

第三，关于开展运动的时间问题，多次强调至少三到四年，不要着急。毛泽东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打个歼灭战，没有这么四五年工夫不够，至少四年。去年一年，今年一年。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不能急。有的省今年就要把社会主义教育搞完，太快了。你没有那么多好干部嘛！现在全国有点苗头，就是急，要什么今年搞60%，明年搞完呀，你何必那样急呢？劲头上来了就急，我看宁可慢一点，南方有句俗话，"紧成鼓包慢成绳"，像拧绳子一样，快了就要出疙瘩，快了就要碰壁，欲速则不达。无论"五反"也好，"四清"也好，时间长一点，搞好一点，急了不能达到目的。当然不是说要慢腾腾地搞，现在不是慢腾腾的问题，作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51页。

战的军队已经起来了嘛！主要的问题是防急，比如，河南省，它几个月就要解决问题。同时，要讲质量、品种、规格嘛，不能只讲数量，不能出次品，三年到四年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你说一切问题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是至少三年到四年，还有个至少二字。

第四，强调干部参加劳动。毛泽东指出，搞革命，就要搞彻底些，不劳动的不能当支部书记、公社书记，也不能当县委书记，这三级书记不劳动不能当。将来有一天，支部书记、大队长是否不要1%—2%的工分补贴？过去打仗有什么工分补贴呀！就是吃饭穿衣，还要死人，人吃了饭，穿了衣，不就解决了问题了吗？你说打仗不算劳动？连、营、团长不算劳动？师、军长指挥作战不算劳动？走二万五千里不算劳动？哪有薪水呀？谁发薪水？为什么一定要到县委机关开会？万里长征还不是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开！有什么房子呀？睡觉有什么钢丝床？有块门板，有些稻草就好了，南方有稻草。革命就是这么过来的嘛。现在搞建设，大房子也来了，钢丝床也来了，汽车、火车也来了，病也来了，官僚主义也来了，自己不写东西，叫秘书写。我直到现在还是自己写，不叫他们写，自己有手嘛。不能写时，就用嘴说。1947年12月的那篇《论目前形势与任务》，就是我说着别人写的，写出来后，我又修改了几遍才定下来的。因为那时我害了病，不能写东西。现在部长、司长、厅长都不写东西了，统统让秘书代替起来了，秘书只能找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厅长、司长就可取消，叫秘书干。

第五，关于运动的步骤，强调先搞"四清"，后搞对敌斗争。针对有些地区的"四清"运动，有的是从生产入手，有的是从对敌斗争入手，毛泽东指出，贫下中农起不来，就没有对敌斗争的队伍，第二个十条，也是说先解决内部问题，先组织队伍，先搞"四清"，然后才去对敌嘛！当有人汇报，南方同志和北方同志认识不一样，"四清"要解决阶级斗争问题、政治思想问题，不只是解

决经济问题。毛泽东说，河南的材料，是先解决内部问题，然后对敌斗争。北方派，南方派，南方干部很多是北方去的，来一场南北大战。3月30日、4月1日毛泽东在听取刘澜涛、李葆华、刘建勋等同志汇报时讲，现在各地的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4月2日毛泽东在汉口同王任重谈话时又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做法，是从对敌斗争入手，还是从"四清"入手？你们下一批是不是可以从干部洗澡放包袱搞"四清"入手？

第六，强调依靠贫下中农，建立贫下中农协会。3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邯郸听取汇报时说，公社要有代表会，县要不要开，县不开声势不大，同时，可以考虑，为什么没有全国性的农民协会呢！当有人汇报有的大队讨论表决干部补贴工分数目时，要贫下中农协会和社员代表会同时分别开会表决，统一计算票数，这样贫下中农协会也就有实权管这事了。毛泽东笑着说，贫下中农协会好像下议院，社员代表会好像上议院，你发明了这么个办法。我们的基本政策是依靠大多数人，不能依靠少数地富，贫下中农开会，中农就来了，不然他的尾巴翘得很高。要团结中农，首先要切实团结贫下中农，就是这个办法。要让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参加我们的支部会，不要关着门开，群众不知道开的什么会，搞秘密的，像搞特务工作，要他们贫下中农参加支部大会，开的什么会让他们知道，不是开让人听不到的会。1964年5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三五"计划设想时说，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看你站在95%的人这一边，还是站在5%的人那一边。剥削者不过占百分之一、二、三、四、五。按7亿人口计算，5%就是3500万人，剥削6.65亿人。要算这个基本账。到底站在那一方面？我们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这一边。我赞成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各级有工

会，就是没有农会，共产党又不代表它，妇女有妇联，青年有青年团，省应该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也要有一部分中农的积极分子，使他们感到也有他们的份。湖南就是这样开的。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贫下中农有权，能管中农，也能管地主富农。

第七，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你们怎么办”的问题。他总结历史经验说，在国际形势和平发展的时期，必然出修正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出现了许多修正主义。我们现在又碰到这种情况，又处在国际上所谓和平时期，所以必须防止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苏联也很有可能出修正主义，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①] 这实际上点明了中国也难保不出修正主义，而且在此之前，毛泽东就认为，修正主义的苗头在中国已经出现了。早在1957年反右派期间，毛泽东就指出：“我党有大批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不过，这时毛泽东对修正主义的看法基本限于党内一些知识分子。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又把彭德怀说成是“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他说：“我国也有修正主义者，去年夏季向党进攻。我们批评了他，他失败了。”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

---

① 张素华：《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1] 从而提出了中国"反修防修"的问题，而"四清"、"五反"就是毛泽东为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而作出的重大部署。

从毛泽东反修防修的初步实践看，他一方面对广大基层干部贪污腐化，"被敌人拉出去、打进来"甚为不满，另一方面，又警觉中央高层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就是这一时期他不断同外国领导人谈中国党内的所谓"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以及向资产阶级投降等问题。

所谓"三和一少"，是指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于 1962 年春向中央提出的正确建议，即为争取时间渡过困难，抓紧国内建设，有必要争取对外关系的相对缓和，在同美国、苏联和印度的斗争要注意策略，对外援助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和集市贸易，调动农民积极性，克服农村困难的一些正确主张。所谓"向资产阶级投降"，是指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在研究统战理论政策过程中，提出争取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使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实际达到消灭阶级的水平，把民主党派根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等。而毛泽东却对这些本来正确的主张加以批判，并上升到"修正主义路线"的高度。

1963 年 5 月 22 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时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的援助少一些，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路线。"1964 年 2 月 9 日，毛泽东再次同威尔科克斯谈话时，又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反动

---

[1]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503 页。

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里面就有一个邓子恢，他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农业。"

1964 年 2 月，毛泽东在同金日成谈话时说："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我们同高岗、彭德怀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之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并提出："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

1964 年三四月，毛泽东同日本共产党访华代表团袴田里见谈话时，也讲了相同的内容，并说："中央各部，每个部都不是太平的，每个部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后来，毛泽东又强调，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1962 年刮歪风，如果我们几个常委顶不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①] 4 月 10 日，毛泽东又说，这些人的理论和赫鲁晓夫的调子一样，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你们怎么办？[②]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统战、教育、文艺以及理论工作也相当

---

①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577—580 页。

② 张素华：《60 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

不满。1964年1月，毛泽东在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中加上了一段话："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2月3日，他又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历来不注重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自然科学文章更少，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过来才好"。同时，毛泽东与朝鲜同志谈话中说，你们搞得好，理论队伍组织起来了，我们六个中央局，比朝鲜都大，但还没有组织起理论队伍，比你们落后了，并提出从政治、社会科学、文艺等方面解决反修防修问题需要25年。

1964年春节期间，毛泽东召集教育工作者座谈，就教育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看法。他主张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考试题目可以公开。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毛泽东对文艺界的问题也看得越来越严重。在制定《前十条》的杭州会议期间，他说："有鬼无害论"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9月27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反对修正主义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要"推陈出新"，"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推出去，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1963年11月，毛主席又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接连进行了两次尖锐的批评，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

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接着,毛泽东又作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著名批示。

"四清"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挖修根",而经过一年多的运动后,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地富反坏分子猖狂活动;基层干部贪污腐化、多吃多占;党内高层又出现修正主义,并提出了一整套国际国内纲领;教育、文艺等领域问题严重,如果不抓紧,也会变成修正主义。这一切使毛泽东更加过分地估计了中国特别是党内高层出修正主义、出赫鲁晓夫的严重性,从而更加坚定了搞"四清"运动的决心,而且"必须进行到底",要打"歼灭战"。[①]此时,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对"四清"运动也非常重视,并于1963年11月亲自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进行"四清"。国内严峻的现实,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就使"四清"运动在各地不仅有开展的必要,而且必须大张旗鼓,集中火力,一致对敌,"四清"运动也走向了高潮。

---

① 张素华:《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第四章

高潮:政策制定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

自1963年下半年后,中国的周边形势已经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了。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论战。中美关系因中国的核计划和越战的迅速升级而日趋严重。国内"四清"运动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为了从反修防修和防备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略考虑,中共中央于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除"三五"计划、大三线建设等题目外,主要研究了"四清"运动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等具体政策,综合会议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总结了前一阶段运动中存在的主要缺点,并提出城市应当划分阶级。

会议中,各中央局和省委负责人就前段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就整个运动而言,大家普遍认为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正常的和健康的,取得的效果也是显著的,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如西南组的同志在谈四川社教时指出,在开展运动

的单位中，质量较差的约占50%，其中15%走了过场。部分社队特别是落后社队，对阶级敌人斗争不彻底，"四清"也不彻底，运动中对党员进行党的原则教育做得不够，同时，对于经营管理中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黑龙江省的同志介绍，全省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10%的生产队搞得不够好，有走过场的现象。在系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约有20%的生产大队搞得比较粗糙，并且有些地区存在急躁情绪。中南地区的社教大约有10%的队搞得不好，其中湖北大约有10%—15%的生产队搞得不好，搞得很坏或是完全失败的百分之六七。同时，据一些地区的来信反映，农村"四清"工作组对犯错误的人，算经济账时不够实事求是，只凭部分群众反映，不调查对证，不允许本人申诉；退赔时，有些地区有些过火，把犯错误的人赶出门，拿走全部生活日用品，造成他们的生活困难，还有被逼得自杀；有些基层干部乘机整人，违反政策，逼死人命；对重划阶级成分有意见，有些来信，对在运动中重划和补定的阶级成分不服，提出申诉等。

城市"五反"工作也存在许多问题。据与会者反映，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认识不足，抓得不紧，松散、拖拉，没有放手发动群众，甚至是表面上拥护，实际上拖拉。有的单位出现单纯求快、忽视质量、走过场的苗头，运动搞得不细不深不透。有些单位，曾经用学大庆代替"五反"等。

由于毛泽东主张城市应当划分阶级，因此，在会议上，与会者也着重讨论了这一问题。认为在工交企业进行划阶级和整顿、纯洁工人阶级队伍，十分必要，必须把划阶级和整顿、纯洁工人阶级队伍，列为工交企业"五反"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划阶级时必须先行试点，要明确划阶级的目的是查坏人，一定要把95%以上的职工团结起来，唯成分论是不对的。同时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大多数，依靠老工人。有的同志认为，城市"五

反"的内容要进一步发展，要划阶级，一切敌人的一切破坏都要给以坚决打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根子要通统挖掉；"五反"的范围也不限于机关、工厂、商店、学校，而且城市的街道和小集镇都要搞。城市和农村可以都叫社会主义教育。有的地区提出，一定要讲阶级，划阶级，评审阶级，进行阶级登记，还要搞阶级档案，搞阶级斗争展览。另外西藏和新疆提出，牧区没有划过阶级，希望中央作出专门的指示和规定。湖北还提出，希望中央根据解放后的情况制定一个文件。

第二，对国内形势作出了严重的估计，提出了"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不切合实际的概念，认为中国要出修正主义。

实际上，"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概念，早在1960年和1961年就已经初步提出了。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地区。"广东坦州在1960年整风整社运动中，认为原被划为二类社的坦州公社，20%的大队、30%的小队的领导权已掌握在坏人手里。1961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讲话中也曾指出：我们党内也有代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各地大约20%烂掉了，领导权落到敌人手中了，凡是三类县、社、队，大体上都与反革命有关。[①]

"四清"运动开展后，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又有了发展。1963年6月14日，毛泽东在邯郸同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等人谈话，了解农村"四清"进展情况后说："你们跟湖北差不多，湖北同志讲他们(那是被篡夺的基层)是占三分之一，有的土改就不彻底，有的后来变了，有的是富裕中农当权，这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不是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52页。

社会主义的，他们挂的是社会主义牌子，实行他们的一套。"8月4日，毛泽东向日本共产党一位政治局委员谈话说："现在在农村还有近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的手里。"①1964年3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邯郸同陶鲁笳、刘子厚、林铁等人谈话时说："现在看来，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大队很坏。我们真正有三分之二就了不起了，天下三分，我们占二分。"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有的地区在汇报时指出，根据部分生产大队的排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占20%，阶级界限不明，方向不清随大流的占50%，发展资本主义而且问题比较严重的占30%，有的已经演变为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第三类单位中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占30%左右，蜕化变质、称王称霸，对群众实行暴力统治的占10%左右，政治上软弱无力或严重不团结的占50%。党员排队情况是，好的占30%，一般的50%，有各种问题的20%。②

6月8日，在周恩来、彭真谈到运动中暴露出来的一些基层干部严重蜕化变质的材料后，毛泽东指出：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③6月11日下午，当刘少奇在作关于反修斗争的报告时，毛泽东插话讲："我们农村同城市，大约有三分之一，或者少一点，是没有进行过真正革命的。那么，很好了，我们有三分之二了，有三分之一大概是左派，有三分之一大概是中间派，跟着走，这就是大多数了。但是，还有三分之一，他就抓到那个支部书记呀，还有什么区委委员呀。"

同时，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

---

①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33页。

② 1964年5月27日，刘子厚在中央工作会议华北组的发言。

③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33页。

办"的问题，并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看得非常严重。在6月8日的工作会议上，当刘少奇指出，苏联搞了40年，出了修正主义！因此，也要想想我们会不会搞修正主义！凡是不注意的一定会搞。毛泽东认为，已经搞了，像白银厂、小站，不是么？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里。中国党搞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比较难些。他们不仅在国际上是父子党、猫鼠党，而且在党内也是。斯大林时代，祝酒时都要祝，每个人祝，就是那么捧，捧到天亮。为此，毛泽东要求大家：省、地、县传下去，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各省顶住。刘少奇在会上说：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①]。

6月11日下午，会议就反修问题听取刘少奇的报告，刘少奇提出，既然苏联搞了四十多年都可以出修正主义，列宁的党可以变质，那么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将来也要出？毛泽东认为，如果不注意，准出，注意了也可能出。出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无非是闹那么几个月，或者几年，或者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又要走向反面。这个修正主义它不做好事的，脱离群众的。要准备出，若干年之后出来怎么对付，现在就要想一想。当会上有人讲到，恐怕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都可能产生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看起来，大概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个规律，不注意要出，注意了也还要出。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因素它不断产生。我们这里不是出了很多吗？白银厂不是个修正主义呀？天津的小站不是修正主义占统治呀？但我们还要有信心，帝国主义还只有一百多年嘛，资本主义还只有两三百年嘛，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总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同时也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天天是晴天呀，没有下雨？没有打雷？没有阴天呀？这个社会就那么干净呀？我看永远不干

①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38页。

净。不干净才合理嘛，不然就没有矛盾了嘛，对立统一嘛，是两个侧面的统一嘛。好像我在这里提倡牛鬼蛇神，这个东西你提倡也好，不提倡也好，总而言之，它要存在的，你"四清"也好，"五反"也好，它还是有的。

与会者在讨论这一论断时，也普遍认为这个问题很值得严重注意。各地都有类似白银厂、天津小站的单位，这个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势必使革命遭受巨大损失，并将贻害子孙后代。有的同志提出，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有的是公开的篡夺领导权，有的则是背后指挥，我们的干部，甚至包括相当负责的干部，成为敌人的工具，被敌人利用。在党内还有野心分子。有的同志说，我国会不会产生修正主义，关键是两个方面，一是选择好各级领导人，保证各级领导核心的纯洁；一是做好两部分人的工作，即做军队和知识分子的工作，保证文武两个方面的队伍实现革命化。

第三，为防止"中国出赫鲁晓夫"，毛泽东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

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是毛泽东长期思考和酝酿的一个关涉百年千年大计的重大问题。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在时就指定刘少奇代理。[①]建国后，毛泽东多次提出重视使用年轻干部。他在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上，曾列举了中外历史上许多出身寒微而建树很多的名人，说他们都在年轻时就做出了一番事业。他列举古代中国，从孔夫子到战国时的甘罗、西汉时的贾谊、晋朝的王弼、唐朝的王勃和李贺、宋朝的岳飞、明朝的夏完淳等等，一一讲述他们的生平事业，说明重视培养青年人的重要意

① 《彭真同志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7月25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64年，第55页。

义。[1] 1961年蒙哥马利访华时，曾问毛泽东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2] 毛泽东虽然还没有明确使用"革命接班人"这一概念，但上述措施和言论，实际上已经表明他在思考和探索这方面的工作了。

1964年2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西里克·马塔克时说，西哈努克亲王正在解决他的继承人问题，这个办法好，我们党早已决定接替我的人，你们知道吗？为了解决接班人问题，就要大力培养和选拔优秀的年轻干部。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就曾这样说过，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那时是27岁，孙权也是27岁。孙策干事时只有十七八岁。周瑜死时才不过36岁，那时也不过30岁左右。鲁肃40岁，曹操53岁。事实上，年轻人打败了老年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斩(换)旧人"。[3]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由于过分强调中国要出修正主义，要出赫鲁晓夫，再加上东北局宋任穷的一份报告，毛泽东又突出地强调了这个问题。1964年3月，宋任穷到辽宁省盖平县(今盖县)，听取了该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铭新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问题的汇报。据宋任穷回忆说："当时感到培养接班人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能思考这个问题，并且有具体的计划和行动，确实很有政治远见。"[4] 5月13日，宋任穷就这个问题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份题为《关于农村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汇报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党支部》的报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9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73页。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95页。
④ 《宋任穷回忆录》，第399页。

告。5月18日，毛泽东将此报告批给刘少奇、邓小平阅，并说："阅后印发工作会议，予以讨论。"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宋任穷写的报告，很值得注意，那个支部书记说要注意后事，注意培养提拔青年人，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你有些人占着位子，都是老年人，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怎么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过去苏联的战斗条例上，就有班长被打死了，要指定代理人。不能一个人死了，就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

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上讲了军事问题、准备打仗之后，又就宋任穷的信，再次强调重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这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可能。像赫鲁晓夫，列宁、斯大林希望吗？还不是出了！如何防修，我看有几条：第一，要观察干部，教育干部懂得些马列主义。第二，教育人民大多数，要靠大多数，为大多数人服务，中国的大多数人，世界的大多数人。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也不能当中央书记、主席。第三，要能团结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不管他是那个山头的，不要结仇。第四，民主作风。总要跟同志商量，总要听各种意见，反对意见让他讲出来，不要"一言堂"。第五，自己有了错误，要自己批评。拿我来讲，只要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自己对，要比较，少打错主意，出坏主意少一点好，经常打错主意，只会打败仗。一共五点：马列、人民、多数、民主、自我批评。

接着，毛泽东又说，还有接班人的问题，中央局、省、地、县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不要认为世界上只有自己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党也没有了，自己死了无办法了。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

怕。说什么死了一个人是很大损失，我就不相信。你看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死了吗？死有各种死法的。敌人打死，飞机摔死，游水淹死，枪打死，包括原子弹炸死，细菌钻死，不钻也老死。要准备随时离开自己的岗位，随时准备接班人，要三线接班人，一二三把手。

后来，"九评"把培养接班人作为防止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重要措施之一，并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人，而不能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毛泽东在修改这篇文章时，特别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这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1]文章发表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和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成为当时全党的共识。

第四，讨论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

1960年冬至1961年春的整风整社运动中，华北局根据农村阶级斗争的严重形势，在一些三类队、二类队甚至是一类队，把贫下中农组织起来，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建立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并组织成立委员会，作为农村贫农、下中农的阶级群众组织，也作为基层党组织的助手和依靠力量。同时，拟定了一个贫下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98页。

中农委员会组织条例(草稿)。1963年3月20日,华北局向中央汇报了这一情况。4月9日,中央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转发了华北局的情况报告。此后,各地普遍建立了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但由于"贫农、下中农协会是一个新生事物",各地尚未取得比较充实的经验。同时,在建立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的地方,也提出了许多问题,如怎样对待上中农,怎样规范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与各地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社员代表大会的关系,如何界定这一组织的性质、权利和义务等等。1964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简报上批示:这是一批好材料,易看,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情况,看了大有益处。这个问题要在五月会议一谈。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已经起草好的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第一稿。讨论中,与会者基本同意此文件,但也提出意见,都主张搞比较概括的,比较粗的,不主张搞细的。6月25日,中央在《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中要求,"把这个条例草案发到生产队一级,各地在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时候,不论是点上的社会主义教育,或是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都要把这个条例草案和'双十条'一起,在农民和农村干部中间广泛地宣读和讲解。"指示指出,"组织贫农、下中农协会,是我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一项组织方面的基本建设。经验证明,要使这个阶级队伍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一个先决的条件是保证它的纯洁性。参加协会的贫下中农,必须是真正的贫下中农。""同时,注意建立贫下中农协会的经常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经验证明,要在农村中加强对于敌人的专政,加强对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加强对于干部的工作协助和群众监督,以及加强农民群众的自我教育,中心的问题是在于加强贫农、下中农协会的经常工

作。"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总结了过去一段时期各地有关贫下中农组织的经验，对协会的性质、基本任务、会员、组织机构、领导成员，它同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关系，同社、队组织的关系，它的经常工作，都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共18条。

关于协会的性质，条例规定，贫农下中农协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由贫农、下中农自愿组成的，革命的群众性的阶级组织。

关于协会的基本任务，条例规定，要积极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模范地遵守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法令，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防止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团结中农，团结农村中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协助和监督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和干部，办好集体经济；积极发挥生产中的骨干作用，努力发展集体生产；对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关于会员问题，规定凡是贫农、下中农成分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不分民族、性别，经过本人申请，由生产队的全体会员大会讨论通过，生产大队贫农、下中农协会委员会批准，就可以成为贫农、下中农协会会员。但对那些有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有勾结的人，有严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的人，有严重损害集体经济利益行为以及犯有其他严重错误的人，除了彻底坦白交代，有经济问题的还进行了退赔，并且经过长期考察，证明确实改正了错误的以外，一律不能入会。同时也规定，贫下中农协会的会员，在协会组织内，都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580—581页。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有权对协会的工作提出意见等。

关于协会的组织机构问题，规定贫农、下中农协会的全国领导机关，是中华全国贫农、下中农协会，其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贫农、下中农代表大会。贫农、下中农协会的地方各级组织，是省、市、自治区和县的贫农、下中农协会，其权力机关是省、市、自治区和县的贫农、下中农代表大会。贫农、下中农协会的基层组织，是农村人民公社各级的贫农、下中农协会，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贫农、下中农协会的权力机关，是各级的会员代表大会或者会员大会。

关于协会的领导成员问题，规定在人民公社各级的贫农、下中农组织的领导成员中间，必须保证老雇农和贫农占绝对优势，也要有一定数量的下中农。人民公社各级的贫农、下中农组织的主席和组长，都不能由公社社长、大队长、生产队长、会计、出纳员、保管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兼任。

关于协会同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以及社队组织的关系问题，规定人民公社各级贫农、下中农组织要经常向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汇报工作，反映贫农、下中农和其他社员的意见。在党组织领导下，积极宣传和执行党的政策。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应该定期讨论贫农、下中农组织的工作，指导他们开展经常活动，注意培养贫农、下中农组织的骨干力量。社队的一切重大事情，在党内决定以前，应该同贫农、下中农组织商量，在党内讨论决定之后，应该先在贫农、下中农组织内进行传达和讨论。同时，也应该模范执行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的决议，带头完成各项任务，应该积极协助和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工作。

关于协会的经常性工作，规定人民公社各级贫农、下中农组织，应该帮助和监督各级干部正确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监督各级管理委员会和干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坚持勤俭办社；经常注意防止和制止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滋长，向资本主义势力

作斗争；要协助治安保卫部门加强对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监督和改造；带动广大社员积极改变自然面貌，努力发展集体生产；经常关心贫农、下中农和其他有困难社员的生活；组织会员学习毛主席著作，对会员进行阶级教育，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组织会员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等等。①

另外，在会议期间，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当前工作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精简会议和报表，宣传报道要做扎扎实实的、科学的、冷静的促进派，注意劳逸结合，关心群众生活，关心干部和群众的健康。要求各地在抓紧进行"五反"、"四清"的同时，必须抓紧生产工作，一切工作都应该服从生产的需要，只能促进生产，而决不能妨碍生产。

总之，1964 年 5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在国际国内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提出了一些正确的问题，如培养革命接班人、重视贫下中农、强调生产等。但这次会议与 1963 年 2 月和 5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相比，气氛已大不相同，提出了一些过火的不恰当的意见和措施。如有的人提出，社教试点时，对农村基层干部偏严，对基层干部的问题看得过重。纠正以后，又过多地强调依靠干部，强调自觉，因此处理问题偏宽，要求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一定要严肃处理，对于"小霸王"一类的人，必须搬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搬石头"的问题，看来是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有的人认为"四清"是农村阶级斗争的纲，不能只简单地看作是经济问题。"五反"、"四清"主要是政治、思想上的革命，不能认为"五反"只是搞搞多吃多占，"四清"只是清账、清物等等。有的人提出，现在"五反"越搞越看出来，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城乡各界，互相牵连。地富反坏修分子向党进攻相当广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8 册，第 584—593 页。

泛，所以只搞“五反”不行，必须城乡“五反”、“四清”联合夹攻。6月2日，刘少奇在会议讲话中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他不再强调依靠基层干部，而是认为有些地方“四不清”干部对工作队的办法是“喂、顶、拖、混”，要想办法摆脱他们，并说，他们抵抗“四清”，就是“反党”，破坏就是“反革命”，要开除党籍。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依靠基层。[①]同时，在这次会议上，还印发了陈伯达在天津小站和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的“四清”材料，以及中共甘肃省委和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夺权的报告。

因此，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表明，党的指导思想已经明显地向“左”转。而刘少奇在会后视察“四清”运动的一系列讲话，更加助长了整个运动的“左”的倾向。

刘少奇视察“四清”运动

中央工作会议后，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②] 此后，刘少奇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领导“四清”运动上来，实际上处于运动领导工作的第一线。6月28日至7月25日，他先后到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等地，同当地党政军干部座谈如何开展“四清”运动。8月5日至26日，又先后到武汉、长沙、广州、南宁、昆明等地视察，并在广州修改《后十条》。一路上，刘少奇就“四清”运动、两种教育制度、劳动制度、反修正主义以及军队政治教育和

---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51—115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99页。

军事训练作了多次讲话，并且对许多地方领导人开展运动的做法非常不满，“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①。强调反右倾，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和基层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估计得更加严重，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明显的急躁情绪，从而使运动一再升温。

从刘少奇视察“四清”运动谈话的主要内容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十分严重，强调对基层干部既依靠又不依靠，并多次提出“追根子”。

7月2日，在河北地委书记座谈会上，刘少奇认为，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你们讲有30%，恐怕大体合乎实际。9日，在济南军区座谈会上，刘少奇指出，就是我们中国也出修正主义咧！事实上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工厂，企业，机关，农村的公社、生产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有的是共产党员，打过游击的被他们拉下了水，被糖衣炮弹打中了；有的原来是贫农、雇农，和地主、资本家的女儿结了婚，或者吃了请，吃了几包香烟，就给他们办事，给他们隐瞒身份。现在相当一部分单位不是我们领导，或者原来是我们领导，现在变了；或者原来反动统治没有打倒，他换了个方式在那里领导，叫两面政权。

南通专区同志汇报说，大约三分之一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不适合我们南通专区的情况。也许南通地区没有三分之一，有20%、10%。刘少奇批评说，南通同志，你们去过没有，去检查过没有，根本没有去查，就说没有那么多。我看，也许不止三分之一。地县委这样估计，也许是30%、40%，也许更多，也许是10%、20%。在你们这种估计下，总不会是少的，一定会

①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3页。

是多的。真正有严重问题的、"四不清"问题的,大概占基层干部的多数,不是少数。

山东提出主要是怕"左",像信阳经验,好多人听到就头痛,提出来恐怕通不过。河南反映,河南对大搞群众运动有许多思想顾虑,过去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影响很深,有的说,平了反,反了平。[1] 刘少奇并没有接受这些意见,反而更加强调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他认为,对我们的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这个话有人怀疑,完全可以,但你们也没有去查。实事求是,多少就是多少。我也希望没有三分之一,问题是三分之一打不住。有多少搞多少。有这么多基层组织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他有他的一套,他有理论、有文艺向我们进攻,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有些不是复辟问题,原来是地主、资本家没有打倒,坏人在那里统治。有的土地改革不彻底,华东地区比其他地区更不彻底。城市文化艺术单位、中小学校,农村里的学校还不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打不住。某些大学的系、班,老教授在统治,在领导。最近,毛主席批示,文艺刊物大多数,十几年来不执行党的政策,这就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大多数。所以,革命非搞不可。有的原来就是反动分子在统治,有的是我们统治了又被和平演变过去了,有的在和平演变过程中。我们已经有许多单位被和平演变过去了,小赫鲁晓夫不少,在思想上、政治上,赞成他那一套;中国是不是可以避免出修正主义,这个事情还没有把握。现在不注意一定出,现在注意了,可能不出,但注意了,也可能出。[2]

后来,刘少奇又指出,实际上对这句话有很多人怀疑。你也

---

① 张素华:《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② 1964年7月21日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没有去查过,只坐在办公室里面,你有什么资格去怀疑呢?你去查一查看嘛,有三分之一。你只要查三个,看有一个没有嘛。我看有些地方不到三分之一,有些地方三分之一打不住,还超过三分之一。特别是有些行业,比如文化教育,中小学校,文化机关,我看就不只三分之一。在农村里面,干部犯一般的“四不清”错误的是多数,不是少数人。严重的“四不清”,多吃多占、贪污盗窃很严重的,我看也不少于三分之一。①

鉴于基层组织和干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刘少奇提出,对基层干部既依靠又不依靠,“靠得住,就靠,不可靠,就不靠”,“要等基层干部改变了,再来依靠,开始不能依靠,后来群众发动起来了,问题揭发了,又实事求是地退赔了,然后再来依靠他”。② 他认为,《后十条》中规定的两个团结、两个依靠不妥当,文件对放手发动群众强调不够,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就规定那么多政策,结果那些政策变成了清规戒律,团结95%的群众是团结95%的干部的前提,不首先发动群众,不首先团结95%的群众,团结95%的干部是不可能的。③ 当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决不能把政策变成束缚群众的清规戒律,“四不清”干部就利用这一点。

同时,刘少奇也多次强调“挖根子”,可以说,他几乎走到哪里,关于挖根子的问题就谈到哪里。“挖根子”的思想,是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在听取王光美的汇报时提出的。他指出,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

① 1964年8月21日刘少奇在广西区直属机关和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讲话。

② 1964年7月14日,刘少奇在南京听取江渭清同志汇报时的谈话。

③ 1964年7月24日刘少奇的一次谈话纪要。

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上面有根子没有？要不要挖？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很多事实说明，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保护，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不敢犯大错误。科员不拉科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科长不拉处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处长不拉部长下水，也不敢乱搞、大搞。生产队干部，没有大队干部撑腰，不敢胡搞；大队干部没有公社干部撑腰，不敢胡搞；公社干部没有上面干部撑腰，也不敢胡搞。这些干部犯错误的时候，以为有上面的干部支持，用上面的根子压群众，可以控制群众，这时候，他们不怕群众。

在这次视察过程中，刘少奇再次强调这一问题。他指出，一切有严重问题的人和集团，都要积极向上级领导机关找靠山，找保护人，找代理人，就是找上层建筑来保护。[①] 根子不仅上面有，而且上下左右都有根子，就是上下左右都有联系。他强调，上面的根子也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②]

第二，认为地方领导干部在“四清”运动中，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对运动的领导很不力，必须大力纠正，并强调领导干部必须蹲点。

在视察座谈过程中，刘少奇了解到，自开展“四清”运动以来，很多省地一级领导干部没有按中央的要求下基层蹲点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而是靠听汇报，看材料了解动态，并没有直接亲自从事运动的领导。对此，他非常不满意，并严厉批评了地方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

---

① 1964年8月1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央召集的党内报告会上的发言。

②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37页。

6月21日，刘亚楼、吴法宪致王光美的信中反映，北戴河一个姓赵的漏划地主的儿子在空军当了飞行员，而抚宁县公安局并未向其儿子所在单位党组织发出漏划地主成分的通知。7月3日，刘少奇批示：抚宁县委和抚宁县公安局的错误，实质上是严重的右倾思想的表现。他们的这种错误不是偶然的。他们虽然经过了"五反"运动，但是可以肯定，他们的革命是走了过场的，还远没有革命化，甚至还存在着严重的组织不纯，这确是值得各地市县委很好地认识和认真检查解决的。

7月5日晚，他在天津同河北省委负责同志的谈话时指出，真正下去蹲过点的人和没有蹲过点的人不一样，一听就知道。包括地委也好，县委也好，公社也好，官僚主义相当严重，自己不下去搞，就是要别人搞，自己指示指示，结果什么也不懂。人家批评他，他也不愿意听，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故步自封。所以，这次下个决心，你们一定下去。没有这一条，你们整个省的工作是不可能领导得好的。7月14日，在南京视察座谈时，刘少奇针对在场的省、地(市)、县几级领导干部，严厉批评了许多领导同志浮在上面，不蹲点，就是下去也是"面上跑跑，听听汇报，指示指示"。反复强调，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各级领导都要蹲点。他还认为，现在情况变了，搞调查研究，光靠开调查会不行了，只有领导亲自带工作队，蹲到点上去，直接掌握运动，才能取得第一手材料和经验。他又说：你当书记的，生病也生得，休息也休得，离职学习也离得，甚至死也死得，为什么离开自己职务蹲半年点就不行？要求省、地、县三级领导都要分期分批，轮流下去蹲点，并提出：省、地(市)、县委书记以及其他负责人，都要参加两批农村"四清"，搞两个大队，从扎根串联到整顿组织，取得比较完整的经验。还要参加两批城市"五反"，搞两个单位的运动。有了两个大队、两个工厂的经验，才有资格当省委

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①

刘少奇对此也十分焦急。他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个大革命,实际上比土地改革、合作化,比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广泛、深刻、复杂得多。它和过去历次革命不同,非要自己亲自去做不行。自己不去取得直接经验,就不能领导这个革命。他多次说过,没有经过蹲点调查的人,没有资格当地委书记、省委书记。② 刘少奇指出,什么叫蹲点?过去你们那个蹲点不叫蹲点,不够标准,不及格。蹲点要善始善终搞一期,这样才算蹲完一个点,才能取得直接经验。③

刘少奇认为,上述种种情况,实际上反映了在领导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在7月3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讲,我这次在各地的讲话,实际上是批驳右倾机会主义,只是没有戴这个帽子。④ 8月11日,刘少奇到达广州,在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指出,现在党内严重右倾相当普遍,我过去怕讲右倾,有顾虑,回去向主席汇报后,主席说不要怕"左",半年总结一次。后来在北京作了一次报告,不戴右的帽子,实际上全是反右的。但是要掌握"火候",掌握火候也者,就是防"左"。⑤

以后,刘少奇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10月11日,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反映,在两省地委书记会议上,发现几乎在每个地委召开的会议上,县委同志的思想都抵触很大。或者在这个问题上思想"通"了,到那个

---

①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485页。

② 金冲及、黄峥主编:《刘少奇传》下,第956—957页。

③ 1964年7月24日,刘少奇在河南省委、各地市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④ 金冲及、黄峥主编:《刘少奇传》下,第958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99页。

问题上又回升了。为此，华北局决定，戳穿“怕‘左’不怕右”这种精神状态，打出反对右倾的旗帜。[①] 12 日，刘少奇在为转发《李雪峰致刘少奇的信》代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在目前情况下，不向党内各级干部明确地指出当前的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危险，是不利的。要求各省、市、区党委“根据各地干部的思想情况，及时地向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提出反对右倾的问题，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以便为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好思想基础”。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同意，此件于 16 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②]

10 月 18 日，刘少奇复信李富春指出，右倾危险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中央最近转发了李雪峰的一封信，请给同志们念一念，今天河北省委又送来一个反对右倾的情况简报，也可以念给同志们听。但是，不要同过去一样在生产数字和计划指标上反对右倾。生产数字和计划指标，只能在厉行节约的条件下实事求是。当前的右倾思想，主要表现在阶级斗争、经营管理方法、干部的精神状态和生活作风等方面。[③]

10 月 20 日，中央转发了《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认为“江渭清同志对自己的缺点和刘少奇同志的信所采取的态度是好的”，“这封信上所批评的江渭清同志的缺点，不只是他一个人有，其他许多同志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还有一些同志则比江渭清同志更严重，其中，也包括中央的和中央各个部门的许多同志在内”，“所有这些同志都应当进行检查”。[④] 刘少奇答江渭清的信是于 9 月 30 日写出的。在信

①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二室编：《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选编》第 5 册，第 467—470 页。

②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第 607 页。

④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二室编：《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选编》第 5 册，第 473 页。

中，刘少奇对江渭清提出了尖锐批评：

> 我和你在北京的那次谈话中，我向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说：你在抗战期间就是在江苏打游击的，解放以后，你一直在江苏工作，从前你作省委副书记，以后作省委第一书记，也有许多年了。我问你：你了解江苏的情况，是比十年前更多了，还是比十年以前更少了呢？毛主席说，我们有些干部"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你和江苏的许多同志是不是除外的呢？对于第二个问题，你当时就回答，你和江苏的同志不能除外。对于第一个问题你当时不好回答我，在我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之后，你最后也承认，你对于江苏社会上当前的许多重要情况，特别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情况，比十年以前是了解得更少了，而不是更多。严重的问题就在这里。①

此前，毛泽东在对刘少奇给江渭清复信的批语和修改中，也对领导干部右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你的信写得很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如果不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10 月 28 日，毛泽东致信刘

①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 496 页。

少奇，“我看了你给江渭清信的全文，觉得实在好。”[①] 再次肯定了刘少奇的复信。

第三，提出了改变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办法，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运动方法。

针对地方领导干部在开展“四清”运动中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刘少奇对运动的部署和方法也十分不满。7 月 24 日，刘少奇在同河南省委和各地、市委第一书记座谈时指出，领导干部怕下去蹲点，这不仅是领导方法问题，而是能不能领导革命的问题，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问题，是要不要领导革命的问题。不敢革命，怎么能领导革命？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敢不敢实事求是，也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工作队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几百人搞一个公社。

随后，刘少奇同湖北、湖南、广东省委和中南局的同志研究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问题，并于 8 月 16 日向毛泽东及中央写信建议，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刘少奇在信中对各地社教运动的部署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南各省对今冬明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大体相同，即每一个县搞一个区（湖北、湖南）或一个相当于区的公社（广东），现在正以县为单位训练工作队，准备分到各地县工作。地县工作队的总团与分团之间有领导关系，但实际上是以县委领导为主。工作队的一些重要决定，按规定须经县委批准。根据过去的经验，有些县委往往偏袒基层干部，使工作队难于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影响运动的开展；对于某些重要案件，又常常拖着不批，因此不能结案，这实际上否定了工作队的决定，使坏干部得以进行翻案和反攻倒算，破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68、169 页。

坏了运动的成果。他指出，我在几个省走了一遍之后，了解到各省对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省、地、县三级干部的认识大有提高。但是，还有一部分县委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把这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是没有决心的。另一部分县委虽有某种决心，但不够坚定，又缺少办法。此外，一部分社队的严重问题，又牵连到区委和县委、县人委的某些人员，常常难于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加以揭露、批评和斗争，并且给以适当处理。因此，由各县分散去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认为是难于保证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我向湖北、湖南省委建议，是否可以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经过湖北、湖南省委讨论，他们都赞成这个建议。在我到广州之前中南局也赞成这个建议，并决定中南五省都照此办理。

刘少奇在信中也指出，经过讨论，同志们认为这个办法有以下一些好处：

一是工作队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的火候。这样，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上万人，声势浩大。地委除照顾面上工作外，可集中领导一个县的运动。省委也可派一二个负责同志到这个县参加领导，省、地、县三级负责同志共同组成工作队，便于随时总结经验，实行个别指导与一般号召相结合，在运动中相互学习，相互提高。也便于在运动中观察和考验各级干部。这样，对于把运动搞深搞透，比较有更多的保证，也可以少出一些乱子。

二是省、地的公交、财贸、文教、农林、政法、党群等各战线都可派人参加工作队。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五反"比较有保证地可以搞好。不然，即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可以搞好，但是县以

下公交、财贸、文教、农林、政法、党群，各行各业和城镇“五反”不能同时进行，势必留下许多死角，不能清理，遗患将来。农村中的严重问题，大都是上下左右都有联系，必须上下左右同时清理，才能比较彻底地解决问题，这样，便于解决上下左右的联系问题。县级机关的“五反”可以立即先一步进行，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可以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后期，在农忙时进行。

三是县委负责同志和县的工作队离本县到邻县去进行社教，几乎完全没有牵连，对基层干部的认识没有什么框框，群众也不认识他们，他们必须从头开始扎根串联，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了解和弄清问题。该县各级党组织所介绍的情况，只能作为工作队的参考。如果发现了生产队、大队、公社、区委的严重问题，他们比较能够放手地发动群众去揭露、批判和斗争，并作出适当处理的决定，如果其中有人动摇，不能坚定地进行这一场革命，也容易被发现，在运动中给以批评、教育和帮助，必要时给以处理。这样，可以带出一批坚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干部，也可以促使某些有问题的外县干部自觉地交代问题。

四是县委的负责同志，到外县去搞运动，可以真正蹲到点里去，不致因为照管全县的工作或者借口照管全县的工作，像蜻蜓点水似的，一会儿又浮上来了。另一方面，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其他不搞运动的县可以集中精力抓生产，不会因为又搞点又搞面，而发生顾此失彼的问题，可以更好地做到点面结合，使运动与生产都能抓好。

讨论中，许多同志也认为今年秋冬和明年春夏，只能每个地委搞一个县，在一个县中也可以有先有后地进行，先铺开一部分公社，取得经验后，再铺开另一部分公社。但在搞好一个县以后，就取得了经验，到明年秋冬，好的工作队就可以一分为二，一个地委搞两个县，有些地委也可以考虑搞三个县。这样做，不独是比较有保证地能把运动搞深搞透，也可能是比较地搞得快些。

更重要的，是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如果不趁着这次有强大的工作队下去一次包干搞好，将来就再不可能有这样强的工作队下去搞了。如果在运动中发现县委、县人委某些人员有严重问题，也可以迅速解决，以至改组县委、县人委，不需要再层层上报监委审批。在运动中的某些重要决定要县委批准的，也可以及时批准了。

据刘少奇在信中反映，地委书记是赞成这种部署的，但是，有的地委书记说，可能有些县委不赞成改变原来的部署。如果省委决定要加以改变，各县委也是能够执行的。现在三省都从省级机关抽调了几千人组织工作队进行训练，其中正副厅局长、处长、科长不少，三省的省委书记多数也表示要下去认真地有始有终地蹲点。军队也准备抽出一批干部去参加工作队。看来，真有点像进行大革命的样子。

为此，刘少奇建议中央机关也要抽出人员组织工作队。其中，正副部长、正副司局长、处长、科长应当大体抽出三分之一，再加其他工作人员，可以有一万至几万人。在北京进行初步的训练和准备，然后分到各大区的若干省，再由省分到几个县，由省委领导。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员应当分到县去进行农村社会主义和县以下的“五反”，四分之一以下的人员去各大中城市进行“五反”。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决定后，由书记处立即进行组织。中央的公交、财贸、文教、农林、政法、党群等各战线都要派人参加工作队到县以下进行“四清”和“五反”。中央组织部的安子文和几位副部长，除留人看家外，应率领组织部的一批工作人员到农村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因为这就是最好的整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也应照此办理。所有参加工作队的人员，必须经过审查，因为这是党委派他们去进行一场光荣的伟大的革命任务。有大毛病的，没有决心下去的人，不能批准他们下去。他们没有资格参加工作队。

刘少奇的这封信，最初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8月18日毛泽东复信：

> 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中旬至十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的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

同时毛泽东也批示将此件"即送邓、彭、康生、朱德、贺龙、荣臻、瑞卿、伯达、冷西阅后，请尚昆印发"。

在8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对公开放映并组织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作出批语："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①] 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开会的一间大房子里，接见了陈伯达、康生、吴江、关锋、龚育之、邵铁真等批判"合二而一"的写作班子。据龚育之回忆，经过简单的介绍和寒暄，毛泽东坐下来就讲，好像有意要向搞哲学的人讲一大篇话。一开始就讲下乡"四清"和阶级斗争。毛泽东说，哲学家要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斗争。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一个大学。什么北大、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132—135页。

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到阶级斗争中去，到“四清”、“五反”中去，你们面貌会改观。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同时，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讲到了《红楼梦》，他认为《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实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①

同一天，既大讲阶级斗争，又批示同意刘少奇提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可见，毛泽东对形势的看法是非常严重的，对当时运动开展的现状是非常不满的。从这一点上看，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与刘少奇没有根本性原则分歧，只是毛泽东对打歼灭战的建议持有比较谨慎的态度，主张收集各地意见，以便十月工作会议讨论一次。

但随着各地反映的情况，毛泽东对这一建议逐渐改变了看法。8月20日上午10时30分，毛泽东在北戴河找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同志谈话。当李雪峰汇报说，少奇同志的信写得好，我们刚接到，只粗粗地作了研究，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刘子厚也说，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这样做，贫下中农很不满意。毛泽东了解这一情况后说，“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如大旱之望云霓”、“汤有七年之旱，祷于桑林”。大旱之望云霓，就是这个故事。你们不同意，发下去怎么办哪？打电话让文件先缓发，或者请小平同志开个会，或者请少奇同志回来再议一次。先不发，何必那样急，在北京开个会再

① 龚育之、王志强：《科学的力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169页。

定。少奇同志的信，我也赞成，中央批发下去，问题大。缓发有什么？你们打一仗，无非你们胜利，或者失败。也可以你们搞你们的。人是由蠢慢慢变聪明的。无论什么人，都是由不知到知，由少知到多知，至于全知的人，没有那回事。马克思知的多一些，但也不是全知。我们就更不用说了。你们不赞成，我也没有办法，又讲了那样多道理。总要以理服人，不以理服人还得了。并当场吩咐秘书说，华北局反对，文件缓发，通知开会，到北京开会，你（指李雪峰）带几个人去好助威呀。到北京打一仗，也许你们打赢，也许打败，打败也不要紧。文件缓发，何必急，急什么。出门上车时，毛泽东又说，也可以写活点，何必一个样？你（指李雪峰）还是带几个人去，助助你的威么。时间不出一周。

此后，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与刘少奇对如何开展"四清"运动产生了分歧，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如何看待运动的主要对象。在刘少奇看来，问题主要在基层干部，但同时也不否认县、地、省甚至中央的一些部门出问题，至于中央一线领导人，刘少奇没有想过，而刘少奇恰恰认为这些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政治上是可靠的。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差别也正在这里。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毛泽东也曾把当时农村中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归之于基层干部未能正确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而在八届十中全会后，根据来自"上面"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从而确立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框架后，毛泽东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他强调基层干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更警觉地关注"上层"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此后他又提出"官僚资本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主要解决"上层"问题的概念。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问题主要在上层，集中大量工作队到基层搞运动，怎能收到效果，又怎能保证上面派来的工作组比基层干部更正确？因此，在运动后期，毛泽东对刘少奇"大兵团作战"的建议和做法提出尖

锐批评,也就在所难免了。

《后十条》修正案

1964年6月17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对《后十条》草案进行修改,由分管农业工作的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主持。实际上,在此之前,谭震林已经开始为《后十条》的修改进行准备了。

6月4日下午,谭震林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主持《后十条》修改小组会议。与会者就如何修改《后十条》提出了许多建议。主要问题集中在:一是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放手发动群众。如有的人提出,依靠基层组织、依靠基层干部、依靠贫下中农,究竟哪一个是主要的?二是工作队的作用问题。有人提议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工作队,但是,工作队一下去扎根串联发动群众,工作队和原来的基层组织,怎么样提法,这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三是干部问题。普遍认为,这个问题很复杂。有的同志说,干部问题看来一年来我们处理得偏了,出现了一些问题,真正要处理的还不能过多。有的说,下去的人把原来干部一脚踢开,自己搞一套,这样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也有人提出,关键是走群众路线,依靠贫下中农是整个运动的核心。四是划阶级的问题。有人主张,要把《后十条》规定的一般不重划阶级改一下,把阶级界线搞清;有人主张不要普遍划,就是把贫下中农组织一下,看谁可以参加到贫下中农组织里头来,要把划阶级和登记分开。

实际上,《后十条》草案出来以后,就听到党内有些人,包括某些地方上相当负责的人的议论,说是右了。文件下发后,又受到党内新的更加尖锐的责难,例如说"《后十条》是反对《前十条》

的"①。由于当时运动试点过程中，各地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宽、混淆政策界限等"左"的错误，各地也都有材料反映，因此，为防"左"和反"左"而制定的《后十条》，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认可，认为这个文件大体上比较好。毛泽东也批准了《后十条》并要求向全国宣讲。但随着运动的进展，毛泽东对《后十条》也产生了不满，他曾发牢骚说："1963 年 5 月杭州会议写出第一个十条，为什么刚过了三个月，9 月北京又搞出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②

由于受王光美桃园经验的影响，刘少奇对《后十条》中的某些规定也提出了许多意见。5 月 28 日，刘少奇在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提出："《后十条》强调发动群众不够，比较多地强调依靠基层干部，强调团结两个 95%。于是，基层干部和那些'四不清'的干部，就拿团结两个 95%来反对'四清'。"③ 随后，在视察"四清"运动过程中，刘少奇又多次表示对《后十条》的不满，几乎是每到一地都谈此问题。

7 月 12 日，他在安徽省委常委座谈会上指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搞了一年多了，我看不深不透，问题不少，不能说已经很好贯彻了。杭州会议以后又搞了第二个十条，这个十条有一个缺点，主要是有些具体政策规定，没有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在群众没有发动以前，有些规定成了清规戒律。团结 95%的干部和团结 95%的群众，有时候就有矛盾，在一定的时候，要团结 95%的干部就不能团结 95%的群众。一定要干部"四不清"弄清了，退赔了，不多吃多占了，参加劳动了，这样，团结 95%的干

① 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第 98—99 页。

②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604 页。

③ 金冲及、黄峥主编：《刘少奇传》下，第 959 页。

部才会有可能,群众才会服气。在"四清"还没有搞清以前,干部还随便打人骂人,群众就不信任你,就不能团结95%的群众,只能团结群众的少数人。挖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根子,关键在于放手发动群众。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就要强调政策,按政策办事,有些地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就强调政策,团结两个95%,依靠基层干部。工作队下去只依靠当地干部,这样群众就不来了。

7月21日,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再次对《后十条》提出尖锐的意见,他认为,中央"双十条"的第二个十条,有许多具体政策规定,其中有些要修改,有些写得不够,或者有些话不那么妥当。比如团结两个95%,到底以哪一个为重点,哪一个是基础,是前提?应当团结95%的群众是前提,是基础,如果团结95%基层干部是前提,这就不对了,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怎么能够团结95%基层干部呢?如果四方面都"四不清",又怎么样团结95%基层干部呢?不可能。我们不要怕基层干部躺倒,基层干部躺倒是假的,不是真的,并不是真想不干,实际上他想干得很。这是他们向工作队作斗争的一种手段,是用来抵制我们的。

8月5日,中央书记处第382次会议决定,《后十条》的修改,由刘少奇主持。这样,至9月1日前,刘少奇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后十条》的修改上了。

据逄先知回忆,刘少奇曾邀请田家英一道去南方修改《后十条》,田家英当时感到非常为难,因为他不太赞成刘少奇对农村形势和基层干部的过左估计以及对"四清"运动的一些"左"的做法。但是他又很尊重刘少奇,也不能不服从组织,最后勉为其难地参加了文件的修改工作。离北京南下的前一天,田家英报告了毛泽东,问他对修改文件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讲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

集中在一个点上。在飞往武汉的飞机上，田家英将毛泽东的两点意见转告了刘少奇。[①] 而刘少奇则“紧皱眉头，没有说话”[②]。

从8月11日至8月20日，刘少奇在广州停留了十天，修改《后十条》，由田家英主要执笔，刘少奇最后定稿。在修改过程中，刘少奇提出并加写了一些十分尖锐的内容和语言。如刘少奇提出要在运动中摧垮“反革命两面政权”，搞比土地改革更深入的革命运动等。[③]这使田家英感到很为难，因为要按照自己没有想通的意见去修改，自然十分吃力，很不顺手，难以落笔。[④]同时，刘少奇还主持召集中南局常委和广东省委书记处成员座谈会，听取对修改稿的意见。经过近十天的修改，《后十条》修改稿基本完成。

19日，刘少奇委托即将回京的田家英将修改稿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审阅。他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信中说：“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⑤] 27日，毛泽东批示邓小平：此件请印发大区书记及少数参加会议的同志，加上中央参加会议的同志，越快越好。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

20日至25日，刘少奇到南宁、昆明视察工作，26日返回北京，29日至9月1日，他连续四天主持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后十条》修改稿。根据会议中提出的意见，又对文件作了

---

① 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第9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52页。
③ 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第149页。
④ 同上，第99页。
⑤ 金冲及、黄峥主编：《刘少奇传》下，第960页。

重要修改。修改稿经毛泽东批改同意后，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下称《后十条》修正案），于9月18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

在印发《后十条》修正案的通知中，中央规定，"在今年秋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地方，要把这个修正草案，同中央的决定草案（即第一个十条）一起，在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中深入地进行宣读和讲解。工作队都要按照这些文件的规定进行工作。"并指出："领导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关键在于三个问题，领导干部亲自蹲点，有坚强领导的工作队，以及在运动中放手发动群众。"同时要求"这个通知只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工作队，不要在群众中宣读"。[1]

同第一个《后十条》相比，《后十条》修正案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认为这个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当前的农村革命斗争，是一场新的革命，一场内容十分丰富、具有许多新的特点的革命。现在，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方法，更加狡猾了。他们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斗争"。

中央对《后十条》的重大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必须以毛泽东提出的六个条件，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好还是不好的主要标准。这六条标准是：(1)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2)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3)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4)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5)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226—227页。

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以至于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6)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为此，文件要求，为贯彻毛泽东必须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这次运动，必须达到中央决定草案所提出的要求："要一批一批地、踏踏实实地搞深搞透，要严格防止敷敷衍衍'走过场'。从省、地、县各级领导，一直到工作队，到工作队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努力工作，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质量，达到高的或者比较高的要求。"

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内容（即两个《后十条》中规定的十二项工作），同第一个《后十条》相比，有所不同。(1)明确规定召开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议，而第一个《后十条》中规定，可以吸收贫下中农代表参加。(2)强调在群众中宣读和讲解中央决定草案和规定草案（指《后十条》修正案），直接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3)强调工作队队员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而第一个《后十条》规定要尽可能地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4)规定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整个工作，一般说来，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解决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和开展对敌斗争。第二个阶段是组织建设，主要是整顿好党的基层组织、社队组织和民兵组织。这两个阶段的工作是密切联系的。在第一阶段的工作中，就要给第二阶段的工作做好准备，打下基础，特别重要的是，在工作队进村扎根串联以后，就应当注意逐步吸收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一起工作，在运动中培养一批新的骨干。

三是强调领导人必须亲自蹲点。文件规定，蹲点必须真正蹲下去。要从头到尾地把一个点上的工作做完，从组织和训练工作队、进村扎根串联、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直到搞好"四清"、搞好了对敌斗争、整顿好了组织、建立和健全了各种制度、

贯彻了《六十条》、掀起生产高潮，一直做完，有始有终，这样，才能取得完整的经验。要蹲在一个生产大队，并且以一两个生产队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亲自参加，亲自动手，这样，才能有亲身体会、真情实感，才能取得直接的经验。要求每一个领导人起码要这样地蹲点两次。并指出，这些同志的亲自蹲点，是领导好这次大革命运动的前提条件。

四是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是不是放手发动群众，是不是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是彻底进行或者不彻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分界线。发动群众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工作。只有放手发动群众，才能使这次运动成为深刻的革命运动。对于发动群众表现动摇的人，应当加强教育，解除他们的顾虑，使他们坚定起来。对于抗拒运动、阻碍发动群众的人，应当进行严厉的批判，情节严重的，还应当给以必要的处分。对于文件中的具体规定，只有在把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以后，才能够正确地执行和贯彻。决不要把这些必要的、正确的规定，变成妨碍发动群众、束缚自己手脚的清规戒律。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是深入发动贫下中农，建立贫下中农组织，强调"关键是扎正根子"。文件规定，参加贫下中农组织，必须是真正的贫下中农。过去划分阶级的时候，有的地方把某些上中农、小商人，甚至地主、富农错划成了贫农或者下中农，也有些雇农、贫农被错划成了中农，这次都必须认真改正过来。要严格防止假的贫下中农混入贫下中农组织；同时，也不要把真正的雇农、贫农排斥在这个组织之外。

五是教育群众，首先是教育干部，解决群众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文件规定，为了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必须把干部中间的、特别是基层组织领导核心里面的问题，给以认真的彻底的解决。团结95%以上的群众，是团结95%以上的干部的基础。文件指出，事实证明，一些犯了错误的

干部，如果经过教育和群众的帮助，检讨了错误，站稳了立场，划清了政治界线，进行了退赔，并且改进了作风，这样就给群众的自我教育树立了榜样，群众中的一些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文件指出，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要在扎根串联、调查研究以后，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能依靠。在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和依靠基层组织的关系问题上，依靠贫下中农是基本的，是决定的方面。文件虽然肯定“绝大多数的农村基层干部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并把原来以县为单位处分干部的比例一般地控制在2%以内的规定，改为“一般地控制在1%左右，最多不超过2%”，规定得更为严格，但对干部中的问题，估计得严重得多了。文件指出：“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有许多人犯有大大小小的错误，不仅有经济上的‘四不清’，而且有敌我不分、丧失立场、排斥贫下中农、隐瞒成分、伪造历史等等政治上的‘四不清’，其中有一些人的错误比较严重，甚至已经蜕化变质，成为阶级敌人的代理人和保护人。此外，还有少数的地、富、反、坏分子混入了干部队伍。应当看到，问题是严重的。”关于如何团结95%以上干部的问题，文件也指出：“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露矛盾，认真进行教育、批评或者必要的斗争，提高干部的觉悟，使之能够认真洗手洗澡，改正错误。”因此，对那些好的或者基本好的可以依靠的基层组织，也“必须在经过扎根串联、充分发动群众以后，证明了他们确实是这样的基层组织”。这样，就完全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另外，文件还强调追上面的“根子”。文件规定，必须追根究底，把有关的人员追究出来。不管是哪一级的干部，不管他们的职位高低，只要是同基层组织中的坏干部勾结，干了坏事，都必须向当地群众检讨，情节严重的，还必须受到应得的处分。

六是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要求每一个点上开展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都必须要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工作队要力求精干，它的成员必须经过严格的挑选和审查。凡是政治上不可靠的、思想作风存在严重问题的、在"五反"中暴露出严重错误而没有认真检查的，都不能参加。每一个工作队，都应当配备一些妇女干部，以利于充分发动妇女群众。为了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顺利开展，各省、市、自治区都应当组织一批包括适当人数的专业工作队，长期固定下来，专搞运动。

七是明确规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必须划出一个专门阶段，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民主革命不彻底或者很不彻底的地区，必须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在土地改革的时候，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分子，必须清查出来。同时也规定，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地也不宜担任会计员、保管员、出纳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等重要职务。但是，一些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考察，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还乡职工、复员军人，可以根据需要，分配他们做一些适当的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并且在工作中教育和改造他们。

八是《后十条》修正案对整党工作必须达到的要求作了不同于第一个《后十条》的规定。如使每一个党员划清敌我界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界限，还要划清先锋队和群众的界限。从运动开始就要注意培养一些成分好、立场坚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以便在运动后期，经过党内和贫下中农群众讨论同意，介绍他们入党等。

九是重划阶级。《后十条》修正案指出，由于现在农村相当普遍地存在着阶级成分比较混乱的情况，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很有必要认真地进行一次清理阶级成分的工作，就是说，经过群众的充分讨论，对每一个家庭的成分进行审查和评定，并且建立阶级档案。凡是过去划错了成分的，都要改正过来。在某

些民主革命很不彻底的地区，或者根本没有划过阶级的地区，还应当重新划分阶级。

除上述明显的重大修改外，还有一些小的改动。如规定，在全国农村完成这个运动，大约需要五年、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点上的工作需要半年左右，面上的工作只要一两个月。而《后十条》则规定，运动用两三年的时间完成，点上需三个月，面上只20天左右就够了。两者相比，修正案显然是把运动的时间估计得更长了。[①]

上述修改中，最重要的是第六点，即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样一来，所有进行运动的基层组织和干部都靠边站了，由工作队取而代之，这是导致"四清"运动迅速向"左"转、严重扩大打击面的一个重要措施和步骤。实际上，《后十条》修正案出来以后，各地都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方法也过于繁琐，束缚地方干部按照不同情况作不同处置的创造性等。[②] 可以说，这是一个"有严重'左'倾错误的文件"。[③]

总之，这一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四清"运动的具体方针政策进行了研究和调研，特别是刘少奇挂帅"四清"后，主持制定了《后十条》修正案，这对后来的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随后，刘少奇又为中央起草和批转了一系列文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桃园经验、小站地区夺权的报告，同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印发的白银厂夺权报告，以及高校"四清"的试点经验——北大社教一起，形成了"四清"运动期间有名的夺权样板。这对运动的进一步"左"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面使夺权成为这一阶段运动的突出特征。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228—265页。

② 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第151页。

③ 同上，第100页。

第五章

高潮:夺权样板

“白银厂经验”

1964年6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甘肃省委、冶金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即有名的“白银厂经验”。

白银厂,又称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位于甘肃省白银市,因盛产有色金属而得名“白银”,是我国“一五”计划期间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也是我国新建设中有色金属的最大的一个工厂。自1954年开始兴建,1962年部分建成投入生产,有1.1万多人的大型铜、硫生产联合基地。据薄一波回忆,关于白银公司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以前就反映出来了。应当说,当时白银厂的工作是有问题的,但有关单位向上反映时夸大了,以致造成那里的问题非常严重的假象。①

那么,白银公司在工作中有哪些问题呢?据“四清”运动的材料分析,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企业职工生活困难时,利用企业闲置设备,如汽车、发电机、钢材、汽油、柴油等物资与当地农村搞“生产协作”,以换取粮食及副食品,用以缓解职工生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52页。

活困难。二是个别干部工作作风存在一定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吃多占、损公肥私的现象在个别干部身上有所表现，甚至较为严重。三是企业生产管理的制度不尽完善，生产经营中出现一些漏洞，货款汇出后，订货不到位的情况未能及时查处，出现一些"无头案"。四是在精简企业职工过程中，由于政策掌握不当，引起内部一些矛盾，部分被精简的职工对领导有怨言。

但是甘肃省委向中央汇报时，却把问题描述得过于严重，影响了中央领导人对此问题性质的判断。2月20日，在接到甘肃省委的报告后，薄一波同吕东（冶金部副部长）、高扬文（冶金部副部长）、王林（西北局候补书记兼经委主任）、焦善民（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乔明甫（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对有关问题作了研究，确定由冶金工业部和甘肃省委负责，选调处级以上干部20人组成强有力的工作组，由高扬文同志率领，迅速前往整顿处理。2月25日，薄一波根据甘肃省委的汇报材料，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关于研究和处理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问题的请示》，认为该公司主要党政负责人李子奇、常跃华、崔国权等少数人，长期把持了领导权，无视党纪国法，胡作非为，公司名义上为党所领导，实质上已为资产阶级所篡夺，以致正气不得伸张，党的方针政策不能贯彻，其错误性质是属于敌我矛盾的，必须采取革命手段，改组领导班子，才能保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月7日，周总理作出重要批示，同意派遣工作组，并指出，这一严重问题，冶金部要负很大的责任，两年来多次提出，均未彻底处理。这一次处理后，还要联系到"五反"运动去解决。

3月中旬，以高扬文为组长，李寿（甘肃省委工交部副部长）为副组长，50余人的联合工作组进驻白银公司，拉开了夺权的序幕。联合工作组到白银公司后，自上而下地发动职工群众，开展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联合工作组先在机关、运输部、火焰山矿、选矿药

剂厂等四个单位，开始所谓的从人民内部矛盾到敌我矛盾的斗争。6月，联合工作组就向甘肃省委、冶金部党组写出了《关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反对领导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情况报告》及五个单行材料。《报告》认为，社会主义企业里，确实钻进来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和阶级敌对分子，只有把阶级斗争放在重要位置上，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和建设顺利进行。

7月，甘肃省委向西北局写出《关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内部阶级斗争问题的报告》。认为这个企业的领导核心，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下，有的已经变质，有的正在变质，其他的人都程度不同地被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在这里所发生的问题，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当前社会上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缩影，是资产阶级势力对社会主义企业实行侵蚀、和平演变的一个典型事件。随后，甘肃省委向各地、州、市、县委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党委批转了联合工作组的情况报告，并要求各地参考仿行。

1963年8月22日，薄一波在冶金部党组关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一个报告上批示，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曾经是搞得最坏的一个工厂，领导混乱，机器设备破坏严重，投入生产以来，达不到设计生产能力，还要每年大量亏损。这种情况，前已报告过。半年来，冶金部和甘肃省委联合派了工作组，在厂矿内初步开展了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对企业进行了整顿，面貌开始改变，年初做计划时，公司只接受了生产粗铜五千二百吨和上缴利润一百万元的任务。现在估计今年粗铜产量可达到一万吨，利润可达到一千万元，这还是留有余地的估计。事实证明，毛主席所讲的“向官僚主义借款”，是现实的，是大有希望的。

1964年5月30日，甘肃省委和冶金工业部党组向中央写出《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报告反映，前几年，这个企业的领导核心烂掉了。一个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

义企业变成了由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也就是地主、资产阶级所统治的企业。公司党委副书记×××是个坏分子，1944年带着个人野心钻进党内以后，一直过着极度糜烂的生活。他父亲是国民党少校团副；岳父是资本家，解放前曾经在北京开过“万里香”大烟馆，1952年“三反”、“五反”时被判过徒刑。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监委书记×××，出身大地主家庭，祖父是前清拔贡，父亲是国民党上尉军官，工作一贯表现不好，其利用职权，安置和包庇坏人，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公司党委第一副书记兼经理×××，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贪图享受，追求名利，同一些坏人同流合污，思想已经蜕化变质。同时，他们为了培植私人势力，利用封建关系，把一批地富反坏分子和思想品质恶劣的人，提拔安置在各种领导岗位上。如把“坏分子”×××提拔为运输部党委书记兼主任，“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当了房产科科长，“有血债的、阎锡山的武装特务”×××担任了农场场长。这样，坏人拉坏人，坏人提拔坏人，许多重要部门的领导权都落在坏人手中，特别是“油水大”的行政处、运输部、农牧处、面粉厂、农场、牛奶场、采购站、食堂等单位，几乎完全被一些坏人把持了。这些坏人把整个公司搞得乌烟瘴气，暗无天日，成了一个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统治的世界，即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统治的世界。

《报告》指出了白银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民所有制的财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如全公司共有重约两万吨的七千多台设备，到1962年底为止，没使用几年，就损坏了70%以上；好几个居民点的住宅（面积3万平方米），差不多被拆光了；以协作为名，盗出设备、材料、运输工具和现金价值160多万元，换回生活品价值50多万元，国家直接损失100多万元等。二是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成风。在“五反”运动中，揭发和清查出来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

共有379人，占职工总数的3.7%，其中集团和个人贪污万元、万斤粮以上的案件有8起，千元以上的案件有57起。三是领导集团生活极端腐化。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形成了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在国家遇到灾荒，职工生活困难时，过着腐化堕落、花天酒地的生活。如×××家中只有三口人，在两年内就多吃多占肉类800多斤、油200多斤、鸡蛋160多斤、白面600多斤、瓜果500多斤、鱼翅3.5斤，×××还经常吃人参、人参精、鹿茸精、还少丹等补品，吸牡丹牌香烟要加麝香，还抽大烟。公司的三个副书记，两年中接受公司各单位的礼物，据不完全统计，仅肉类就有1000斤，另外还有大量生活物资40多种。四是社会风尚败坏。在公司中，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到处泛滥，请客送礼、行贿受贿之风盛极一时。一些人向供应部门送了礼，就可以拿到搞非法协作的物资；给医生送了礼，可以不经过检查就取得"肝炎"证明；给人事部门送了礼，可以连升三级；给财务部门送了礼，可以报销不该报销的费用。五是反革命活动猖獗。在近两年中，先后发现的反革命组织，就有"民族党"、"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自由民主党"和"反共救民党"五个。此外，还发现了张贴反动标语、阴谋叛国投敌、破坏生产、阴谋暗害等案件多起。六是抗拒中央指示，打击陷害好人。西北局为纠正张仲良同志错误所作的兰州会议决议，公司不加执行；中央在七千人大会提出反分散主义后，他们仍继续大搞非法协作；中央一再指示不准盖楼堂馆所，他们却动用修建工人住宅的投资，盖书记、经理宿舍等。同时，《报告》还认为，地主、资产阶级对这个公司领导权的篡夺，从高岗手下的红人——黄罗斌担任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的时候就开始了。

《报告》总结了白银公司"五反"运动的做法，即"白银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五反"运动中，进行了两个革命的斗争。一个是打击

地、富、反、坏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夺回领导权。运动一开始，就把斗争的锋芒对准以李子奇为首的领导集团，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接着便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斗争，给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以坚决打击。一个是通过"洗澡"，进行自觉的思想革命，挽救绝大多数可以挽救的犯有各种错误的干部，一致对敌。

第二，组织阶级队伍，坚决依靠老工人。采用扎根串联的办法，个别访问和召开座谈会，解除顾虑，请回了过去下放的500名四级以上的老工人，组织了一支觉悟高、热爱党、对坏人坏事敢于斗争又有比较丰富的生产经验的老工人队伍。

第三，彻底纠正了过去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统治时的那一套做法，把党的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对过去被打击报复的好干部，坚决彻底地平反，对包庇重用的坏人和有严重问题的人，该精简的精简，该开除的开除，该调整的调整。坚决纠正了过去单纯强调物质刺激、妨碍生产力发展的资产阶级包工制，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了合理的计件工资制和奖励制度。坚决纠正了领导干部生活特殊化和对广大职工死活漠不关心的严重错误，取消各单位克扣工人生活物资的小灶，禁止领导干部上下班乘坐小汽车（从住宅区到厂区只有三里路），停发了厂长、处长级以上干部的奖金，制止了走后门的现象，坚持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等。

第四，把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广泛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包括"双十条"教育，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教育以及前途的教育。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发动起来以后，又把群众的干劲引向突破生产关键、修复设备、管好生产、提高效率方面。在生产情况好转以后，又及时提出新的奋斗目标，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报告》还指出，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

很深刻的。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只注意了建设的一面，忽视了革命的一面；只注意了经济和技术，忽视了政治。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对于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事实认识不足。今后一定永不忘记阶级斗争，一定要把"五反"运动搞深搞透，坚决挖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根子，一定要认真选择领导干部，扎正根子，经常关心、考察干部，把领导权紧紧掌握在德才兼备的干部手中，使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无法得逞。①

6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了该报告。批示指出，一个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大型联合企业——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没有多久，很快就被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篡夺了领导大权，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独立王国。这样一个严重的事件，很值得大家深思。像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这样变了质的企业，在全国来说，虽然是极少数，但是它给我们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事件，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是死不甘休的，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隐蔽的方式，打入社会主义企业，企图篡夺领导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把它演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这一事件的最根本的教训就是，在我们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硬是忘记和忽视了社会上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客观事实。这里再一次提醒同志们注意，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社会主义的江山是铁打的。如果我们对过渡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认识不足，那么，就会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和进攻失去警惕，不加防范，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随时就有可能得逞。

---

①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二室编：《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选编》第5册，318—335页。

中央认为，白银厂的夺权斗争说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同时也说明，在全国城市中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和“五反”运动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这次运动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一定要把它搞深搞透，坚决进行到底。为此，中央要求，在运动中，必须组织好革命的阶级队伍，建立阶级档案，彻底清除坏人，挖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根子，决不可以放任自流，半途而废。①

中央的指示进一步加剧了白银厂的夺权斗争。据联合工作组负责人高扬文、林泽生写给中央及薄一波的报告中记载，在白银公司的“四清”运动中，夺回了公司和所属8个厂矿（占厂矿总数的三分之二）、22个车间（占车间总数的40%）的领导权，重新建立了各级领导核心。在这一过程中，对公司5名主要领导人分别给予开除党籍、留党察看或逮捕等处分，对两名处级领导干部判处死刑或有期徒刑。与此同时，先后有69名干部职工被戴上“地富反坏”帽子，47名干部职工戴上“贪污盗窃分子”帽子。6名干部定为蜕化变质分子。占全公司1.5万职工总数的0.8%的干部职工被戴上各类帽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组织部、甘肃省委和冶金工业部派出调查组对“白银厂事件”进行了复查，确认这是一起冤案。1979年1月17日，中共中央给中央组织部、甘肃省委和冶金工业部党组的批复中指出，原定以黄罗斌同志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篡夺白银公司的领导权，并将他定为修正主义分子，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②2月3日，中央为受到错误处理的几名原白银公司主要领导人平反，恢复名誉。3月，中央批准为“白银厂事件”冤案彻底平反。中央批准的调查结论中指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572—574页。

② 同上，第574页。

出，给黄罗斌定性的主要根据都不是事实。其他所谓被地主资产阶级篡权的公司领导核心成员，虽有缺点错误，但都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也是错案。在白银厂事件中，当时共立案630余件，绝大多数属于冤案。

“桃园经验”

1964年9月1日，中央批转了王光美《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对“四清”运动开展具有指导作用的“桃园经验”。

1963年11月，王光美根据刘少奇要她下去锻炼的指示，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河北省委工作队，下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担任大队工作组副组长。离京前，王光美问刘少奇，应该注意什么？刘少奇只简单地讲了一句，“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1]。1964年春节，“四清”工作队放假，王光美回家过年，刘少奇向她详细询问了农村“四清”的进展情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要追上面根子的主张。王光美返回河北后，于1964年2月29日晚，向中共河北省委卢风传达了刘少奇谈话内容，卢风根据记录大意，整理成《少奇同志谈“四清”》。在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将此记录送毛泽东审阅。

王光美下乡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她每一次回来，毛泽东都向她询问情况，并多次说过，“根子在上面”。1980年王光美回顾说：当时“我是真心真意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的”[2]。毛泽东还对王光美提议说，

---

① 王光美、刘源著，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110页。

②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37页。

你下次到南方去搞一期，不要总在北方，我那里派两个人跟你一起去。后来，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林克、卫士小张果然随王光美一起去参加了下一期的"四清"工作队。不过没有去南方，而是去了河北新城县高镇大队。因为王光美担心南方农村口音太重，听不懂话，没法开展工作。这回她换了个新的名字：鲁洁。①

在王光美下桃园大队搞"四清"期间，刘少奇不但了解运动进行的情况，而且也写信给王光美，作过具体指示。1964 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在听了王光美的汇报后指出，凡是蜕化变质分子和有严重"四不清"的干部大都有一个或几个享福的窝子，如苏长吉在桃园和牛头崖都有享福的窝子。因此要强调群众监督。群众要监督大队、公社和区、县的干部，上面的干部也要接受监督。当王光美谈起桃园和一些地方干部有宗派斗争，也有些"四不清"干部借口有宗派斗争，来抵抗"四清"运动的情况时，刘少奇说，不能借"四清"运动搞宗派斗争，也不能借口有宗派斗争，就不能批评"四不清"。否则，也是宗派。3 月 27 日，刘少奇复信王光美，谈对桃园大队"四清"运动形势的看法时指出，吴臣的一伙要复辟，以便彻底推翻"四清"的成果，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你们应该细心地认识，宗派活动如果达到了这种程度，是否已经是一种严重的反党活动，是一种实际上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在实际上进行着坚决反对党的路线的活动，破坏党在"四清"和对敌斗争中所取得的革命成果，要那些"四不清"的贪污盗窃分子和敌对阶级勾结，用暴力（表现形式是无顾虑地打骂社员群众）统治群众的分子重新复辟，掌握权力。应该了解，吴臣领导的桃园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吴臣的支部领导核心，是按吴臣的面貌建立起来或改造过来的。他们在以前一段时期，是否

① 黄峥主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下，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82—1283 页。

曾经是共产党，你们应该在调查之后作出判断。但是后来，他们确是反党反人民的，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同时，刘少奇也要求，"要团结95%的群众，也要团结95%的干部，这是运动和斗争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能不经过批评和斗争。对于那些违反人民利益，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只顾取得少数人的非法利益，而且坚持不改，并企图进行破坏的人，是不能不继续进行坚决斗争的。否则，是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和干部的。"① 4月11日，刘少奇又复信王光美，指出，你们那里的实际情况和你们与社员群众的实践经验，是真理的唯一标准，此外，不可能有另外的标准。我的信，只能作为你们的某种参考，引导你们向某一方面想一下。如果不是真理，不管是什么人的意见，必须有勇气加以否定。②

7月5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报告总结了桃园大队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即"桃园经验"，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宣讲"双十条"，采取背靠背的开会方法，并强调扎根串联，扎正根子。

据王光美报告反映，进村以前，公社向工作组介绍，桃园大队是一类队，一类支部，生产还好，征购任务完成得也好。支部书记吴臣是贫农，忠实可靠，"四不清"的问题大概没什么，因为他家人口少，生活富裕。群众非常欢迎"四清"，现在已经磨了米，砍了肉，准备接待"四清"工作队。进村后，支部书记吴臣介绍说，小小不言的，有些多吃多占和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保证没有。如果有了，你就开除我的党籍。先遣组先进村十来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89页。

② 同上，第590页。

天，也介绍说，这个大队干部团结比较好，没有两派问题，支部书记吴臣，有一定的威信，他没有什么“四不清”，就是有点用人不当，有点家长式领导。

工作组根据刘少奇“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示，要求一定把真实情况了解清楚，并指出，要做到这一步，就必须直接到群众中去，认真发动群众。工作组以“双十条”作为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先党内，后党外，使党中央的政策直接跟广大群众见面。在工作组的努力下，群众开始动起来，不过还是敢说话的不大了解情况，了解情况的不敢说话。于是工作组采取分组讨论的办法，把党员、团员、干部分开单独讨论，群众按队分组讨论。可是，党员、干部主要谈认识和体会，群众会上，大家还是不吭声。工作组问根子怎么回事？回答说：“一肚子话，像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吐不出来。”为什么呢？“有干部的亲信在场，给干部通风报信。你们解决不了问题，意见白搭了，空伤人。”“了不得呀，人家都是上边的人，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我们怎么敢提呢？”“你们一走，我们是八寸的脚要穿七寸的鞋！”

为了打开局面，工作组先组织少数“根子”开会，然后逐渐扩大范围，从小到大。每次开会都声明，工作组是贯彻“双十条”来的，谁的“四不清”都要清，这是党中央的政策，省委派我们来的，工作不搞彻底，工作组就不出村，并鼓励他们提意见，不要怕报复。“根子”开会时，一会跑出去一个人，一会又出去一个人，说是解手，其实不是，是为防有人偷听自动出去放哨的。群众要求搞意见箱，工作组立即钉了意见箱，每个队一个，挂在工作组门口。群众说，为了便于投放，最好挂在公共厕所里。于是工作组在公共厕所里也安了意见箱。

这种背靠背开会的办法，基层干部不知道群众提了什么意见，开始感到有压力。此时工作组就分头找干部谈话、开会，启发教育，推动他们自觉革命。

报告指出，根子能不能扎正，是这场革命能不能搞好的关键。要自己访，要多方了解。选什么人当根子，是有斗争的。并认为，在扎根上，支部不是帮一手，共同搞革命，而是同工作队唱对台戏。因此，工作队对支部采取的态度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又依靠，又要独立思考，全面分析。

第二，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放手发动群众，开始"四清"。

在扎根串联的基础上，各生产队组织了贫协小组，大队建立了贫协筹委会，初步形成了革命的阶级队伍，于是，工作组宣布"四清"正式开始。

桃园大队"四清"，曾先后掀起三次放包袱的高潮。第一次放包袱高潮，是在召开公社三级干部会期间形成的。公社干部带头放包袱，对桃园大队"四清"产生推动作用。干部开始洗澡交代问题，也互相搓澡，互相揭发。一般性的错误，大家都有份的事交代了。大的问题，有攻守同盟的还没有交代。吴臣对严重的问题都不交代。"四清"中期，在抚宁县城召开了工作队会议，传达了华北局太原会议精神和省委要坚决搞彻底的指示，工作组回村后组织了第二次放包袱高潮。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大量的细致的思想工作同大规模的查证相结合，解脱了一些问题不严重的"四不清"干部，剩下一些被群众叫做"钉子"的死不交代的人。第三次高潮是在林铁参加的公社三级干部会以后掀起来的。会上一些有严重问题的干部放了一些大包袱。吴臣的问题，经再三查对，实在严重，公社党委在会上宣布接受桃园贫下中农的要求，决定撤了吴臣的职。

在此基础上，工作组提出敢于实事求是，主动核实，一共搞了三次。第一次是三定，即定事实、定时间、定性质。第二次搞了三允许：允许翻案、允许补充交代、允许别人来给他申辩。第三次搞了三对口，把个人检查的材料，别人揭露的材料和工作组的调查报告，三部分东西对了一下。经过核实，"四不清"干部心

服口服，退赔很快。最后，"四清"只留下两个专案，一个是支部书记吴臣，他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性质，还没最后弄清。一个是副书记赵树春，开始躺倒不干，没洗完澡，没下楼。

据此，报告总结前段运动经验时指出，一是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这就是很重要的经验。有的时候没弄清情况，听到别人夺权我也夺，不管该夺不该夺，都是夺。现在的情况是明明该夺，有些单位和地方，阶级敌人已经掌握了领导权，又不敢夺了，如果该夺又不敢夺，就是没从实际出发。二是只有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大胆依靠贫下中农，才能弄清实际情况是什么，不要有清规戒律。三是要正确地掌握革命的群众运动的火候。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要强调敢不敢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又有过激情绪时，就要很好地掌握火候，要强调敢不敢实事求是，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四是工作队应清醒。

第三，发动群众忆苦思甜，通过写家史、村史，登记阶级成分，然后转入对敌斗争。

经过普遍忆苦，群众和干部的阶级觉悟提高了，真正苦大仇深的人出来讲话了，阶级敌人活动的材料大量地揭发出来。

桃园大队一共查出漏划地主五户，富农两户，而且也揭露出地、富、反、坏大量的破坏活动。比如反攻倒算，变天账，挑拨干部与干部、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破坏生产等等。但主要的、最突出的是隐瞒了成分，自己钻到干部队伍，或者拉拢干部，使干部成为他们的代理人。有了敌人，就开展对敌斗争，主要采取开小型批判会和说理斗争会的办法。

第四，组织建设阶段，强调又是一次很严重的、很尖锐的阶

级斗争,把吴臣看作是"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并提出追上面的根子。

报告反映,原以为做了这么多工作,经过群众性的"四清"斗争和对敌斗争,组织建设会很顺利,实际上依然不是风平浪静的。于是,在桃园大队,工作组又进行了一次很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主要表现是,在酝酿大队干部名单和支委分工时,吴臣进行了反攻。工作组认为,吴臣想把持桃园的领导权,想要复辟,要推翻"四清"和对敌斗争的革命成果。同时,工作组就吴臣的反攻倒算进行了讨论,但不敢下结论,最后,交给群众讨论。

据此,工作组认为,吴臣是钻进党内的坏分子,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办国民党的事"、"吴臣把持的桃园支部,过去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但报告也指出,直到工作组走,还没有查出吴臣和国民党有组织联系,也没有查出他与反动组织或特务组织的联系,不过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同时,报告也反映,根据桃园群众和干部的揭发,工作组挖出来一个副区长,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烂透了顶的蜕化变质分子。因此,一些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一追他们的事就联系到上边,有人包庇。据此,报告提出,要追上面的根子。

第五,报告最后强调农村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和平演变,并提出"大四清"的概念。

报告指出,农村阶级斗争矛盾的焦点在哪里?根据我们接触的情况看,主要的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搞和平演变,有些钻进革命队伍,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潜移默化,使我们的一些干部,舒舒服服地演变过去了,代表了敌人的利益。不是一下子收买,一下子给大鱼大肉吃,是逐渐逐渐地影响,这最不容易引起我们的警惕。在战争时期,阶级敌人是搞武装反革命,配合帝国主义。在和平时期,和平演变是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主要

形式，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我们的身份是清楚的，而敌人都躲在后面，出面的是戴着“党员”和“干部”帽子的人，所以斗争是更复杂了。现在我们搞的“四清”内容，已经不是保定地委原来提的那样，清工、清账、清财、清物，现在是政治上的“四不清”，经济上的“四不清”，思想上的“四不清”，组织上的“四不清”，反正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事情都要清。“四清”内容广泛了，意义深远了，确实是比土改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而且是更尖锐、更复杂、更深刻的一场大革命。并提出，我们一定要下决心解决这个掌握领导权以后不贪污腐化的问题，不和平演变的问题。[①]

王光美在河北省委作了报告后，在随同刘少奇视察时，先后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市(区)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同样的报告，还有不少地方听了录音。

刘少奇南下视察的一系列谈话，在很大程度上受了桃园经验的影响，并要求各地高度重视。他曾在一次报告中指出：“没有料到王光美的报告那样受欢迎，当然，她有实际经验，一报告就是六个半钟头，我现在没有资格发言，我就是听了她一点。主席赞成这一套。”[②] 7月14日至17日，在南京视察时，刘少奇问江渭清，对王光美向参加中共江苏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的同志所作的桃园经验报告有什么看法？并进面问：究竟赞成不赞成王光美的报告？江渭清回答：“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

①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二室编：《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选编》第5册，第406—431页。

② 1964年7月30日刘少奇的一次讲话纪要。

不照搬。"刘少奇说:"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江渭清回答:"不盲目执行。"据江渭清回忆,当时,刘少奇并未发脾气。第二天晚上,刘少奇离开南京前夕,江渭清偕爱人徐敏,去看望刘少奇和王光美。刘少奇严肃地对江渭清说,你昨天讲的对王光美的报告不能盲目执行,是不对的。而江渭清则坚持原来的看法,这就引起了"顶撞",刘少奇发了脾气。①

由于各地工作队员对如何开展"四清",没有充分的经验。因此,王光美的报告很受欢迎,很多人请她去作报告。陈伯达还特意找到刘少奇,积极建议把王光美的报告印发给各地党委和"四清"工作队参考。

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经慎重考虑,于8月19日,就批转王光美报告一事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刘少奇在信中指出:"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②并说:"这个报告确实很长,但不难读,各地同志和工作队愿意要这种详细的材料,不愿意压缩过多。"8月2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③

9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这一报告。在批语中,刘少奇认为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

①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487—48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00—601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144—145页。

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同时，刘少奇也指出，“这不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为框框，到处套用”。①

实际上，王光美的报告，在各方面也有不同的反应。除江渭清有不同看法外，8月20日，毛泽东在同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谈话时，李雪峰讲到，据说有的人对王光美的报告有所保留。② 而据王光美回忆，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推荐给江青看，毛主席多次鼓励表扬我，还在中央会议上表扬了刘少奇，鼓励我到各地去讲”，“毛主席要少奇同志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后十条》草案”。③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桃园经验产生了不满，并决定停发。造成这一局面，江青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据曾志回忆，在1964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让陶铸去跟李雪峰讲一下，由李雪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听王光美介绍“四清”运动中的桃园经验。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去听了，江青则在屏风后面走来走去地听着，看样子江青对此十分不满。④

可以肯定，至少在9月1日前，毛泽东还没有决定停发桃园经验，也没有公开批评刘少奇。但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了相当的不满，只是没有公开暴露而已。日后，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185—186页。

② 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40页。

③ 同上，第541页。

④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432页。

两位领导人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并进而导致公开的冲突。

“小站经验”

1964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即“小站经验”。

小站地区位于天津市区的东南，过去曾是一片盐碱低洼、芦苇丛生之地，很长时间内荒无人烟。公元1871年（清同治十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在马厂驻兵，由马厂至新城修筑驿路，并沿途设置驿站，小站即是其中所设一站，因此而得名，并以盛产驰名中外的小站稻和从小站练兵起家连出三任民国总统而闻名。

小站地区的“四清”运动是从1964年1月开始的。市委派驻小站的工作组进村后，首先组织辅导队向群众宣讲“双十条”，使群众了解中央政策，领会中央精神，主动配合工作组开展工作。接着工作组又主持召开了小站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发动干部“洗手洗澡”，进行“四清”。可以说，运动正有条不紊地开展着。但是自3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来到天津小站搞“四清”试点后，形势风云突变。一方面，小站集中了大批上面下来的工作队员。有《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十多位同志，有中宣部的周扬。同时，天津市委为配合陈伯达的“四清”试点，陆续抽调了几千名干部加强小站地区“四清”分团的力量。市委书记王亢之、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纪以及市公安局局长江枫带领50名干警也来到小站地区投入“四清”运动。小小南郊区，仅“四清”工作队员就达5000余人。真可谓大军压境，战火一触即发。另一方面，改变了原来工作组从“四清”入手搞运动

的做法，打破框框，开展夺权斗争。

陈伯达对其蹲点的西右营、小站镇和坨子地的“四清”运动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西右营村党支部书记张凤琴、小站镇党总支书记张玉仑、坨子地“水稻专家”姜德玉都存在严重问题，都是反动阶级有计划地打入我们的内部，长期窃取当地党政大权，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并认为，在“四清”运动以前，这里的天下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据此，陈伯达强调，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露张凤琴、张玉仑、姜德玉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展开夺权斗争。

小站地区的夺权斗争，首先是从西右营村开始的。作为西右营村党支部书记的张凤琴，出身贫农家庭，在土改工作中表现积极，被吸收入党。先后担任村、乡妇联主任，初级社、高级社社长以及中共天津市南郊区区委委员，市妇联执委等职务。曾出席河北省党代会和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多次被评为天津市农业劳动模范，并于1960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天津日报》曾于1964年2月5日以《说老实话，做老实人》为题，报道了张凤琴的事迹。但运动开始后，张即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揪了出来，这主要是陈伯达的杰作。3月5日，陈一到小站，便驱车前往西右营村。在张家，陈只呆了20分钟，跟张谈了一会话，又在屋里屋外转了转，看到张当时新盖了三间土坯房，屋子里存有一些稻谷。回到工作队后，陈便武断地下结论说：“张凤琴不像贫农，她家比好多社员都富。她当了支部书记发了财，成了全村的首富。双层玻璃暴露了张凤琴。我看她贫农不贫、劳模不劳，是个政治化了的人物。”又说：“一眼就可以断定她是敌人，你们搞吧，这不会错的！”①

“四清”工作队秉承陈伯达的旨意，为了把张凤琴的“富农成

① 《峥嵘岁月——刘晋峰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

分"落实，想方设法拼凑"材料"，凭空捏造张"全家每年雇短工120个"，继而又把张和她的丈夫打成"混入党内的富农分子、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在政治上，硬说张"十几年来以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欺上压下，骗取领导信任，取得合法地位，一直保持了10年的劳模称号，窃取了省人民代表、公社党委委员等职，暗地里对抗党的政策，任用亲信，搞宗派活动，推行反革命的阶级路线，公开勾结地富分子，打击贫下中农、干部，并拉拢腐蚀党的干部"。同时，陈在谈西右营"四清"工作的性质时说："张凤琴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一帮子坏人勾结起来搞反革命。他们自称贫农、劳模、党员、干部，是挂羊头卖狗肉，公开干坏事，因为他们掌握了权力，上边有人支持。"并提出"要把张凤琴的问题和与她有关的人联系起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关系"。又暗示工作队说："任何问题不提到一定的高度都是不能解决的。"[①] 实际上是把矛头对准了当时的区委书记刘晋峰。

在陈伯达的指挥下，"张凤琴反革命集团"终于炮制成功。仅仅一两个月的时间内，东右营、西右营和北义庄三个村子成了"阶级斗争第一线"，被列入"张凤琴反革命集团"的共有88人，超过了三个村干部人数的总和。[②]

随后，小站镇也掀起了"革命风暴"。小站镇党支部书记张玉仑贫雇农出身，1955年在天津南郊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区人民委员会委员。"四清"工作队进驻小站镇后，陈见了张玉仑一面。此后，陈便说："张玉仑是个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1942年以前的20多年间，张玉仑家与土匪常来常往，是土匪们落脚联络的据点。日伪时期他又当过伪甲长，国民党统治时期，他还当过'反共锄奸组'的组长。张玉仑的叔叔是土匪，

① 《峥嵘岁月——刘晋峰回忆录》，第213—214页。

② 同上，第214—215页。

当过盐巡、贩卖私盐，给土匪‘洗黑’。”然后，陈又给张玉仑罗织了五条罪状，即：隐瞒土匪家庭出身及反动历史；混入我党，篡夺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权；勾结四类分子发展反动势力；利用职权包庇坏人，破坏党的政策；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并说张玉仑“惯用反革命两手，伪装积极，假报成绩，骗取区、社某些领导的信任，窃取了各种荣誉，一步一步地篡夺了小站镇的领导权”。为了给张玉仑拼凑一个“反革命集团”，陈又说：“十多年来，张玉仑网罗了一些亲朋故旧，培植了一些心腹，作为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班底。在政治上，他积极排除异己，包庇重用坏人，安插亲信，培植个人的反动势力，把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 20 余人安插在党总支、大队、街道和各工厂的重要岗位上，组成了张玉仑为首的以原来的党总支委员会成员为核心的反党集团，控制了小站镇的党政军财的领导权。”

在陈伯达的一手策划下，5 月 29 日，工作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以张玉仑为首的小站镇党总支委员全部揪上台，当场宣布撤销张玉仑党内外一切职务，令其反省交代。工作队宣布：小站镇党总支实际上成了张玉仑反革命集团统治人民的工具，总支委员会基本上已经烂掉。于是决定：开除张玉仑的党籍，撤销全体总支委员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同时还决定逮捕张玉仑的三姐夫吴凤山、外甥吴寿臣，继而将“张玉仑反革命集团”扩大为“张、吴反革命黑帮集团”。

被列入“张、吴反革命集团”的共有 89 人，其中 10 人被定为骨干分子。1964 年 12 月，张玉仑被逮捕，于 1966 年 1 月以“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 10 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获得彻底平反。

继西右营和小站镇之后，坨子地也掀起了夺权高潮。作为坨子地前任党支部书记的姜德玉，1954 年被评选为天津市农业

劳动模范,1956 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出席了全国劳模大会,曾三次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切接见。1959 年,当选为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聘为科学院研究员、河北省农学院教授,是有名的水稻专家。

姜德玉的问题,"四清"时并非初次触及。早在 1960 年和 1961 年两年间,陈伯达到小站时就说他是"假劳模",是"恶霸地主并有血债",并责令天津市监察委员会对姜德玉进行专案调查,最后把姜定为富农成分,清除出党,解除其省、市人民代表资格及其一切职务。

"四清"运动开始后,陈伯达再次来到坨子地,发现姜的势力没有倒,还有一帮人在台上,认为姜的问题处理得很不彻底,要求放手发动群众起来揭发斗争,并定下调子,说:"姜德玉十多年来就是采取一套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来维持他的统治。他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戴着劳模的面具,表面上积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实际上却与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为反动阶级服务,对群众进行压迫剥削"。"姜德玉解放前就效忠敌人,密告我地下工作人员","姜德玉是坨子地村的'姜半天',是'寸地王'、'顶破天',坨子地是'小台湾',姜德玉在这里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以姜德玉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反革命黑帮集团"。

在陈伯达的授意下,公安机关以未经查证的"陷害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新罪名公开逮捕了姜德玉,并连续召开群众大会和各种小型会议,给已被蒙冤逮捕的姜德玉继续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行"。1965 年 3 月,姜德玉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其"罪名"是"反革命"。被列人"姜德玉反革命集

团"成员的共有 77 人。①

同时，陈伯达授意"四清"工作队，要在揪出三个"反革命集团"后乘胜追击，挖出他们上面的根子。工作队认为，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揭露和处理，甚至"官越做越大"，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根子硬"，他们上面的根子就在区委，区、社一级领导干部，实际上就是他们的保护人。于是，按照陈的部署，工作队将区委、公社一级领导干部中与"三个反革命集团"头子有较多联系的人一一列出来，把正常的工作关系一律说成"黑帮"关系，然后，按图索骥，一层一层像剥笋一样"挖上边的根子"。南郊区区委宣传部部长陈喜荣，只因为有一次在领导小组会上讲到"张凤琴的问题仍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敌我问题，有缺点错误可以对她批评教育"，陈伯达当场气愤地说："陈喜荣是在搞政变"，后来把陈喜荣定为"张凤琴反革命集团"的根子，罪名是"反对领导，破坏运动，保护坏人"。区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于荫田，因为 1956 年在西右营村蹲点搞经营管理的时候在张凤琴家住过，被定为"张凤琴反革命集团"的根子。原天津县三区区委组织委员吴海亮，也被定为"张凤琴反革命集团"的根子，理由是吴海亮解放初期是天津县委驻西右营党组织委员。区财贸办公室主任边华英，因为 1958 年"大跃进"期间曾与姜德玉一起搞过丰产田，便成了"姜德玉反革命集团"的支持者，定为该"集团"上面的根子。此外还有区、社两级领导干部共 11 人，均被定为三个"反革命集团"在上边的根子。"根子"挖出来

① 1972 年至 1973 年，结合清算陈伯达反党罪行活动，对小站地区"四清"运动进行第一次复查和平反。经过复查，宣布张玉仑无罪释放，对"张玉仑反革命集团"中受错误处理的 15 名党员干部予以恢复党籍，恢复职务，补发工资。恢复张凤琴的党籍和职务，补偿人民币 1800 元、粮食 650 斤的经济损失。1978 年至 1983 年天津市委又派出调查组进行第二次复查，为三个"反革命集团"和改组南郊区委的冤案彻底平反。

了，还要挖出“总根子”，“总根子”就是区委书记刘晋峰。定根子过程极其简单，在定三个“反革命集团”上面的根子时，陈伯达说：“要把刘晋峰放上去。”工作队的人说：“已按您的意思把刘晋峰放上去了，但还没填事实，不知怎么写。”陈伯达怒气冲冲地说：“不要事实！刘晋峰是南郊区区委书记，是三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都是他培养的劳模、党员干部，这就是铁的事实，是罪证！”于是，刘晋峰被宣布为三个“反革命集团”的总根子，陈伯达强令天津市委：必须撤刘晋峰的职，必须改组南郊区委！①

在陈伯达的指挥下，小站地区的“四清”运动是按以下步骤开展的。

先夺权。陈伯达认为小站地区80%以上基层政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因此便亲自指挥策划了上述三个试点单位的夺权斗争。

夺权之后，即转入清经济阶段。清经济的基本要求和目标，一是经济联系政治，通过清经济划清政治思想界限。二是国家与集体、集体与集体、集体与社员的账目要三对口，做到账目、单据、表格、物品、款项五相符。三是“一净四透”，即手洗净，澡洗透，账目、财务、仓库清理透。同时处理“四不清”干部的经济退赔等。清经济时，首先召开动员大会，发动群众揭发村干部的问题，同时要求干部“自我洗澡”（检查交代），干部之间还要“互相送礼”（互相揭发）。问题轻的、态度好的，在大会上检查后可以获得“解放”。检查不主动、不彻底的，请“四清”积极分子帮助“搓澡”，即在小组会上强力挤压问题。然后是查账，由查账小组审核财物管理，纠正违反规章制度的错误做法，揭发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非法行为。第三步是查证落实。第四步是定案处理，对重点人物进行批斗，做好退赔工作。

① 《峥嵘岁月——刘晋峰回忆录》，第199—236页。

清经济之后，转入清政治。首先进行的是“阶级复议”，陈伯达认为，小站地区阶级状况复杂，解放前藏污纳垢，解放后民主革命搞得也不彻底，阶级阵营很不清楚，有许多漏划的地主富农，有的人私自改变出身、成分，有的人甚至冒充贫农，因此要重新进行阶级复议。根据陈伯达的旨意，“四清”工作队组织成立了以“贫下中农协会”成员为主、吸收已过关的一部分干部参加的阶级成分评议小组，要求各家各户自报阶级成分，填写登记表，写明解放前三年的生产资料占有情况、经营（生产）方式及生活状况。根据自报情况，公布第一榜。然后组织群众进行讨论、评议，重点抓两头，即漏划的地主、富农和错划的贫下中农，据此公布第二榜。之后，对因有争议而未定成分的个别户进行调查及再评议，最后将评议结果统一报“四清”分团，经“四清”分团审批后公布第三榜。这次大规模清理阶级队伍后，小站公社戴帽“四类分子”计有902人，仅小站镇就有戴帽“四类分子”55人。对这些人，一般是进行大会批斗后，交群众就地监督改造。对这次被清查出来的所谓漏划地主和富农则一律实行扫地出门，其房屋、家具被没收，债权一律废除，对“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分子，实行新账老账一块儿算，层层开会进行批斗，“批倒批臭”后，有的被公安机关逮捕，交法院审判后判处有期徒刑，有的交给群众监督改造。

清思想工作，贯穿于“四清”运动的全过程，通过宣讲“双十条”、清算“资本主义道路”，搞臭“资本主义思想”，使群众提高认识，划清敌我界限，采取人人过关的方式检查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

最后是“清组织”。即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建立领导核心，以“巩固四清成果”。由于陈伯达亲自过问、插手，所谓的整顿变成了专整党员干部。据小站公社76个生产大队的统计，参加运动的干部有1268人，整出犯有各种错误和“罪行”的干部960人，

改造的支部成员共105人，其中连任的只有37人。被开除党籍的28人，留党察看15人，劝退的1人，暂缓登记的21人，受其他处分的44人。①

在小站夺权斗争大功告成之后，陈伯达又督促“四清”各分团分别绘制了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仑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图和历史大事记各一份。此外，又专门编造了一个“张凤琴反革命集团”展览，在天津水上公园和北京天安门城楼后面的午门公开展览。8月4日，陈伯达致信中央指出：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分问题和他们的罪恶活动，群众早已有所反映。1962年，天津市委接受群众意见，已将姜德玉开除出党，并解除他的一切职务。但是，不论姜德玉的问题，还是张凤琴、张玉仑的问题，都只是在今年“四清”运动中，群众充分发动以后，才彻底暴露出来。现在运动还没有结束，他们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还在继续清查中。主席吩咐过，这些材料可以发到县级，供给大家参考。如何处理，请中央批示！除了这些图表和大事记以外，工作组还准备写一篇叙述斗争发展过程的材料，但要过些时候才可能写。写出后，当即送中央审查。

中央接到陈的信后随即于8月12日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党委”做了转发：“现将陈伯达同志给中央的信和所附关于天津小站地区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材料，印发给你们参阅。”这样，陈伯达炮制的小站地区三个所谓“反革命集团”和“社会关系分布图”及其“集团头子”的“历史大事记”便迅速传遍全国。

根据陈的要求，天津市委很快组织人员撰写了《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陈还带着戚本禹等人专程赴天津，修改这份总结报告，陈本人也曾亲笔修改数遍，并要求以天津市委的名

---

① 刘晋峰：《陈伯达与小站“四清”》，载《炎黄春秋》2000年第1期。

义上报中央。1964年9月25日，天津市委向华北局和中央上报了这份报告。报告对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即有名的"小站经验"，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集中优势兵力，打好歼灭战。这是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关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是完全适用的。这种战法的效果：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同时，在运动中，必须配备坚强的队伍，特别是要有一批有革命决心、懂得党的政策、有工作经验、作风好的领导骨干，切实加强工作组的力量。

二是工作组要旗帜鲜明，坚持三同，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工作组的工作态度和生活作风，是关系到能否取得这场革命领导权的首要问题。一进村就要高举全心全意依靠贫下中农的旗帜，反复表明彻底革命的决心，在工作中放下架子，去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面目出现，处处虚心向群众求教；要保持勤劳、朴素的生活作风，坚持与群众同住、同吃、同劳动。这是能不能取得群众信任的大问题，也是工作组自身能不能革命化的一种重要标志。

三是在斗争中组织一支坚强的阶级队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场极为深刻的群众自我解放、自我改造和自我教育的运动，只有以彻底革命的精神，有领导有组织地放手发动群众，并在斗争中组织一支坚强的阶级队伍，才能取得这一场斗争的胜利。

四是判断问题性质，当机立断。能不能对了解到的大量材料，及时地加以分析，判明性质，区别两类不同矛盾，下定决心，不失时机地采取有力措施，是关系到运动能否顺利开展，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关系着运动成败的关键性问题。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比，不能不占首要地位。因此，我们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揭露他们的政治问题，进行夺权斗

争，然后清查经济问题。只有坚决把“石头”搬掉，才能进一步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团结、改造绝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才能扫除运动中的障碍。事实上，一旦把盖子揭开，运动的局面就急转直下，出现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

五是最大限度地分化、孤立敌人。这些坏人虽受到了打击，但他们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因此，决不能疏忽大意，陶醉于已经取得的胜利，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最大限度地把敌人孤立起来。在斗争中，工作组注意进行具体分析，区别是集团的首要分子还是一般成员，是现实问题还是历史问题，是严重的贪污盗窃分子还是具有一般性的贪污错误的人，以便集中力量打击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争取其他成员坦白交代，促使他们迷途知返，至于介乎两类矛盾之间的边缘性问题，一时难以断定性质的，一律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查清后再处理。同时，为深入发动群众，孤立敌人，各个工作组还对群众中的落后层，进一步加强了工作。

六是学会掌握运动的火候。学会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并不容易。既不要煮夹生饭，又不要温度过高把饭烧焦。根本的一条是看积极分子的态度。因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成分好、觉悟高、密切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最能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积极分子的态度，是测量运动火候的温度计。为及时掌握火候，每逢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工作组天天分析新形势，研究群众的思想动向，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运动应该是有起有伏，波浪式地前进，不能一直保持紧张状态。当斗争相持不下，积极分子发生急躁情绪的时候，就要下决心把运动停下来，休整队伍。一面总结经验，研究战术；一面搜集证据，准备再战，这样就可以使运动有节奏地健康地发展下去。

七是公安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开展斗争。在民主革命不彻底、斗争十分尖锐的地方，派一定数量的得力的公安干部，

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非常必要的。以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来推动公安工作，丰富了依靠群众管制和监督四类分子的经验；同时，做好公安工作来支持群众运动，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这样，不但可以保证运动的顺利发展，而且通过运动可以发现敌人，捞出大鲨鱼来。

八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断地训练队伍，学好基本功，取得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要深入学习中央"双十条"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把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精神吃透；要向贫下中农学习，虚心向他们请教，把当地的实际情况吃透。同时，要练好基本功。如宣讲"双十条"，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分别两类矛盾以及学习斗争策略、学习算账等等。工作组还应认真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真正把自己锻炼成一支战无不胜的革命工作队。

九是一面抓运动，一面抓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促进生产和其他工作。在集中力量抓运动的同时，我们始终注意安排好生产。在插秧季节，为了给生产让路，运动暂停，工作组进行整训，进行调查研究，保证了运动和生产两不误。[①]

10月24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转发了《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并要求各单位转发此报告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队员阅读"，认为"这个报告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好的"。

《指示》肯定了小站地区这种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即开展

---

① 《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1964年9月25日），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二室编：《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选编》第5册，505—518页。

夺权的政治斗争，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的做法。认为“他们的经验，值得各地参考”，但同时也指出，“应当根据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来解决，一切要从实际出发，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当地贫下中农和多数群众要求先解决什么问题，就先解决什么问题，而不要被预先规定的一些框框所束缚”。

《指示》明确指出了小站地区矛盾的性质及其表现形式和解决方法，强调：“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对党对人民造成的损失也很大。但是当地的多数群众是清楚的。只有我们党脱离了当地多数群众的情况下，这些敌人的阴谋才能得逞。当着我们党同当地多数群众结合起来了，这些敌人就立即被揭露，并且受到了失败。由此可以看到，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中，包含着一部分很危险的敌我矛盾。必须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为此，《指示》要求，“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指示》还列举了各种类型夺权斗争的经验：在一个地委和县委，有信阳的经验；在一个农村或镇子，有小站地区的经验以及其他农村的不少经验；在一个大企业，有白银厂的经验；在一个城市，将会有贵阳市、白银市的经验。所有这些类型的经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论在信阳、小站、白银厂和贵阳，在夺权以前，都由上级派人进行了长期的工作，才确定地认识这些地方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才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意想不到的革命热情”。最后，《指示》强调：“这里也有一个教训，

就是在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以前，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确定领导权是否在敌人手里，才能确定这个地方的领导核心是否已经变质，才能决定是否应当进行夺权斗争。"①

从《指示》的基本内容看，既肯定了小站夺权的经验，又要求各地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被框框所束缚；既肯定了国内敌我矛盾的存在，又指出了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既要求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必须进行夺权，又规定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这反映了中央一线决策层部署运动时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态，即既要大规模地开展运动，搞深搞透，又怕运动过火而谨小慎微。实际上，运动中，各地大多机械地套用上述各种经验，没有按《指示》规定的要求，盲目进行夺权斗争。

三大夺权样板，一个是农村生产大队，一个是农村乡镇，一个是城市企业，可谓点面俱全，基本上代表了开展"四清"运动的单位。另外，也有部分高等学校开展了"四清"运动，特别是北京大学，又树立了一面"高等学校四清"的样板。

"北大社教"

在全国农村和城市企业普遍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作为培养国家高级人才基地的高等学校也不例外。为了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大立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破除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解决两条道路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争夺青年一代，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一些高等学校自身也开展了运动。如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建工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天津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305—308页。

23所高校。其中开展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并有全国各地干部参加的北京大学社教试点。

1964年7月2日,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为组长的中宣部调查组10人进入北京大学进行调查研究。8月29日,张磐石向中宣部写了一个《一号报告》。报告说,调查组7月2日到北大以后,最突出的一个印象是北大党委的阶级斗争观念薄弱。在北京大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攻是很猖狂的,特别集中地表现在教学和科学研究领域之中。校内帝国主义、蒋介石、修正主义的特务间谍活动,贪污盗窃分子、流氓分子的活动也相当严重。北大党员干部队伍政治上严重不纯,北大党委对这些问题却没有认真抓。哲学系聂元梓向我们反映,北大党委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提拔和重用一大批政治上不纯的干部。

工作组根据这些基本估计,建议在北京大学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于10月21日拟订了《关于在北京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初步计划(草稿)》。《计划》提出,从11月起在北大开展社教运动。这一试点计划经中宣部领导批准,很快得到实施。

1964年11月初,中宣部开始在北京大学进行社教试点。试点工作由五人小组及其领导下的工作队负责。五人小组成员是:张磐石(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刘仰峤(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后由侯西斌处长参加)、庞达(中央宣传部教育处副处长)、宋硕(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张磐石任工作队队长。全国各大区22个省市文教部门和高等学校报名参加北大社教试点的共210人。

运动一开始,工作队便甩开北大党委的主要领导陆平、张学书、史梦兰等多数同志,以及各系党总支的多数领导同志,神神秘秘地在师生员工中,依靠聂元梓等个别所谓"左"派人物,扎根串联,搜集材料,然后选定目标,进行批判。11月12日,在机关

总支党员大会上，工作队成员当场点了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彭珮云、谢道渊的名。这次会后，北大形势相当紧张，几位书记被孤立，许多干部不敢和他们接近。

随后，社教工作队队长张磐石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他首先欢迎各地的同志来共同作战，打一个大的会战。并说，北大有几个总支的领导权在共产党手里?! 人事处、组织部的问题就更乱了。哲学系正在进行的大论战，就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北大阶级斗争的缩影。现在工作队已普遍进人各单位，口号是：人揭阶级斗争的盖子，重点揭发校系两级领导的主要问题，开展面对面的斗争。他还表扬了聂元梓。会后，绝大多数党总支已被夺权。

运动的目标一开始就对准了北大党委。11 月 19 日，张磐石以"北京大学调查小组"名义写了《北大调查组第二次报告》(即《2 号报告》)。报告认为北大党委的领导实际上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道路。

1965 年 1 月 11 日，社教工作队队长张磐石召开全体工作队员和活动分子紧急会议。他在会上说、北大全校总的斗争形势很好，十天来在全校 20 个点上，全面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斗争气氛十分激烈、十分尖锐、生动活泼、热火朝天。过去谁是哪一派，斗的是哪些，被斗的是哪些，看不清楚。斗争起来以后，斗争的阵营比较清楚，有些想暗藏已不太好藏。在斗争中谁是真积极，谁是假积极，谁积极十分，谁积极二分都看清楚了。在斗争的烈火之下，牛鬼蛇神开始退却，有些顽固的集团开始分化，被斗的人开始动摇、彷徨。在群众热火朝天的斗争之中，北大的陈规恶习，已经受到斗争烈火的冲击。同时，他要求大家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关于敢于胜利的、严格遵守政策的、围歼敌人的相关文章。工作组办公室根据他的指示，布置了八篇学习文件。前三篇即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作战

方针，第四篇是《关于重庆谈判》。

这次紧急会议后，各单位面对面的斗争更加激烈，斗争的方法采取了个别审讯式的谈话，大会批，小会斗，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逼迫被斗者承认是“烂掉了”的干部。在斗争中，有的总支被定为“阶级报复”，有的总支被说成“两面政权、内外勾结”，许多总支书记被扣上敌我性质的帽子。学校流传着这个单位烂了，那个单位烂了，北大烂了等消息。

可以说，工作队这种“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做法”，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了过火斗争，运动出现了严重偏差。如在1959年“大跃进”的年代，技术物理系在搞原子能时，曾有两人受到放射性伤害。这其实是一起责任事故，但在社教运动中却被歪曲和夸大为该系党总支书记石幼珊搞阶级报复，于是给石戴上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进行批斗。

实际上，当时工作队部分成员和一些领导同志就对北大社教的做法表示不满。担任工作队副队长的高教部政治部主任曾德林就不赞成工作队长的主张和做法。[①] 担任工作队党委副书记、上海市委文教部部长兼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常溪萍就说：“这个搞法有问题，我们上海高校的工作同你们学校都一样，你们成了资产阶级代理人，资产阶级大学，将来我们的结果不就和你们一样了吗！各省、市、区的高校不是也差不多都要成为资产阶级大学了吗！”[②] 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高教部部长蒋南翔不赞成工作组到高校搞社教，更不赞成北大社教采取的方针和做法，他在清华的书记会上说：“我们不赞成派工作队在北大搞‘四清’。工作队把陆平同志和各系的领导同志扣上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帽子，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说北大是资产阶

---

①② 刘冰：《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级大学。照这样的逻辑，清华和各高等院校，都是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和北大一样执行中央的同一个方针，贯彻的同一个‘高教六十条’，那么全国还有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大学呢？”① 据后来北大干部整风学习会上有同志反映，有个系的组长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早已看出张有问题，曾召集省里参加工作队的几个人研究。当时他们考虑有两种做法：一是不执行张磐石的指示，这样就要在组织上犯错误，被撤职；另一个是执行张磐石的指示，回到省里再检讨。后来他们采取了第二种做法。

作为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在中宣部领导没有通气的情况下，也亲自调查了北大的情况。1964年10月21日，彭真把陆平和张学书找到他的住处，向两位同志恳切地说，你们都是党员，要说真话，听说你们挨斗了，到底为什么？陆平、张学书回答说，工作队说我们烂掉了，是资产阶级代理人。彭真问，你们是不是？有没有事实？他俩回答，工作队说的不是事实，我们没有烂掉，不是资产阶级代理人。彭真说，你们要实事求是，是就检讨，不是就顶住，路线问题不要急于作结论。随后，彭真又找了清华大学何东昌调查。他说，北大搞“四清”，陆平他们都成了“资产阶级代理人”，对你们清华一定有影响，你们有没有“唇亡齿寒”之感？何东昌说，是有点感觉。然后，他如实地把北大“四清”造成的紧张形势及清华党内外的反映向彭真作了汇报。②从后来彭真对北大社教的态度看，实际上他是不赞成工作队这一套做法的。

作为北大社教的直接领导单位中宣部的一位领导同志在看了张磐石1965年1月11日的报告后，感到“大为吃惊”，批评说，斗争，斗争，仅在第一部分就用了40多次斗争。斗争一词前

① 刘冰：《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第13页。

② 同上，第14—15页。

后还加上许多漂亮的形容词。斗、斗、斗就是革命派，不斗就是机会主义。但通篇报告就是不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讲团结——批评——团结，而却要在北大打一场淮海战役，把被批判的人当敌人。

正在北大处于严重混乱之际，1月14日，中央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个文件包含着纠"左"的一些重要内容，如改变了撇开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由工作队单独领导运动的做法，提出"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的原则；反对工作队搞神秘化；反对人海战术，严禁打人和变相体罚，"四清"要落在建设上等等。

但是，《二十三条》的这些纠"左"措施的贯彻执行，在北大并不顺利。一方面，以陆平、彭珮云等为代表的北大党委根据《二十三条》精神，批评了工作队前段运动"左"的错误；另一方面，以张磐石为代表的北大社教工作队党委不承认前段运动存在"左"的错误。双方发生"顶牛"现象，唱起了"对台戏"。

1965年1月23日、24日，陆平、彭珮云先后在贯彻中央《二十三条》的市委全会(扩大)高等学校小组会上发言。他们根据《二十三条》精神，联系北大社教工作的实际，对北大工作中的问题做了自我批评，在肯定社教运动成绩的同时，对北大工作队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批评，如工作队把北大党委和大多数总支撇在一边，没有实行三结合；对北大的估计，特别是北大干部队伍的估计，不符合实际情况；对北大许多领导干部不经说服教育，就给戴上大帽子进行批判斗争，等等。此后，陆平又对工作队的做法提出批评，他不同意工作队某干部在机关党员大会点名对几个书记和副书记的指责，而事先不和北大党委打招呼和事后进行各种追逼的做法也是不妥当的。

而社教工作队党委的主要领导人、部分工作队员以及一些北大的积极分子，对陆平的意见进行了反驳。如队党委主要干

部说，各系和机关(不包括常委)共揭发批判了52人，占北大全体教职员党员的4%，一般说，这些干部或轻或重地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不论从方针方法上或从结果上看，是基本上符合《二十三条》的，不发生斗争面宽的问题。有的工作组组长说，我们系揭发批判了4个人，如按全系干部党员(教职员)算，还不到2%。有的组长说，关于唯成分论的问题，我们系的积极分子中有50%是剥削家庭出身；"四清"领导小组10人中，有6人是剥削家庭出身，因而也没有唯成分论的问题。有的说，我们只斗了1个人，而且该斗，陆平是无中生有恶意攻击。常溪萍曾建议工作队认真学习《二十三条》，总结两个多月的工作，并联系西语系的实际(常担任西语系工作组组长)，写了一份报告。不料那位主要负责人竟在常的报告上批了个大"右"字，不予理睬。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2月20日，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对直属10个社教工作队作报告。他结合对《二十三条》的讲解分析，谈了对北大社教的看法。他说，北大陆平这个人，我问了很多人，铁道部的同志，还有别的地方的，都打听了一下，这个人还是好人犯了错误。北大工作中的问题，似乎看成主要责任都在陆平。可是反过来想想，主要责任是否在我们，我们下面还有教育部么！对他的问题可能是肯定过早了。现在搞成两肚子气。双方都要学习《二十三条》，检查自己的缺点。

陆定一的讲话，基本上站在了陆平这一边，对北大社教工作队的一些做法进行了批评，形势朝着有利于以陆平为代表的北大党委一方发展。3月3日，在邓小平总书记的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了北大社教问题。会议对北大作了基本估计：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陆平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不存在改换领导的问题。对北大社教运动也作了基本估计：北大的运动有成绩，肯定有缺点、错误，发生了"顶牛"现象。缺点、错误有几条：一是没有三结合，这问题不只是北大，中央担了责任；

一是开始对北大估计有错误，当做烂掉的单位去搞，以夺权问题对待，越搞越远；一是斗争方式有严重毛病。邓小平强调，要按《二十三条》办事。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要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分头召集北大社教工作队和北大干部开会，按照中央《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统一认识，做好工作。

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3月5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来到北大，向北大全体工作队员及北大党委常委作报告。他要大家都来联系自己的工作好好学习《二十三条》，北大要落脚到教育上，把教育革命搞好，不是要搞得人人小心谨慎、害怕。同时，陆定一提出，把北大社教的五人领导小组扩大为八人小组，增加校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戈华、彭珮云。由八人小组领导北大社教运动。

北京市委为落实中央书记处的指示，于3月9日至19日，在国际饭店召开北大党员干部会议，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根据《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向北大党员干部做工作，这是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万里指出，陆平同志参加革命三十多年，是积极的。这次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运动中还犯了错误，对党不负责任，但还是好同志。中宣部工作队在北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这个运动谁也没搞过，难道不准许人犯错误？第一，我们应当欢迎这么多同志不远千里而来。第二，运动有成绩。第三，运动有毛病、有问题、有错误，工作队自己在检讨，检讨不够的可以提意见，不接受可以再提，两次，三次，一万次，只要你正确。最后，万里讲了几点意见：要端正立场，进行自我批评；批判的人与批判别人的人的关系应尽可能调整好，离心离德不行。对北大、对各系工作，对个人都必须有个基本估计。

在国际饭店召开党员干部大会的同时，校内工作队也在总结。3月19日，中央宣传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张子意副部长给工作队全体队员作报告。他在肯定前一阶段社教成绩的同时，着

重讲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如在北大运动中没有实行三结合，从调查组开始，就把北大党委撇在一边，实质上摆着夺权的样子；批判面过宽，20个总支书记，批判了18个，占90%。如果其他学校都这样搞，能受得了？在座的许多都是院校的领导、总支书记，按这样搞法，你们回去都得挨批判，你们受得了吗？有的单位出现追逼、粗暴过火的现象，不符合党内斗争原则等。

中央书记处讨论北大社教工作会议以后，张磐石继续"顶牛"，怕检讨错误。而担任工作队党委副书记的常溪萍对此非常不满。当常溪萍听了刘仰峤传达3月3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北大社教的基本估计后，他对照北大社教的实际情况，又向主要领导人提了意见。但张不接受，而且把常调离了西语系。3月17日常溪萍给总书记邓小平写信，反映对张磐石的意见，并建议中央派人检查张在北大的工作。3月20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同志约常溪萍谈了话，并写了谈话纪要，上报中央领导同志。纪要中列举事实，反映张磐石自《二十三条》公布以来，直到中央书记处讨论北大社教工作会议以后，对《二十三条》、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对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的错误态度、错误做法以及错误的工作作风。纪要说常溪萍认为张磐石的指导思想和做法许多是不符合《二十三条》和中央指示精神的，但他却独断专行，把一些正确意见视为"右倾"，并调动了几个组长的工作。常溪萍说，因为事关全国高等学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样板，建议中央派人调查。

作为北大党委书记的陆平，前段运动虽受到批判，靠边站了。但中央书记处对他作了基本估计后，也开始主持北大党委的日常工作了。3月21日，中宣部部长约陆平谈话，并对他说，毛主席说了，你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放心好了，以后第一书记还是要你做下去。名声不好了，这不要在乎，向同志们讲清楚就行了。陆平把这次谈话内容向校党委常委作了汇报，要求大

家解除在社教中的隔阂，团结起来向前看，并说，社教运动中有的同志批判了别人，主要是基于革命的热情，被批判的同志应抱闻者足戒、有则改之的态度。

3月30日，邓小平对常溪萍与中办同志的谈话纪要作了重要批示，批评张磐石在北大，对《二十三条》是患得患失，抵触的。再这样顶牛下去，北大工作要受损失。彭真也作了汴批：直到最近，就是说《二十三条》已经下达这么久了，中央书记处也为北大开过会了，有的同志还是有错误怕检讨，而且听不得不同意见。后来，中共上海师范大学委员会曾派人访问刘仰峤，刘说，从常溪萍反映的主要内容看，反映的情况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情况的，是对党负责的，这在当时就已经肯定了。他的做法是正常的，这也是当时完全肯定了的。当年任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也证明：常溪萍写信向中央反映问题是符合事实的，是完全正常的，常溪萍的信写得很好。常溪萍是个好同志，这个同志在北大社教运动中表现得很好。

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下，张磐石于4月1日在校党委常委会上表了态。他说，中央讲了，陆平同志是好同志有某些错误，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大家有共同语言，校内工作要靠校党委常委会和陆平同志。同时，在校党委常委会上，张磐石介绍说，中宣部负责同志讲，中央领导同志对北大运动很关心，周总理最近还问到北大运动的情况。领导同志说，北大工作队不仅仅是北大的问题，工作好坏还影响全国。中央书记处要北大作出个总结来，供全国参考。北大社教运动，全国调来这么多人，想来取经。究竟正面有什么经验，反面的缺点错误、反面经验是什么？不能总结出经验让同志们带回去，也会使各地的同志和党委失望，是对他们不负责任。

为认真总结北大社教的经验，4月2日，中宣部在民族饭店召开北大社教工作队部分骨干座谈会，是为民族饭店会议。会

上印发了常溪萍的意见和邓小平、彭真的批语，还印发了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张子意在开幕词中传达了彭真的指示意见：北大社教违背了延安整风的精神，要求通过这次会议，通过纠正北大的过火斗争，使延安整风以来的党内斗争好传统传下去，在全国高等学校传下去，在全国知识分子中传下去。

4月28日至29日，中宣部召开全体工作队员大会，北大校系主要领导干部参加。28日，校党委书记陆平发了言，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讲话。29日，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讲了话。三位领导人总结了近一个月来会议的情况，总结了北大社教运动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工作队队长张磐石的错误进行了分析批评，指出，他所犯错误的性质是对抗《二十三条》，拒不执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二十三条》发布后，他患得患失，反对执行《二十三条》，拒不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甚至引导工作队同中央顶牛。在组织上严重破坏民主集中制，独断专行。陆定一代表中央五人小组宣布：撤销张磐石北大工作队队长职务，由许立群任北大工作队队长；八人小组改为九人小组，增加常溪萍为小组成员，许立群为九人小组组长。随许立群参加北大社教工作队的，还有陈道（中宣部理论处处长）、何静修（理论处干事）和龚育之（科学处干事）三人，除张磐石和阮铭撤回中宣部外，原来的工作队员一律不动。

新的九人领导小组成立后，作为组长的许立群一方面在北大搞纠偏，抓团结，抓落实教学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工作队有许多外地学校调来的干部，他们都是来取经的，都准备回去在自己那里的高等学校搞社教，因此，许立群也在思考高校社教究竟如何搞的问题，以便最后写出一个高校社教的文件。许立群的基本出发点是，高等学校数目不多，党委都由省、市委直接领导，负责干部归中央管理，党的组织较强，同农村不一样，不会有多

少烂掉的。因此不搞从上而下的革命，而是搞从上而下的整风。[1] 后来中央发出通知，文教单位的社教一律停下来，高校师生都去参加农村和工厂的社教。因此，所谓高校社教文件也就不了了之了。

为了进一步在北大社教中贯彻落实《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纪要》精神，以及为总结运动做准备。1965 年 6 月 29 日上午，应许立群之约，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向北大工作队全体队员和北大党员干部作报告。彭真指出，北大形势好还是坏？我看北大形势好。如果北大是资本主义熔炉，全国还有几个社会主义熔炉？北大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全国还有多少无产阶级统治的学校？北大社教试点很有收获，正面经验是收获，反面经验也是收获，反面经验总结后就成了宝贵财富；关于陆平同志，我说陆平同志是好人犯错误，主席说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他加了量；从根本上把北大大是大非问题解决好，办法是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整风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要解放思想，增强党性，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高等学校“四清”必须密切结合教学实践并落实到教学改革上；看知识分子要“重在表现”等。

彭真讲话之后，北大社教运动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因会议在国际饭店召开，是为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

1965 年 7 月 29 日，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开始。参加人员主要是校系两级主要领导干部、部分支部干部以及一些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共 250 多人。会议由市委、中宣部、高教部及原九人小组成员共 14 人组成领导小组，中宣部许立群任组长，市

① 龚育之：《彭真同志与北大社教——我的所见所闻》，载《百年潮》2002 年第 7 期。

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为副组长。许立群在讲话中希望每个同志要自觉革命，首先清理自己，清政治，清思想，去掉资产阶级的东西，增强党性。

在会上，各组学习文件，自己清理思想，互相谈心，并对社教工作队、北大党委常委会、北京市委、高教部以及中宣部等单位提出了意见。如认为北大社教工作队运动后期不负责任，马马虎虎，潦潦草草，有的放手不管，系里留下的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就撤走了，责任心不强。工作组有唯成分论倾向。有些同志意识有问题。有的竟说，发动学生革教员的命，越"左"越好等。认为学校党委常委会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够，特别是对北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及其特点认识不够。领导作风存在问题，骄傲自满，故步自封，缺乏革命朝气。清华与北大只隔一条马路，工作却比北大强，主要是北大主义在作祟，从来没听说北大要向清华学习；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常委之间很少展开批评，表面上一团和气，思想不交锋，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等。认为北京市委大学部长期未发现并解决北大常委的不团结，这一现状虽是张磐石造成的，但根子原来就有，大学部有责任等。

9月4日，整风学习会举行全体大会。许立群宣布说，除哲学、经济、技术物理三个组和校常委还需继续讨论外，其他大部分单位告一段落。陆平做简要总结。他说，这次会议很有收获，如增强了党性，党内原则空气比以前浓厚了；提高了对张磐石错误及其危害性的认识；对过去几年的错误做了初步清理，对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有所解决，有所前进。下一步工作，除三个系和常委同志外，其他大多数单位可以回校。回去后，对全体党员进行思想教育。

哲学、经济、技术物理三个系，因在社教前期折腾得很凶，党内裂缝很深，再加上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积累下来的未解决的纠

纷，问题很多，表面上的团结还没有达到。因此，其他单位整风学习告一段落后，何静修、陈道和龚育之分别参加了这三个系的继续整风学习。

据龚育之回忆，技术物理系的争论是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一位预备党员学生应不应该划右派引起的。当时有些党员主张划，有些党员不主张划，总支后来决定不划。1958年"双反"运动时，有些党员批评总支右倾，说总支包庇了好多右派。1959年反右倾运动起来，总支认为这些批评是反对总支，反对党，其中几位工农出身的复员军人还被划成"分子"遣送还乡。1962年虽然做了甄别平反工作，仍没有很好解决问题。到社教运动时，翻过来批评原来总支对待他们是阶级报复，并且联系到他们所受的放射性伤害，阶级报复的调子喊得很高。《二十三条》颁布后，双方还争论不休。

经协调工作，最后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那位党员鸣放时有些错误言论，属于可划可不划，考虑到北大学生中右派已经划得很多，这个学生不划是可以的，并且已经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应该说是严肃处理了。坚持指责总支包庇右派，是没有理由的。这个学生早已病故，更不要纠缠了。至于反右倾中，把指责总支右倾的同志打为反领导、反总支，遣送回乡，那是完全错误的。至于放射性伤害，一些在实验室工作的工农干部、转业军人受到了伤害，应该关心他们，很好给他们疗养，但是一些知识分子干部也受到了伤害。当时主要是防护放射性伤害的知识少，甚至在有些问题上无知，而又干劲很大、热情极高，明知有伤害也抢着拼着干，卫生部某局的调查也做了这样的判断。因此，不要讲什么阶级报复。在这一基础上，弥合裂缝，加强团结，技术物理系的问题解决了，该系的整风学习会在国庆节后也结束了。

经济系的整风也很快结束了。唯有哲学系的整风拖的时间较长，因为总支书记是聂元梓。据说她平时不大工作，运动一来

就兴风作浪。社教运动开始后，她上斗陆平，下斗哲学系新来的总支书记王庆淑。在这次整风学习会上，哲学系一些同志对聂元梓提出了批评。如有同志反映，聂元梓在社教运动中对陆平的态度很恶劣。有一次在陆平来参加哲学系整风会之前，聂在会上说，今天陆平要来参加会，大家要有准备，看我们敢不敢于斗争。陆平如果抗拒运动，应当当现行反革命处理。她在主持斗争王庆淑时，主张打王庆淑的态度。她说，现在我们准备的炸弹很多，但要开花，要有主攻，有配合，不要给王庆淑有一点喘气的时间。同时，会上也有人维护聂元梓，而聂元梓在清理自己的思想时，继续顶着。

1965 年 10 月 11 日聂元梓还向毛泽东、刘少奇写了《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承认在运动中犯了过火斗争的错误。但是，以"四清"运动中被批判的人为主要领导，重新组织力量，斗争积极分子，追个人主义，以及追和张磐石有无组织关系，这是不妥当的。更不妥当的是，原来中央宣传部调查组及工作队，在发动群众时，将积极分子所反映的意见和所揭发的材料，交给从前被批判的人（现在主要领导人的陆平、彭珮云），作为根据，对积极分子进行斗争。11 月 15 日聂又到中办、秘书室和来访群众接待室反映以上情况，说原"四清"运动是张磐石领导的。

据龚育之讲，哲学系历次运动的争端多，能言善辩的"常有理"和争论"爱好者"有的是。哲学系的整风一直拖到 1966 年 1 月，才宣告完结，北大社教也随之画上了句号。[1]

北大社教虽然没有作为运动的样板加以总结，从而指导全国高校的"四清"运动，但是北大社教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北大社教结束不久，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康生立即指使

---

[1] 本文其他资料请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上），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06—637 页。

曹轶欧于5月20日到北京大学，找到北大社教工作队曾经依靠过的所谓"左"派人物聂元梓等人，密谋攻击中共北京市委。而聂元梓等人由于在社教后期受到批评，窝了一肚子气，根本不在乎得罪谁，并说"一锅端出去算了"。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于5月25日下午2时在北大策划并贴出"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据龚育之回忆，大字报七个作者大都是北大哲学系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对《二十三条》以后纠"左"心怀不满，伺机发难。原来准备就写北大社教的事，后来觉得写现实问题更尖锐，就写了学术批判的事。大字报的矛头就是明确指向彭真同志的。[①]

就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同一天，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了《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大革命》第13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所写的这张大字报。毛泽东觉得，如果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突破口，可以打乱原有的秩序，使群众手脚放开。他当即写了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②] 晚8时，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武断地宣称：陆平、彭珮云等人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他们的党不是真共

---

① 龚育之：《彭真同志与北大社教——我的所见所闻》，载《百年潮》2002年第7期。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14页。

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6月5日，陈伯达也指示工作组写了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人民日报》社论，大翻北大社教的案子。指出："陆平等这一小撮保皇派，拼命抵制和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对一批积极分子进行的这种残酷斗争，竟长达七个月之久。这是1965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8月2日，聂元梓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华北组会议上说，毛主席在全国公布了这张大字报。这天北京大学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国也爆炸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康生于9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京串联者时说："这张大字报不仅是揭开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而且是点起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种。"毛泽东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①

此后，"文化大革命"斗争的矛头陆续指向彭真、邓小平、常溪萍等同志，而这些人大多是具体负责处理北大社教的领导同志。"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大开始，迅速席卷全国高校和中等学校，并从学校蔓延到党政机关、工厂和农村，开始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浩劫。由此可以说，北大社教，实际上是北大"文化大革命"，甚至是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和序幕。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14页。

第六章

高潮:大兵团作战

集中优势兵力,大军压境,打歼灭战

1964年下半年,随着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刘少奇视察“四清”、第二个《后十条》的颁布以及夺权样板的全国推广,“四清”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大兵团作战搞“四清”。全国各地开展“四清”的单位,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到点上搞“四清”。

江苏省委为贯彻执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决定对全省城乡“四清”运动的部署重新调整,要求从当年秋冬起,农村每个专区集中搞好一个县,全省搞好七个县,即新沂、涟水、大丰、邗江、海安、句容、太仓,在一个县范围内,分批开展运动。在省辖市,首先集中力量把主要行业与产业的运动分批搞好,其余企事业和街道居民,以区为单位开展运动。为此,全省组织了一支6万人左右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和一支2万人左右的城市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要求机关干部除老弱病残和其他不适宜参加工作队的人员外,区以上机关按三分之一、公社按五分之一、企事业单位按10%—15%的比例抽调。另外,选拔一批优秀的农村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回乡职工以及城市企事业工人

和不脱产干部参加工作队。工作队要以开展运动的县、市为单位，建立团部，由所在地区的地委书记担任团长。[①]

福建省"四清"重点县——连江县，从1964年12月开始，以省委书记为团长，从省直机关、闽侯地委和福安地委抽调7500人，组成庞大的社教工作团，进驻连江县，搞人海战术。第一批先在敖江、琯头、浦口、马鼻、丹阳、潘渡、城关、筱埕和县直单位等八个公社146个大队开展工作。[②] 山东省1964年冬，社教运动先是在曲阜、海阳、齐河、长岛、临沂、泰安、历城七县重点进行，随后扩展到全省各地。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共5.4万人。至1965年9月，全省共有12万名社教工作队员在33个县、两个郊区和九个城市从事社教运动，覆盖面约占县社队和人口的三分之一，被纳入社教范围的城市人口共145万人。[③] 浙江全省共抽调31378人，其中脱产干部20735人、大专学生10643人，农村青年4739人，参加点上的社教运动。

江西省委为传达和贯彻中央五月工作会议精神，于6月24日至7月2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又于8月6日至9月1日召开有各地、市、县委书记、省直各单位和省属企业负责同志共298人参加的省委全体扩大会议，决定江西省的"四清"运动必须根据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先少后多、逐步扩大、统一部署、密切结合的原则，重新组织力量，重新训练干部，重新调整部署。决定农村"四清"先搞临川、安福、清江、永修、上饶、瑞金六个县和井冈山垦殖场。当时准备永修、安福、瑞金、井冈山先后全面铺开，上饶、临川、清江先搞一部或大部，共计152个公社。后感力量不

①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493页。

② 成波平：《连江县的"四清"运动》，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89年第6期。

③ 吕景琳、申春生：《山东五十年发展史》，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136—137页。

足，经收缩后实际开展104个公社。参加工作队的干部29138人，组成七个工作团。城市"四清"原定在南昌市的红都机械厂、南昌柴油机厂、江西拖拉机厂等中央和省属大中型企业和工业比较集中的青云谱区进行，后加上省委原定进行划阶级试点的下垅钨矿和军委总后勤部干部搞的九江112厂以及景德镇市委搞的新平瓷厂，共计120个单位。组成了两个工作团，南昌市工作团3923人，下垅钨矿工作团214人。[1]

安徽省委于1964年8月23日对各地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草案)》，确定寿县、全椒、歙县、界首、砀山等县为第一批重点县，抽调工作队3.7万人，进驻140多个公社开展运动，这批重点县"四清"于1965年8月结束。从1964年8月以后，城市"五反"纳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轨道。9月，安徽省委在合肥市和省直机关开始试点。11月间，从省直机关和省辖七个市抽调3100人，组成36个工作队，集中在合肥开展了第一批运动，共有49个单位，其中包括27个工交企业，10个商业单位，3个文教单位，7个公安单位，2个街道单位，总计有职工4万多人(不包括街道居民)，于1965年8月底基本结束。[2]

上海市于1964年8月开始，根据分期分批进行"四清"运动的要求，确定第一批开展运动的单位，农村是金山、奉贤两个县，城市为133个点，其中，工业系统88个点，交通系统12个点，财贸系统25个点，其他系统8个点。当时从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大专院校抽调3.5万人，组成工作队，领导"四清"运动，其

---

① 曹力铁：《江西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末》，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

②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安徽》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106页。

中2万名工作队员分赴两个县，1.5万名工作队员分别进入城市各点。[①]

中共广东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之后，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四清"试点工作组在河北总结的"桃园经验"，提出了反对"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的问题。认为原来搞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不合标准，决定重新进行试点。1964年10月至1965年上半年，第一批农村"四清"试点在中山、高要、阳江、曲江、惠阳、揭阳、澄迈、花县八个县铺开，共有108个公社（场），1545个大队，3.26万个生产队，其中农村人民公社100个，占全省公社总数6.1%；大队1497个，占大队总数的7.2%；生产队3.23万个，占生产队总数7.3%；渔业公社5个，大队35个，生产队214个；林场3个，大队13个，生产队98个。同时，城市"四清"运动也在佛山市和15个中央直属大中型企业进行了试点，参加运动的职工共5.9万人。据1964年10月"四清"运动工作团统计：全省各级机关抽调工作队员7.8万人，分为8个总团，111个分团，搞城镇"五反"的4960人，参加农村人民公社"四清"运动的7.3万人。[②] 其中阳江是广东铺开"四清"运动的八个重点县之一。为了集中力量搞好阳江的运动，中共湛江地委成立了"四清"运动工作总团，由地委书记孟宪德任团长，从省、地、县抽调来的干部、大专学生、知识青年以及军队干部共1.4万多人，组成庞大的"四清"工作队，进驻阳江铺开运动的18个公社，凡是进行"四清"运动的公社均成立了"四清"工作分团。[③]

---

① 陈沂主编：《当代中国的上海》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244页。

② 匡吉主编：《当代中国的广东》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1页。

③ 《一个红军战士走过的路——舒光才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285页。

河南省委于1964年9月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部署全省“四清”运动。会后，从各方面抽调干部7万人组成工作队。其中，派到农村的6.3万人，派到城市的7000人。河南农村“四清”重点搞八个县，即信阳、南阳、许昌、偃师、开封、封丘、新乡、浚县，共7526个大队，3.2万个小队。城市试点是郑州和焦作两市。[1]

广西壮族自治区从各级党政机关及农村贫下中农青年、复员军人中，抽调3万多人，组成庞大的工作队，在约占全自治区10%—15%的公社铺开“四清”运动。[2] 其中武鸣县县直机关各单位干部总数697人，抽调搞社教的184人，占干部总数的26.3%；区干部总数188人，抽96人，占区干部总数的50.7%，其中灵马区干部14人，抽11人，占78.5%；区直各机关单位干部总数783人，抽调159人，占干部总数的20.3%；另外，还从各公社抽调脱产干部140人，非脱产干部387人。组成浩浩荡荡的工作队，到农村搞“四清”，堪称“人海战术”了。[3]

宁夏自治区于1964年11月由杨静仁等自治区主要领导人亲自蹲点的第一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永宁县全面展开，同时开展的还有贺兰县金贵公社、盐池县大水坑公社。当时，自治区在永宁县采取了“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全自治区集中了5000多名骨干到永宁县的城乡各个单位直至农村生产队蹲点，每个公社蹲点的干部多达三四百人。从11月中旬开始的前73天里，采取神秘主义的“扎根串联”的方法开展调查工作，特别是采取了“对干部冷，对中农冈”的错误办法，使依靠对象的面变得很

---

① 张树德、侯志英主编：《当代中国的河南》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149页。

② 韦纯束主编：《当代中国的广西》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

③ 黄如海：《广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初探》，载《广西党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3期。

窄，严重脱离了群众。[①]

甘肃省于1964年11月中下旬至1965年5月底，集中了1.7万余名干部、1.1万余名农村积极分子和大学生，共计2.8万余人，在张掖地区的张掖、高台、临泽、民乐、山丹等五个县，开展了"四清"运动。五个县人口共65万，其中农村人口58万，城镇职工1万，居民6万。城镇方面共计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616个。农村方面公社73个，生产大队798个，生产队4867个，占全省总队数的5%。

陕西省委于1964年9月22日决定：全省社教，集中力量在长安、延安、西乡三县打歼灭战。根据9月23日西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的决定，社教工作团团部于9月30日正式成立。在组建社教工作团团部时，从中央机关、西北局、陕西省级机关以及西安市、渭南、咸阳等地区共抽调了17393名干部。在这些干部中，党员占65%，团员占16.4%。13级以上干部132人，17级至14级干部共420人。10月9日，社教工作团决定，在总团下设8个分团（每一区工委一个分团），51个公社工作队，2个集镇工作队，862个工作组（每个大队一个工作组），每个生产小队平均2至3名工作队员，每15户一个脱产干部。并明确规定，社教工作团领导县委，分团领导区工委，工作队、工作组分别领导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②]

据《杨尚昆日记》反映，青海省在湟中县27万人口中，集中了8040名干部进行"四清"。新疆伊犁县共2万多户，11万人，有工作队员3000多人，骨干1800人，其余是大学生和积极分

---

① 李恽和主编：《当代中国的宁夏》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149页。

② 张馨、高光厚：《陕西省长安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调查》，载《党史通讯》1987年第6期。

子。①

华北局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刘少奇的一系列指示，对运动做了重新部署，决定华北局机关和省、市、自治区政府机关中一般行政部门要抽调百分之五六十的干部，管理经济业务的部门要抽调百分之三四十的干部，参加“四清”和“五反”运动。地（盟）、县（旗）各单位，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参照上述要求的精神，确定抽调干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抽调。务必做到，每一个进行“四清”大队的工作组至少有两个领导骨干，每一个生产队要有两三名工作队的干部，其中至少有一个骨干。

河北省为贯彻执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和华北局的指示，在九个地区和天津市抽调了97037人的“四清”工作队。有脱产干部63516人，借调干部24105人，大专学生9416人，借调干部和大专学生占工作队总数的34.15%，党员占45.7%，团员占32.3%，群众占22%。王光美蹲点的新城县高家镇大队，319户，1500多人，集中了60多个工作队员，其工作队人数和质量都比桃园强，有少数是县、区、社干部，剩下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有一部分大学生，有好几位是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还有党史教员。新城县工作队队员达15000多人。邢台地委为加强对“四清”运动的领导，决定进一步充实“四清”工作队的干部力量。工作队干部由原来的75名增加为350名，每个大队平均15名，并成立“四清”政治部，下设整党监察处理、巡逻检查、资料报道、政治思想、综合汇报等五个小组。政治部设政委、副政委、主任、副主任各一人。各公社建立工作大队，并建立党委，吸收公社书记、社长参加。②

---

① 《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32、555页。

② 中共邢台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邢台市党史大事概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365页。

内蒙古于1964年冬搞第一批"四清"的时候，华北局和自治区党委两级领导在临河搞点。自治区与乌盟、呼盟在察右中旗、布特哈旗共同搞两个点。临河的点，工作队阵容庞大，华北局由解学恭带队，部长、处长来了一大批。五原县当时集中1800多人搞四清，其中有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大学生等，厅局级以上干部11人，处级干部43人，力量很强。光明大队这个点，有自治区直属机关的，有巴盟和五原县的，还培训了一些农村借干。直属机关去的有门德、白值品、忠乃、赵忠华、赵裕国等。[①]

北京市也对点上和面上的工作重新做了部署。决定把正在郊区13个县(区)进行"五反"和"四清"的绝大部分力量，集中到通县打歼灭战。通县的试点包括通县的城镇、33个公社和邻近通县的朝阳区6个公社、顺义县6个公社，共45个公社，57万人，工作队员2万人(包括1300名大学生和1500名农村知识青年)。城市"四清"在22个单位试点，包括工业交通13个，建筑2个，财贸4个，大学、医院、城市公社各1个，共有职工5.3万人(包括师范大学学生，不包括城市公社居民)，工作队员4400人。另外，中央各部门和华北局在北京还有9个试点单位。[②]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东北地区的"四清"运动从7月开始全面展开。全区农村第一批进行系统"四清"的有12个县，另5个公社、4个大队，城市开展232个单位。各县成立工作团，公社成立工作队。工作团由省委领导同志任团长，东北局、省、市、县都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万人工作团。[③] 其中，工交企业第一

---

① 王铎：《五十春秋——我做民族工作的经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6—487页。

② 《北京市委关于学习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信和检查右倾思想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1964年11月19日)，见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64年，第68页。

③ 《宋任穷回忆录》，第494—495页。

批开展运动的单位共有104个，职工31.4万人，有工作队员2.1万人。

全国工交系统的"四清"运动，共组织了13万人的工作队，在1800个全民所有制企业，187万职工中进行了试点，分别占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人数的1.8%和12.6%。其中企业286个，职工92.4万人，分别占中央企业、职工人数的9.1%和14%。

全国财贸系统在30多万人的范围中，开展了"四清"运动，占财贸系统职工总数578万人（包括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部门的加工厂，财政、银行、税务、工商管理部门，不包括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个体商贩）的5%强。中央财贸各部门抽出了3400多人（其中财贸各学院学生和教员865人）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占能够下去参加"四清"运动总人数的34%。其中，副部长以上29人，占同级干部的46%；司局长114人，占同级干部的40%。第二期抽出参加"四清"运动的机关干部人数，大体上同第一期接近。

检查和反对右倾思想

刘少奇在1964年夏视察各地时，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特别是在给江渭清的一封信中，对江渭清的右倾思想尤为不满，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指责。10月20日，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要求"各地委、县委同志都联系实际认真地进行讨论"。中央认为江渭清对自己的缺点和刘少奇的信所采取的态度是好的。正如江苏省委来电所说，这封信上批评的江渭清的缺点，不只是他一个人有，其他许多同志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还有一些同志则比江渭清更严重，其中，也包括中央的和中央各个部门的许多同志在内，中央认为所有这些同志都应当进行检查。根据刘

少奇和中央的指示，各地领导干部纷纷检查了自己的右倾思想，并提出大力反右倾。

北京市委在接到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复信以后，立即召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进行学习讨论和检查。一致认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信，抓住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一个根本问题，抓住了全党的活思想，信中所指出的缺点、错误，北京市委也同样存在着，而且有些问题还更严重。主要表现在：一是我们对于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党本身的当前的情况，并不是了解很多，而是很少，或是了解得错了，特别是对阶级斗争深入到内部，深入到领导层来的严重情况认识不足。我们不仅对基层单位的情况不了解，就是对整天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的一些领导干部也不十分了解，或者根本不了解。二是错误地接受了过去领导运动的经验教训，一开始就有许多顾虑，怕发生过火斗争，怕犯“左”的错误，怕出一个指头的毛病，怕有后遗症，因此对放手发动群众认识不够，相反却规定了一些框框。三是依靠县(区)委，依靠基层党委能不能搞好这一场革命斗争，长期以来，我们是不清醒的，没有认真考虑过县(区)委和基层党委领导得了还是领导不了的问题，而是盲目地相信他们可以领导得了，把运动领导权交给他们，这样就必然打了败仗。四是在运动的部署上，也可以看出我们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挖时间，赶进度，一开始就铺得过宽，不利于打歼灭战。产生上述右倾思想的根本原因，是市委主要领导干部长期没有蹲点或者没有认真蹲点，对下情不了解。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存有骄傲自满情绪。总之，我们的确是没有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确是对毛泽东思想学习领会很差，对这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要解决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伟大深远意义领会不深，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存在着“和平演变”的危险认识不够，对社会主

义社会两类矛盾错综复杂甚至交织在一起，而敌我矛盾大量地以人民内部矛盾形式出现，以及两类矛盾的互相转化，缺乏系统的认识。[①] 11月19日，北京市委把上述情况向中央和华北局作了汇报。28日至30日，北京市委再次召开全体会议，进一步检查了右倾思想，认为自己过去对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的确是不知道、不懂得、不会搞，过去对中央和主席的指示，是似懂非懂，实际不懂，右倾思想的确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客观世界变了，阶级斗争形势变了，我们的思想还没有变，总觉得北京市的工作做得还不错，总觉得北京市的干部没有那么多严重问题。事实证明，我们是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②]

江西省委在传达中央五月工作会议精神时，总结了前一阶段运动。认为一年多来，多数地方的运动搞得不深不透，有的地方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完全揭开，有些“四不清”干部的问题还没有彻底揭露，有的干部思想作风并无显著的改变。省委认为，运动不深不透的根本原因是指导思想上存有右倾情绪，没有深刻领会中央指示的彻底革命的精神，没有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不敢大胆地放手发动群众。在组织领导上，力量分得比较散，战线拉得比较长，没有真正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分析为什么存在右倾情绪时，总结了三点：一是对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其特点和干部队伍中存在问题的严重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对前一阶段运动的估计偏高。二是总结历次群众运动的经验教训有片面性，强调“稳”的方面多，怕这怕那，怕过火，怕有后

① 《北京市委关于学习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信和检查右倾思想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1964年11月19日)，见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64年，第63—68页。

② 《北京市委全体会议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检查右倾思想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1964年12月7日)，见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64年，第70—71页。

遗症，怕妨碍生产。三是各级领导干部没有亲自蹲点。10月份，三位领导同志率中央和国务院机关15人到达上饶地区参加"四清"。他们于14日到达，20日便写信给江西省委，对江西省"四清"运动提出了意见。10月25日和12月8日，三位同志又向华东局和中央报告，认为上饶地、县一些负责干部对敌情估计不够，对运动成绩估计过高。并点名批评：上饶地委和社教工作团的领导同志没有坚决贯彻中央彻底革命的精神和充分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对中央提出三分之一基层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这一估计不满，对中央的指示不认真学习，在工作队进入阵地后，继续以右倾思想指导运动，一开始就错误地提出"反急躁"。华东局于12月21日向华东各省、市转发了这份报告，认为上饶地委和工作团的领导同志已经阻碍着社教运动的开展，不能担负领导社教工作的任务，并要求各地检查一下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把右倾思想彻底反掉。江西省委接到华东局转发的这个报告后立即进行了研究，表示完全同意华东局的意见，决定由一位省委候补书记到上饶社教工作团任党委书记。省委还认为，全省有很多领导同志，包括省委领导同志在内，都存在右倾思想，对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认识不足，对前一阶段运动估计过高，在实际工作的指导上没有完全摆脱旧框框的束缚，表示要同右倾思想彻底决裂。①

甘肃省委在中央五月工作会议以后，于6月24日至7月7日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刘少奇的指示，对一年来城乡"四清"运动做了深刻检查。甘肃省委认为，由于对中央、主席的思想跟得不紧，有时就跟不上，因此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对阶级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

① 曹力铁：《江西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末》。

不足。我们在一个时期，对敌情估计得低了一些，对工作成绩估计得高了一些，有盲目乐观情绪。在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方面，在一个时期，在某些问题上有摇摆，没有坚决按杭州会议精神去做。在处理犯错误的干部问题上过于谨慎了一些，有些问题处理得不及时、不彻底。我们对于已经明显超出人民内部矛盾范围的问题，态度比较坚决，处理比较果断，但是对于内部性质的问题，则由于甘肃过去在党内过火斗争中伤害了大批干部，总怕处理不当，引起干部思想波动，因而过于谨慎了一些，怕处理多了，处理过了。甘肃省委认为，发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吃透两头，即对上没有吃透中央、主席和西北局的指示，对下没有吃透实际情况。归根到底，是阶级观点不够明确，没有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为此，甘肃省委提出，今后一定要老老实实按照中央的政策和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要取巧，不要乱出主意；要坚持高标准、高质量，要不惜时间和精力，尽量抽派干部参加这一斗争；要放手发动群众，在农村坚决依靠贫下中农，在城市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坚定不移、顽强不懈地把这一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11月21日，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在曲阜社教工作团干部会议上，对反右倾问题做了深刻认识。他指出，未修改前的《后十条》(草案)最大的缺点、毛病，就是只反映了基层干部的情绪，没有反映广大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的情绪，也就是反映了各级干部的一种右的情绪。这个文件当时他也参加了起草工作，但没有认识这些问题，直到少奇同志指出后才认识，这是要做检讨的。为什么认识不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下去蹲点，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特点，主要是敌人采取"和平演变"、"两面政策"，对这个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它牵涉到上下左右，都有它的根子，等等，认识不足，体会不深，缺乏实感。同时，他结合工作团学习中央两个"十条"的问题，对中央和毛泽东

反右倾思想作了历史考察分析。他指出，中央“双十条”的基本精神就是反右倾。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毛主席早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就开始发现我们党内产生了右倾思想。不久，在北戴河开会，主席就提出过渡时期还有阶级、阶级斗争，反对单干风，反黑暗风，反牛鬼蛇神。12月在上海开会，主席写了《冬云》一首诗。这些都是反右倾，反修正主义。主席还提出：在文艺战线上，为什么光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有点“西风压倒东风”的样子，这也是反右倾。在第一个“十条”中，主席讲得很尖锐，他说：现在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呵！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没有领会主席讲这些话的中心思想就是反右倾，是有所指的。至今年7月，少奇同志到山东讲了六次话后，我们省委同志才开始领会是反右倾，并更加明确了，当前山东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思想。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在政治上犯严重错误，要受历史惩罚。为此，山东省委在转发谭启龙的发言报告上批示：今冬明春面上的任务很繁重，不反掉右倾思想，工作是不会做好的。因此，各级党委也要在进一步学习中央批转的两个文件的时候，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加以检查，把右倾思想反透。只有这样，做好面上的工作才有保证。

1964年11月22日，李富春、薄一波在视察云南、四川、贵州三省时，除主要研究三线建设问题以外，也找省、市、地委特别是在基层蹲点的同志了解了一些城乡“四清”运动的情况。从西南接触到的材料看，属于右倾性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组织不纯的情况，在西南各地同样相当普遍，贵州省尤其严重。(2)有些居于领导岗位的老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贪图享受，只当官，不革命。(3)由于许多制度不合理，变相的多吃多占还

很普遍。(4)在农村工作方面,明集体,暗单干,无限制地扩大自留地。(5)在城市工作方面,四川省就发现许多中小型工厂,特别是公私合营企业,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搞计划外生产,用不正当的手段追逐利润。(6)对严重犯错误的干部,无原则迁就。(7)有些负责干部独断专行,采用资产阶级纵横捭阖的权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内生活很不正常。(8)有的单位搞分散主义。上述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是这次运动中必须解决的。而且对多数人来说,是思想认识问题。

中南局的同志在农村面上工作座谈会上也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上层干部的右倾思想。并提出,干部必须过社会主义这一关,领导干部也不例外,这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必须在这场斗争中,重新了解干部,认识干部,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过去民主革命时期,三整对干部是脱胎换骨,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拔拔"三个根子",搞好"四个基本建设",对干部来说是个大关,社会主义的大关,每个人都要过。过好过坏,过得去过不去,对干部是个大检阅;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看你抱什么态度,自由选择。

在各地纷纷检查右倾思想、反对右倾的同时,11月25日,中央批转了唐山地委"四清"工作团关于"两个文件"(即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学习讨论情况简报。

1964年11月16日,唐山地委"四清"工作团各分团召开了公社社长和17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传达了两个文件,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正击中了我们的思想要害,对我们帮助极大,教育很深。这几年我们工作中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倾向,发展得确实很严重,骄傲自满,自以为是,框框很多,故步自封。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也正像其他形形色色

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样，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队伍，涣散着革命组织，松懈着革命斗志，同右倾思想一样，严重障碍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

同时，在讨论中，许多人比较集中地揭发和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讲演报告，当传声筒。思想懒汉，既不动手，也不动脑，自己去做报告，别人代写讲稿，写前不授意，写后不过目，上台照本宣读，甘当“传声筒”、“大喇叭”。因此，有些讲演报告长而且空，不关痛痒，甚至闹出笑话来。唐山市教育局一次小学教育工作会议和中学教育工作会议同时进行，分别报告，秘书替局长起草了两个报告。由于报告人不了解报告材料的具体内容，竟念错讲稿，给小学教师念中学教育的稿子，念了半截他还不知道，后来写稿人听着不对，才给他换了稿子。(2)秘书写稿，东摘西抄。领导人做讲演报告，要秘书代写讲稿，有些秘书也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那就只好来个“搬运法”、“大拼盘”，“天下文章一大抄，保险省劲又牢靠”。拼出来的东西往往是长篇大论，空洞无物，离题万里，不解决问题。(3)总结经验，背鞋找脚。去总结经验，不是实践第一，一分为二，有什么总结什么，反映客观实际，而是题目第一，背鞋找脚，强拉硬扯。(4)推广经验，生搬硬套。不从实际出发，不因地制宜，盲目推行，其结果是浪费了人力物力，给生产造成严重的损失。(5)上堆下推，转运货栈。不调查，不蹲点，高高在上，养尊处优，日常工作状态就是“瘸子打围——坐着喊”。上边指示来了，大会小会电话会往下推；下边汇报来了，不加分析往上堆。一是上边的，二是下边的，就是没有自己的，实际上只起“转运货栈”的作用。(6)计划安排，主观臆断。做计划、搞安排，以主观想象代替调查研究，闭门造车，一挥而就。做出的计划不是“高而空”，就是“低而右”，也有的是“老皇历，年年使，年年用”。(7)领导犯错，别人检讨。有的领导

同志犯了错误，检讨书也让别人代写，有的实际上就是让别人替他做检讨。如某领导同志，平常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革命意志衰退，在“五反”中的三次检查，都是秘书代写，而且不向秘书交代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只是让别人硬写，写出后，其中有一句“革命意志不够旺盛”的话，还被他抹去了。(8)干部路线，上当受骗。听的不是群众的话，而是干部的话，反映的不是群众的意见，而是干部的意见，走的不是群众路线，而是干部路线。从干部中来，到干部中去，受了基层干部的领导，上了坏干部的当。(9)批评表扬，不符实际。(10)经验框框，自以为是。凭老经验、老印象办事，许多干部走马观花，不深入工作，群众说：“社干社干，骑车子乱转，家里睡觉，好队吃饭。”

中央对唐山地委这一报告十分重视，并作出重要批示：从这个材料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很多县级、区级和公社的领导干部是怎样工作的。在唐山地区的领导干部中这种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死气沉沉的工作方法，已经形成一种风气。在其他各省、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中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形，很值得注意。对于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出现，都必须予以揭露，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坚决加以克服和纠正，我们的工作才能做好，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起来。在我们党内和国内的工作中，是不需要办外交的。外交礼节中的一套形式，完全不应该用在我们党内和国内的工作中来。

中央批转这一文件之后，北京市委也将此文件推荐给下级党委，并要求党组成员首先把中央的批示和这个简报，认真地读几遍，逐条逐项地和自己对照一下，然后在党组会议上，认真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北京市委也指出，唐山地委领导干部中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在我们这里不是个别存在的，而且许多比他们严重得多。许多送到市委来的报告，言之无物，只要变

动几个指标数字，今年可以用，明年、后年依然可以用；不少报告是秘书代“官老爷”起草的，有的连“官老爷”也没看就上报了，连“官老爷”的图章盖倒了，也未发现；有些负责人的讲演、报告，甚至连“五反”下楼时的检讨也是秘书代笔；有的负责干部由秘书起草了讲话稿，自己看都不看一遍，就上台讲，结果讲得不三不四，闹得哭笑不得；有的连中央文件也不自己看，躺在床上逗孩子玩，让秘书向他宣读。这些怪现象，不胜枚举。像这些领导干部，既然不愿动手动脑，好逸恶劳，斗志松懈，就应该让贤选能，自己或“甘居人下”，或“弃官为民”。

各级领导干部对照中央和刘少奇的一系列指示，纷纷检查右倾思想，并强调大力反右倾，其结果就是大批领导干部下基层蹲点搞“四清”，形成了这一阶段运动的独特景观。

领导干部蹲点，指导“四清”

前文所述，刘少奇对“四清”运动中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强烈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获取第一手材料。而这一时期毛泽东对领导干部蹲点也非常重视。

1964 年 5 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在 5 月 30 日下午华北组的发言指出，干部蹲点，参加“四清”运动，各行各业都应当认真执行，失掉参加这场革命斗争的机会是很可惜的。如果我们的年轻一代不下乡，不了解农村，不会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共产主义是搞不成的。6 月 3 日，毛泽东看了这一发言后，批送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阅看，并批示：你应当下决心在今冬明春这段期间，在北京农村地区，或天津郊区蹲点，至少五个月。家里工作可以间或抽时间回来处理。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抽出一批人和当地干部合组一个工作队，包一个最坏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

以后并成为你们经常联系的一个点。还要在一个冬春，参加城市"五反"，千万不要放弃参加这次伟大革命的机会。[①]

他对刘少奇给江渭清复信的批语中，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并对领导干部右倾思想提出批评，要他们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11月4日，中央军委就关于贯彻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精神的情况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说："军委目前主要的工作之一是抓领导干部蹲点，要求师以上领导干部，都要分期分批下基层蹲点，每人每年一至二次，每次一个月左右。"毛泽东于12日批示：这是一件大事。13日，广东省委向中央、中南局汇报了省委常委下去蹲点一个月的情况和体会。认为这次蹲点使常委们对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尖锐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对于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右倾思想，则是一次充分的揭露和有力的鞭策。他们深感内疚地说，自己的"官"做大了，官僚主义大大发展了，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已经形成一堵高墙，隔断了自己同广大贫下中农的联系，对农村真实情况完全不了解了。今后一定要坚决革掉官风，打掉官气，下最大决心，把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深搞透搞彻底。毛泽东对此报告批示：很值一读或两读。[②]

12月1日，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说，近几年存在着"宁右勿左"、"怕左不怕右"的右倾思想，障碍了我们的眼睛，闭塞了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对阶级斗争中出现的这样严重的情况，竟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10日，毛泽东批示道：此两句有语病。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是各级干部除少数人以外，在这次下去蹲点以前，根本没有下去认真蹲过点，没有作出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他们有些人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79—80页。

② 同上，第168、223—224、225页。

不出办公室，谈不到视听见闻。有些人下去了，甚至蹲点了，都是蹲在基层干部、富裕中农、富农地主那里。这些人是有视听见闻的，可是只视听见闻了剥削阶级一方面，面对被剥削阶级一方面，即广大的贫下中农，则根本没有什么视听见闻。[①]

12月13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送审的向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四稿的批语中写道：也有不少同志不蹲点，不调查，不研究，有事不同群众商量，高高在上，独断专行，一人说了算数，满足于发号施令，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像这样的“同志”，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也没有，就不可能做到领导同群众相结合，就不可能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些“同志”应当立即改变作风，鼓起革命精神，“下楼出院”，深入现场，调查研究，认识问题，承认自己的错误，从广大群众那里听取意见，然后才有可能同群众一道解决那里的问题，总结那里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正确的个别指导，从而也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一般号召，使生产建设的群众运动能够开展得更好。不这样做，最后总是要被群众抛掉的。[②] 在随后举行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深搞透，关键在于领导人员亲自“蹲点”。蹲点的干部，都要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各级领导人要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样一场革命，必须亲自带领工作队，亲自深入实践，取得直接的经验。[③]

在中央领导人一再强调蹲点的指示下，各地纷纷表示拥护中央指示，检查了前一阶段工作中的缺点，并派出了大量的领导干部去工厂农村蹲点搞“四清”。

如华北局于8月20日，就领导干部蹲点问题向中央写出了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59—261页。

② 同上，第272—273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508页。

报告。报告首先对照中央领导人关于蹲点的指示，对前一阶段运动作了检查。认为前段运动也强调领导干部蹲点，但是，根据刘少奇提出的蹲点标准检查起来，是很不够的。全区县以上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包括华北局的同志，只有很少人基本合乎标准，其余的都没有认真地蹲下去。以山西为例，全省 90 多个县委书记、5 个地委书记，除了 5 个同志在一个大队蹲了四个月左右以外，有 73 人蹲了两个月左右，还有 17 人只蹲了一个月左右。其他省、市、自治区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华北局认为，领导干部下不去、蹲不住的原因很多，如运动的部署，是由上而下逐步开展，就是先搞好县(旗)一级的"五反"。开好县的三干会和搞完公社一级的"四清"，然后再开展大队和生产队的"四清"。前一阶段不少县的负责同志集中搞县级"五反"和公社"四清"，所以到基层蹲点少一些。但是更为重要的还是思想问题和认识问题，如许多同志安于靠看报告、听汇报指导工作；有的养尊处优，怕艰苦，贪恋城市和小家庭的安逸生活；有的对高标准搞"四清"认识不够等等。为此，华北局指出，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是清除这种恶劣作风的时候了。并作出重要决定：(1)华北局书记处同志今冬全部下去蹲点。(2)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地(盟)、县(旗)委书记，今冬都要下去蹲点。党委和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要有一半以上的人下去蹲点，并形成一种固定的制度。(3)每次蹲点都要自始至终地搞完一个生产大队的"四清"或一个企业的"五反"，要亲自动手做，亲自扎根串联，亲自动手总结经验，不经上级批准，不得离开岗位。(4)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实现革命化，彻底克服"五多"现象和只凭看报表、听汇报、发指示来指导工作的官僚主义作风。所有工作人员，都要按照计划，分期分批地至少参加一期到两期"四清"或"五反"。(5)各级、各部门主要领导干部下去蹲点，都要指定代理人，全权负责处理机关的日常工作。(6)主要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要解决

好蹲点与指导一般的问题。

华北局的决定作出后，河北省迅速作出部署，制定出《今冬明春四清工作队伍计算表》。据表中反映，河北各地计划抽调领导骨干数字为：唐山 650 人，承德 350 人，张家口 900 人，保定 792 人，石家庄 800 人，邢台 822 人，衡水 26 人，沧州 513 人，天津 586 人，邯郸 669 人，全省总计 6342 人。

北京市委书记处除留下万里照顾面上工作以外，刘仁、郑天翔、邓拓、陈克寒都已经下去蹲点。其余 11 个常委中，除了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的两位同志以外，有 6 人下去蹲点。郊区县（区）委、市委各部委和市人委各局的第一把手，绝大部分也下去蹲点。[①]

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根据刘少奇关于蹲点的指示，做了深刻的自我检查。他认为，我们这些人，长期在上面，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故步自封，自以为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靠党中央、毛主席的威信高过日子。不是少奇同志这样明确地尖锐地提出来，我们还是不下来的。这一年多，曲阜他也不断地来过，但多是跑跑转转，指指点点，听听县委、公社和基层干部的汇报，靠他们的汇报来指导工作，发号施令，所以工作没有搞好，使工作受到很大损失，这是个错误。蹲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次是经过严重斗争才下来的。说句老实话，他自己是被赶下来的，不是自觉下来的。据统计，山东省共组织了 5200 多名领导干部蹲点。

江苏省委针对刘少奇的批评，抽调了 7 个常委（其中 4 个书

---

① 《北京市委关于学习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信和检查右倾思想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1964 年 11 月 19 日，见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64 年，第 68 页。

记)和65个部委的厅局长以上干部下去蹲点。[1] 其中,省级机关,部、厅、局长有247人,下去蹲点的占30.7%;地委正副书记有39人,下去蹲点的占49%;全省县委正副书记有264人,下去蹲点的占45%。

广东省委一班人也分头下乡。陶铸去花县,赵紫阳去中山,区梦觉去高要,张云去澄迈,张根生去揭阳,寇庆延去惠阳,陈德去阳江。广州市"五反"单独搞,由曾志主持,刘田夫到佛山搞"五反"试点。海南岛的"四清",由副省长兼"五反"运动领导小组副组长罗范群领导。[2] 据当时广东省水产厅厅长舒光才的回忆,阳江县"四清"工作团集中了大量领导干部。从阳江"四清"工作团领导成员名单中就能反映出来。团长:孟宪德(湛江地委书记)。副团长:谢永宽(湛江地委副书记),杜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委员:陈德(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陈越平(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舒光才(广东省水产厅厅长),罗道让(湛江地委副书记),张丕林(湛江地委副书记),冯志仁(湛江地委副书记),等等。[3]

安徽省省委书记9人,蹲点的有5人;省委常委15人,蹲点的8人;省厅局长级符合参加社教条件的248人,蹲点的占52%;地委书记蹲点的16人,县委书记蹲点的91人,地、县委第一书记除特殊情况外全部下去蹲点。江西省地委书记蹲点的23人,县委书记蹲点的230人,占50%。浙江省抽调厅局长级干部72人,处长级279人,18级以上干部225人,共计500多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26.9%下乡蹲点。地委常委74人中,蹲点的34人;县委常委共539人,蹲点的229人。

---

①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493页。

② 叶曙明:《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第2卷,第1476、1503页。

③ 《一个红军战士走过的路——舒光才回忆录》,第285—286页。

东北局宋任穷带领农委、财委的部分同志到辽宁省金县三十里堡公社蹲点。马明方到沈阳五三厂，顾卓新到沈阳七二四厂蹲点，黄火青、吴德、强晓初也都到农村蹲点。中央机关派出34位负责同志和2800多名工作人员到东北地区参加"四清"蹲点，其中95%在城市蹲点。公安部谢富治、严佑民在沈阳冶炼厂，交通部孙大光和刘亚雄在大连港务局，中央监委马国瑞在辽宁金县大连湾，一机部段君毅和周子健在长春第一汽车厂，石油部康世恩和徐今强在大庆油田。[①]

甘肃省委根据刘少奇关于领导干部蹲点的指示，安排汪锋、王世泰、胡继宗、葛士英、徐国珍、丁乃光、韦明等七同志去农村蹲点。[②] 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分别到上海综合仪器厂、协昌缝纫机厂蹲点。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的曾希圣化名余勉教授到上海宝山县扬行人民公社城西二大队和奉贤县胡桥人民公社孙桥大队蹲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吕剑人负责喀什专区的社教工作，并在疏勒县洋大曼一区一公社蹲点。[③]

据《杨尚昆日记》反映，在陕西长安县搞"四清"的中央办公厅干部就有30多名，其中领导干部蹲点的情况是：杨尚昆在斗门公社牛角大队，陕西省省长李启明在引镇大队，中共中央西北局候补书记刘刚在民主公社，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细柳公社姜仁大队，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主编胡绳也在长安县。此外，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舒同在西乡县蹲点。[④]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军队抽调干部参加城乡

---

① 《宋任穷回忆录》，第395—398页。

② 《王世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53页。

③ 吕剑人：《我的回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页。

④ 《杨尚昆日记》下，第403—661页。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反映，到12月，全军已抽调干部30747人，其中省军区系统15720人。师职以上各级领导干部773人，其中将军67人。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福州军区副政委卢胜，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徐国珍，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李文清，和各省军区的一些负责同志，都带头下去蹲点。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于1965年9月带领军区机关和歌剧团，到浙江嵊泗参加"四清"运动，并在马关公社蹲点。

从上述材料看，中央机关和各省委、地委，部队派出大量领导干部下工厂、农村亲自蹲点，指挥"四清"，可见，中央对搞深搞透"四清"运动决心之大！领导干部蹲点，对改善领导作风，了解基层实际，密切干群关系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部分领导干部对基层阶级斗争形势看得过于严重，而这种严重的情况经高级干部反馈给中央领导层后，使中央领导人进一步验证了阶级斗争大量存在的事实，以更大的决心和更激烈的方法指导"四清"运动，从而使运动产生了较大的偏差，出现了过火斗争，甚至夺权的现象。

练兵练将，整训工作队

在《后十条》修正案中，将"四清"运动看作是一场比土地改革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并强调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因此，各地开展运动的单位普遍认为，要使这场运动搞深搞透，从而取得彻底胜利，没有一支坚强的工作队是不行的。在点上派驻大量工作队，强调数量的同时，各地也特别注意强化工作队战前整训，进行阵地练兵，从而建立起一支有领导、有组织、有纪律、革命化的战斗队伍，以便及时投入运动中去。下面以河北省为例，来说明工作队是如何进行战前整训

的。

为落实中央有关指示，华北局发出了《关于加强“四清”工作队的指示》。华北局指出，过去一年，我们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点铺得多了一些，工作队力量的使用有些分散，没有真正达到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和首先练兵练将的要求。为此，华北局作出如下指示：(1)根据已有经验，要把“四清”运动搞好，每一个生产大队的工作队至少要有两个以上有革命决心、懂得党的政策、有一定群众工作经验、作风好的领导骨干。(2)各级党委应对抽调的人员严格审查，必须保质保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右派分子，和政治上有重大问题的人，不能参加“四清”工作队；政治觉悟太低，没有革命决心和热情的人，也没有资格参加工作队。(3)由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下派的工作队人员和由地(盟)、县(旗)抽调的工作人员，由地委统一领导，统一安排。在编组时要注意强弱搭配，新老干部搭配，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搭配，男女搭配，骨干和一般骨干搭配。(4)工作队的主要任务：严格按照中央指示和“双十条”的规定，按照高标准的要求，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依靠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认真解决政治“四不清”和经济“四不清”的问题，切实实现教(重新教育人)、改(改造人)、组(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挖(挖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根子)、栽(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子)、培(培养基层领导核心，培养和训练一代人才)的战略任务。(5)正确处理工作团、队与当地党组织的关系。“四清”工作团在地(盟)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派到某一个县(旗)的工作团可以吸收县(旗)委的若干同志参加组成工作团党委，统一领导全县(旗)的“四清”运动。公社一级的工作分团成立党委，统一领导全公社的“四清”运动。(6)为了加强工作团、队内部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工作队不断革命化，在工作团和分团中设政委，工作队设指导

员，负责做好内部的思想政治工作。(7)每个工作队员要严格执行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充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树立一个好作风。

在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下，河北省从九个地区和天津市抽调近10万人的"四清"工作队，于10月中旬集中到各重点县，每县约有万余人的工作团，进行战前整训。训练时间一般是40天左右，少数三十几天。由于这次训练的工作队伍庞大而不整齐，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水平参差不齐，思想、作风也有很大差异。据此，河北省委认为，要把这样的队伍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训练成像中央所要求的那样，即具有彻底革命精神、优良工作作风、严格工作纪律的坚强的工作队，确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和缺乏经验的新工作。因此省、地、县委要集中力量领导好训练工作，工作队的训练，要从全体队员出发，从实际出发。整个训练的中心，是学习"双十条"，并以"双十条"为武器，反右倾，放包袱，进行自我革命，力争训练出一支过得硬的作战队伍。

训练一开始，由工作团的负责同志作动员报告，而后用两三天时间进行"收心"工作，端正学习态度，组织队伍，建立临时党团组织，加强生活管理，严明纪律。由于省、地、县的各级领导干部发扬"老八路"作风，和学员一起同吃大锅饭，同睡土炕地铺，共同学习，因而，一开始就出现了"情绪高、纪律好、劲头足的革命气氛"。

学习"双十条"，解决作战思想问题，是整个集训的第一步，也是整个训练的中心。各地都用了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是先学"十条决定"，着重解决对阶级斗争的认识问题。在初步掌握阶级斗争武器的基础上，再学"十项规定"，着重解决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在学习"十条决定"的过程中，穿插阅读"白银厂"、"小站"和本地阶级斗争等典型材料，给大家一些感性知识，帮助领会"十条决定"精神。为了学好"十项规

定”，把《后十条》修改前后的新旧本都印发给工作队员，对照学习。同时穿插阅读了“王光美同志的报告”和“迎丰公社”等材料。学习方法，一般是先看文件，边读、边议、边查、边放相结合。学习文件，联系实际；联系实际，印证文件。揉来揉去，逐步深入，防止两者脱节。但在学习过程中，碰到了学不进去的问题。有些搞过“四清”的干部产生了厌倦情绪；有些大专学生爬文件，抠名词术语，在概念上转来转去；有些接触实际较多的干部，光摆具体事，与文件挂不起钩；有些组长，只会催人发言，不会启发诱导。为此，河北省委认为，解决如何钻进去的问题，解决上纲问题，始终是领导的首要任务。并建议：一是要善于抓带有普遍意义的活思想和活典型，诱导大家展开议论和争辩。二是加强班（组）领导，首先对班长进行辅导，使他们学在前面，然后领导大家学习。三是强调领导干部蹲点，深入班（组），启发诱导，总结学习经验，及时推广介绍。四是组织学习好检查好的同志，在中、小型会议上作典型发言，推动大家深入学习。五是组织负责同志根据学习中提出的问题，宣讲“双十条”，或者集中几个问题作辅导报告，提高认识，解决上纲问题。

在学习“双十条”中间，各地划出一段时间，一般是 7 至 10 天，反右倾，放包袱，进行自我革命。这是整训工作的第二步。

经过学习“双十条”，联系实际，联系思想，暴露了大量的右倾思想。不少同志认识到右倾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认识到不反掉右倾，就不能取得这场革命的彻底胜利。这时，领导上因势利导，适时地提出反右问题，引导工作队员集中精力，层层带头，检查批判右倾思想，振作革命精神。从揭发的材料看，突出的表现在几个方面：在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上，有些大专学生和借干，不承认我国当前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认为社会上有阶级斗争，党内和干部队伍中没有阶级斗争，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阶级斗争新的形势和新的特点认识不足。在放手发动

群众问题上，顾虑重重，怕“左”不怕右，在干部中有所谓八怕，即：怕群众发动起来，人多嘴杂，事不好办；怕干部躺倒不干；怕死人，出乱子；怕影响生产；有问题的干部怕牵连上自己；怕搞错了再平反，赔礼道歉；怕“上根”攻不动，碰一鼻子灰；怕和当地党委意见不一致。在党的生活和党内斗争上，不少人一切以“我”字当头，患得患失，不坚持原则，对坏人坏事不斗争，市侩习气，混事主义，革命精神不振，有的甚至一切为了“保命、保职、保级别”。

针对上述情况，河北省委认为，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右倾思想，反映了很多干部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足，缺乏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这种精神状态，已成为当前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障碍。因此，必须结合当前的实际斗争，不断地反对右倾思想，以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放包袱一般和反右倾一起进行。其方法是一面强调自觉革命，号召大家向一切错误决裂，坚决当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彻底的革命派；一面采取领导带头，先上后下，发动群众，进行批评帮助，形成群众性的自我革命放包袱的热潮。反右倾放包袱的重点是解决各级领导骨干的问题。为此，公社书记以上干部单独编组，检查揭发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大专学生和借干，组织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解决知识分子为谁服务的立场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工作团也揭发出一些严重问题。如保定地区的博野、唐县、涿县等县委核心有严重问题；石家庄工作团在脱产干部中，揭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违法乱纪、腐化堕落、革命意志衰退、丧失立场、隐瞒政治历史、从事资本主义剥削等严重问题的，占18.3%。不少大专学生检查了资产阶级的名利观点，批判了“功课过得硬、政治过得去、生活过得好”的只专不

红的错误思想。

通过反右倾放包袱，对于部的政治思想面貌有了比较系统深入的了解，然后根据工作需要，挑选领导骨干，组织作战队伍。这是整训工作的第三步。

以革命精神，打破论资历、排辈数的封建观点，大胆提拔新生力量，挑兵选将，组织领导班子。河北省各地都本着这一精神，对领导骨干作了严格的审查和调查。如邢台工作团公社书记以上干部，共有891人，经审查不能当骨干，需下连当兵或锻炼的232人，占26%。同时，在审查过程中也发现一些干部不够队员条件。如唐山、承德、天津、沧州、邢台和天津市统计，在30253名干部中，不够队员条件的有666名，占2.18%。[①]

"选将"结束后，开始进行编组。关于工作队编组问题，1964年10月23日，中央专门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和军委总政发出了《关于社教工作队编组和交流社教工作经验问题的指示》。中央指出，目前各省工作队的编组，有两种方式，第一是省委干部包一片，地委干部包一片，各县的干部也各包一片。第二是省委、地委干部和各县的干部混合编组，就是说，每一个工作团、工作队或工作组都有省委或地

① 其实，这一情况，在全国其他工作团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如陕西长安县社教工作团，用了二十多天时间，在工作团干部中发动了一场以反右倾保守思想为中心的查阶级、查立场、查作风的"三查"运动。查出队员中有重大历史问题、重要社会关系、思想作风严重不纯的干部占队员总数的12%，丧失立场、散布修正主义观点的干部占队员总数的13%。最后，有2.6%的干部被取消了队员资格，9.6%的干部被取消了积极分子资格。这就是说，工作团进村之前，就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受到打击，有的甚至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严厉处分。宁夏地区在运动开始抽调工作队员时强调"要像挑女婿一样挑选"、"要查三代"。广西地区强调工作队一定要十分"干净"。参加运动的人员一律要经过集训，并自我进行总结、鉴定，小组评议，分团、工作团层层审查，搞"人人过关"。稍有一点"不干净"，就被请回原单位，搞得人心惶惶。

委的人。第二种编组方法，会有很多麻烦，各方面的人编在一起共同作战，立场、观点、作风都有些不同，在工作队内部对于每一项工作都会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做法也会不同。但是，为了工作的利益，又首先必须统一工作队内部意见，并且统一做法。这样，就有很多好处，使省委、地委的干部更好地了解县的各级干部，也使县的干部更好地了解省委、地委的干部，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看到各种不同的做法，互相监督，互相学习，互相考验。第一种编组方法，可以省去许多麻烦，但是却有许多缺点。特别是原来的上下级在一起工作，就有些下级干部有意见也不说了，领导同志也难于了解情况和干部。第二种编组法，在去年，河北抚宁工作队就是这样做的，证明是好的。第一种编组法，去年有些地方也作过，证明不大好，但是各地也还可以再试验一个时期。如果继续证明这种编组法不好，就应下决心逐步改为第二种编法。

河北省按照中央指示，实行了混编。一般是县与县交插30%到40%，加上中央、省、地分别编入各县分团的，一般分团外插干部占40%到50%。

在整编作战队伍之后，各地一般用了三至五天的时间，进行纪律教育。这是整训工作队第四步。首先由负责同志作加强纪律的报告，然后联系实际，联系思想，进行小组讨论。并印发违犯纪律的典型材料，组织讨论。最后制定“四清”工作队员纪律守则。下面是河北省制定的“四清”工作队员纪律守则：

四清工作队员纪律守则(修改草案)

毛主席曾教导我们：“大军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说明严格的纪律是革命胜利的保证。为此特制订“四清工作队员纪律守则”，每个工作队队员均应自觉遵守，并向贫下中农宣读，由群众监督。

一、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双十条”，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提高政治水平。

二、深入群众工作，加强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带框框。如实反映情况，不弄虚作假。

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决与地富反坏分子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分子划清界限。不包庇阶级敌人和“四不清”干部。

四、依靠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有事和群众商量，反对强迫命令；按照政策办事，反对违法乱纪。

五、坚持说服教育，坚持说理斗争。不打人，不骂人。

六、坚持“三同”，发扬“老八路”作风，要以平等的态度待人，要同群众打成一片。

七、关心群众生活。爱护群众一草一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物要归还，丢失、损坏要赔偿。

八、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不吃请受礼，不占群众便宜，不买退赔物资。

九、加强革命责任心，坚守工作岗位，遵守工作制度。不擅离职守，不造假请假，不逾假不归。

十、作风要雷厉风行，反对拖拖拉拉；工作要深入细致，反对粗枝大叶；办事要讲实效，反对形式主义。

十一、服从领导，听从指挥，重大问题要请示报告。工作要大胆负责，发挥主动性、创造性。

十二、树立新风尚，反对庸俗习气。不拜把子，不认干亲。作风要正派，不乱搞男女关系。在工作队期间不和当地群众搞恋爱。

十三、提高革命警惕，严防敌人破坏，做好保密工作。文件要妥善保管，说话要注意场合，不当“透气筒”，严防泄漏党和国家的机密。

十四、坚持原则，加强团结，实行民主集中制。严格组织生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意见向组织上反映，也可以越级反映。

十五、发扬彻底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防止和反对各种不良倾向。按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按照六条标准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任务。

在整训期间，河北省的一些工作队也十分重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求大学解放军、学大庆，提出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实现工作队革命化”的口号，并深入开展了一系列评比竞赛活动。如有的地区掀起了“五好工作组、五好工作队员、五比、五勤、五不怕”的竞赛运动（简称“五五”竞赛运动）。五好工作组是：贯彻阶级路线好、依靠党支部好、坚持集体领导好、方法正确效果好、思想工作抓得好。五好工作队员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群众路线调查研究好、团结互助好、学习好。五比是：比革命化、思想、干劲足，比扎扎实实工作、实效大，比深入工作、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坚持“四同”、劳动好，比坚持岗位、出满勤，比贯彻政策认真、领导方法好、经验丰富、总结及时。五勤是：手勤、腿勤、眼勤、嘴勤、脑子勤。五不怕是：不怕艰苦、劳累，不怕困难、问题，不怕吃亏，不怕碰钉子，不怕负责任。有的工作队还向留在机关的同志发出了倡议书：

倡议书

在机关的全体同志们：

我们能够参加这次伟大的农村革命运动，感到非常荣幸。我们认为这次伟大的运动，是重新教育人的革命运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决不辜负领导和同志们的期望，坚决按照地委指示，既要做好农村四清工

作，又要使自己受到一次极为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锻炼。我们保证做到：

一、坚守岗位，努力工作，不完成任务不回机关。

二、服从领导，搞好团结，严格遵守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地委提出的下乡干部六项原则。

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持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加强调查研究，学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处理问题。

四、坚持“三同”，与贫下中农交知心朋友，在下乡期间，保证参加集体劳动二十天，争取达到一个月。

五、学好主席的“三论”和中央两个“十条”及有关农村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并且做到活学活用，联系实际，提高思想。

六、认真坚持生活制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比、学、赶、帮竞赛运动。

同志们：我们下来后，你们毅然决然地担起了我们的工作，使我们非常钦佩。机关人少了，工作更加繁重，你们肩负的担子是重的，这是我们完全能够理解的，我们相信你们在思想革命化、机关革命化，以及各个运动中一定能够名列前茅，更加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让我们在革命的时代里，携起手来，共同前进吧！

地委驻安国四清工作队全体人员

同时，河北省还组织了一批农村文化工作队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他们认为，农村文化工作队是组织文化艺术工作者为“四清”运动服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可以成为一支“四清”战线上的文化宣传轻骑兵。它用戏剧、电影、曲艺、皮影戏等艺术形式进行演出，用黑板报、广播、展览会等多种形式进行“四清”宣

传鼓动工作和阶级教育工作。并且通过对农村基层文化组织的整顿工作和农村文化活动的辅导工作，充分发挥群众业余文化活动的作用，使专业的农村文化工作队和业余的农村基层文化组织在农村广泛开展文化宣传活动，来配合“四清”运动和活跃农村的社会主义文化生活，满足农村群众和“四清”干部对文化生活的要求，用社会主义文化去占领农村阵地，推动农村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发展。农村文化工作队的基本任务：一是用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艺术形式，演出配合“四清”运动的剧目和节目，进行文化宣传活动，为“四清”运动服务。二是对于基层文化活动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指导和扶植农村群众文化活动，改变农村文化工作的面貌，使农村社会主义文化活动大大开展起来，并结合“四清”参与整顿农村文化基层组织工作。三是“四清”文化工作队的人员，在农村要深入生活，参加劳动，访贫问苦，从政治、思想、生活等方面受到一次锻炼。

据统计，河北省共组织了 10 个文化工作队。其中唐山地区 159 人，承德专区 159 人，张家口专区 140 人，天津地区 166 人，沧州地区 150 人，保定地区 172 人，石家庄地区 144 人，邢台专区 144 人，邯郸地区 194 人，衡水地区 166 人。

可以说，经过练兵练将，“四清”工作队的作战能力明显增强，可谓“烧红了思想，炼硬了骨头，坚定了立场，明确了观点”，练就了一支思想革命化、工作战斗化、生活群众化、行动纪律化、作风民主化的革命队伍，许多工作队员也由“革命战线的一名新兵”转变成“冲锋陷阵的战士”，并很快开入“战场”，展开一场“四清”大革命。

夺权斗争

“四清”运动本来就是“左”倾思潮的产物，而这一时期又不

断强调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这样，就使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局面。

北京市委在检查右倾思想时认为，没有一个单位过去的“五反”运动是搞深搞透了的。20个单位中，有11个单位的领导班子已经烂了，或者十分严重。轴承厂7名党委常委中，5个人问题非常严重，党委书记完全烂了。第五建筑公司6名党委常委中，5个人问题非常严重。①

济宁市作为山东省“五反”运动的重点单位，在运动中，工作组重点揭发了市委领导核心中的问题。据初步揭发的材料说明，济宁市委确是一个烂掉的单位，领导权基本上不在我们手里。曲阜作为山东省农村“四清”重点县，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比原来严重得多。曲阜工作团认为，据十处公社350个大队的初步排队，领导权掌握在地富反坏分子和严重蜕化变质分子手里的209个大队，占66%。据十处公社1628个生产队的排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510个队，占31.3%，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绝大部分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

甘肃省委分析认为，部分单位职工队伍严重不纯，兰州铁路管理局、103公司等6个单位，20%—50%的人没有经过审查。交通厅配件公司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占70%，部分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据临夏12个公社的调查，其中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大队占30.4%；全省基层单位中，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肯定是不少的，有些地方很可能超过三分之一。

贵州省委认为，在“四清”运动中，需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地

---

① 《北京市委全体会议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检查右倾思想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1964年12月7日)。

区的比例很大，起码一半以上，这是全省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贵阳市在"五反"运动中指出，从运动揭发的问题看，贵阳市已经变了颜色，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复辟，形成反革命两面政权。从目前运动发展的情况看，问题十分严重，几乎是揭开一个烂掉一个。

青海省在"四清"运动中过分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认为敌人千方百计地拉拢腐蚀社队主要领导干部，进行和平演变，通过他们在党政机关中的代理人，从幕后操纵和继续控制着不少地方的基层领导权。如湟中县"四清"工作团在"四清"运动总结中说，公社领导权被篡夺的占 28.7%，生产大队一级领导权不在党和人民手中的占 48.2%，干部中有各种"四不清"错误的占 48%，公社书记中问题性质严重的占 25.9%，支部书记问题严重的占 33.7%。①

陕西省"四清"重点县长安县，在经过工作团的调查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一个基本判断：一是民主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都很不彻底。山区基本没有土改，平原地区大多是和平土改。二是从县委到生产小队的各级领导问题都十分严重。6 个区工委中，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有 2 个，43 个公社中有严重问题的就有 25 个，668 个生产大队中有 332 个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三是资本主义黑风像瘟疫一样流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猖狂。据此，工作团认为，大批反革命分子根本没被触动，党政组织严重不纯，封建和资本主义势力猖獗，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不只三分之一，广大贫下中农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参加这一次大革命，同过去参加 1925 年到 1927 年的大革命，参加苏维埃战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政治意义一样重大，或者更重

---

① 赵洵峰主编：《当代中国的青海》上，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2 页。

大一些。[1]

华北局在一篇报告中指出：邯郸专区14个县，完全烂掉的有2个，大部分烂掉的有5个，另外7个县委书记问题严重，常委一半要调整，占55%；张家口地委烂掉，市委烂了，下边区委都烂了；中央、省委派的工作队，摸27个大队，属于夺权的26个。[2]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认为，不少干部已走完“懒、馋、占、贪、变”的全过程，已经和平演变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甚至说有三分之一单位的领导权不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者的手里。据南宁地区“四清”总团的排队，“四不清”干部已占干部总数的73%；全地区县委常委中有“四不清”问题的达94%；全地区16个县的县委领导班子，已基本烂掉和部分烂掉的各2个；有个公社的37个生产队，有12个队的领导班子变质。[3]

在1964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陶铸谈了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后认为，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三分之一打不住！清理了一下之后，可能又看多了一些。广东的40%，可能比较接近实际。[4] 西北的报告说，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县市，如果把以前夺权的数字也算上，占50%。浙江的报告说，从浙江梁湖公社的情况来说，已经不只是三分之一的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且很难找到有多少单位的领导权还在我们手里。山西的报告说，工作队进村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面临着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5] 湖南反映，据省、地委负责同志

① 张馨、高光厚：《陕西省长安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调查》。

② 栗守廉、仲乙禄：《四清运动述评》，载《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③ 韦纯束主编：《当代中国的广西》上，第122页。

④ 《杨尚昆日记》下，第463页。

⑤ 张素华：《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蹲点的69个大队的材料说明，在湖南被敌人窃据领导权的基层要多于三分之一。[①]

1964年11月15日，王任重在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社、区、县、地、省的各级领导机关，都有一批人烂掉了，还有一些单位整个组织都烂掉了。原来听到主席的估计，三分之一的地方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不少人还有怀疑。现在一接触实际，思想通了。从孝感县的情况来看，这个县的几个主要领导人或者已经烂掉了，或者接近烂了，不是烂了一个指头，而是烂了几个指头，多数指头，或者从头烂到了尾。[②]

从上述材料反映的情况看，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破坏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这就使中央一线领导人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解决。在这一段时间内，中央连续发出了许多文件，以利运动的开展。

1964年6月23日，中央批转了《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9月1日，正式转发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0月24日，又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这样，就把三大夺权样板推向全国。

10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李雪峰给刘少奇的信，并批示：对于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应当在调查研究以后，采用信阳经验、小站经验、白银厂经验，进行夺权斗争，发动群众迅速加以解决。其他有严重问题的县委及其他机构，能够说服的就说服，不能说服的，也要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75页。

②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785—786页。

加以改组。[1]

11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批示指出：在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地区，如果发现有的地方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有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上述三种情况，在查明确实后，经工作队批准，都可以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没有贫协组织的地方，也可以由工作队组织贫协，取而代之。[2]

11月13日，中央还印发了经毛泽东、刘少奇同意，书记处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规定凡是有地委以上党委负责同志领导的工作团集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当地县委和县人委即由工作团党委领导，该县各区区委和区公所、公社党委和公社管理委员会也接受工作团分团党委和工作队党委的领导。并说明本规定原则上适用于城市和企事业单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团或工作队。[3]

12月21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对原有农村基层组织瘫痪的地方，要实行一切权力归贫农下中农协会的原则。对于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和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着领导权的组织，必须实行改组，把领导权夺回来。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必须认真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对于实行复辟和进行破坏的地主、富农、恶霸、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

---

①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二室编：《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选编》第5册，第466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326—328页。

③ 同上，第332—333页。

要发动群众，把他们揭发出来，对他们进行说理斗争，制服他们。①

上述文件的下发，使这一阶段铺开的"四清"运动，急转直下，"左"的倾向更为明显和突出。各重点县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在许多地方错误地进行"夺权"，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过火斗争，有的地方甚至发生自杀等极端现象。

如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代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在组织处理上，最后确定性质严重的四类干部共有2616名。县委书记以"包庇坏人"的罪名被处以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三级，下放公社分配一般工作。县委某副书记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和公职，判刑八年。某副县长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全县劳动、妇女、民兵、水利、治安、拥军优属、节约、饲养等各种模范人物，几乎无一幸免。同时，社教总团在"四清"之后，紧接着就把斗争锋芒指向四类分子。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在运动进展过程中，共发生自杀事件182起，154人自杀身亡，28人自杀未遂。可以说，长安"四清"工作团严重夸大了敌情，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据长发(1979)88号文件《关于落实党的政策，平反"三案"工作的总结报告》反映，截至1979年5月底，复查纠正了"四清"中错划的2707户地富成分，占原补定地富成分2724户的99%。将贫农、中农上升为中农、上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的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502—507页。

5547户，全部恢复为原土改时的成分。给"四清"中戴上各类分子帽子的2242人平了反，占原戴帽子2366人的94.7%。为"四清"中受各种党纪、政纪处分的1576名农村基层干部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占原受处分2018名干部的80%。对受错批错斗而未立案的7758名干部和群众，一律从政治上给予平反。①

曲阜县东郭大队是名副其实的红旗单位，支部书记郭守明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在他的领导下，全大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群众生活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据1965年1月31日陈少敏向谭震林的汇报，以外贸部部长助理为首的工作队，在工作中发生了严重的偏差。郭守明等领导干部，虽有一些缺点错误，如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参加劳动少，多吃多占，经济不清等。但工作队根本不从实际出发，不是帮助郭守明等同志克服缺点，改进作风，而是机械地搬用了撇开干部，发动群众整干部的方法。结果，全部大队干部都隔离反省，郭守明停职反省，大儿子是复员军人、民兵连长，被撤职，全家被斗。大小队干部中32人退了1964年多占的工分，并都说自己是贪污分子。郭守明被斗后，一度要自杀。可以说工作队的错误做法，给这里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福建省连江县搞"四清"时，县委和公社党委一律"靠边站"，接受审查。并把土改时对付地主、富农的那一套办法，全部用来对付社会主义时期的基层干部。中央发出了"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后，各地纷纷建立贫协组织，依靠贫农协会来领导夺权斗争。在县、区委机关则"靠员不靠长"，依靠通信员、炊事员、传达员、驾驶员等"基本群众"，来决定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哪个领导干部可以解放，哪个干部有"四不清"问题等。审查时，县委六个常委一次又一次地检讨、

① 张馨、高光厚：《陕西省长安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调查》。

"下楼",整个运动搞得十分紧张。浦口大队驻了200多人的工组队,地委书记亲自蹲点,依靠修理自行车的工人和理发店的伙计,审查大队干部。东川大队把村干部集中起来"四清",搞逼供信,把支部书记整得病倒了,会计打得残废了。东湖大队的西庄村党支部原是1963年县委表扬树立的红旗支部,工作队硬说是"红皮白心"的"反革命两面政权",是国民党支部,罗列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把支部书记、大队长等六个同志打成混人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其中两个人被判了刑。连江县第一批146个大队和县社机关,参加运动的干部中79%被定为犯有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的"四不清"的错误。①

江西省在这一阶段运动中,出现了过火行为和非法斗争。如瑞金县四个大队的185名干部中,被非法斗争的94名,占了一半多,30名大队干部中18名被非法斗争,占60%。非法斗争最普遍的是罚跪、体罚、游街、软禁,个别甚至使用酷刑,有的还发生了逼死人的现象。②

青海省"四清"重点县——湟中县,先后对11个公社、297个大队和36个县社企业中的880人进行了夺权斗争。在该县县级机关958名职工中,被定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达427人,占45%;县属各单位领导干部79人中,定为问题多和性质严重的63人,占79.7%;科、部长以上干部65人,定为问题多和性质严重的32人,占49%。类似问题在其他地区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在运动过程中,违反政策的现象极为普遍,打骂逼供屡见不鲜,自杀现象也有发生。由于结合"四清"运动进行了民主补课,结果又错误地补划了一些地富分子。在评审"四类分子"时,也出现许多过火行为,造成不良影响。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

---

① 成波平:《连江县的"四清"运动》,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89年第6期。

② 曹力铁:《江西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末》。

地区，结合“四清”运动，对宗教封建特权进行揭发和批判，发生了不少违反民族宗教政策的情况，伤害了民族感情，影响了民族团结。[①]

湖北省的“四清”运动贯彻执行了“左”的指导方针，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机械过火的斗争，伤害了一大批县级干部、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还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县的问题。沔阳县潮愿大队的大队长李华子因为发展家庭副业，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在全省通报批判。类似的批判斗争，全省各地都有。[②]

甘肃省张掖地区的张掖、高台、临泽、民乐、山丹五个县，在《二十三条》下达前，共自杀212人，其中山丹25人，民乐31人，临泽42人，高台40人，张掖74人。而据当年担任张掖县乌江公社东湖大队“四清”工作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新回忆，工作组进村的时候，不开群众会，先搞秘密串联，搞得很神秘，竟像在白区工作一样。工作组因为先入为主，所以看见村干部就不顺眼，总以为他们都是“四不清”干部，偏听偏信，只要得到一点“四不清”材料就穷追不舍，已成了工作方法。这样也就自然会产生逼供信的错误。和历次运动一样，开始不防“左”，只怕“右”，一定要等到出了无数乱子以后再来纠偏。工作组的权力很大，可以任意隔离审查（等于逮捕），可以随时审问（等于私设公堂），即使逼死了人，也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所以在“四清”中，逼死的村干部是不少的。即以乌江公社而论，人命案不下十余起。同时，也进行了民主补课，即找出漏划地主、富农来斗，或者是对斗得不彻底的地、富再挖出来斗争。[③]

---

① 赵海峰主编：《当代中国的青海》上，第102—103页。

② 钱运录主编：《当代中国的湖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

③ 李新：《“四清”札记》，见萧克、李锐、龚育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231页。

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多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70多起，死了50多人。山西洪洞县，也死了四五十人。[①]

海南省国营西达农场"四清"工作队，在下去之前，对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还半信半疑，下去之后却认为三分之一也打不住了。全场23个生产队，经工作组初步摸底排队的结果，认为坏人当道的7个队，烂掉的10个队，干部排队烂掉者竟达70%。运动中，把大多数干部撇在一边，坐"冷板凳"。昆仑农场的小战斗打了一个多月，斗争了45人次，战况极其惨烈。工作队相信，只要"大会一哄，群众一压，材料一亮"，干部就会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因此，他们实行"大会斗，小会追"，把温度升得高高的，把气氛搞得浓浓的。这还不够过瘾，为了尽快打破闷局，甚至把全体干部关进大仓库，剥夺行动自由，假日也不准回家，然后人人过关，逐个解放。[②]

各重点县点上的过火斗争，很快影响到面上的"四清"。荣高棠1965年2月9日向中央去信反映，山东烟台专区乳山县和泰安专区平阴等县的基层干部，目前基本上躺倒不干，使冬季生产受到很大影响。主要原因是这些县面上的"四清"违反了党的政策，抓经济退赔不实事求是，打击了干部的积极性。如乳山县于1964年12月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号召干部洗手洗澡，交代问题后，要立即退赔。由于烟台地委提出退赔要达到"双十指标"，即干部退赔的东西，要达到每个社员平均分到10斤粮、10元钱。为了搞退赔，会议一再延期，一共开了18天，直到完成地委提出的"双十指标"才散会，并限三天退完。县委在动员时说："如果不立即退赔，就要考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

---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61页。

② 叶曙明：《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第2卷，第1505—1506页。

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五顶帽子，哪一顶给你戴！"不少干部为了争取不戴帽子，只好卖掉基本口粮、房子、衣服、被子等东西来退赔。南黄公社东阳水村党支部书记迟京义，是个成分好、劳动好的干部，1962年下放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以来，该村粮食生产增长了一倍。这次他为了给别人带头，也退赔了120元、160斤粮。泰安专区平阴县的退赔工作也搞得很猛，从动员洗手洗澡到退赔处理，前后只有九天，而且对干部交代的问题，既不去查证核实，也没有一定的政策界限，干部交代多少就退赔多少。有些地方在砍干部多占的工分时，是从1958年或1959年算起的，甚至连《六十条》规定的补贴工分也砍掉了。如东平县有些大队规定，凡是干部就一律砍工分，砍掉后每个干部平均每天只剩下3个工分。肥城县边家院公社某大队，每个干部平均砍掉300个工分。平阴县有的干部多吃多占的粮食是平价买的，现在要按高价退赔，一斤粮食要退赔2.80元。开荒地、多占的自留地、机关副业生产基地上所得的收入，也要全部退赔，并从1961年算起。该县第三中学在教职员中也普遍搞退赔，共退赔了1000多斤粮食。这样就扩大了退赔面，有的村退赔户占三分之一，甚至半数以上。上述违反政策的做法，在干部思想上引起很大的混乱。有的说："当干部没有个好下场。这还是小四清，将来工作组大军压境，如何得了。"有些地方在改选时，谁也不愿意当干部，说："谁选我，我喊谁爹，到谁家磕头。"乳山县新当选的干部中，有的已经出走了。对于这种情况，县社队干部都不敢讲话。乳山县一个县委书记说："谁要是不认账，就是倒算。"在面上主持工作的同志，对《二十三条》不敢贯彻，有的向群众草草念了一遍，不敢讲解。有的说，减、缓、免的规定是适合于点上，不适于面上。

另据山东菏泽专区成武县文化馆某干部反映，他们机关的"五反"先从经济上进行清理，时间是从参加工作之日算起。凡

是经济上不清的，领导上都要求他们本着倾家荡产的精神，彻底退赔。该干部认为自己没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错误，但多吃多占的问题，十多年来还是不少的。如她妈妈到机关来，喝了开水没给水钱；1960年她下乡工作时，吃了生产队的瓜，当时队里不要钱，现在要兑现；她的孩子住医院时，向工会借的钱也要退赔。总计需要退赔的共约40多元。因为发工资的时间未到，她就把身上穿的毛衣、小袄脱下来交上去，还向别人借了30块钱，都交上去了。文化馆副馆长共计退赔衣物十多件，连身上穿的棉裤也退赔了，现在只穿一条小单裤。另外一个姓魏的把家当全部上交了，床上只剩下一片席，连茶缸子都上交了。其他单位退赔的实物也很多。仅财贸口在两天内即退赔自行车40辆、人民币773元、手表10块、布票700多尺、粮票200多斤，被子、箱子、衣服数百件。有些单位还用"参观"的名义进行搜查，凡是被怀疑的人，领导上就以"参观"为名，到这些同志家中去搜查，把箱子、柜子全部打开，什么都要检查一番。文教口已经用这种办法检查了两家。电影放映队在追查一个人的贪污问题时，整夜叫他写检查，因为他的钱和粮食都退赔了，白天未吃饭，晚上写检查时竟昏了过去，有人还说他是装死吓唬人。

不仅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而且在一些地区的"民主补课"中，不少群众因重划阶级而被拔高了阶级成分，受到错误的处理。由于中央对划分阶级的标准始终未作出统一的规定，因此，各地划阶级时普遍过严。例如，贵州省委认为，全省有一半以上的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重新划分阶级，并且审查社员成分，清洗一切混入人民公社内部的阶级敌人，甚至提出重新成立人民公社。对地主、富农，在政治上应彻底斗倒。对于清查出来的漏划地主、富农的房屋家具，依法没收。土地改革时划出来的地主、富农，应当没收而没有没收的房屋和家具，应重新没收。漏划地主、富农放的债一律废除。对有投机倒把、盗窃集

体财产等破坏活动的，应当老账、新账一齐算。对待富农，在政治上，与地主应稍有区别，但在经济上应当地主一同看待。同时，也指出，对不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和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分子，在查明情况的基础上，有多少清洗多少，不在处分干部控制比例数以内。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的首要分子和惯犯，不受时间的限制，政治上要彻底打垮，经济上要彻底清算。可以说，这些规定，比土地改革时还要严厉，而且对富农与地主基本上不加区分，这就使那些错划了成分的人受到了更严重的打击。

农村"四清"的严重"左"倾，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城市"四清"的开展。如上海市开展"四清"时，有些工作队由于对运动的性质、重点认识不明确，在斗争中面宽了一些。有的把干部一般性的缺点、错误，不加分析地提高到两条道路的问题上斗争。有些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过去已经交代并做了结论，也没有发现新的问题，这次又重新拿出来批判斗争。有的有怕漏不怕错的情绪，对一些犯错误的干部，已经做了检查和交代的，仍扭住不放。有的不适当地追查一般男女关系问题。有的在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斗争中，曾对一部分有小拿小摸行为的工人，当作重点来进行斗争。有少数单位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违反政策，有的单位忽视说理斗争，甚至发生打人、罚站、挂牌游行等现象。个别的还有擅自进行搜查吊赃，甚至用录音机录音诱供、监视、侦察等方法。有些单位为了追求数字，经济退赔不注意核实材料，而是靠毛估推算，追算的时间过远。[①]

大兵团作战，整训工作队，百万干部下乡蹲点，以及不断反右倾，一场"四清"革命高潮于1964年下半年在全国部分地区掀

---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7—98页。

起。运动的开展似乎异常顺利。应该说,刘少奇很好地贯彻了毛泽东关于搞“四清”的指示。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随着运动的开展,毛泽东对刘少奇挂帅“四清”以来的许多做法非常不满,进行了批评,并逐渐把“挖修根”的视线转移到中央上层。而刘少奇面对“四清”中暴露出来的大量严重问题,一再强调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要把矛盾都上升为敌我矛盾,并且把“挖修根”的重点放在了地富反坏的破坏和基层干部的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等问题。对工作中问题的不同看法,再加上其他复杂的个人因素,两位领导人产生了分歧,“四清”运动也因此发生了转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七章

转　　折

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

鉴于前段运动中出现了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的“左”的错误，1964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各地负责人在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时机，召集各中央局的领导干部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以总结前一段“四清”运动的经验教训，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会议本来计划并不很长，但是，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主要矛盾、运动的性质以及做法等问题上发生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了批评，会议也由此延长至一个月之久。这样，毛泽东与刘少奇由运动之始的配合默契转而走向分歧。

1964年12月15日下午3时半，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作主要发言。他在讲话中传达了会议的预定开法，并且提出了一些前一阶段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刘少奇指出，到底讨论一些什么问题，我现在也没有准备好，提点问题。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还有一个报告，现在印给大家了，那封信值得讨论一下。他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是用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

子？此外，王任重同志有一个讲话，还有封信给我，说县、区、社、队一齐搞，不一齐搞不行。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因此，是不是战线过长了？农村里面跟城市里面都一样，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那么，如何缩短？毛泽东插话说："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随后，刘少奇提出其他一些问题要大家讨论，并且说："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毛泽东说："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是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①] 可见，毛泽东是话中有话。在当天的会上，周恩来也作了反修报告。[②]

刘少奇讲话之后，会议从16日至19日接连召开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对前段运动中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各中央局负责人在会上作了发言。从发言的基本内容看，主要有两点：一是各中央局领导人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普遍过于严重，对大兵团作战搞"四清"不但支持，而且有所发挥。刘澜涛在17日下午的发言中指出，社教中心是夺取领导权问题。县以上烂掉和有严重问题的有50%以上，基本形式是滥用职权，包庇坏人、反革命，自己也有可能是反革命。根据白银厂经验，必须城乡配合，务必全歼！跟踪追击，长驱直入，城乡配合作战！[③] 李雪峰在18日下午的发言中也指出，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8个重点县委，已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66—1367页。

② 《杨尚昆日记》下，第462页。

③ 同上，第467—468页。

烂了3个,常委72人有问题的38人,张家口地委烂了,大队情况摸了一下,属夺权的有26个(山西)。河北永年县他所在队就要夺权!要抓社会主义革命!贯穿始终!深入到一切方面去!组织当年工分的清查,逐月算上去,是第一仗;然后就夺权,夺权之后边整、边建。"四清"之后,深挖穷追!围剿!严重的斗争,耐心地争取!争取不了就搬开![1] 18日,中南组的同志在讨论中认为,从广东的情况看,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不只三分之一。中山县的22个大队中,已经烂了和基本烂了的有11个,占50%;全省37个蹲点大队中,属于派进来的占20%,烂掉和基本上烂掉的占50%。公社一级已经烂掉的也不少于三分之一。广东的几个红旗单位,问题都很大。二是各地负责人讨论了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16日下午,陶铸在发言中指出,社教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为主?一般说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的,但敌我矛盾多了,突出了。用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比较好些。[2] 17日,东北组在讨论主要矛盾时,有的同志认为,从现在暴露出的问题看,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所以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从阶级上来认识这个问题,

---

① 《杨尚昆日记》下,第469—471页。

② 同上,第463页。实际上,在此之前,陶铸就提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解决内部的问题。所谓内部的问题,就是党内部的问题,政府内部的问题,干部内部的问题,群众团体内部的问题,工矿企业、经济组织和学校等方面的内部问题。他认为,以基层干部为代表的新的富裕农民阶层对广大贫、下中农所实行的剥削,他们的"四不清"与农民反对"四不清"的斗争,是今天农村存在的主要矛盾,也是我们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严重的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在今天农村的阶级斗争中,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的,而前者是大量的,只要我们把这个主要矛盾抓着了,运动就具有更广泛与深刻的阶级内容。刘少奇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主要矛盾问题,与陶铸写信向他反映有很大关系,而刘少奇在会上提出此观点时,陶铸明显是表示赞成的。

教育意义更大。但是,当前阶级斗争的焦点有新的表现形式,如干部的和平演变、蜕化变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也有的同志认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以基层干部为代表的富裕阶层与贫下中农的矛盾,这样提对干部震动很大,有好处。西北组在讨论时认为,当前农村的阶级矛盾,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坏干部同社员群众的矛盾,二是富裕阶层和劳苦阶层的矛盾,三是地富反坏分子同群众的矛盾。主要矛盾是坏干部同社员群众的矛盾。这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就是要把领导权从坏干部手里夺回来,有多少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就夺回多少。

12月19日下午3时半到6时半,工作会议大会由魏文伯、谭震林发言之后,宣布明天起,工作会议停开几天,再开时再通知。[①]

12月2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运动的性质和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毛泽东也做了长篇讲话,对刘少奇的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而刘少奇则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就引起了毛泽东强烈的不满和批评。

毛泽东先到会场,同已到的一些人谈笑风生,气氛没有什么异常。刘少奇来了,毛泽东要他主持会议,刘少奇执意不肯。毛泽东便要他先讲话。

刘少奇从蹲点问题讲起,谈到最近看到的几个材料。他说: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讲,还是怎样讲,就是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

① 《杨尚昆日记》下,第471页。

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回答：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他们头上，他们不好混，穷得要死。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毛泽东说："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又重复开头提出的问题问：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毛泽东回答说：还是讲当权派。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说：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去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希望。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刘少奇接着说：这些人有几种。一种是戴了帽子的地富反坏，当了权的。这没有问题，应该处分，不只是退赔，恐怕还要没

收。还有一种是过去漏划了的地富，过去就是坏分子，反革命分子，混进我们党里面来，当了权的。这也容易处理。还有一部分，原来是贫下中农，过去也曾经是革命的，土改过，后来和地富拉拢在一起，站到那边去，压迫群众。

毛泽东说：恐怕这是主要的。管你是劳动出身，还是漏划，总而言之是共产党，坏了的，就要整。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左右。我们过去就是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要多划，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实在拿不出来的，宽大处理算啦。

刘少奇说：只要退赔得好，改造得好，积极参加劳动，都不戴分子的帽子，改正错误，是团结对象。经济上也不要太挖苦了，要合情合理。

毛泽东说：有些大队根本没有地富，他那个地方身上没有虱子，一定要捉？但是现在是最有劲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一盆冷水下去，我又怕泼冷水。现在是盲目性，我们是盲目性，群众也是盲目性。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还要搞到明年什么时候，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再搞五个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部的腰，说牙膏不要挤干净，贪污分子也可以作团结对象。先搞豺狼，后搞狐狸。狐狸也搞，也是坦白从宽，惩办从严。这就抓到了问题。

刘少奇问：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陶铸说：赞成。

毛泽东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彭真说：主要矛盾是不是这样：总的提法，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还是我们七届二中全会提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是四不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主要整干部。整个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个整个的提法和这次运动的提法要分一下。这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一种形式。

刘澜涛也指出：整个过渡时期的矛盾，中央早就规定了，作为一般的教育，还是照中央的说法。具体到农村当前主要的矛盾究竟是哪个？矛盾很多，敌我矛盾也是各种各样的，就是要找最主要的。找的一部分是好的，新生的，变坏了；再一个是漏划的地富反坏，这些人现在一身二任，他是地富反坏，但是他取得了农民成分，以后又加入了共产党，这一部分人量相当大。

毛泽东说：一个新生，一个漏划，一个坏掉，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几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但是，刘少奇仍坚持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李葆华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说：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说：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人家贪污盗窃，你说他是社会主义？

刘少奇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陶铸插话说：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刘少奇还强调扎根串联，首先要找那个最老实的贫农。

毛泽东说：有那种老实的人，可是不能办了。

应该说，20日的常委扩大会议，气氛还较为缓和，毛泽东只是对刘少奇坚持主要矛盾的提法表示不满。而刘少奇对毛泽东提出的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赞成的，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称作一个派，人数就太多了。但刘少奇并没有直接反对毛泽东的提法。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回答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的提问时说："《二十三条》中间的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从会议发言的内容看，刘少奇并没有公开反对毛泽东的提法，只是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胡乔木于1980年7月8日在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问题时说："毛主席1970年对斯诺的谈话，是在世界上发表的。毛主席说，1965年1月，刘少奇反对'走资派'的提法。其实，刘少奇没有直接反对，只是说，有两类矛盾的交叉。像这样的问题，不讲不清楚，但都讲又太繁了。"[①]但是，在随后的几天里，毛泽东逐渐加重了对刘少奇批评的分量，发言的气氛也与20日的常委会大不相同。

这次会议不久，恰逢毛泽东生日。应该说，建国后，毛泽东从不公开为自己过生日，但这次提出要请大家吃饭，在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举行，并亲自审定了请客名单。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出席宴会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参加三届人大的一些劳动模范和科学家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共

①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05页。

40多人。宴席共分三桌，毛泽东坐在按品字形摆的三张桌子上方那张的首席，左右两边是陈永贵和董家耕，陈、董旁边是钱学森、邢燕子，这桌还坐了陶铸、罗瑞卿、谢富治、汪东兴和曾志。而刘少奇、胡耀邦和各大区书记以及江青则分坐另外两桌。一到会场毛泽东就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接着他又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刚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

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啰，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基层生活。官做大了，骄娇二气，拒绝到农村，城市里生活舒适，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李讷呢，下去搞四清吗，她没有资格来。并说：我要坐在群众这一边。他递烟后继续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毛泽东大声地赞扬钱学森，说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随后，他还陆续批评了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

义的。

据参加宴会的曾志回忆，毛泽东在入席前，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曾志认为，主席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并相信这绝不是批评李富春。吃饭过程中，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曾志说，时间久远了，已记不全主席谈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同志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而一年多后，1966 年，终于爆发了旨在打倒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散席后，毛泽东向钱学森和陈永贵介绍曾志说："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①] 据薄一波回忆："席间鸦雀无声。"[②]

当晚，刘少奇在与东北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谈话时指出：有什么反什么，有右就反右，"左"还没有出来就慢一点反，出来"左"就准备反"左"。什么地方出来就在什么地方反，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反右要在具体的问题上反，否则是抽象的。而在前一天晚上，刘少奇与华东组同志谈话时说：越革越多不好。标准是本人剥削收入占家庭收入 50% 以上，并且连续三年以上。也不一定都戴，只戴其中最坏的。只要坦白得好，改得好，彻底退赔，也可以不戴。做法问题，擒贼先擒王。要搞县、区、公社，先从头上整起来，大队就好办了。不搞上面，大队就难办。不从这里搞起，只搞大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总之，无论如

①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第 433 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1167 页。

何农村不能整社员，下厂不能整工人，学校不能整学生。主要是整当权派。很显然，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刘少奇已逐渐改变了自己的一些认识和看法，与毛泽东的想法靠拢。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停止对刘少奇的批评。

12月27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大会，毛泽东主持，由朱德、董必武、陆定一、赛福鼎、陈伯达等发言。朱德在发言中认为，所有的事情，都要按主席的一分为二的精神去办。对基层政权也要一分为二，有好的有坏的。当权派，点上摸的情况是好的不多，应该还是好的多。有计划地搞，时间长一些是能够搞好的。陆定一在发言中，主要谈了文化革命问题。他认为，苏联集体化后，斯大林就提出阶级消灭了，和谐了，上下也没有矛盾了。把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的赎买，变为高工资制度，按劳付酬，对技术干部的培养，是"技术决定一切"，就是培养了一批高薪阶层、特殊阶层！三大差别不是逐渐接近，而是继续扩大！毛泽东插话说："列宁说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小生产者大量存在会发展资本主义。打倒了的阶级长期存在！这些斯大林都去掉了！达于极点就出了赫鲁晓夫！出差补助问题，是否可以取消？要研究一下。文学稿费可以繁荣文学？我们的稿费高了，走向反面了！"陆定一讲：各种稿费应当取消一些！糖衣炮弹！花了钱，培养一批资产阶级分子！学校中阶级斗争也很严重！毛泽东插话说："一抓就得了！有什么要紧嘛！小学教师也严重不纯啊！"①

而在这次会上，陈伯达的发言与众不同，由于他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意，便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为基调，并从理论上加以发挥。他说：四清与四不清不能说明问题的性质，封建社会就有清官和贪官的问题。其实封建时代的清官，实际上是假

① 《杨尚昆日记》下，第477页。

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阶级内容，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所谓清官，那些清官都是大财阀。

毛泽东插话说：清朝刘锷的《老残游记》中说，清官害人比贪官害人还厉害。后来一查，南北朝史中的魏史就有此说。

陈伯达讲：内部矛盾那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外有党，国民党也有这个问题。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这也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要把矛盾的性质说清楚，不然就要迷失方向。要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就有了纲啦。

毛泽东说：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

陈伯达讲：有一种人，不管大官、小官、芝麻大的官，到群众中自己觉得无限大，是首长，很神气，总有架子。要放下架子，以平等态度对人，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所以取消架子很不容易。不注意可不行呀！许多人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的，忘了本，忘了自己是从老百姓来的。我这个人不参加革命，顶多不过是个小学教员、中学教员而已。

毛泽东说：你不是大学教授嘛！大官是从小官来的，小官是从老百姓中来的。还是老百姓嘛！蒋委员长不姓蒋，姓郑，叫郑三发子，河南人氏。只知有母，不知有父，还不是老百姓变的。

陈伯达讲：我们职务高了，放下架子不易，要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到群众中去。主席常说不要自以为是。毛泽东说：自以为是，就是形而上学！自以为是，而不自以为不是！开会是什么？就是因为有不同意见嘛！有些人读书太多了，读蠢了，孔夫子不是说过吗？不必读书然后为学。最后，毛泽东还讲：从秦始皇开始，帝王就世袭了！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

据薄一波回忆，陈伯达这个发言，受到毛主席的欣赏。后

来，毛主席修改《二十三条》时，特别把这个意思写了进去。原来制定的《十七条》的停发，也是由陈伯达建议的。很显然，陈伯达的发言和建议在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已发生的分歧中，起了不良的加剧作用。①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即 1967 年 2 月 6 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也批评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不是你个人有事，你从来不找我。②

12 月 28 日下午，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后，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并且是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的。毛泽东说：

> 文件行不行，第一条性质的规定行不行？三种提法好不好？商量过还是以第三种提法为好。因为运动就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不是前两种的运动！北戴河到十中全会就是搞社会主义，当时单干风很大。
>
> 有的人听进去了，有的人听了不表态，没有主张，不能回答问题。当时我得到电话，说有重要问题要报告，没有一个地方同志说形势好，只有几个军队同志说形势好，如杨得志、许世友、罗瑞卿、韩先楚等，问过是否可以在上海讲话。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不敢说话咧！5 月在上海说形势不好，6 月到了山东，小谭（指谭启龙）他们说形势好，为什么是一个月就变了呢？原因是 6 月麦子已割了。北戴河我为什么说形势呢？当时有人说恢复要七八年！我讲了阶级、阶级斗争。常委同志和各大区同志都认为可以这样写。陈毅同志就是当权派。只要你搞社会主义，当权派还可以当下去。

---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1169 页。

②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5 页。

此外就是16条，工作态度，要讲点民主咧！天天是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些同志要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了！比如军队就是三大民主，遇到堡垒打不开，就找士兵开会嘛！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就是要管伙食嘛！现在是不是还叫事务长咧？

好话是爱听的，不成问题，问题是坏话。七千人大会时我讲过几句话，叫做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老子就偏要摸。后来改了，认为不大文明！我们这些人就不好摸，疮疤不易揭！正确、对的，批评错了不要紧，有什么问题呢？错了责任在他。批评错了，他错嘛，为什么不能听咧！听反对的话不容易，要把话讲完也不容易，是水多米少，稀饭，不大容易，我就受过这个灾难，因此我就深有感觉。有人同我说了两个钟头，不着边际。也有人专门训人的，不是对话式，而是长篇大论地讲，滴水都泼不进去。宣传、鼓动不是有区别吗？做学术报告是宣传，动员起来只讲一件事是鼓动！我主张不鼓掌，不爱听允许打瞌睡，保养精神，免此一灾！这就整了教员。我还主张看小说。也许是先生的毛病，也许是我的毛病。看小说、打瞌睡（我就是一点发明），这就整到教员。训话式而不是对话式。总理报告，我认为讲几句就行，后来因很多人不识字，只好全读。

在同志间不要使人怕，对敌人则要使他怕！同志间使人怕，就有鬼！人家怕大概是你有另外的办法，如军队中有打骂、坐禁闭，就使人家怕！逃兵捉回来要枪毙，我就主张不捉，更不能枪毙！如果捉回来就请吃饭、吃肉，认自己错，你留则留，不留则再走，逃到外国去的少，不要紧，中国人多嘛！逃兵无非是骂，骂也不要紧。赫（指赫鲁晓夫）不是中国人，他也骂！外交系统逃了人，斗争是要的，但逃了也不要紧！吃你些面包，我可以减少粮食。

我只讲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头一条性质问题，一个是第十六条工作态度问题。如果还有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文件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譬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譬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会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下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谭震林说的那么多集团，太分细了可能出毛病！我是主张游行示威的，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游行示威的。真正的官僚主义者压迫之下，群众忍不住，要游行示威，我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以整我们的官僚主义。1957年成都等地要到北京来，中途被搁，我就不赞成！反动分子要游行示威，只能暴露自己。反对官僚主义嘛！有好处！胆子那么小，怕人游行示威！怕写标语！结果都证明，凡游行示威了的地方，那个学校就搞得比较好一些。总而言之，坏人要闹事，越闹得大越好，闹小了不好，闹小了我们不警惕，不能暴露他。现在反革命

他不闹了，他可聪明了。[1]

最后他问大家："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一个官僚主义者。"[2]

当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表情十分严肃。在座的许多人都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毛泽东是对谁讲的。实际上，毛泽东是有所指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邓小平考虑到这次会议是一般性质的工作会议，曾向毛泽东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在这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由于刘少奇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准备讲的话比较长，毛泽东只讲了个开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泽东非常不满，所以特意拿了两本书到会，并且在讲话中发了脾气。[3]

按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一天闭会了，与会的省委书记也都陆续返回了。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会后江青请曾志和陶铸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在休息室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曾志和陶铸，其实已隐约感觉到了，毛泽东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就是指刘少奇，但是他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陶铸说："有的走了。"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观看《红灯记》时，江青对陶铸说："有人反对京剧改革，我就是要搞京剧改革！"又是一个"有人"！但这又是指谁呢？曾志和陶铸都不

---

① 《杨尚昆日记》下，第480—48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75页。

③ 金冲及、黄峥主编：《刘少奇传》下，第970页。

敢去多想。[①]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来了。中央工作会议又在1965年元旦以后继续召开。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在同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责前一阶段运动在领导上的问题，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

在这次会上，一些负责人汇报了运动开展的情况。当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到保定地区新城县的试点情况时，毛泽东打断说：

> 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二十几岁的大学生，光是学文件怎么学得进去？有成绩没有？那个文件，一天就读完了。第二天议，议一个星期就下去。在农村里去学嘛，向贫下中农去学嘛。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子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去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联，什么扎根串联！冷冷清清。我们从前革命不是这样革的。一两万人，搞一个小县，倾盆大雨，几个月搞不起来。我看，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来

①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第431—432页。

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除了漏划的地富，投机倒把分子，和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外，开门见山，交代一句。什么小偷小摸，通通赦免了。向社员说明，你们之间有什么要说的，你们自己去谈，我们不听你们谈。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群众批准，拉倒！你只有这么一点嘛，吃掉了，拉成大粪了，讲出来，群众会放你过关。讲出来没事，不讲就有点事了，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我看进村个把月就可以开大会。在县上开。一个小队来个队长、来两个贫下中农代表，大队来个大队长、支部书记，公社来个社长、党委书记。话不要讲长，半个钟头就够了。

毛泽东问陶铸，你们不是开过万人大会吗？湘乡就开过万人大会。你冷冷清清依靠工作队，几个月搞不开。工作队有些人是做官的，没有经验，不会做群众工作的是大多数。通县塞了两万多人。搞了一年多，搞不开。这样搞法，我看要一百年。在通县的，据说教授不如助教，助教不如学生，书读得越多就越蠢。扎根串联，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一个县，一两万干部。不依靠群众，几个月群众起不来，搞不开，我看方法要改。贫下中农开会，通通去，包括漏划的地富在内。宣布几条。不要照双十条一条一条那么去念。

毛泽东接着说：干部会、贫下中农会可以在大队开。湖南开了贫下中农大会，粮食就增加了二十多亿斤！冷清地访贫问苦，看不出好人，真正的好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不要冷冷清

清地去扎根，不要有一点毛病就不要！硬找，越找越少，越找越难！越发动不起来，越窄！

有人讲：扎根串联能找到真正可依靠的贫下中农，开会就更好。毛泽东说：你扎，扎到里头去了。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刘子厚同志插话说：我们开始扎了一下根。毛泽东继续说：你怎么扎法？怎么串联？你去发展他嘛，去搞群众运动嘛，去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嘛。群众要什么，你就搞什么。在斗争中他们会选出自己的领袖来。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则清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没有虱子能够找出虱子来？学四十多天文件，搞繁琐哲学。我历来反对这样学。我看这是个迷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三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

周恩来讲：刚才陈毅同志说，张茜学了两个月才进村。毛泽东批评道：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我历来反对学文件，一个文件几个钟头就看完了，要再学，你带下去学嘛。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联，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第二个十条太长了，太繁了。书太厚就没有人读。文章太长就没有人看。不要搞繁琐哲学。

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说："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我们一些大干部，如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蹲在一个小队、大队，太长了不一定有利。至少要着眼一个县，还有你的全省嘛，全局嘛。蹲点的经验并不一定全面。现在蹲下去了，是好的。现在要慢慢上来管广一些。这也是可以搞快

一些的方法。陷到里面出不来,就不好了。"[1] 1月5日下午毛泽东继续对"四清"运动的一些做法进行了批评,他说:第二个十条太长,学了40天,自己记不得,再改时,要砍掉一半,留下要点,简明扼要。这又不是著书立说,搞理论。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六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问题是工作队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上千元的只有四人,没有第五个人嘛!我没有什么讲了,就是因为王光美讲新城县那么多人,搞不开,她去了才搞开。通县也搞不开。我的娃娃在那里搞四清,讲教授比助教差一点,助教比学生差一点。读书越多越蠢。这些人不但不搞四清,还阻碍四清。越搞细越搞不开。

当陶铸问:这次革命是否还是要三结合。毛泽东说:不能越搞越不信任这些人了。四种人不论哪一种人,就是烂掉的,也要区别对待。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但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28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当陶铸谈到形势的新特点时,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77页。

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明太祖也搞过，他搞扩大化了。

1月13日下午3时半，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共17人。刘少奇是中共党内享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之一。开这样的生活会，会议参加者深受感动。王任重当天日记的标题就是"难忘的一天"。他写道："党的领袖和他们领导下的干部在一起开党的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在全世界党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①]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严厉批评，也使党内不少人感到忧心忡忡。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找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②]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以后，又在自己家里连续举行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对自己的批评和帮助，刘少奇对大家的发言作了记录，并委托陈伯达把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尽管刘少奇作了这些努力，但并未奏效。

不论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走向，还是对毛泽东晚年生涯以及刘少奇的个人命运而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它实际上成为毛泽东对刘少奇失去信任的转折点，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刘少奇的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79页。

② 金冲及、黄峥主编：《刘少奇传》下，第973页。

一条罪状。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建议的；再嘛，又过于信任别人，引起我警惕，还是《二十三条》那时候。"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回答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提问的"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说道："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的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①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一线工作虽然还是由刘少奇主持，但是，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想法和部署，却是由江青等人背着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另外的渠道和方法进行。一年半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同时，也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对刘少奇挂帅"四清"的一系列做法的批评，也产生了另一个结果，就是《二十三条》的制定，这对后来的"四清"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十三条》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由于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主要矛盾和运动性质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从而使会议变得复杂起来。在各组讨论基础上形成的会议纪要也几经反复，做了重要修改，最终，会议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形成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的制定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曲折的过程。1964年12月23日，会议形成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未定稿)，共16条，即运动性质、统一提法、工作方

① 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05页。

法、抓全面、时间、宣布对隐瞒土地的政策、财贸部门的工作要同四清运动结合、工作队成员、集团问题、给出路、"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生产队规模、干部任期、监督问题、四大民主、工作态度。24日,各组就16条进行分组讨论,形成了《十六条》第二稿。文件的题目定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题下括号内写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纪要,未定稿,请同志们提意见,以备修改"。当晚10时,陈伯达向毛泽东报送了这个文件,并附言:请主席审阅!是否照这个改稿印发,请批示!毛泽东于11时批示:照办。27日,这个文件做了小的修改,最后加上了一个第十七条:上述各条,原则上也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题目改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括号内的文字改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纪要。同时送毛泽东审阅,当日毛泽东将括号内的文字改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将所署时间"十二月二十四日"改为"十二月二十七日",删掉"二稿"两个字,并在题目上方批示:照发。28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4]811号文件印发了这个纪要,由彭真批示:印发。但是,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关于停发[64]811号文件的通知,说纪要"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同日,毛泽东批示:照改的(第二页倒数三行)文字,重印。请少奇同志阅后交机要室办。这是伯达同志建议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则请交办。中共中央以中发[64]815号文件于当日印发了这个经过修改的纪要。

1965年1月,中央继续开会讨论并修改这个纪要。1月6日,发排稿改动相当大,成为24条,加上了形势、搞好运动的标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蹲点、干部问题、建立贫农下中农协会、思想方法等七条。7日又大改一次,印出修改草稿。8日改一次,晚19时,邓小平送毛泽东说:这是集体改过的,送上请看看。彭、伯达和我三人拟今晚到你处谈谈,如何,请通知我们。毛泽

东对1月8日稿作了重要修改。在运动性质一条中,加上了一段话:"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在"统一提法"一条中,加上了"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11日下午3时,陈伯达写信给毛泽东说:"根据各组讨论的意见,十日作了一次修改,划在八日的稿上面。小平同志嘱送审阅,并请考虑,晚上是否要我们三个人谈话。"这次修改,删去了"集团问题"一条,定为23条。12日又改一次,毛泽东在"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民兵工作,各方面都有所前进"一句中,于"卫生"后加上了"公安"二字。1月14日,彭真送毛泽东审阅后,正式发出。

《二十三条》纠正了《后十条》修正案以及前一阶段"四清"运动中一些过"左"的做法,规定了一些有利于运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方法和政策,主要表现在:

第一,关于运动的方式方法问题。虽然文件仍提出"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但也作出明确规定,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提出要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这就改变了由工作队包办运动的做法,也改变了首先团结95%的群众,然后团结95%的干部的提法。文件规定,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他们。工作队必须在运动和斗争过程中,发动贫下中农,组织阶级队伍,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形成领导核心,同他们一道工作。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在运动中,要

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不要像小脚女人，不要束手束脚。同时，也要深入细致，不要大轰大嗡，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等，这些规定，纠正了前段运动中大兵团作战、扎根串联、搞神秘主义等做法。

第二，关于干部问题。规定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看待干部，对他们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肯定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的政策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对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对于那些错误性质一时分辨不清楚又不适宜留在原工作岗位上的干部，可以调换工作，或者集训，进行审查。对于经济退赔问题，文件也规定，不能马马虎虎，同时要合情合理。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过群众同意，退赔可以减、缓、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的错误。同时，文件也对工作队成员做了规定，提出不一定要十分干净，犯过错误的，也可以参加。一方面便于教育改造他们；另一方面，他们有些人可能熟悉内情，对工作有好处。从而纠正了前段运动中强调的工作队员一定要严格挑选和审查，凡是有毛病的都不能参加的规定。

第三，关于搞好运动的标准。明确规定了搞好运动的六条标准，即：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

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①] 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

第四，关于工作态度和思想方法。文件规定，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别人把自己的话说完。在思想方法上，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无论什么事情，都必须加以分析。把什么事清都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是形而上学。罗列一大堆表面现象，拼凑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条文，使人得不到要领，是繁琐哲学。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繁琐哲学。

第五，关于"四清"和生产建设的关系问题，文件指出，"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拿一个县来说，在"四清"中，"四清"后，要逐步把党的领导核心搞好，逐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工具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逐步建设好一个社会主义的县，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各方面都有所前进。文件还强调，现在进行"四清"运动重点以外的面，占全国的绝大部分。这些地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建设，必须认真做好。在运

---

① 《后十条》修正案中有"彻底"二字，此处删掉了。1965年1月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运动要达到什么目的？问题是"彻底"二字。能不能要求那么彻底？恐怕不能那么彻底。彻底不能要求过分，过分强调彻底反而不彻底。毛泽东说，搞过分了群众不一定赞成。运动结果不是那么太彻底，也就可以快一些。彭真也认为，现在讲"四清"和杭州会议讲的"四清"内容不同了，现在是政治、经济、组织、思想。思想"四不清"包括马列主义、宇宙观等问题，要好多年。《二十三条》中"四清"的标准中有一条叫"四清"彻底了没有，这次请示主席，把彻底二字勾掉了。思想怎么能一下子搞得那么彻底？要搞一百年、几百年，一次搞那么彻底，以后还干什么？

动中,要自始至终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分配。

第六,其他方面。如对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要给出路,要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帮助他们重新做人;基层干部要按《六十条》的规定,定期进行民主选举;干部要有上下监督,主要是群众监督;所有社队,都要学习人民解放军,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领导干部必须有选择、有计划地继续蹲点,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等等。

同时,《二十三条》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又发展了以前的"左"的观点,使阶级斗争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了,因而,这一文件也存在严重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城乡阶级斗争形势仍然做出十分过"左"的估计,认为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文件指出,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领导权。

第二,把运动的性质定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认为这样的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调在工作中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应该说,文件对运动性质的界定是错误的。否定前两种提法,只强调"四清"运动所要解决的矛盾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样就很容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第三,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那些"走资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

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上面的，有社、区、县、地甚至有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① 这样就使运动的对象由抽象到具体，由党外到党内，由基层到中央。这就为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把斗争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从基层支部书记直至国家主席，提供了理论根据，是继八届十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进一步升级，是一种更"左"的错误观点。

第四，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大四清"的概念，即由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小四清"发展到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大四清"。"小四清"最初是河北省保定地委在整风整社过程中提出来的，主要是指经济方面的"四不清"问题，并把"四清"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阶段。后来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揭露出来大量的"四不清"问题，"四清"的内容也发生变化。王光美在桃园经验中指出，现在我们的"四清"内容，已经不是保定地委原来提的那样，清工、清账、清财、清物，现在是政治上的"四不清"、经济上的"四不清"、思想上的"四不清"、组织上的"四不清"，反正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事情都要清。② 1964 年 9 月 2 日，刘子厚在致刘少奇的信中，提出了政治"四不清"和组织"四不清"。政治"四不清"(包括了思想问题，也可称为政治思想"四不清")即敌我界限不清，两条道路不清，阶级路

---

① 据邓力群回忆，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起了很好的作用。讲农村的走资派各级都有后台，原来的稿子写中央也有后台。周恩来说，中央都有后台，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吧，改成中央各部门也有后台。参阅林蕴晖、刘勇、史柏年主编：《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00 页。

②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二室编：《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选编》第 5 册，第 430 页。

线不清，专政对象不清。组织“四不清”，即出身成分不清，政治历史不清，入党问题不清，组织处理不清。1964年11月15日，王任重同志在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这一次运动的中心内容就是“四清”，包括经济、政治、思想、组织四个方面，都要彻底搞清。[1] 对此，中央发出指示，认为王任重的讲话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发表一些很好的意见，例如，对“四清”的提法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机关的社会主义教育也叫“四清”，不再叫“五反”等。[2] 12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不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因此，《二十三条》正式作出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大四清”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四清”的范围比以前更加广泛了，它实际上也是阶级斗争不断人为激化的产物，从而使运动中“左”的倾向并没因《二十三条》的颁布而扭转，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

1965年1月14日，中央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发出了这一文件，并规定：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要求上述各单位把“这个文件发至县、团以上党委和工作团、队党委”[3]。20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二十三条〉的通知》。《通知》要求，在点上和面上都进行一次广泛的宣传。在点上传达到全体工作队员，并要他们遵照执行，然后向所有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在面上由公社党委和支

---

①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794页。

② 同上，第783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第18页。

部向全体党员和党内外干部传达，同时，向贫下中农及其他群众传达。通过这次宣传，使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和其他群众得到支持和鼓舞，使得干部和工作队员得到教育和提高，并且会起安定人心的作用，和使极少数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更加孤立。这样，也就能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使今年的生产建设搞得更好。并要求把这个文件印成布告，分送各省、市、区党委，发给农村的每一个支部和大队在室内张贴起来，让一切人都来看。在城市的一切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支部和军队的连队也都在室内张贴起来。[①] 随后，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张贴和印发〈二十三条〉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规定，张贴的《二十三条》不要让外国人观看，也不要让人照相，如有人抄录不必阻止；城市工厂、商店、学校、街道没有党的支部的，可由基层党委或总支选适当地点张贴；少数民族文字是否印大张张贴，由各地根据汉文式样自行印发；为了便于教育干部和向群众宣传，各省、市、区党委和中央各部门可根据实际需要，印成小册子，发给基层干部和机关干部，但是不能公开发售。[②]

中央通知下发后，各地党组织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以保证《二十三条》大布告能和广大干部和群众及时见面。一些地区还出现了群众迫不及待等着阅读的场面。如河北青龙县采取三等的办法，即区里派人到县里等，公社派人到区里等，大队派人到公社等，接到《二十三条》后，连夜分发。山西浑源县事先组织了250多名干部，抽调了六辆汽车，一接到大布告，即分兵六路，到各生产队张贴宣传。宁晋县柏房大队13名贫下中农代表和十名干部在大队办公室等了一夜没睡觉，布告一来，天还没亮，很多社员就挤满了办公室。许多基层党组织为迎接大布告，把

---

① 中共中央党校机要处编：《中共中央文件》1965年第1册。

② 中共中央党校机要处编：《中共中央文件》1965年第2册。

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有的确定专人负责张贴管理。山西的群众说,党中央政治局的文件能贴在咱村的墙上,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没有见过的大事,一定要念会记牢。并要求把大字布告镶上镜框,挂在保险的地方,保存一辈子。

为更好地宣传和贯彻《二十三条》,从而指导全国城乡正在开展的"四清"运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从1月21日到5月4日,先后在中央各部门在京"四清"蹲点的领导干部会议、中共北京市委扩大会议、通县"四清"地区广播大会、通县"四清"地区四级干部会议、市委农村"四清"工作座谈会议和两次农村"四清"分团书记会议上,作了六次讲话,对《二十三条》的有关精神做了具体的解释和宣传,对全国其他地区学习和贯彻《二十三条》起了重要的作用。彭真宣讲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严重不严重?彭真指出,根据各个工作队、贫下中农和一些干部所揭发的材料看,阶级斗争的情况是尖锐的、严重的。这么一些干部搞四不清,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混进我们的队伍里来了,有些还当了干部,有些坏的干部和他们勾结起来,搞四不清,这还能说不严重?应该说阶级斗争形势是严重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严重的。当然,这一些人在我们的干部中,只占极少数,我们绝大多数干部还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好的,或者经过教育、帮助是可以改好的。坏的干部混进来的,变坏了的,只是极少数。就北京郊区而言,绝大多数干部没有闹单干,搞长途贩运、投机倒把的人也极少。从1961年到去年,每年增产2亿斤粮食,增产百分之十几。此外,蔬菜、水果、猪、各种山货等等,这几年都大增产。这些成绩,也证明我们县、社、队的多数干部是好的,也证明他们多数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当然有毛病,特别是有些人毛病还很严重,但这是少数,是极少数,没有这个估计,运动中就会迷失方向,把自己搞糊

涂了。

第二，运动的性质是什么？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一个纲。一切问题都要以这个为纲，不要让别的东西冲淡、干扰甚至转移运动的目标，要紧紧抓住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不要让那些小是小非，或者其他的问题干扰我们。小是小非要不要解决，让他们个别谈话解决。我们派这么多人下去，是要解决两条道路斗争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别的出点小问题不要紧。因此，不管是谁，不管老干部、新干部，不管老党员、新党员，不管你过去有多大的功劳，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反对谁，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就要失败。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错误的就赶快改，赶快回头，回头是岸，改了，是有出路的。你不改，我们就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你斗。我们几亿人口，在党的领导下，以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为骨干，反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把不明白的人教育明白。我们就不信，斗不倒你。

第三，怎样依靠干部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不是以前所有工作队都是这样做的，有这样做的，有不少不是这样做的。不分好坏，把原来的党委，不管干部如何，没有调查研究就放在一边，是不对的。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怎样三结合？就是实行群众路线，也就是主席讲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依靠群众，首先依靠贫下中农。中农是真正热心集体经济、热心集体劳动的革命分子，也可以依靠。然后把整个农村的群众教育过来，觉悟提高，慢慢地就可以依靠95%了。依靠干部大多数，首先依靠那些没有四不清问题，或者有也比较轻微的干部。就是说首先依靠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干部。有的干

部问题比较多，要帮助他检讨、交代，改正错误，该退赔的退赔。这样，一步一步地做到依靠干部大多数，依靠95%以上的干部。有了群众大多数，有了干部大多数，我们的一切事情就容易办了。有几个人搞资本主义，有那么几个反面教员，我们经常跟他斗争，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第四，有错就改，一切有错误的人都必须改。县级干部也好，社、队干部也好，市一级干部也好，工作队干部也好，不管是谁，一切有错的人，都必须改。必须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那种以为自己总是一贯正确，有了错误还把错误说成是正确的人，不仅思想方法不对，党性也不纯。干部四不清那不行，绝对不行，政治四不清、经济四不清、组织四不清、思想四不清都必须搞清。该退赔的应该退赔。实在退不起的，给大家出个主意，多打粮食，多搞副业，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用这个来弥补损失，搞个积极方式。工作队这一段工作，出了一些毛病，出了一些错误、缺点。有的是把人斗错了，有的斗争方式上错了。打人啦，熬鹰啦。但这并不能否定成绩是主要的，绝大多数工作队是好的，绝大多数的工作队员是好的。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了。错误也不可能不犯，一点错误都没有，就没有一点教训，就印象不深。群众在运动中会不会一点错误都不犯？不可能。干部在群众运动中都犯错误，难道说群众在运动中就一点错误都不犯？那不合乎实际。会有点错误，一般群众也好，贫下中农群众也好，有了错误，也要改。贫下中农也好，别人也好，都不许打人，严禁动手打人或其他体罚。动不动就动手打人，这是封建性的、野蛮的，不是好东西。但是，对贫下中农，不管有什么错误，不要去追。

第五，学校、工厂的运动怎么搞？现在学校中可是很紧张，特别是中学，这些娃娃们要斗，要罢考、罢课、闹革命，人小，帽子满大，抓住人就斗。这个问题要刹住，停下来，总结经验，搞教

学。教职员和学生中有出身和历史问题,出身成分隐瞒的,讲清楚就算了,我们不搞唯成分论。要讲唯成分论的话,马克思出身不好,恩格斯出身不好,自己还当了厂长。列宁也不是好出身。解放前的大学教授成分好的有几个?和国民党没关系的有几个?清理一下钓鱼台、宣传部、文化部,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有几个成分好的?学校不要搞唯成分论。知识分子中不要划阶级,让他自己填,有点不实也不是最要紧的。一切人都要看表现。工厂和学校一样,搞大是大非问题,搞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工厂划一头,就是主席讲的把敌人划出来,把反动党团骨干、地富反坏划出来,划出来后也要区别对待,只要老实交代,没有破坏活动的,不是敌人的特务,还要留在工厂工作。工厂每个人都去查清历史干什么?那有多大的工作量!每个人都划,是搞繁琐哲学,把人都累死,没有必要。

第六,生产问题。生产极为重要,生产搞不好,别的工作都搞好也不行。生产搞不好,还有什么大好形势!生产千万耽误不得,生产耽误了,什么政权也好,都要完蛋的,不完蛋也要完蛋一半。所有社队干部、工作队要抓紧领导生产运动。不管什么人,如借这个机会,不管用什么方式,破坏生产,影响生产,使生产搞不好,是要追究责任的。破坏生产,就是破坏我们整个事业,非追究责任不可。"四清"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革命干什么?无非是解放生产力。你"四清"搞得很漂亮,结果生产掉下来了,你革命表现在哪里?现在工作队的中心任务是抓生产,一切工作要在生产上表现出来。从理论上讲,没有取得政权时,我们天天闹革命,那时是不大注意生产的。现在,我们是7.3亿人口的国家,取得了政权,如果还只管阶级斗争,还不搞生产,不搞科学实验,不能说这是觉悟高,这是觉悟低。人的生产力第一,这个关系搞不好,天王老子来了,生产也搞不好。因此,要把生产队、贫协、干部、下台干部的关系搞好。大家都是同

志，谈谈心，交交心，谁有疙瘩谁解开，谁也不要有负担，谁有话都可以讲，都一般高。大家拧成一股绳，一股劲，谁对了就坚持，谁错了就改。

彭真的上述讲话，除个别观点仍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内容外，大部分观点都是正确的，也十分精彩，因而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1965年2月25日，北京市委向中央报送了《关于通县试点地区四清运动最近情况的报告》，全面报告了市委贯彻《二十三条》精神，通县"四清"地区11万人的广播大会和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会议的情况，还报告了以后继续贯彻落实《二十三条》的安排。3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农村"四清"运动问题。彭真联系通县"四清"问题发言说：工作队到一个村，要先调研，弄清问题。现在比较多的是一去就说那里烂掉了，似乎那里缺点越多，工作队成绩越大。搞完了，他就走了。现在这样很危险。我们党搞了这么一个大事业，"四清"要挖资本主义根子，但是要肯定我们党基本上是好的。要肯定全党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邓小平插话说，现在这样一转，按《二十三条》搞，80%的解放出来。北京通县转得比较自然，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书记处会议后，中共中央于3月4日作出批示：现将北京市委《关于通县试点地区四清运动最近情况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同时，刘少奇、邓小平把彭真在通县"四清"地区广播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转发全国各地。[①]

这一时期，全国其他"四清"地区的中心任务就是宣讲《二十三条》。从宣讲的方法看，一般采取了作辅导报告、小组讨论、解答问题等手段。如河北省石家庄动力厂工作队在宣讲《二十三条》时，就经过了四个步骤，即：初讲，把《二十三条》初步交给群

① 赵有福：《彭真与京郊农村"社教"运动》，载李海文主编：《彭真市长》，中共党史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68页。

众准备，工作队进厂后，分头深入各车间劳动，了解职工的思想动向，并由工作队的一名同志试讲，请群众提意见；宣讲，把一些重点问题突出解释，针对活思想，有的放矢地作解释，对于一些不易懂的词句，尽量通俗化；议论，在小组议论中不出题目，不划框框，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及时掌握动态，积极引导，注意和发现培养新的积极分子，使他们成为小组议论的骨干力量；解答，对群众的提出的一些问题，如不理解条文、思想问题等，要进行解答。从宣讲的内容看，主要集中于形势、运动的性质、干部问题、工作方法、搞好运动的标准以及生产等问题。

经过学习、宣讲和讨论，《二十三条》在工作队、基层干部、贫下中农、工人、高校教师等各个阶层引起了不同的反映。从各地汇报的材料看，“四清”工作队员经过学习讨论《二十三条》后认为，《二十三条》更明确、更切合实际、更完善了，越学越心明眼亮。有的同志称《二十三条》是及时雨，感到中央对下情摸得透、抓得准，有了这个纪要，在工作上少走弯路，少犯不少错误。有的同志说：“这《二十三条》一贯彻，四清革命运动将更加健康、深入地发展。”有的认为“《二十三条》是两年来特别是几个月来社教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一个纲领性文件”。

许多工作队在学习《二十三条》的基础上，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对前段运动进行了检查。检查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普遍认为，前段运动对阶级斗争形势缺乏全面的认识，对形势的看法是一团黑，只说坏，不说好。如石家庄马平分团后营某工作队队长说：“过去把赵县看得一团漆黑，看见哪里也不顺眼，这是错误的。”甘肃省委在传达讨论《二十三条》时认为，“对形势看得偏了一些，深入群众以后，看到了敌情严重这一面，但看得过于严重了一些，对属于敌我性质的问题，看得多了一些。”保定有的同志检查：“把阶级斗争形势看成一团漆黑，认为新城好人不多，不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赵县城关分团

某政委检查："贤前街一个生产队六名干部，斗了四个，按中央政策一衡量，应该斗的只有一个，这就是由于思想片面的结果。"二是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石家庄王西章分团西纪毫某工作队副队长说："过去斗得过宽，一斗就呼口号，不斗就认为会开得不生动。"邢台邢家湾分团检查前段工作是："一个跟得上，两个跟不上。一个跟得上是开斗争会跟上了，两个跟不上是说服教育跟不上，查证查账跟不上。"固城分团某党委委员说："过去见别的村一斗，自己就慌了，不斗怕说'右'，一斗才像个革命的样子，从指导思想上总想多斗几个，觉得政治攻心、个别谈话不过瘾。"三是对待干部的态度，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严肃有余，积极热情不够。视干部如仇人，不论问题大小，有枣没枣打三杆。如邢台固城分团某工作队员说："入村以后，虽然对干部进行了几次排队，总是认为没好人，一丘之貉。不管问题大小，态度好坏，一律看待。"新城高碑店某指导员检查："过去不区别情况，一律让干部在群众大会上检查。一个下台队长，多占一碗黄豆，吃过一次西瓜，两次洗澡不让过关。"有些干部很明显问题不大，应该解放不敢说。坝县一分团 275 名队干部，有 103 人问题不大，不敢解放，怕说右倾。有的认为干部的问题越严重越好，交代的问题越大越好，交代小问题不愿听。四是思想上"怕"字当头，工作上束手束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如河北邯郸十官营分团规定，生产队开群众会要经工作队批准，生产大队开群众会，要经分团批准，原因是怕出乱子。甘肃省委在检查中也指出，群众路线走得不够好，发动群众放得不够开。在前一段工作中，不适当地强调了工作队发现和培养根子对象，有脱离广大群众的毛病，使运动一度出现了冷冷清清的局面。

工作队在根据《二十三条》检查前段工作的同时，也对《二十三条》提出了不同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认为《二十三条》一贯彻，给干部撑了腰，向群众泼了冷水，担心运动搞不彻底。

邢台工作团了解，在工作队员中有四怕：一怕干部翻案和不交待问题；二怕不退赔；三怕给群众泼冷水；四怕工作队在群众中失掉威信。衡水十甲村某工作队员说："现在群众发动得充分，这样一讲，群众劲头不就下去了吗？"有的干部说："这《二十三条》给四不清干部长了气，给贫下中农泄了气，贫下中农不敢提意见了。"赵县韩村某工作队长说："《二十三条》贯彻下去，运动非走弯路不可。"有的同志说："该讲的讲，不该讲的不讲。"十北口分团政委孙××，有人问他，你讲不讲"减、缓、免"，他说："叫我讲可以，讲到那里念快点。"衡水有的工作队长，贯彻《二十三条》后，见到有的四不清干部翻案，哭着找分团领导干部说："这下白搞了。"二是认为传达的不合时机，方法不对。邯郸有些同志认为《二十三条》应该分别传达，即向工作队传达全文，向贫下中农讲精神，向队干部讲重点。张家口张家场某工作队员说："中央《二十三条》公布于众，我看中央有些冒险。这个文件连搞运动的时间都讲了，干部顶牛六个月，四清就搞不彻底。"南新庄某工作队员说："《二十三条》把工作队员不十分干净都说了，对工作队不利。"唐山榆关某工作队员说："公社两个会议（贫协代表会、三级干部会），使运动走向高潮，如果趁火猛攻，就可一下子搞清。这个时候一讲《二十三条》，对干部说服教育，退赔还要减、缓、免，热气就要凉下去了，我看不如春节以后再讲好。"三是认为《二十三条》是降低了运动标准。石家庄某工作队员说："这次六条标准少了'彻底'两个字，看来四清不那么认真了，像个收兵的劲头。"邢台北辛庄某工作队员说："前段是不要急急忙忙往前闯，是时间服从质量，现在是质量服从时间了。"有的说："六条标准没有'彻底'二字了，以后可能是搞多少算多少，搞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四是对提"三结合"有抵触情绪。有的认为"三结合"与过去批判的"双依靠"没区别，是走回头路。天津白塘口某工作队员说："现在提'三结合'，工作队与群众好结合，与四不清

干部怎么结合？不叫打人，还要结合，怎么办？"有的甚至说："和干部结合是个策略问题，真正结合是和贫下中农，对干部是利用，他们只能管生产。"五是对退赔"减、缓、免"有误解，思想搞不通。有的说："退赔实行了减、缓、免，两个月的硬功夫，几句话就吹了。""过去说不能叫干部在经济上占便宜，这次又提减、缓、免，到底怎么掌握？"衡水王庄某指导员说："对干部政策太宽了，退赔是减、缓、免，群众一听就没有劲头了。"有的说："这一回不用死乞白赖地搞了，反正搞出来还得减、缓、免。"

绝大多数贫下中农学习《二十三条》以后，积极拥护。有的说："毛主席到了咱大队"，"又听到了主席的声音"，"用《二十三条》战胜一切敌人"[1]。有的说："毛主席想得真周到，我们坚决按《二十三条》办。"有的说："《二十三条》是指路明灯，开心钥匙，给我们指出了方向，指明了前途。"不少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在学习中进行了检查，其问题主要有：一是对"四清"运动的意义领会不够，认为运动就是整人、出气。河北任丘长洋店肖楼大队某贫协委员说："运动主要是教育人、改造人，光斗争，不帮助，达不到这个目的。不分问题大小硬斗，这样下去谁还当干部。"二是对干部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对犯错误的干部应该是"治病救人"，不能一脚踢开。北京市海淀区的贫下中农代表学习了《二十三条》后，普遍认为，"对干部也要一分为二，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当干部辛辛苦苦，起早贪黑，为大家办事，真不容易。""干部有缺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认识改正错误还是好干部。"许多贫下中农表示：今后一定按照《二十三条》办事，要监督干部，也要帮助他们搞好工作，对待干部什么时候也要从教育出发，不能抱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新疆伊宁县红星公社的贫下中农说："毛主席看得对，把干部分四类，区别对待，不是一

---

① 《杨尚昆日记》下，第559页。

竿子都赶。""党的政策最公正,犯了错误的干部,只要把问题交代了,改正错误,就给予宽大处理,如果不听教育,不愿回头,我们就和他斗到底。""原来认为工作队只应该和群众结合,不能和干部结合,现在实行三结合好得很。干部好的是多数,团结的人多了,力量就大了,才能打倒最坏的人。"① 三是检查了打骂、体罚干部的问题。河北衡水不少贫下中农说:"帮助干部认识错误,应该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动武。"有的说:"体罚干部,痛在身上,挖不出资本主义思想来。"有的说:"过去四不清干部打我们不痛快,我们打他们也有抵触,影响解决思想问题。"也有不少贫下中农听了《二十三条》后,思想不通,有的说:"党的政策太宽了。我们刚把四不清干部打下去,《二十三条》下来了,他们又会神气起来。实行三结合,干部又会把贫协的权利夺走了。"② 也有少数积极分子有沉闷表现,原因是对"三结合"了解不清,对减缓免想不通。

基层干部对《二十三条》反映比较积极。有的干部认为《二十三条》是"救命政策",是"管子孙万代的事情,是卸膀子的政策"。③ 一些没有问题的干部丢掉了人人挨整、人人过关的顾虑,工作态度更加积极,一些"四不清"干部学习《二十三条》后,表示要积极交代问题。如北京市通县地区于1965年1月25日召开广播大会,在彭真宣讲完《二十三条》之后,很快出现了一个坦白交代的高潮,四天之内,到会的2.2万多个社队干部中,新交代或补充交代各种问题的有1.2万多人,新交代贪污盗窃粮食27万多公斤,现金22万多元。至2月20日,开展"四清"运动的544个大队共有19639名干部,已经"洗手洗澡"、"下楼解

① 吕剑人:《我的回忆》,第176—177页。
② 同上,第177页。
③ 《杨尚昆日记》下,第544页。

放"的14475名，接近干部总数的73%多。[1] 北京市海淀区永丰屯公社小辛店大队长王××放下了高价出售粮食530斤，合伙盗窃粮食260斤的包袱。他说："在1962年运动中，我只交代了一些小问题，始终不敢放这两个大包袱，怕受处分，这回学习了《二十三条》，听了彭真同志的报告，认识到只要交代彻底，积极退赔，就既往不咎，才下决心把包袱放下来。"新疆伊宁县红星公社二大队十一生产队的六名干部，经济手续不清，工作组进村的前两天就订了攻守同盟，互不揭发。听了宣讲《二十三条》后，有三名干部主动交代了问题。全大队13个生产队的干部在短短的几天就被解放了将近一半。第八生产队会计库尔班江，群众揭发他贪污1121元，原来只承认贪污300元，听了宣讲后，就全部承认了，并当场退赔500元。有的交代了自己的问题还积极揭发别人的问题。有几个队出现妻子劝丈夫，父母劝儿女交代问题。有的干部说："以前害怕交代了会追个没完，当成坏人处理，现在明白了自己不是坏人，还不如早交代，早解放。"[2]

许多基层干部经过学习《二十三条》后，基本上解决了不愿当干部的错误思想，也缓解了与贫协对立的情绪。《二十三条》传达前，有的干部认为，"当干部没有好下场"，"受气挨骂不讨好，精神上受气，经济上吃亏"，"干了一年落个年终算总账，不是批评就是斗，寒心"，"不如当个社员，分不少挣，累不多受，会不多开，自由自在"。有些干部与贫协抱对立情绪，认为"贫协和干部唱对台戏"，"有了贫协多一层婆婆"，"事事贫协管，还要干部干什么？"《二十三条》宣讲后，有的干部说："原来我意见不小，但没有更高的要求，只要上级体会到我们的处境就行了。"许多干

---

① 赵有福：《彭真与京郊农村"社教"运动》，载李海文主编：《彭真市长》，第60、67页。

② 吕剑人：《我的回忆》，第177页。

部检讨了自己对贫协的错误看法，认识到贫协组织对巩固农村无产阶级专政，搞好生产的重要意义，认识到必须依靠贫协组织，才能不脱离群众。有的干部说："过去对贫协看法也缺乏一分为二，总找人家的茬，不看人家的成绩。""自己也是贫下中农出身，可不能忘掉了穷哥们，今后一定团结起来，接受贫协的监督帮助，把工作搞好。"

另外，据湖北向中央的报告反映，一些"四不清"干部把《二十三条》变成了合法斗争的"武器"，抵抗"四清"运动，说《二十三条》是"和平条约"，是给他们"补药"，认为"贫下中农的日头偏西了"，"《二十三条》解放了我们，该我们抬头了"。有的还提出"有冤伸冤，有气出气"，孝感专署一名副专员甚至号召全体严重"四不清"的同志们起来和这个"四清"运动作斗争，要求立即停止"四清"运动。

开展"四清"运动的各高等学校中的工作队和广大师生，在学习了《二十三条》之后，认为"这个文件总结了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丰富经验，贯穿了彻底革命的精神和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深刻体现了毛主席的思想，是指导这场革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有的认为，"文件中始终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一分为二的，不把任何问题看成绝对化，依靠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团结95%群众，团结95%干部，运动一定会搞好的。《二十三条》比'双十条'提的既具体，又明确，而且简练。"

学校"四清"工作队根据《二十三条》精神认真检查了前段工作中的缺点。如北京师范大学工作队认为，由于在高校中进行"四清"缺乏经验，工作中有不少缺点，一是把学校工作和部分领导干部的问题在程度上看得重了一些。二是实行三结合不够，把师大党委和总支撇在一边了。三是在揭发干部工作的问题和选拔积极分子的时候，对一些人的阶级出身和历史问题看得过重，对重在表现注意不够。四是在党外群众中做工作注意不够，

以及对教学工作注意不够等等。

高校师生在学习《二十三条》后，也提出了一些问题。一是对学校“四清”搞什么都很关心。有的教师说：“学校四清主要是思想、政治问题，这是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还是培养无产阶级掘墓人的问题。”有的教师说，学校革命的对象主要是教育思想，如教育是否为无产阶级服务、办学思想、红专问题、欧美式的自由教学、凯洛夫教育学、教书不育人等，这都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有的教师说，“四清”比过去“五反”更深刻广泛了。“四清”牵扯到每一个人，“五反”主要是经济上的问题，现在是牵扯到思想深处问题了。二是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有的说，以前搞运动没有提到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由上而下，这样，上下都牵扯到了。有的说，听报告时，听到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认为与自己关系不大，自己不是党内人，也不当权。有的说，我看不是只整党内当权派，在整党内当权派时，一定把地富反坏分子都整出来。有的教师问，校长、系主任、教师，咱们都是干部，能不能算当权派？三是关于运动的性质，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说前两种提法不是马列主义的，不太理解。如果提“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也不可能想到别的社会去，说党内外矛盾交叉，也不可能理解成不是共产党。有的提出，前两种提法，不能说不是马列主义的，如果在第一种提法上加上社会主义时期几个字，还是可以的。四是其他问题。有的人提出，在农村中不反社员群众，是否在学校中不反学生？教师算不算干部？学校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指什么？农村成立贫下中农协会，学校应以什么为核心？这次运动重点是整党内，我们党外怎么办等等。

总之，《二十三条》下达后，对整个“四清”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各地根据《二十三条》的有关政策，纠正了一些过“左”的做

法，解放了大批基层干部，使他们重新走上了日常生产的领导岗位，受到了广大基层干部的欢迎，城乡一度紧张的局面开始有所缓和，有的地方出现新的生产高潮。[①] 但是，《二十三条》的"关键提法大大超过了《后十条》修正案"，田家英曾对吴冷西说："你这次下乡在基层搞四清，照《二十三条》做还不至于出大问题。但运动发展下去，从下而上，问题就越来越大。"[②] 事情的发展不幸被田家英言中，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李新为撰写回忆录，把《二十三条》文件借来重温一遍，写道："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文件啊！它把这次四清运动的性质规定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现在看来，问题很清楚，这是毛主席 1957 年特别是 1962 年以来强调抓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但我们当时还把它当作反'左'的文件来欢呼，可见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之低，也可见'左'倾病毒深入我党的肌体已多么严重了。无怪一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终于降临全国大地。"[③]

"大四清"

《二十三条》正式颁布后，标志着城乡"四清"运动进入了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大四清"阶段。这一阶段，各地在认真学习贯彻《二十三条》的基础上，对运动进行了重新部署和具体安排，并专门划出一段时间进行清政治[④]，

---

① 据笔者采访当年"四不清"干部家属，至今谈起《二十三条》，还连连说，幸亏主席制定了《二十三条》，否则真不知该怎么活下去，《二十三条》的威力太大了。

② 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第 151 页。

③ 萧克、李锐、龚育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第 240—242 页。

④ 从河北、山东、北京等地的运动开展情况看，并没有将清思想和清组织突出出来。因此，清政治成为这一阶段运动的主要特点之一。

同时,各地在开展运动中,强调突出政治,强调用毛泽东著作指导"四清"运动,从而构成了这一阶段运动的独特景观。

第一,各地根据《二十三条》精神和形势的变化,重新部署了运动。

1965年上半年,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国内正在开展的"四清"运动因《二十三条》的颁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另一方面,国际上美国加紧侵略越南,使我国的周边形势日益紧张。为此,中央于1965年4月12日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全党县委以上的干部中,应当加强备战思想,密切注意越南战局的发展"。并指示,"在所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都要贯彻执行《二十三条》,把四清工作做得更好。"① 因此,各地根据《二十三条》精神和备战形势,对"四清"运动进行了重新部署。

湖北省委在讨论今后农村"四清"运动部署时指出,是继续采取目前的办法,每个地委集中力量搞少数县,还是以县为单位分期分批开展运动?除分期分批重点开展系统的"四清"运动以外,广大面上要不要先搞一次初步"四清"?整个运动究竟怎样安排,才能搞得更好、更快一些,才更有利于点面结合,更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更有利于巩固运动的成果和准备战争?在各地委、县委和各社教总团、分团反复研究的基础上,湖北省委决定,从今冬开始,以县为单位开展运动,面上今冬普遍进行一次初步"四清",同时继续贯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分期分批逐区开展系统的"四清"运动。为此,湖北省委对运动的部署作出具体安排。一是六个重点县的运动,一定要达到六条标准,善始善终,争取在今年9月份基本结束。二是为了把今后的运动搞好,现有的工作队在点上的运动结束后,必须进行整训,认真总结经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第141、145页。

验。三是今年冬季以前,以地委为单位或以县为单位集训干部,首先解决县、区两级领导核心的重新配备问题,然后解决公社领导核心问题,使他们能够在冬季投人运动,以使我们在整个工作上取得主动。四是在整顿好县、区、社三级领导核心的基础上,今冬明春以县为单位,每县先在一个区(少数大县可以搞两个区)开展系统"四清",作为试点,以便进一步取得经验,同时在面上普遍进行初步"四清"。① 五是根据季节和农事的特点,农村的运动主要放在冬春二季进行,城镇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运动主要放在夏秋二季进行。农村系统的"四清"今冬明春每个县都搞一批,明冬后春搞两批,后年冬季再搞一批,机关、城镇每年各搞一批。这样,一般的县大体上到 1967 年冬季即可搞完,1968 年春季进行复查,基本结束运动。②

河北省于 4 月 25 日至 5 月 7 日,召开了有地委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今后运动的部署问题。经大家讨论决定,从 1964 年冬季算起到 1967 年底用三年时间基本上完成全省农村"四清"运动。根据这一总的要求,确定今后每年搞两期,冬一期春一期。今年秋后打算在现有 18 个"四清"重点县工作团的

① 1964 年 11 月 15 日,王任重在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提出,"四清"运动要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齐搞。主要基于两点原因:一是坏人不仅有下面的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这是主要的。把上面的根子挖掉了,问题就比较好办了,上面的根子不挖掉,坏人是打不倒的,也会很快复辟。去年社教不彻底,这是一条极其深刻的教训。二是如果不上下左右一齐搞,县、区、社的干部自己的"四不清"没有解决,怎么能去反别人的"四不清"呢?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问题一揭开,就扯到他们头上来了。不仅他们自己没有心思去搞运动,更重要的是贫下中农反对,不欢迎他们,认为他们包庇坏人,订攻守同盟,压制群众,阻碍运动的开展。因此,只有上下左右一起搞,才能起到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作用。因此,在此后"四清"部署上,各地大多采取县、区、社一起搞"四清"。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 789—790 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0 册,第 206—211 页。

基础上，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每个地委搞四、五、六个县。运动布局，要分期分批，波浪式发展。要尽先搞完城市近郊、交通沿线和后方的战略要地的落后地区及落后的大村大队。按照以上全局部署，对当前工作做如下安排：一是必须按照主席提出的六条标准，把 18 个县的"四清"运动搞好，做到善始善终，取得完整经验。运动结束后，接着在秋前集中力量搞一段生产革命，实现"四清"、生产双丰收。二是搞好县、区、社"四清"。县、区、社三级干部要继续进行调整。县需要调整三分之一左右，社需要调整二分之一左右，使调整后的新的县、区、社干部都有机会参加和领导本地区的基层"四清"运动。三是整训和扩大工作队。重点县的"四清"运动结束后，要在 9 月份整训工作队，以提高政策思想水平。工作队员的数量在 10 万多人的基础上，扩大到 13 万多人。四是加强领导。地委设总团，进行"四清"的县设工作团，社(或几个社)设分团，生产大队(或几个大队)设工作队。县、社党委同去参加工作团或分团，共同领导运动。五是对今年秋后新铺开的生产大队，大体在 9 月份，就可以派出先遣队，为大军进村做好准备工作。六是今冬面上继续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①

中央对湖北、河北两省关于今后"四清"运动的部署作出批示，中央指出，湖北省委的安排同河北省委是不同的。湖北省委的安排是以县为单位，集中省、地、县各级党委的全力，在今冬或今冬明春在面上进行初步"四清"，解决那些能够解决的问题，并发现一些难于解决的问题，准备在以后解决。河北省委的安排仍是以地委为单位，每个地委搞几个县。但是湖北省委和河北省委都决定在 1967 年底基本完成农村"四清"运动。在农忙季节搞好县、区、社的"四清"，在冬春农闲季节，搞好两批农村"四

---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0 册，第 211—215 页。

清"。中央认为，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参考湖北省委和河北省委的报告，根据各省和各专区的情况来确定今后农村"四清"运动的部署。各省、市、自治区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来部署今后的农村"四清"运动。但是中央要求在符合六条标准的条件下尽可能快一点完成农村的"四清"运动。这对农业生产和备战都是大有好处的。①

1965年7月，全国工交系统召开"四清"座谈会，对运动进行了规划和部署。主要是采取适当集中力量、分期分批打歼灭战的方法，争取在1967年底基本上完成工交系统的"四清"任务。尚未开展运动的大中型企业和重要企业，争取在1966年底基本上完成"四清"任务，从现在起，分三批进行。大型的、同备战关系密切的问题较多的企业，要尽先纳入规划。在具体部署的时候，要量力而行，不能把战线拉得太长。在一个城市，一般以按行业开展运动为好；矿区、林区，也可以按片进行。中央部门直属企业"四清"运动的规划，一般的以地方党委为主，同主管部共同商定。县属的工业交通企业，随农村"四清"运动统一安排。暂不开展"四清"运动的企业，不再进行"小四清"。要求整个运动应当以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集中到兴社会主义、灭资本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个总的目标上。并规定，不同的企业，可以有不同的做法。② 同时，这次座谈会不久，全国工业交通系统也落实了第二批"四清"运动的规划。第二批共开展全民所有制企业6565个，占企业总数的17.6%，职工452.6万人，占职工总数的30.5%，比第一批试点企业、职工分别增加了2.7倍和1.4倍。按地区看，第二批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第205—206页。

②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二室编：《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选编》第5册，第581—584页。

结束后，华北可搞完全大区职工的一半以上，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可搞完40%以上，东北可搞完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二批开展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中，有中央企业910个，占企业总数的26.5%，职工239.6万人，占职工总数36.6%。各省市第二批安排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缺中南)1732个，职工14.2万人。[①]

1965年5月，全国财贸系统也召开工作会议，通过了《全国财贸工作会议纪要》和《1965年财贸政治工作要点》。《工作要点》指出，"四清"运动是目前全党的中心工作，财贸政治工作应当服从这个中心。必须在财贸部门中切实开展点和面上的"四清"运动。不论点和面，都要深入地、普遍地学习《二十三条》，自觉革命，按照《二十三条》办事。要用"四个第一"的精神来搞"四清"运动，通过"四清"运动落实"四个第一"。同时规定，凡是试点的地方，在"四清"运动的后期，都要建立政治工作机构，健全政治工作制度。[②] 7月10日，李先念致信毛泽东，反映了财贸部门"四清"运动的情况。信中指出，自去年下半年，全国财贸系统在30万多人的范围中开展了"四清"运动。目前，财贸部门第一期"四清"运动已经结束，第二期即将开始，参加"四清"的工作队正在组织。其中抽出参加"四清"运动的机关干部人数，大体上同第一期接近。

山东省在1965年5月召开的省委二届四次扩大会议上，一方面考虑到生产和备战的要求，另一方面考虑到运动本身形势的变化和群众的要求，深感有加快运动进度的必要。决定每个地委同时铺开三四个县，每个县今冬明春分两批搞完。同时，为适应备战要求，决定下一批以沿海地区、铁路沿线、后方基地、大

① 《中央工交政治部关于全国工交系统第二批四清运动规划的落实情况报告》(1965年8月17日)。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第251页。

城市郊区和重要粮棉产区为重点。这样，每个地委按搞四个县计算，全省今冬明春就可以搞36个县，加上原来已经搞过的共40多个县，明冬后春，争取再多搞一点，1967年冬就可以全部结束。同时，山东省对全面开展城市"四清"运动进行了部署。全省有九个城市列入城市"四清"范围，共145万人，除已经参加两批试点的40万人之外，还有105万人，今后分作三批搞完。大体安排是：第一批把中央和省属的工交企业基本搞完，财贸企业搞两三个行业，文教卫生、手工业、街道居民各搞几个单位，共28万人。第二批搞完全民所有制的企事业单位，并搞一部分集体所有制单位和街道居民，共37万。第三批，将其余的全部搞完，共30万人。此外，铁路系统，新汶、肥城煤炭分公司及省属劳改企业还有7万人，分别由中央主管部门和劳改部门自己组织力量进行。省直各部门还有3万人，另行安排。

北京市委也制定了今冬明春北京郊区农村"四清"运动的部署计划。北京市从1964年10月，集中农村"四清"工作队到通州地区(包括通县及顺义、朝阳、大兴一部分地区)开展运动。到1965年5月底前后，通州地区的"四清"运动即将结束。计划今冬明春，把北京郊区农村的"四清"基本搞完。郊区目前共有278个公社，323万人，已经结束"四清"的通州地区和过去已经搞完运动的公社，共81个，约120万人。其他地区绝大部分在今冬明春都开展运动，剩下少数社队，到1966年冬季和1967年春季扫尾。现有工作队员2万多人，再加上新参加运动的大学师生，工作队人数可达3万人左右，其中老队员将近一半，骨干约有1.1万人，平均20户社员配备一名工作队员，一个生产队配备一名骨干。6、7月工作队进行休整、训练，7月中旬派上一部分干部进行公社领导干部"四清"。

1965年8月，安徽省委对第二批"四清"重点县做了部署。第二批重点县包括颍上、凤台、宿县、六安、霍邱、凤阳、定远、长

丰、无为、桐城、贵池、宣城、旌德，加上第一批未结束的歙县，共计14个县。省、地、县行政机关按干部50%比例抽调工作队干部，企事业单位按30%抽调工作队干部，全省参加社教工作队的人员增加到6万余人。同时，安徽省根据适当集中打歼灭战的原则，于1965年秋在合肥、淮南、蚌埠、马鞍山、濉溪、芜湖、安庆、铜陵等八个城市部分重点单位，以及省直机关第一批未搞完的部分单位，共计313个单位，开展了第二批城市"四清"运动。[①]

江苏省于1965年4月下旬召开了由在江苏蹲点的中央、华东局机关和军队负责同志、各社教工作团长、各地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总结了农村"四清"运动的基本情况，并按《二十三条》精神，对今后运动提出原则意见。总的要求是，坚持六条标准，争取搞得快一些，打算再用大约三四年时间，分期分批搞完全省农村"四清"。到1965年7月底8月初，全省有7个县、88个公社、12个县属镇和徐州、南京等市的323个单位，结束"四清"。接着新的一批开展"四清"的有14个县(包括上批未搞完的6个县)，7个市的郊区，251个公社，17个县属镇。已经结束和这一批新开展"四清"的县市，共占全省总县数的23%，11个市同时开展城市"四清"的共850个单位，37万职工，占全省职工总数的35%。[②]

1965年9月，江西省委召开全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今后以地委为单位组织工作团，由地委直接领导，开展运动的县成立分团，公社成立工作队，大队成立工作组，规定每期运动的时间冬春为三个月左右，夏秋四个月到五个月。会议还要求工作队的骨干力量和各级领导干部蹲点的人数不能

①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安徽》上，第105—106页。
②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506页。

少于前两期。城市社教第一批完成之后，省委决定改由各地、市分别设立城市社教工作团，由地委直接领导，在本地区开展运动。决定先安排大中型、重要的、同备战有密切关系的和问题较多的企业，后安排一般的中小型企业；先全民所有制企业，后集体所有制企业；先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后街道居民的顺序。要求在1966年上半年基本完成中央、省属大中型主要企业的"四清"运动。一般的中小型工交、财贸企业争取在1966年底完成，文教单位和集体所有制的工交、财贸企业、国家机关、城市居民于1967年底完成。①

上海市第一批"四清"运动集中在工业、交通、财贸和文教系统133个单位、19.7万多人中开展。从1964年8月起到1965年6月结束，共抽调了1.4万名各市、区机关干部和大学毕业生组成城市"四清"工作队分赴各运动单位。第二批开展"四清"运动的单位从1965年5月开始，改为按局系统进行，有仪表、电业、机电一局、机电二局、造船、交通、财贸、人委机关等系统的企事业单位44万职工参加。全市按行业(局)系统组成了9个工作团、270多个工作队，抽调了2.3万名工作队员，全面铺开运动。因为运动进展不够平衡，第二批"四清"运动中的仪表局在1965年年底就已经基本结束"四清"工作，其工作队员随即转赴冶金局，并于1966年春节后率先开始了第三批"四清"运动。上海城市第三批"四清"运动仍按行业(局)展开，有冶金、纺织、轻工、建工、邮电等局和文教系统企业事业单位约35万人参加。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运动停止。②

中南区城市第一批"四清"运动，在21个城市和地区的4900

---

① 曹力铁：《江西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末》。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社会主义建设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297页。

多个单位铺开。参加运动的职工和成年居民126万余人,其中工交战线90万人,财贸战线10万人,工作队6.7万人。当时,佛山、南宁已进入建设阶段,其他省市仍处于"四清"阶段,预计6月前后可以全部结束。对下一步城市"四清",中南区也作出了部署:一是一个大、中型企业的运动,大约要用八个月左右的时间,因而每一批运动的时间也要相应地延长。这样,全区城市"四清"运动的时间,需要延长到1968年底。二是建立一支强有力的革命化的工作队。工作队必须保证质量。现有工作队的人数,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工作队的骨干力量,只能增强,不能削弱。三是为了搞好中、小城市的"四清"运动,建议由省委派出得力干部和市委共同领导,"四清"工作队,最好由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或者各系统之间混合组成。四是财贸战线单位分散,基层领导弱,队伍复杂,直接管钱管物,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更为严重,没有坚强的领导,运动是搞不好的。建议各级党委增派财贸战线的负责干部参加城市"四清"运动,加强对财贸战线"四清"运动的领导。同时,中南区对力量的部署,采取了"一带一"的办法。其具体做法是,主点带副点。一般在主点开展工作的同时,派几个干部到副点上去,抓生产,了解情况,宣传政策,发现积极分子,组织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主点上的会议。主点进入建设阶段时,再把大部分力量转入副点,展开运动。中南局认为,"一带一"是一个既可按期完成任务又能保证质量的好办法。

第二,清政治。

《二十三条》颁布后,"四清"运动的开展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清经济之后,专门划出一段时间搞了清政治。清政治是在"小四清"即经济"四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许多"四清"工作队认为,犯有经济"四不清"的干部,也大多犯有敌我界限不清、两条道路不清、阶级路线不清、专政对象不清等政治不清的问题,要求在清经济之后清政治。如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四

清"中,发现经济"四不清"和政治"四不清"常常联系在一起,凡是有严重经济"四不清"的人,大都有政治上的"四不清"。王光美在"桃园经验"的总结报告中,也提出了政治"四不清"的问题。王任重于1964年11月15日在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指出:"经济上'四不清',就必然在政治上、组织上也'四不清'。这是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① 同时,清政治也是前段运动中夺权斗争不断激化的结果。由于中央决策层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形势,强调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这样就使运动的内容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而《二十三条》又进一步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要求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这样"四清"运动的重点就转向了以对敌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斗争上来,清政治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什么是清政治?怎样清政治?在这方面,河北省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经验。如保定地委规定,清政治总的要求就是要以《二十三条》为武器,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其基本内容主要有:充分发动群众,大反资本主义,大反"和平演变",突出地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对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斗争,把他们揭深批透,挖出幕后的阶级敌人和社会上的投机倒把分子,把他们斗倒制服;彻底揭开阶级敌人搞"和平演变"的内幕,把资本主义搞臭,把社会主义旗帜高高举起,这是清政治的重点。全面评审四类分子,对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要斗倒制服;四类分子戴帽子、摘帽子,必须由群众审议决定,并且依靠群众对他们实行监督改造;横扫牛鬼蛇神,对有严重破坏活动的要开展批判、斗争。清理阶级成分,划

①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788页。

清阶级阵营，建立阶级档案，一般采用划两头的办法，把漏划的地主、富农划出去，把错划其他成分的贫下中农改过来；清理阶级成分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通过这项工作，提高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巩固地团结中农，团结、教育地富子女。在土改不彻底的地区，要认真进行民主补课；讲阶级、议阶级，回忆对比，忆苦翻心，进行“谁养活谁”的阶级启蒙教育。

清政治的基本做法，总的看来，主要是“亮活典型”，即那些问题虽然严重，但交代检查较好的人，要让他们现身说法。“打活靶子”，即主要是那些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批判斗争少数，教育大多数。具体而言，就是如何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和斗争方法。在这方面，天津市大石桥工作队的做法就比较典型。主要包括：

一是斗争大会。对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要在大会上进行说理斗争。少数有严重的经济不清、至今仍拒不交代的“钉子”，也要在大会上进行说理斗争，促其交代问题。不过，对于所谓“钉子”，也要分析，这个人是多数问题、主要问题都交代了，剩下少数次要问题呢，还是基本没有交代？是真有问题拒不交代，还是问题并不真实呢？这些都要调查研究，仔细分析，实事求是，不能一概称之为“钉子”，更不能一味地追逼。

二是说理批判。有的干部经济不清，或者政治不清的错误，比较严重，基本交代了，并不是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但是对错误认识不深刻，检讨不好的，可以在不同范围的会议上进行说理批判，目的是进一步批判他的错误，同时教育大家。这种说理批判，同说理斗争是有区别的。

三是示范检查。选择经济问题多但交代好、退赔好的干部，或者犯有较大的政治不清的错误但检讨好的干部，作为典型，在不同范围的会议上，作示范检查，思想上纲，现身说法，教育大

家。但是，对于作示范检查的人，应该抱欢迎鼓励的态度，不是斗争他。

四是洗手洗澡。有些干部政治不清的问题比较多，或者还有若干经济问题没有交代清楚，群众意见较多，可以分别情况，在大队、生产队或者一部分直接有关的群众参加的会议上，洗手洗澡。这不是斗争会，更不能采用对敌斗争的方式。什么人需要洗手洗澡，也要经工作队支委会讨论决定。

五是小组会上的自我批评。通过在大会上说理斗争、说理批判和示范检查，在小组讨论中，来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正如省委在清政治的文件中指出的，这种抓住典型、教育大家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犯有一般性经济不清、政治不清错误的干部，有的在小组会上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做了自我批评，应该欢迎，但是不要勉强，不要不适当地强调“提到原则高度”，更不要人人过关。经过这次“四清”运动，要把党、团、贫协小组的组织生活中的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风气树立起来。为此，就必须注意组织生活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无论如何不要把它同斗争会混淆起来。

六是专题讨论。根据清经济和清政治中发现的问题，梳梳辫子，提出若干问题，进行专题讨论，使运动进一步深入，使干部和群众从原则上进一步认识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搞和平演变的严重危害，敌我界限不清和两条道路界限不清的严重危害。

《二十三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也有的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这些人不分

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这实际上是规定了清政治的具体对象。由于中央并没有对上述对象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为了落实《二十三条》指示和解决政治"四不清"问题，各地制定了一些具体政策。

如山东省根据《二十三条》精神和城乡"四清"运动的经验，对清政治问题的性质界限和组织处理制定了如下措施：

一是关于阶级异己分子。凡是剥削阶级出身或受剥削阶级的深刻影响，并一贯保持同情剥削阶级，敌视党与劳动人民，有事实证明的，应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本人是剥削阶级分子，有罪恶民愤，为了逃避人民政府的惩处或群众的监督，趁机钻进了革命队伍的，应定为阶级异己分子。隐瞒了剥削阶级分子身份，参加革命后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一贯表现好，运动中坦白交代的，可不以阶级异己分子论处，一贯表现不好，又不坦白交代的，应以阶级异己分子论处。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参加革命后，长期表现还好，偶然犯了丧失立场的错误，经过教育，能够检讨改正的，不要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可以根据所犯错误的情节，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或免予处分。

二是关于蜕化变质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经不起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腐化堕落，屡教不改，完全丧失革命性的，应定为蜕化变质分子。虽有比较严重的腐化堕落行为，但经过批评教育，能够检讨改正的，不要定为蜕化变质分子，可以根据所犯错误的情节，给予应有的纪律处分。在政治上、思想上一贯表现尚好，偶尔在生活作风上犯了错误，经过批评教育，能够认识错误，坚决改正的，一般可给予纪律处分。

三是丧失立场、包庇坏人。明知是地富反坏分子，而加以隐瞒、窝藏，或以伪造证明、介绍工作及其他方法使之逃避国家法

律制裁的，须给予严重的党纪、政纪处分，直至法律处分。因亲朋关系或接受贿赂，有意包庇纵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应根据情节轻重、造成的恶果大小，给予应得的纪律处分或免予处分。由于政治上麻痹，过去不知道自己所介绍和引用的人员是地富反坏分子，经查出后，能认识错误，深刻检讨的，不应视为包庇；因此而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的，应该追究政治责任，并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由于阶级观点模糊，曾与地富反坏分子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在一起吃喝或接受少量礼物，但没有纵容支持他们搞违法活动的，应批评教育，划清界限，可不视为丧失阶级立场。

四是关于一般政治历史问题。隐瞒了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运动中做了坦白交代的，不予处分。政治历史问题过去已经交代并做了结论，又确无发现其他的问题，不应再追究。隐瞒了被杀、关、管、斗的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本人没有其他严重问题，运动中作了检查交代的，可不予处分。虚报党龄、工龄、军龄和伪造历史，运动中已经交代清楚，作了检查的，要改正过来，一般地不予处分。

五是违法乱纪。利用职权，捆绑吊打群众，挟嫌报复，为非作歹，造成严重恶果的，应给予应得的纪律处分，直至法律处分。有一般违法乱纪行为的，应该根据本人对错误的态度和在群众中的影响，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或免予处分。在工作中犯有强迫命令错误的，应该着重批评教育，一般地不给予纪律处分。

虽然各地制定了清政治的具体政策，以防止运动发生偏差，但实际上，由于清政治的重点放在了两条道路的斗争上，因此，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在清政治的旗号下，揪出了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分子，开展了夺权斗争，把大批农村基层干部作为政治批判的对象，从而造成了过火斗争、打击面过宽等严重

问题。另一方面,在清政治进行"破"的同时,也强化了"立"的工作,即突出政治,强调政治挂帅。两者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

第三,突出政治,掀起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

《二十三条》后,各地开展的"四清"运动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强调突出政治,在运动中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以毛泽东著作来指导运动的开展。

突出政治,就是在一切工作中必须强调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挂帅。这一口号的提出,既是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政治思想工作传统的延续,又是当时"左"倾思潮的产物。早在1944年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谭政同志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就指出,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但同时,报告也强调所谓"生命线"不应是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的突出政治,不要把政治工作摆在"统帅"、"领导"其他工作的位置上。[1] 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2]从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党的指导思想的逐渐"左"倾,特别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使经济形势日益恶化,而毛泽东仍然坚持三面红旗。这样政治工作便被放到了一个突出的地位。1958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3] 1960年10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提出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

---

① 中国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理事会编:《毛泽东思想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一，政治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号召全军干部战士、全体党员和共青团员“必须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大法宝”，“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号召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并规定：“一切干部的理论学习，都要以毛泽东著作为主要内容。”[1]为此，中央做出批示：决议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正确的和适时的。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2]

1964年，叶剑英、罗瑞卿在南京组织军事训练现场会，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继而在全军掀起大练兵高潮，受到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赏。但不久于11月召开的全军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林彪以大比武冲击了政治为由，否定了全军群众性练兵的成绩，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的口号。12月29日，林彪在接见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和《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时指出，1964年在军事训练上有的搞得过于突出，时间也占得多了一些，冲击了政治；有的过分强调军事技术，忽视政治思想工作；有的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要加以纠正。1965年应当着重抓政治思想工作，首要的是大抓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大抓活思想，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一指示作出批示：此件早已看过，完全同意，照此执行。执行中逐步总结经验，大约一年总结一次，至多两次也就够了。此后，毛泽东又在总政关于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加强战备的情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743—751页。

② 同上，第742—743页。

况和意见(草稿)上批示:此件已阅,很好。[1] 在这种情况下,突出政治,大学毛泽东著作,便成为正在开展的城乡"四清"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

如西南三省(四川、云南、贵州)工交企业"四清"中,干部和群众普遍学习了毛泽东著作,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搞好一切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搞好四清的强大思想武器。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凡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直接用毛主席著作来教育干部、群众和指导运动的地方,四清斗争的发展就比较顺利,干部和群众思想觉悟的提高就比较快,运动的收获就比较大",并指出,"这是搞好四清的一条根本经验"。表示:今后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突出政治。西南局也对此作出批示:当前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必须更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四清"运动,大力解决企业工作中突出政治的问题。

中南地区城市第一批"四清"运动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认真学习了毛泽东著作,贯彻执行了《二十三条》,突出了思想革命。为此中南局城市"四清"领导小组认为,"把毛主席著作当作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发动群众,教育干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是搞好四清运动的根本保证。"中南局也于1966年1月16日作出了开展群众性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的决定,并指出: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和"四清"工作队构成了运动的中坚力量。[2]

从第二期"四清"以来,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曾多次讲到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314、472页。

② K. R. Sharma: *China: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 published by K. M. Mittal publications, New Delhi, 1989, pp. 218—219.

突出政治。1965年12月27日至29日李雪峰在邯郸市听取"四清"运动情况汇报时指出,"突出政治,这是今年四清运动很重要的一条新经验。"1966年1月10日至18日,在华北局"四清"座谈会上,李雪峰指出:"四清是当前最大的政治运动,因此四清中首先要抓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的落实。""四清中突出政治,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从农村看,第一,是政治思想的斗争,包括唯利是图、压迫群众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第二,集中在当权派上,领导权上,或者叫政权,最后落到领导核心上。第三,对群众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工厂的四清要突出什么?要研究。是否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包括经济、政治、思想、组织几个战线。第二,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资产阶级管理方式。"此后,在华北局召开的一些会议上,他又多次做了关于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在"四清"运动中抓四个第一的讲话。如"政治挂帅,突出政治,是指导四清运动的共同的根本原则","如果不从根本上反复落实四个第一、不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一句空话,四清运动也是不可能搞好的"。

河北省委认为,在"四清"运动中,必须突出政治,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教育干部。重新教育人,重新改造人,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打退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以"和平演变"为主要形式的进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河北省委"四清"办公室还制定了《关于加强工作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意见(草稿)》,要求各地工作团党委必须加强对工作队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把政治思想工作列为党委的议事日程,抓好活的思想教育,掀起大学毛泽东著作的新高潮等,以保证"四清"运动的健康发展和彻底胜利。山东省委认为,以毛泽东思想统率运动,发动群众,教育干部,武装工作队,是前一段运动取得成就的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在运动中始终要突出用毛泽

东思想清思想，坚持重新教育人，反复进行思想归纲，使之成为贯穿于运动全过程中的一条红线。

中共广东省委在《关于在四清运动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情况的报告》中指出："我省第一批点的四清运动，有一个新的重大特点，就是强调了突出政治，在运动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改造人，以毛主席著作直接指导运动的每一步工作。这是试点经验的新发展，四清运动同时成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四清地区成了全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重点地区，十四万工作队带着毛主席著作下乡，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强大宣传队。"为此，中央批示：广东省委关于在"四清"运动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情况的报告很好，转发给你们参考。在"四清"运动中学习毛主席著作，应当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中的有关指示，特别是近几年有关"四清"运动的许多指示，把"四清"运动搞得更好，使"四清"运动的成果更加巩固，并为今后做好其他工作创造条件。

那么各地是如何运用毛泽东著作来开展"四清"运动的呢？在这方面，广东省的做法比较典型。首先，用毛泽东著作去教育群众，激起群众的革命斗志，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如"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贫下中农听到这句话后，热泪盈眶，说："毛主席撑我们的腰，还怕什么！"可以说，大批贫下中农骨干和积极分子，从毛泽东著作中吸取了力量，提高了觉悟，坚决参加斗争。同时，贫下中农学了毛泽东著作，思想认识和斗争水平大大提高。试点时，斗争会上常有拍桌子等现象，而现在贫下中农往往是这样来批判干部的错误："白求恩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你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这是什么主义？！""毛主席叫我们为人民服务，你却做官当老爷，为地富服务，这是什么立场？"三言两语，就把一些干部所犯的错误提到世界观高度上来，击中要害，叫人心

服口服。陆丰县大湖大队贫协会员黄顺荣,以前曾被生产队长打伤过,这次批判这个队长时,他气愤得举拳要打,但转念一想,却说:“毛主席说人民内部矛盾要讲道理,我不打你了,可你要想想,我们都是穷人出身,你为什么对穷人这么狠!”有的贫下中农说:“毛主席的话,千金难买,学会一句,终身管用!”其次,直接用毛泽东的话去教育干部,促进干部的革命自觉性,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许多地方从入村时的整党整干会议开始,到召开公社三级干部会议组织“四清”高潮,都突出了大学毛泽东著作。许多干部从亲身经历中痛切地感到,毛泽东的著作,是“灵芝草”,是“防腐剂”,是“照妖镜”。他们庆幸“进了政治医院”,“感谢白求恩大夫割掉了自己身上的毒瘤”,认为自己过去的“自留地主义”、“家庭主义”、“小队主义”,都是不对的,自觉地批判自己“身在大队、生产队,胸怀家庭,心里只有一个钱字的错误思想,决心要学白求恩,要学张思德,立志身在大队、生产队,胸怀各国,放眼世界”。最后,工作队学好毛泽东著作,是在运动中组织群众、干部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前提,而且是实现工作队革命化的必由之路,是搞好“四清”的根本保证。许多人为了寻找毛泽东著作中对运动实际针对性最强的语录,翻遍四卷不眠不休。通过学习,许多同志掌握了阶级观点、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等群众工作的基本功。

山东省在工作队整训时,突出强调了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问题。工作队进村后,为给群众撑腰,便向群众讲了“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一段话;当群众开始揭露问题,还没有上纲时,工作队反复向群众讲了毛泽东“就要变颜色”、“多么危险的情景”这一段话;当群众有了初步发动,革命形势初步形成,干部内心斗争激烈时,工作队讲了“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那一段话;当清经济、清思想取得初步胜利,需要及时把政治思想革命

的高潮引向生产高潮时，工作队组织干部、群众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有关著作，学习了先进典型，突出地宣传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突出地解决了"种田为革命"的思想，掀起了一个改天换地的革命高潮。这些措施都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为此山东省委总结道：要从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时代意义，从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新教育人的战略意义，从学与不学实质是革命不革命的严重意义去解决认识问题，提高学习的自觉性。要抓紧每一段战斗任务的要求，对准干部群众中的活思想，选准毛泽东的书，活学活用。要大搞群众运动，把学习毛泽东著作同学习先进人物、先进典型结合起来，同向群众学习结合起来，同比学赶帮超运动结合起来，通过现场会、巡回报告会，推广先进经验，促进学习运动。

河北省委城市"四清"工作团政法训练大队在第二期训练中强调了大学毛泽东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队员的头脑，规定每星期六下午和星期三晚上为学习毛著时间。干部学，队员也学。从这期队员入队到 4 月底一个月的时间，一般的学习了五篇文章，多的学了九篇，少的学了三篇，几乎每人都写了心得和笔记，各个中队也都出了学习毛著的专刊。在学习中，依着解放军的经验，一读，二想，三对照，四行动，强调从实际出发，带着问题学，有什么问题就学什么问题，可能发生什么问题，就学什么问题。例如，为端正学习态度，树立革命观念，反复学习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为了解决学习政法业务畏难情绪，就事先组织队员学习了《愚公移山》。为了克服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组织队员学习了毛泽东论反对个人主义辑录。为了解决干部的工作方法，专门学习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等。不少队员已经把学习毛著作为经常的活动，规定的时间学习，业余时间也学习。有的星期天很少出去，常常是拿着《毛选》读了又读，看了又看，圈圈点点，舍不

得放下；文化低的一遍读不通，就多读几遍，文化高的就主动帮助共同学习。有的晚上已经睡了觉，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还看。有的队员说："毛主席著作好像心中的太阳，天天读，风里浪里顶得住，天天看，天大的困难也不难。"并表示："活到老，学到老，干一辈子革命，学一辈子主席著作。"

湖北孝感县卧龙公社群益大队总结了过去学习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些能经常坚持学习的方法。如对广大农民群众，要求主要学习毛泽东语录，把语录写在黑板上，一月学一条，一年学12条。抓干部学习，但要求不能过高，大队干部在一年内只学《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四篇文章。对于一些回乡知识青年、中学生、工人、转业军人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民，各队把他们专门组织起来，成立学习毛泽东著作小组，对他们的要求比一般人高一点，培养他们中间思想好、成分好的人成为学习积极分子。

"四清"运动中突出政治，坚持在一切工作中政治挂帅，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是当时"左"倾思潮极端化的一种表现。它既有林彪等野心家捞取政治资本的一面，又有毛泽东怀疑"大权旁落"而加强个人权威的一面，因而在社会上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强调突出政治，政治挂帅，政治决定一切，于是，社会上的一切都依附于政治，从属于政治，政治态度成为衡量人们行为善恶的唯一标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如奖金、利润、市场等因素，一切反对"三面红旗"的声音，都被扣上不突出政治的大帽子而加以批判。另一方面，运动中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强调以毛泽东思想挂帅，也容易助长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而这种个人崇拜之风的加剧，反过来，促使在社会上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学习毛著运动，从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群众手捧毛主席语录而形成"红海洋"的奇特景观。

第四，运动中出现了斗争过火、打击面过宽、经济退赔过严

等严重问题。

由于"大四清"阶段的运动重点放在了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运动中也出现了斗争过火、打击面过宽、经济退赔过严等严重问题。例如,广西武鸣县从1965年8月开始"四清"运动,到1966年10月结束,历时一年零两个月,据1966年9月5日对六个区80个公社的统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659人,已开展批斗的有651人,已斗垮的530人,未斗垮的104人,未斗的8人。其中府城区走资派209人,已斗208人,已斗垮169人,基本斗垮18人,未斗垮的18人,未斗的1人。四类分子3309人,应该斗争的654人,已斗争的有599人,已斗垮的426人,基本斗垮20人,未斗垮的161人,未斗的55人。从这些数字中不难看出,阶级斗争扩大化到何等严重的程度。在批斗中,尽管都是文斗,不搞武斗,但文斗都是无限上纲上线。有关"贫下中农团结起来,打倒×××走资派"、"不斗倒斗臭走资派誓不罢休"、"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口号处处皆是。

宁夏在《二十三条》颁布之后,许多地方以县、社、队领导干部为夺权对象,错误处理和打击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全自治区仅在第二期"四清"运动中,开展运动的地区就有17%的中共党员被清除出党,10%的生产队、34%的生产大队和33%的公社被夺权,同时还补划地主、富农阶级成分1027户。在开展第二、三期"四清"运动期间,还在灵武、吴忠、盐池、隆德、海原、固原、同心七个县同时进行了面上的运动。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地方有17%的生产队以上干部被撤职或法办,有5.7%的生产队、13.3%的生产大队和12.3%的公社被夺权。在农村"四清"运动全面开展的同时,从1965年底开始,还先后在城市进行了两期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银川地区参加第一期运动的有银川市的机关、厂矿205个和自治区级机关17个,运动中有332人被

清除出干部队伍，103人被清除出工人队伍，还新查出专政对象360人。①

山东崂山开展"四清"的少数单位也出现了偏激情绪和不健康苗头。李村公社东大村大队，召开大会斗了下台小队长王××、大队电工邵××，开始一女青年动手打他们，以后几个小青年也上去打了。河东、双山也有辱骂干部等不健康苗头。楼山后大队渔业队要求工作队把不交代问题的干部交给他们处理，并说："出了问题不怨你们。"吴家村公社西吴家村大队第七生产队社员因为队长潘××不交代问题，叫他站起来，摘下帽子，有三四个人要动手打他，被工作队制止。山东省据1965年5月七个重点县初步统计，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基层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8%；开除党籍者占党员总数的5%—10%；受撤职以上处分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1.5%，属懒、馋、占、贪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80%以上；领导权被篡夺的生产大队占10%左右。在基层组织中，县级领导核心调整三分之一，社级调整二分之一，大队调整二分之一。《二十三条》关于解放干部问题不仅未实现，反而变本加厉，更加普遍、严厉和残酷。②

张掖地区在《二十三条》颁布后，共死亡52人，其中山丹8人，民乐11人，临泽4人，高台11人，张掖18人。干部总数为3708人，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94人，占干部总数的2.53%，其中山丹22人，民乐8人，临泽15人，高台7人，张掖42人。

《二十三条》指出，经济退赔不能马马虎虎，同时要合情合理。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过群众同意，退赔可以减缓免。但在实际过程中，也发生了退赔面过宽等不合理的现象。如新

① 李佯和主编：《当代中国的宁夏》上，第149—150页。

② 吕景琳、申春生：《山东五十年发展史》，第136—137页。

疆伊宁县红星公社二大队有经济不清问题的95名,共计金额5.3万多元,其中100元以下的19名,100—300元的29名,共计48名,占有经济问题的人的50%。在处理经济退赔中,实行减免的38名(完全免予退赔的只有1人),占有经济不清问题的人的40%。五一公社一大队有经济不清问题的干部45名,共计金额1.4万元,其中100元以下的25名(最少的1人仅有8元的问题),共计金额1010元。在处理经济退赔中,没有一人免予退赔。据了解,像这两个大队的情况在五个试点公社都普遍存在。由于在经济退赔上没有突出政治,很好地实行宽严结合的政策,打击面过大,已经造成不良的后果。有经济问题的干部,心情不够舒畅。重新当选和新当选的干部,有些人在经济问题上不敢大胆负责或不愿负责,要求辞职,特别是他们的家属拉后腿。新老干部之间、老干部与社员之间的团结都不够好,有些新干部看不起老干部,有些社员不听干部指挥。①

河北邢台地区内丘县官庄公社在经济退赔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有的计价不合理。如官庄三大队四队保管何××,使了队里两根檩条一根梁,作价36元,退出大梁一根,柱子两根,木板两块,床、缸各一个,总共才折价30元。本人反映说:"用队的梁檩把价格作的高高的,我退的东西作价低低的,这算合情合理吗?"并说:"当干部造下罪,有理没理不让说话,让我立着检查,摘了帽子,熬了两天鹰,一肚子冤气。"二是少数人退赔后影响了生活。如小日头大队长张××,为退赔拆掉两间房,卖了200斤粮食,一个上小学的孩子也退了学。三是追退的时间过长。如串屯大队会计路××,远在1956年贪污多占90元,这次也让全部退出。

在运动过程中,群众对工作队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如石家

① 吕剑人:《我的回忆》,第178—179页。

庄副食工厂职工群众对工作队提出批评，主要有：一是运动与生产结合不好。有的反映说："工作队抓运动好，抓生产业务差，工作队与车间负责人联系差，影响了生产。"二是开会安排不妥当。有的反映，有时光管开会，不管职工的休息，如下午4点上班，夜里12点下班，第二天早上8点还要开会，一直开到中午12点，影响了职工休息。三是队员作风问题。有的反映工作队员参加劳动少，说："工作队同志才来都是整天或半天劳动，深入调查研究，但现在有的人干一点就走了。这样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有的反映队员生活特殊，指出，"工作队员在生活上要求高，愿吃好的，工人觉得太贵，和工人水平不一样"，"有的队员生活不艰苦，有时看食堂不是好饭，上饭馆买果子馒头吃，这样不好"。有的反映，工作队有的人说话生硬，不够客气，调查不够深入等等。

同时，也有部分"四清"工作队员对运动提出了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运动拖得太长。福建南安县一个队员反映，他们那里的运动已有九个多月，经过运动，该县面貌已根本改观，生产形势很好，新的领导核心也建立起来了。但是省委有些领导人还说，搞运动不要受时间限制，似乎时间拉得越长，运动就越彻底，使工作队员感到遥遥无期。二是工作队员体质普遍下降。福建南安县一些工作队员反映，由于长期生活比较艰苦，最近两个月来，工作队员病号突增，约占总人数的30%以上，许多人已躺倒不能工作了，大部分是水肿、肝病、骨病，营养极度缺乏。三是农忙季节不宜搞"四清"。浙江省委工作团一队员反映，目前已到夏季大忙季节，可是这里的"四清"运动还在进行。群众不止一次地向工作组反映："农忙时间，生产这么紧张，夜晚哪里熬得了！最好农忙季节不要搞，到农闲再搞。"工作队员也很疲劳，入夏以来，大家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来信建议，农忙时期不要搞"四清"运动，要关心队员的劳逸结合，准许休弱有病的

同志回去调换。[①]

应该说，这一阶段运动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把运动的重点转向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准备。到1965年下半年，由于国内外形势日益紧张，毛泽东对这场运动已不太感兴趣了。1965年11月13日至17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安徽、江苏、上海，与各省市领导谈话时，主要内容是谈打仗、备战，抓好生产，对社教谈得很少。同时，毛泽东对文化批判也日益不满，认为"四清"与文化批判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425—426页。

第八章

尾　　声

“四清”纳入“文革”

1966年5月，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同时，各地正按既定计划开展“四清”运动。为了能使“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各地都对“四清”运动进行重新部署，并把“文化大革命”纳入“四清”计划之内。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各地又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四清”，把“四清”又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运动实际上也不了了之了。

华北局为了领导好这场革命运动，动员各行各业的广大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求文艺、教育、新闻、出版、卫生、科研等单位全面铺开，对于党内的“学阀”、“党阀”，对于资产阶级“权威”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定要揪出来，彻底加以批判。同时，对“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进行了部署。一是当前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重点放在大中城市，其中又以党、政领导机关和文教系统为主要战场。二是工交、财贸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一般列入“四清”计划之内，分期分批进行，并且实行分类指导。已经搞过和尚未开展“四清”的，凡是能够发扬民主、放手发动群众的单位，一般可以由本单位党委来领导；问题很多或领导不力的单

位，必须派精干的工作队，进行领导或者进行夺权斗争。正在进行“四清”的单位，由“四清”工作队负责领导；同时，还要准备用一带一的办法，支援那些急需夺权而又派不出工作队的单位。已经搞过“四清”的单位，结合“文化大革命”，搞好“四清”复查。医院、饭店大体依照这个办法。三是在农村中，也要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而又实行分类领导。四是城乡“四清”工作队的人员基本上不动。所有城乡“四清”工作队，要拿出较充裕的时间，以“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进行整训，学习文件，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总结经验，分清是非，进一步革命化，克服右倾思想和散漫习气。五是各级领导，包括工作团(队)长，都必须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挺身而出，站在运动的前面，敢于革命，敢于引火烧身，以便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又能取得领导运动的主动权。总之，对工业、农村、财贸系统的“四清”运动，都要同“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加以安排，基本按照原定部署，坚持进行到底，彻底搞好。要防止在“文化大革命”兴起之后，对“四清”运动采取或者潦草从事、偷工减料，或者大轰大嗡的偏向。

北京市对“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做了明确规定，在文化教育战线的各个部门，要乘胜追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并通过“文化大革命”完成“四清”任务，兴无灭资，巩固与扩大社会主义阵地。在农村，县委、县级机关和中等学校，以及财贸等单位的文化革命，列入“四清”范围，要高举《二十三条》，分期分批，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通过“四清”运动完成“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与“四清”结合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北京新市委认为，把“文化大革命”同“四清”结合起来，革命的内容更丰富了。而且从根本上讲，“四清”与“文化大革命”的重点，都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是为了解决领导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反修、防修，所以完全可以结合。

中南局召开了全区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传达和讨论了中央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并动员五省区积极参加全国批判"三家村"反党黑帮的斗争。揪出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如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河南省郑州大学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等等。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同时,中南局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对"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进行了部署和安排。主要是重点放在城市。大中城市和地委所在的某些小城市,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是目前文化革命的主要战场。所有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学术等单位,都要立即普遍开展运动,加以彻底整顿和改造,夺回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城市工矿企业,要按"四清"的部署,按《二十三条》规定的"三结合"的方法,结合"四清"搞好文化革命。目前正在进行"四清"的单位,要适应当前形势,立即拿出一段时间,结合"四清"进行文化革命,然后继续完成"四清"任务。已经结束"四清"的单位,应当再搞一段文化革命,可根据不同单位的具体情况,依靠党委或派工作组去,发动群众,把"四清"中漏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批判资产阶级,把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搞深搞透。今后新铺开的"四清"单位,应当从清政治入手,先搞文化革命,然后完成"四清"的其他任务。暂时不开展"四清"的单位,应当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文化革命的教育,积极参加声讨报上点名批判的人物。农村文化革命也结合"四清"进行。

东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自5月下旬东北局召开扩大的第十次全体委员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精神以来,进展异常迅速。揪出了一大批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在辽宁是省委书记周桓,在长影是周扬、林默涵、夏衍等人,在哈尔滨是市委书记郑依平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牛乃文。在新闻出版界,《营口日报》、《哈尔滨晚报》以及其他一些报纸的

副刊，问题也很严重。在教育界，东北工学院前党委书记柳运光、沈阳农学院院长张克威、吉林大学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大连工学院院长屈伯川、东北林学院党委书记王禹明，都有严重的问题。为使运动深入开展下去，东北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对东北地区城乡文化革命运动，做了如下安排：一是把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放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首位。二是改变领导落后于群众的被动局面，关键在于中层以上的领导干部敢不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敢不敢于领导，善不善于领导。三是"文化大革命"不论在城市或农村都必须进行，在部署上应当明确重点。就城市和农村来说，重点在城市。就各界来说，重点在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等文化工作部门和市、地以上党政机关。农村社队的文化革命，决定结合"四清"进行。工交、财贸、医疗卫生等基层单位和县直党政机关的文化革命，也应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分期分批地进行。凡是暂时不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单位，都要向群众交代清楚，有步骤地进行文化革命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措施，是为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把运动搞得更好。

西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自6月上旬以来，迅速形成了高潮。特别是6月3日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公布以后，运动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在省(市)一级机关和大专院校、几个大城市的中等学校以及部分地、专机关，迅速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的热潮。广大干部群众集会、游行、贴大字报，纷纷表示热烈拥护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愤怒声讨批判"三家村"，揭发批判张黎群、李孟北、汪小川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同时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从各个方面揪出了一批牛鬼蛇神。为使运动在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更加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向前发展，西南局对进一步搞好"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进行了安排和部署。西南局指出，鉴于

当前城乡都存在着正在进行"四清"、"四清"已经结束或即将进行"四清"等种种不同情况，因此，必须分别采取不同的做法，把"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凡是"四清"运动已经结束的地区、单位，确实达到了《二十三条》的六项标准的，可以在本地区、本单位党委的领导下，在"四清"运动的基础上，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把"四清"运动的成果，大大向前推进一步；没有达到六项标准的，特别是领导核心问题没有解决好的，要重新派工作队去，从"文化大革命"入手，把"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正在开展"四清"的地区、单位，要把"文化大革命"插进去，紧密地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进行。正准备开展"四清"运动的地区、单位，要把开展"文化大革命"作为"四清"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从训练工作队开始，就要认真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文件、社论。目前暂不开展"四清"运动的地区、单位，应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和"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社论、文章，召开一些必要的声讨会。

西北局召开了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揭露和批判了以彭真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初步揭发和批判了西北地区一批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义，挖掉了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埋在陕西的定时炸弹，铲除了陕西反革命黑线的根子。同时，也确定了西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部署。西北局决定，无论城市和农村，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部门，都必须有计划有领导地放手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当前运动的重点应该放在解决省、自治区和地(州)市一级文教部门及其所属单位、高等院校和党政领导机关的问题上。凡是领导权被篡夺的单位，都要派强有力的革命化的工作组，开展夺权斗争，重新建立革命的领导核心。县级机关、县以下文教单位和农村的文化

大革命运动，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和各省区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正在进行“四清”的，要把“文化大革命”作为“四清”的重要内容，搞深搞透。已经进行过“四清”的，要有计划地组织力量进行“文化大革命”补课工作。尚未进行“四清”的，可以仿照面上社教的办法进行。西北局还要求，城乡“四清”运动仍按原计划进行，领导不能削弱，一定要做到既要搞好“文化大革命”，又要搞好城乡“四清”。

华东局于6月3日至6日，召开书记处会议，传达和讨论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关于进一步推进“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在运动中，要进一步组织工农兵和干部大学毛泽东著作，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把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会议研究了以下政策和部署：一是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二是坚定地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和打击右派。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文化队伍。四是“四清”运动要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五是加强党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华东局要求，当前各级党委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文化大革命”，全面安排工业、农业、财贸、小三线建设等项工作。山东省委也规定，农村“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结合分期分批进行，有点有面分类指导。如果搞“四清”的单位不认真开展“文化大革命”，“四清”就搞不彻底，好多坏人揪不出来，有些根子挖不出来，新的领导班子有些也靠不住。今后搞“四清”，就要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以《二十三条》为指导，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彻底揭发问题，然后梳辫子，重点批判斗争，使斗争迅速上纲。

把文化革命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共同打击那些混入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是“文革”初期毛泽东部署运动的既定考虑。这在毛泽东致林彪

的《五七指示》中就有反映。毛泽东指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8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件规定，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①] 9月1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要求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

① 1966年8月9日《人民日报》。

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联。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农村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应在农闲时专门安排一段时间把它搞好。[①]

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四清"运动中的许多做法和部署已不适应文化革命的需要了。1966年11月27日,谭震林就今冬明春开展农村"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几个原则性问题向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写了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文化大革命"与"四清"的结合,《十六条》上是两种提法。现在看来,"四清"运动中下台的干部,只要贫下中农大多数没有意见,也不准翻案,"四清"工作队也应肯定。但是,各地原来的"四清"部署和做法,还有不少框框,繁琐哲学,人海战术,包办代替等等,有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大民主的经验,就不能再按原来的一套部署去做了。应该加以改变,不改变也行不通。因之,似以明确肯定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四清"的提法为好。

随后,中央于12月10日召开了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座谈会,制定了《农村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意见》(供讨论用)。《意见》指出,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村进行了"四清"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阶段,比"四清"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今后的"四清"运动,应当和"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进行。没有搞好"四清"的地区和"四清"没有结束的地区,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四清"。已经进行过"四清"的地区,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结合进行"四清"复查。12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

①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864页。

定》即《十六条》,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二十三条》的原则进行。必须是群众当家作主,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问题。[①]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些地区发生"四不清"干部翻案以及揪斗部分"四清"工作队员的问题,为此,中央又下发了一系列有关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指示。1967年1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通知》指出,现在,有些农村和企业、事业单位要把"四清"工作队员揪回去斗。中央认为,"四清"运动有伟大成绩,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十条》、《二十三条》,都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这是必须肯定的。根据《十条》和《二十三条》的规定,在当时派出工作队,是正确的,不能说是错误的。至于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受形"左"实右路线的影响,犯了一些错误,主要应由错误路线的提出者负责。因此,中央决定,"四清"工作队的同志,一般的不要揪回去斗。对于"四清"工作队的同志有意见,可以用写信、送大字报或者其他方式提出。必须保卫"四清"运动的成果,不许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下台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不许他们兴风作浪。[②] 2月20日,中央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信中号召贫下中农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绝对不许地富反坏右分子乱说乱动,破坏生产,破坏劳

---

①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862页。

② 同上,第864页。

动人民之间的团结，挑动宗派纠纷。在"四清"运动中下台的干部，必须积极参加劳动，改造自己，不许反攻倒算。[①] 3月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通知》要求，在已经"四清"过的地方，决不允许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下台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要坚决保卫"四清"运动的成果。[②] 1967年12月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规定"文化大革命"要继续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即《十条》的原则进行。同时文件指出，《前十条》和《二十三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根据这两个文件进行的"四清"运动，有伟大的成绩，必须肯定。"四清"运动遗留的某些问题，可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解决。[③]

此时，毛泽东对"四清"运动早已不感兴趣了。1967年2月8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卡博以及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④] 这样，"四清"运动就无法开展下去，而让位于正在蓬勃开展的"文化大革命"。

截至1966年上半年，全国结束"四清"运动的地区，有694个县、市、旗(其中包括少数只搞了一部分的地区)，占总数的

①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865页。

② 同上，第867—868页。

③ 同上，第869—870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

32%。分省来说，占11%至20%的有湖北、陕西、贵州、云南等四省。占21%至30%的有吉林、黑龙江、甘肃、新疆、四川、广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等十省。占31%至40%的有山西、内蒙古、宁夏、河南、广东、湖南、福建、山东等八个省。占41%至50%的有辽宁、河北两省。青海农业区完成66%，北京市以公社计完成92%，上海市全部结束。加上随后开展的单位，全国开展"四清"运动的重点地区超过三分之一以上。其他地区则普遍开展了面上的"四清"，全国的厂矿企业大体上也是这种情况。县以上各级机关和大、中、小学校及文化单位，则普遍开展了"四清"运动。

历史评价

持续四年之久，有数百万工作队员下乡进厂，波及全国三分之一广大地区的"四清"运动，已经过去40年了，历史已进入21世纪。这场运动在当时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认为运动对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对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都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但历史是无情的，"四清"过后，一场所谓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从而把中华民族拖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社会大动荡。因此，我们今天应如何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政治运动？应该对这场运动做怎样的历史定位？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四清"运动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历史决议》指出，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

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历史决议》的评价为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指出了方向。

具体而言，"四清"运动在许多方面还有值得肯定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运动对改善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开展"四清"运动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认为基层干部作风存在严重问题，认为"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有许多人犯有大大小小的错误，其中有一些人的错误还比较严重"①。"在我们一部分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确有滋长。突出的表现是：损大公、肥小公，打埋伏、耍手段，只顾局部、不顾大局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分散主义，特别是本位主义滋长起来了；贪图个人享受、讲排场、铺张浪费、假公济私、走后门、破坏制度、损人利己、多吃多占、滥用国家资材、挥霍人民血汗的现象，也滋长起来了"②。

不可否认，上述情况在60年代前期的干部队伍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势必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严重损害党与群众的关系，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此，在"四清"运动期间，中央要求各级干部要"好好地洗洗澡"，对社、队普遍存在的"四不清"矛盾，"必须予以解决"，使"四清成为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首先是基本核算单位的一项经常制度，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主义教育"；要求干部必须积极

---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第405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173页。

参加生产劳动，这“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认为“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①]；要求“建立和健全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②]。并把“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作为衡量“四清”运动是否搞好的重要标准之一。同时，运动期间中央一再要求，“各级党组织的负责同志还必须有计划、有选择地蹲点，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③]。要求“领导人员亲自蹲点。省、地、县各级的主要领导人员，都必须亲自蹲点，以便取得经验，做出样子，指导和带动全盘运动”[④]。中央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⑤]。

应该说，上述措施和要求都是正确的，对解决干部队伍中的不良作风，使干部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许多干部在蹲点的过程中，了解到农民群众中存在的困难，并为他们办了很多好事。比如杨尚昆曾在日记中写道：经过很多同志蹲点，现在不是已经提出来卫生部门要下乡为人民服务吗？我们中国7亿人口，差不多有6亿在农村。全国解放以后，卫生工作虽然有很大发展，但基本上是在城市，农村里头很少，农民没有地方看病。城市里头医院修得很漂亮，农村里连一个医务所也没有，牛鬼蛇神利用“行医”就出现了。农民看不起病，药费太高，住院费太高，所有蹲点的人都反映这个问题。所以中央这一次准备把卫生部门赶下乡去，目前医务人员已经去了。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321—325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231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326页。
④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233页。
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329页。

文化也是这样，就拿唱戏来讲，尽是唱一些搬不动的戏，光是道具几个汽车还拉不出去。不只是北京，县里头也有这个问题。农村里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演一次电影30块钱的出租费。30块钱呀，同志们，农民一个人一年的收入就差不多了。所以，农民看不起电影。现在中央不是准备把文化人员赶下乡、把演戏的也赶下乡吗？所以，蹲点对我们确实有很大的好处。可以了解政策，哪些是合适的，哪些是不合适的，应该改进。[1] 在广西梁同蹲点的时任广西区委第一书记的韦国清，发现当地缺少碾米加工厂，便与有关部门联系，把电线拉到梁同，给家家户户安装了电灯，并在下垌、大梁、五里、坛周几个地方办起了碾米厂、粉碎加工厂、电动打浆机，大大方便了群众。[2]

第二，"四清"运动虽对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运动过程中始终强调抓生产，并没有因开展阶级斗争而放松生产工作。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一方面大讲阶级斗争，一方面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给经济工作带来的干扰，他接受了刘少奇等人的意见，提出了"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阶级斗争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3]。在"四清"运动中各地都强调了运动同生产的紧密结合。在城市"五反"运动中，中央强调"在运动的各个阶段，都必须以增产节约为中心"，"决不能因为开展群众运动，放松对日常生产的领导，放松巩固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的工作，更不能打乱生产秩序和工作制度、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前十条》提出了农村中的十个根本问题，要求各地"在不误生

---

① 《杨尚昆日记》下，第653页。

② 何绍榜：《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194页。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8页。

产、密切结合生产的条件下，分期分批地有步骤地推行”[1]。《后十条》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进行，必须同生产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运动进行的每一个步骤，都不能耽误生产。运动中的一切措施，都应有利于生产。在整个运动中间，随时都要注意把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引导到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包括集体副业）生产上去。”[2] 在《二十三条》中，除把增产作为搞好运动的一条标准外，还规定财贸机关应当在投资、贷款等方面，适当支持进行“四清”地区的生产建设。并提出“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各方面都有所前进”[3]。

在各地指导“四清”的许多领导干部也积极贯彻中央的指示，一再强调抓生产。如杨尚昆在陕西长安县搞社教时强调：“一定要自始至终抓生产，因为我们搞社教，最后都要落实到生产上。要跟老百姓讲清楚，不要耽误生产。工作队开会，也不要耽误生产。冬闲的时候，是搞社教的黄金时间；一到农忙，你要开会，就很不得人心。总之是要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样就得人心，不然社会主义教育不得人心。”[4] 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在曲阜搞社教时说：“只抓社教，忽视生产，不符合群众要求，也不符合《二十三条》对运动的要求。每个工作队员，一定要了解，只抓社教，不抓生产，社教搞不好。”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直言：“如果运动结果不是增产而是减产，社教的声誉就会一落千丈。这么多工作队搞这么久，搞出个减产，谁还愿意搞社教！”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强调：“政治挂帅很重要，但是如果生产搞不好，如果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175—176、328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第392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第28—29页。
④ 《杨尚昆日记》下，第659—660页。

不能增加物质财富，就是空头挂帅。"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宣讲《二十三条》时也指出："生产极为重要，生产搞不好，别的工作都搞好也不行。生产搞不好，还有什么大好形势！生产千万耽误不得，生产耽误了，什么政权也好，都要完蛋的，不完蛋也要完蛋一半。"

可以说，这些政策措施的执行，对于在"四清"运动中，坚持抓紧工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指数，1949 年为 100，1956 年为 276，1965 年为 476.3；同一时期的工业总产值指数为 100，502.1，1108.8；农业总产值指数为 100，178.8，203.6。从 1956 年到 1965 年，全国钢产量由 447 万吨增加到 1223 万吨，煤产量从 1.1 亿吨增加到 2.32 亿吨，发电量从 166 亿度增加到 676 亿度，原油产量从 116 万吨增加到 1131 万吨，棉布产量从 57.7 亿米增加到 62.8 亿米。1965 年粮食产量 3891 亿斤，基本相当于 1956 年 3855 亿斤和 1957 年的 3901 亿斤的水平。因此，薄一波指出："前后历时四年的'四清'运动虽然也给工农业生产带来消极影响，但同 1959 年、1960 年反'右倾'斗争比，影响要小得多。"①

第三，"四清"运动对改善经济管理，健全巩固集体经济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打击了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刑事犯罪活动，刹住了歪风邪气，在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中央在开展"五反"和"四清"的指示中指出，目前无论在国营企业或者合作社企业中，无论在生产过程或者商品流通过程中，都存在着很多严重的缺点和问题，存在着严重浪费国家资财的现象。在农村，普遍存在"四不清"问题，如账目不清、财物不清、工分不清、库存不清等。因此，在城市进行了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在农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1291—1292、1315 页。

村进行了经济“四清”。在城市中,规定“无论在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物资管理、财务管理方面,也无论在政治工作、职工生活、组织领导等方面,都要根据或参照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和国营商业经营管理条例草案的规定,把必要的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①。在农村,规定了要实行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定期公布账目、工分,制定了一些必要的财务制度。这些措施对于改善经济管理、堵塞漏洞、巩固集体经济起了积极作用。同时,在运动期间,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敌对分子的违法犯罪活动,“四清”运动对这些破坏活动和犯罪活动进行了斗争,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安定,刹住了歪风。

但是,“四清”运动毕竟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运动的基本方面是错误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国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十分严重的脱离实际的错误估计。“四清”运动在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上,过分夸大了敌情,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已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提出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主要手法是搞和平演变,从内部寻找代理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并认为有三分之一的基层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有些地区三分之一还打不住。

但是,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许多基层干部对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提出疑问。如某大队一名支部委员说:“高级社成立以后,大队和生产队治保干部负责对四类分子进行监督、教育和改造,分工明确,工作有序。另一方面,有些四类分子也老老实实做人,争取早日摘掉帽子。这样不是蛮好吗?为什么又要搞阶级斗争,闹得人心惶惶,过不上安稳日子?”某大队干部谈了对四类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179页。

分子的看法，他认为，四类分子在经济上决然没有什么优势，他们的生活低于农村的平均水平，在政治上处于农村的最底层，部分失去了说话和行动的自由。他们人数很少，每个大队才几个人。虽然他们中的有些人对政府不满，但决然不可能掀起政治风浪。四类分子已经是死老虎，完全没有必要对他们兴师动众，搞什么阶级斗争。[①] 有的农民说："运动中向干部猛烈开火的人包括：过去有病或有困难找干部帮忙，结果不能完全如愿的人；有要求建房，但因地点不对，得不到干部批准的人；另外是因为嫉妒干部偏爱其他农民而非自己，甚至还有计较三代之前仇恨的人。这些理由全都出于自私的个人动机，根本不是毛主席所说的阶级斗争。"[②]

有些人对农村阶级斗争情况是否真正像文件中所指出的那样严重，半信半疑，准备"到农村去看个究竟"，一进村，许多人就"提着灯笼到处找阶级斗争"，但看到的是"平静的山村，一片和平景象"，"看不见阶级斗争"。有的人参加村里对四类分子训话会，开始满以为"地主样子一定都很凶恶，进屋一瞧，都是些老头子，耷拉着脑袋，挺老实"[③]。李雪峰在华北城市"四清"会议上也指出："究竟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没有阶级斗争，干部中的认识始终有问题，有反复，特别是工作队干部。有些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到工作中的一些毛病，便压根儿连主题也丢了，否认阶级斗争。有些人开始时承认有阶级斗争，但经过一段工作以后，又不承认了。"可见，人们对阶级斗争大量存在的事实是有

---

①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48—149页。

② 陈佩华、赵文词、安戈著，孙定国译：《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

③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郊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汇集》二，第3、18页。

所怀疑的。杨尚昆在长安搞社教时认为:"在村子里头,那些真正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还是少数,那些真正坚决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也不多,也是少数。"① 在广东阳江搞"四清"的舒光才认为,所谓基层政权三分之一不掌握在我们手上的估计是不符合事实的。从东平公社乃至整个阳江的"四清"运动的情况来看,基层党组织总的来看是好的,广大基层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蜕化变质分子是极少数,这是基本的最主要的事实。②

云南省委在传达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省委扩大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在农村中从开展一次两条道路的斗争入手,通过这样一个政治运动来解决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在印发《总结报告提纲》时,为避免误解,有意识地保留了"不需要从两条道路斗争入手",回避了"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字句。但随后下边反映,省委明确讲了"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非常得人心。为什么正式印发的文件上没有了呢? 是不是错了? 因而产生"疑虑"。为此,省委认为不要回避"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句话,还是写明了好。随即确定再正式印发一个省委文件,这就是《批转省委宣传部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并在第七稿将"不需要从两条道路斗争入手"改写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③。

应该说,上述材料足以说明,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中国社会,并不存在"四清"运动时期所描绘的那幅可怕的阶级斗争

---

① 《杨尚昆日记》下,第658页。

② 《一个红军战士走过的路——舒光才回忆录》,第308页。

③ 李原:《云南"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省委文件出台记》,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

图景。在不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大搞阶级斗争，只能是无中生有，人为制造，从而在理论上和实际生活中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恶果。

第二，严重扩大了打击面，挫伤了一部分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作为重点开展"四清"运动的县社队，几乎都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阶级敌人不仅有已经划定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而且有漏划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基于这种估计，许多社队重新划定了阶级成分，进行民主补课，将一部分群众划入了阶级敌人一边，给戴上了漏划地主、富农、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坏分子等帽子，进行批判斗争。同时，也提出了"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的观点。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剥削量等阶级划分的具体内容已不存在的情况下，还强调划分什么阶级成分，对于农民来说，只能使他们背上沉重的包袱。早在1949年10月11日，党中央以"新华社信箱"的名义答复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时就指出，在彻底完成土地改革的农村中，不要强调阶级划分，特别是不要强调中贫农的界限，否则，对发展生产是不利的。"四清"时期在城市强调重划阶级，在农村搞阶级档案等等做法，实际上不利于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去努力发展生产。

对于农村基层干部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总体估计下，看得十分严重。认为"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有许多人犯有大大小小的错误，不仅有经济上的'四不清'，而且有敌我不分、丧失立场、排斥贫农下中农、隐瞒成分、伪造历史等等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其中有一些人的错误比较严重，甚至已经蜕化变质，成为阶级敌人的代理人和保护人"。由此提出，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可以依靠的

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能依靠"[1]。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普遍地产生了打击面过宽，撤换、处分干部过多等现象，使一大批党员和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从而影响了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有的干部甚至一时怨气地说：发誓不让子孙后代当干部。[2] 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仁颇有感触地说："我们这些年，年年整社，实际上就是整干部。农村有的干部反映，我们在春天是好人，在夏天是忙人，在冬天是罪人。你冬天整得他不想干了，春天又动员他当干部，结果整一次伤害一次积极性。要总结经验教训。"[3]

第三，"四清"运动造成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受到干扰。为了克服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带来的农村严重困难，1961 年中央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并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农业六十条》在许多方面对人民公社原有体制作了相当程度的改变。比如缩小社队规模，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可以耕种自留地、开垦零星荒地、饲养家畜家禽等，并把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等等。应该说《农业六十条》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但在随后开展的"四清"运动中，为了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有些县社队将包产到户视为"刮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予以取缔和严厉批判，并无视《农业六十条》的规定，随意没收社员的自留地、开荒地，搞生产大队核算，或者继续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资金搞集体建设。四川、陕西、山东、吉林等省有些县、

---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9 册，第 248、226 页。

② 《一个红军战士走过的路——舒光才回忆录》，第 309 页。

③ 中共北京市委《刘仁传》编写组：《刘仁传》，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99 页。详细情况请参阅本书第二章"农村'四清'试点"一节、第三章"'四清'铺开"一节、第六章"夺权斗争"一节、第七章"大四清"一节。

社、大队，为兴修小型电站或水利工程，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资金。有的硬性摊派集资任务，以致使社员卖猪、卖口粮交款；有的对根本不受益的大队或生产队也分派集资任务，导致挤占社员分配，影响当年生产、生活。更为突出的是，各地还普遍对农村集市贸易加强了限制，认为农村集市是资本主义活动的场所。一些由于经营家庭副业有方、在集市出售商品较多，或者由于经营小商摊等赚了钱的社员，往往被当作"资本主义倾向的代表"予以批判斗争。上述种种现象，使《农业六十条》中的许多经济政策在一些地方未能落实。这不仅在农民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而且严重妨碍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四，运动中，许多政策界限并不明确，甚至根本不正确。开展"四清"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反修防修，但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在中共党内并没有作过认真的深入的研究，也没有作出科学的解释。按照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等著作中和斯大林在《季诺维也夫所理解的修正主义》中所作的准确解释，从根本上说来，用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全面推翻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否认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能够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否认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否定无产阶级，否认无产阶级采取革命手段去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的而奋斗，这些观点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采取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才是修正主义。由此可见，修正主义的概念是绝对不容许滥用的。

但是，毛泽东对修正主义的看法随意。他多次讲修正主义就是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而所谓的"三和一少"，是指王稼祥 1962 年提出的对别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援要看其发展情况采取适当的方式，并且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正确意见。所谓"三自一包"，是指邓

子恢1962年提出的克服经济困难的一些措施，如适当扩大社员的自留地、搞家庭副业的小自由，恢复和发展农村集市贸易，允许社员实行包田到户等生产责任制。这些意见本来是完全正确的，却被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给说真话的彭德怀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把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看作是修正主义，甚至认为宋江也搞了修正主义。实际上，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的东西，很多是正确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的。

比如“走资派”。这是毛泽东在“四清”后期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认为“四清”运动的重点就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毛泽东没有对“走资派”作出过明确的解释，党和政府的文件也没有提出过判别“走资派”的具体条文。陈毅曾当面问毛泽东，什么是走资派？我是什么派？毛泽东说，党内的，当权的，又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就是党内走资派。你陈毅同志是当权派，只要走社会主义，当权派还可以当下去。据参加中央制定《二十三条》会议的人回来说，在会议上，并没有讨论清楚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彭真在1965年2月18日通县“四清”分团书记会议上，对解决极少数性质严重的人的问题，没有用“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而是用“只整顽固不化的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极少数分子”，两种提法大不相同。[①] 刘少奇也不赞成这种提法，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称作为一个派，人数就太多了。[②] 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在经过试点和反复调查研究后，于

① 赵有福：《彭真与京郊农村“社教”运动》，载李海文主编：《彭真市长》，第70—71页。

②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03页。

1966年1月提出，边疆“不搞整党内走资派”，“可以先从生产、生活搞起，让群众增加点收入，同时开展一些文化、教育工作。把一般情况摸一摸，把步子放稳当一点”①。

再如“清政治”。这是《二十三条》颁布后，“四清”运动开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很多地方都专门划出一段时间清政治。应该说，清政治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它需要界定具体的对象，如什么是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异己分子？什么是蜕化变质分子？什么是漏划的地富反坏分子？可以说，上述工作都涉及阶级划分问题。即如何评审四类分子？如何划分新富农？如何界定划分阶级成分的时间标准？这些工作都需要制定明确的政策，否则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在陕西长安搞“四清”的杨尚昆同志希望中央对下列问题尽快给以提示，即中农划不划？地富如何划？新资产阶级分子或新富农是否划？阶级档案是否还要搞？并说，全国各地对以上问题可能也急需中央指示。② 但是，中央并没有专门就此问题制定出正式的文件。因而许多地方规定了甚至比土地改革时期还严厉的政策，如规定新查出的地主、富农的多余房屋、财产等都要没收，认为许多地区都是“和平土改”，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要重新补课等。这就不仅错划了一部分干部、群众的阶级成分，而且使他们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

第五，“四清”运动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为“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准备。一是理论上的准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这一“左”倾理论不仅为全党所接受，而且很快付诸实践，指导“四清”运动。由于“左”倾理

---

① 李原：《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8页。

② 《杨尚昆日记》下，第526页。

论与“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阶级斗争一再被人为地放大，从而证明了毛泽东“左”倾错误理论的正确，证明了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于是《二十三条》进一步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实际上就提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最基本的理论根据。二是实践上的准备。“四清”运动期间，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夺权斗争，大搞怀疑一切，无限上纲，把任何问题都归结到阶级斗争上来认识，上升到政治问题来处理。搞人人过关，“有鱼没鱼掏干了看”，鼓动群众斗领导，认为不斗，就显不出革命的样子。于是，在运动中刮起了一股非法斗争的歪风，什么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这些做法，无疑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打、砸、抢”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经验。三是“四清”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某种题材和动力。“四清”运动中所犯的一些“左”的错误，在社会上累积了大量的矛盾和纷争。而这些矛盾和纷争在“四清”运动期间被暂时压了下来，“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召开群众进行“四大”的旗号下，又一触即燃，许多地方发生了翻“四清”运动案子和揪斗“四清”工作队员的事件，助长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派性斗争。

但是，从整体上看，“四清”运动的错误还只是局部性的错误，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这和“文化大革命”是不同的。“四清”运动只是在全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城乡地区开展，而且是有领导分期分批地进行；当时国民经济的调整居于主导地位，始终是党的工作重点，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还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①尽管在理论上提出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456页。

观点，但在实际中并未来得及加以全面贯彻；当时规定的一些具体政策有不少是正确的，对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偏差，也作过一些纠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包括“四清”运动在内的十年建设时期作出了总体的评价：“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①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2 页。

附录一

四清运动大事记

（1957年—1967年）

1957

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

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出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指出：在目前农村中，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

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第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等等。教育的方式是:利用生产间隙和休息时间,在全体农村人口中就这些题目举行大辩论,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的变化。对于这些问题的辩论,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通过辩论,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使爱国、爱社和爱家的观念在群众中统一起来,并普遍地养成勤俭办社和勤俭持家的风气。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反动的煽动言论必须及时地有力地给以反击。对于群众的误解和错误意见,都必须采取很好的态度,加以解释和说服,对于富裕中农的错误言论的态度,也应该这样。

1958

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对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做出了与八大一次会议完全相反的结论。会议通过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说:"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会议宣告:"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一个是工人阶级。这次会议上的错误论断,对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严重"左"倾错误的发生

和长时间持续，产生了深远的消极的影响。

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要求，就农业社的收入如何分配问题和是否建立人民公社问题进行鸣放辩论，要求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以无数大增产的实例，来大讲特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坚定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彻底批判一部分富裕农民残存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在人们的思想上继续破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大立共产主义。并且引导群众回忆三年来“马鞍形”的历史教训，彻底批判“靠天吃饭”的“条件论”和“照着前人脚印走路”的“习惯论”，大破右倾保守、甘居下游的思想，大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思想，使“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不仅在大丰收的事实面前哑口无言，而且在思想上彻底破产。应该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插起来，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

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国家干部队伍有几百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有几千万人，他们的思想、生活作风影响着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这个队伍完全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为此，决定各机关、部队和各企业、事业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除年老有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或只能参加轻微的体力劳动的以外，每人每年必须用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1959

4月3日，毛泽东在《麻城的经验》一文批示指出：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干

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5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4月20日,中央批转关于算账等问题的四个文件。中央指出,现将《中央组织部关于湖北省麻城县算账问题的材料》、《浙江省委转发绍兴县东湖公社算账会议的报告》、《吉林省委关于重算一九五八年分配账目的报告》、《江苏省委关于召开人民公社代表大会的部署的报告》等四件,都转发各地参考。从这四个材料看,算账问题是当前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随着解决了。算清账目的关键是省、地、县、公社四级党委的决心问题。只要下了决心,一天一晚就可以基本上弄通思想,只要反复打通思想,用帮助干部下楼的办法,事情就可以顺利地进行。

5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省委关于处理人民公社干部经济手续不清问题的规定》。规定说,目前,各地在清算人民公社的"旧账"中,发现公社各级干部手续不清的现象相当普遍,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应该坚决地加以批判纠正。鉴于这些干部绝大多数本质是好的,工作是积极的,经过教育,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因此在处理时应坚持思想从严、处理从宽,做到少处分人,把处分面缩小到最小程度。

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对算账和召开社代表大会等问题的指示,要求从现在起,集中全力搞好农业生产。还没有召开代表大会进行算账的公社,可以等到秋后或者其他的农事间隙时间,再来清理1958年的账目,开代表大会改选干部。在账目已经清算的单位,应该退的一定要退,有钱退钱,有实物退实物,无钱无物的记上账,缓期分期退还。在尚未算账的单位,应通知各级干部将应该退的实物,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主动退还原单位,以利生产,并取得社员谅解。

10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在10个公社中选择10个大队结合生产进行整社试点，即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经验，指出：湖南的试点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表明，目前在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10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各级党委对此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安排一个适当的时间，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领导上一手抓政治、一手抓生产，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群众，用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一次整社、整风运动，并且结合着进行整党、整团工作。

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部分中央和省、市领导人会议。会议印发了杜勒斯的几篇演说，内容都是讲和平演变的，毛泽东要大家看一看。毛泽东说：杜勒斯讲他要以什么"法律和正义"来代替武力。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变到合乎他的那个意思。美国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毛泽东还特别讲到，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基础的。

11月4日，中央批转《湖南湘潭地委关于整社运动中掌握重点批判对象面的问题的意见》。指出，根据已经进行整社试点的几个省的经验，重点批判的人数(包括基层干部和党员在内)一般地以控制在全县农村人口总数的1%以下为宜，态度必须实事求是，没有批判对象的单位，不要硬找或勉强凑数。思想批判必须从严，方法上要和风细雨。被批判的农民和一般农民党员不要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党员干部中那些确实属于右倾机会主义的人可以戴帽子。

11月28日，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的两个报告。《报告》指出,广东省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九月中、下旬开始试点,十月上旬全面铺开,通过层层整顿干部队伍和全民性的鸣放、算账、回忆、对比、辩论与重点批判上中农代表人物,到目前为止,以"三大万岁"和党的领导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已经基本结束。运动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基本上澄清了对"三大万岁"的糊涂思想。

1960

3月23日,中共中央对《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的情况简报》作出批示。《简报》反映,在一些县、社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刮起来了。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中央认为,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的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

4月22日,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在列宁的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报告,《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的文章。这些文章对苏共的一些论点和做法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提出了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任务。

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规定,这次"三反"运动的内容,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以反贪污为重点。凡是有贪污行为的人,不论贪污数量大小,都必须退赔,计算时间一般从1959年算起。通过这一运动,主要达到两个目的,即普遍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同时,对

隐藏在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加以清理，以纯洁我们的组织。

5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在中央国家机关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央肯定了这一《报告》，并指出：凡是对反官僚主义斗争抓得不紧的单位，应当迎头赶上去，不能都是落在后边缓步不前。凡是已经全面展开了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单位，应该贯彻始终，获得全胜。

10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晋、冀、鲁、豫、北京五省市农业书记会议纪要》，并作批示，要求必须继续完成"三反"整风整社运动，彻底肃清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和某些干部的特殊化作风，清洗混入我们队伍中的不纯分子。

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今年冬季，必须下决心，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展开一个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整风整社是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必须坚决依靠群众，大鸣大放，用领导和群众"两头挤"的方法，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把农村三反贯彻到底，把整风整社搞深搞透。坚决反对：(1)贪污，(2)浪费，(3)官僚主义。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反对干部引用私人、徇私舞弊、打骂群众的国民党作风。要通过整风整社运动改造落后地方和落后社队，纯洁公社各级领导机构，纯洁农村党的组织，进一步发挥农村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核心作用。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

11月15日，毛泽东对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五人小组《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的批示，把农村问题归结为坏人当权，打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对

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指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种歪风的纠正。

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的批示》,指出:贵州遵义和毕节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严重情况,特别是干部中的极其严重的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可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权、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

12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中央总结了近两个月来各地区整风整社试点的经验,确定进一步开展农村整风整社运动。中央指出:各地整风整社的情况表明,农村中约有80%的县、社、队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只有约20%的县、社、队存在着性质不同和程度不同的严重问题。即使这20%的地区,也可以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把局势从根本上扭转过来。中央确定,1961年所有社队都必须以贯彻执行十二条紧急指示为纲,进行整风整社。要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要彻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要彻底清算平调账,坚决退赔。在运动中,首先应当集中力量整顿三类社队,而且首要的一着是解决领导权问题。三类社队的整顿,主要依靠原有组织的力量,上面也必须派工作团去加强领导。

1961

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河南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报告》,即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这

个《报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夸大了敌情，把1959年度粮食大减产，发生饥饿、疾病和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现象，统统说成是"坏人当权"，是反革命集团、封建地主势力进行的破坏活动，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内部肃反、社会镇反不彻底"所造成的。因而提出"坚决撇开原有组织、依靠工作队和贫雇农"，夺取领导权，进行整风整社，以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做法。中央批示肯定了信阳地委这个报告，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有分析，有办法，有步骤。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中央这个批示助长了整风整社运动中"左"的倾向的发展。

1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指出：前几年农村也整了，不彻底，但是没有料到地主复辟的问题。我们党内也有代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据林总报告，军队1万个单位烂掉400个，4%，这不是粮食问题，而是领导权落到敌人手中了。这种情况在城市、工厂、学校也一定有。凡是三类县、社、队，大体上都与反革命有关。就全国说，90%以上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社、队80%是好的或比较好的。

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纪要》指出：农村约有80%的县、社、队是好的或基本上是好的；只有约20%的县、社、队存在着性质不同的严重问题；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只有近7%的干部是犯有严重错误的或比较严重错误的，其中真正属于五类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约占3%。首先解决三类社队的领导权问题，把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提出派工作团，用扎根串联的工作方法，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3月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农业六

十条》对于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基本核算单位等方面的问题,都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这个《条例》后来几经修改,一直执行了20多年之久,对我国农村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3月20日,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安徽农民搞"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希望得到理解和支持。随后,4月27日、7月24日,中共安徽省委又两次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书面报告,汇报了"关于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和"关于试行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取得了毛泽东的同意。

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强调农村的整风整社工作必须进行到底,不能草率结束。今后在整风整社中,不要预先划分社、队的类别和干部的类别,也一般地不要在群众中重划阶级成分。对各个社、队和干部的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慎重地作出结论,不要拿"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框子到处去套。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出:这次教育,要结合六十条的规定,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要向农民宣传工农联盟、城乡互助以及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重要意义;要向农民宣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传统。下面的七个问题,在这次教育中,应当着重宣传:(1)努力发展生产,克服当前困难;(2)提高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3)正确对待家庭副业;(4)发扬爱国热情,积极完成征购任务;(5)积极支援城市,支援国家工业建设;(6)厉行节约;(7)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次教育,要结合农村的各项具体工作进行,不单独展开运动,要完全采取正面教育的方法。

1962

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各级党委以及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负责人7000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1958年以来的经济建设工作和1962年的调整任务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会议对统一全党对形势任务的认识，促进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继续深人，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2月13日，中共中央制订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示》决定，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应把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普遍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要求至少在30年内把这个体制稳定下来，不能任意变动;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改为生产队后，人民公社仍然是一个完整的集体经济组织，公社内部仍然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生产队仍是生产大队这一级经济组织的组成部分;生产大队仍然要在公社的领导下，在全大队范围内对经济方面和行政方面的许多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中央认为，对于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必须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强领导，加速进行。当前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

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

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还批评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12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安徽改正“责任田”的情况报告》。《报告》反映，自1962年3月20日中共安徽省作出《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以来，全省已改正“责任田”的生产队有6.01万多个，占实行“责任田”生产队总数的23%。要求在1963年春耕生产以前改正一批，其余部分在1964年春耕以前改正过来。

1963

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严禁打人的通知》。《通知》指出：根据许多地区的材料反映，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些地方发生打人和乱搞斗争等违法乱纪现象。这件事应该引起全国各地党组织的严重注意。请各地的县一级以上党委，立即进行一次检查，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防止纠正。

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并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会议印发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中央认为目前无论在国营企业或合作社企业中,无论在生产过程或者商品流通过程中,都存在着严重浪费国家资材的现象。在党政机关、群众团体、部队、学校以及其他事业中也存在许多浪费现象。同时党内有些干部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有所滋长,尤为严重的是,贪污盗窃国家资材、投机倒把、长途贩运、私设地下工厂、牟取暴利等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资产阶级活动猖獗起来了,并且新生长起来一批资产阶级分子和一股资本主义势力。因此,中央决定,必须坚决打击。此后,中央以及地方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相继开展了"五反"运动的试点。

3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的调查材料。中央认为,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昔阳县的同志能够这样做,所有各县也可以这样做。

4月4日,保定地委向河北省委写出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向省委的报告》。河北省委认为保定地委的"报告很好",批转全省参照执行,并上报华北局、中央及毛泽东。中央及毛泽东对保定"四清"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中央称保定地委的报告"极为重要,写得很好"。毛泽东在修改《前十条》时,加上"河北保定地委的同志到农村进行调查,发现了农民迫切要求社、队认真地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一段。可见毛泽东对保定地委的做法非常重视。《前十条》中专列"四清"一条,重点介绍了保定"四清"经验,并认为"这个经验是重要的,应当推广"。在5月杭州会议上,毛泽东讲:"河北现在有十个地委,下去调查都不去了,但只有保定地委才是真正的调查,保定地委开始也不是四清,是去搞分配问题,

群众不同意，要四清。听群众的，才是真正的调查研究。”

4月9日，中共中央将华北局《关于华北区农村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情况汇报》转发全党参阅。《汇报》说，根据华北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调查分析，感到在许多农村有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必要。一般说来，它的主要作用是：把基本群众组织起来，在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中有了明显的阶级队伍和阶级阵营，使基层干部和基本群众觉得自己的力量强大；它在党的领导下，向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运用自己的组织力量，团结中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打击地、富、反、坏分子的复辟活动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等。实践证明，建立这一组织是完全必要的，如能运用得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五月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于20日颁发，并带有七个附件。文件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当前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文件列举了阶级斗争的九条表现，认为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另外还有“反革命分子”在进行罪恶活动，除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包括“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文件提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认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说来，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如果“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强调依靠贫下中农，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并认为河北保定地委开展“四清”的经验是重要的，应当推广，使“四清”成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一项经常制度，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主义教育”。《前十条》是整个“四

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对整个运动的进程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5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批示》认为，河南省委“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报告所说的其他各项政策也是对的”。“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

6月14日，毛泽东在同林铁等谈话时提出农村三分之一不是社会主义：你们跟湖北差不多，湖北同志讲他们(那里被篡夺的基层)是占三分之一，有的土改就不彻底，有的后来变了，有的是富裕中农当权，这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不是社会主义的，他们挂的是社会主义牌子，实行他们的一套。

7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吉林省委“五反”简报上反映的边反边犯的几个事例的材料。中央指出，在“五反”运动期间，仍然发生请客送礼、多吃多占、特殊化走后门这类事件，很值得注意。要把这些事例作为活的教材，反复教育干部，边犯就边反，进一步把“五反”运动搞深搞透。

9月6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一篇评论文章，至1964年7月，相继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简称“九评”。这些文章围绕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同苏共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论战。

9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就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若干政策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

案)》即《后十条》。这一文件的制定是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多次讨论后集体智慧的成果，是对社教试点的经验总结，也是“带有一定反‘左’和防‘左’意义的文件”。如文件对团结两个95%的政策规定、强调社教必须同生产相结合、整顿党的组织、干部参加集体劳动以及对中农和地富子女的处理政策等等，这对于防止扩大打击面、改进党的作风、促进农业生产，从而保证运动健康进行，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后十条》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要“挖修正主义根子”，并且提出了“一纲五点”，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五个要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并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方针。这就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使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待侨户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历年制定或批准的各项侨务政策，尤其是关于土地制度、改变侨户地富成分、争取侨汇、进口粮食、副食品和化肥等有关侨务政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和运动以后，都必须贯彻执行，不得任意加以更改。

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决定将两个文件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发出两本，由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领导干部负责向全体党员和全体农民宣读。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一切党支部都要发给两本，由市委、区委指定负责干部用口头向一切人宣读。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警察，照此办理。民主党派成员，由统战部召集大会小会宣读，并发给他们阅读。同时，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以利于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通知》要求做一次伟大的宣

传运动,使《前十条》和《后十条》在全国家喻户晓。通知发出后,各地先后开始了"双十条"的宣讲活动。

1964

1月2日,中央批转了《中央监委关于五反运动中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在"五反"运动中,党的一贯指导方针是:敌我问题从严,人民内部问题从宽;在人民内部问题中,批评自我批评从严,党纪、政纪、法律处分要分别情况,酌量从宽,必须严肃与谨慎相结合。在运动开始时,重点是使干部、群众认识问题的严重性,防止麻木不仁,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以后,即在运动中期和末期,不仅要防止"虎头蛇尾"、"走过场",尤其要防止把问题扩大化,防止打击面过宽,处分人过多,而事后又要对处分过重、处分错了的人进行甄别平反、赔礼道歉。中央认为,正确处理"两反"斗争揭发出来的案件,关系着前一阶段运动成果的巩固,关系着今后运动的顺利开展。中央监委的报告,就如何开展反贪污盗窃和反投机倒把指定了明确的政策界限,对防止运动中发生打击面过宽等过火行为起了一定的作用,保证了运动的顺利开展。

1月14日,中共中央在批发谢富治、谢觉哉、张鼎丞在人大三届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和《诸暨县枫桥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时,作出《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指出,一年多来,毛泽东同志反复地指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依靠群众向反动阶级残余势力实行专政,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要少捕人,少杀人。

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号

召在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共产主义竞赛中，向解放军学习，并指出，全国学习解放军就是要学习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学习解放军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学习解放军坚持我国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三八作风”；学习解放军注重创造“四好”连队，加强基层建设等。社论希望全国人民真正活学活用这些宝贵经验，像解放军那样，做到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

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的指示》，强调这个运动也像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样，是重新教育人、改造人的革命运动，是防止和克服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打退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革命运动，是推进工作和生产的一个巨大动力。要求“五反”运动必须坚持进行，搞深搞透。凡是放松的或者停顿的地区和单位，一定要重整旗鼓，把“五反”进行到底。

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要求两个文件“应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发问，答问，由粗到细，由浅入深，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深入调查研究，直到确实解决问题。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并指出：“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做消极怠工分子。”

3月下旬至5月上旬，毛泽东一路南下视察，同各省负责人了解“四清”运动的开展情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如强调大力宣讲“双十条”；认为运动至少搞三到四年，不要着急；强调干部参加劳动，不劳动的不能当支部书记、公社书记，也不能当县委书记，这三级书记不劳动不能当；强调依靠贫下中农，建立贫下

中农协会。同时,还提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你们怎么办"的问题。

5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新疆商业厅党委关于"五反"运动后"两反"开展坦白检举情况的报告》。指出:请你们对本地区财贸部门的五反运动认真地进行一次检查。凡是领导力量薄弱、运动开展不好的单位,要责令有关领导部门也像新疆商业厅党委那样,派出得力干部,亲临第一线,去加强指导和具体帮助工作。一定要督促各级财贸部门把五反运动进行到底,搞深搞透,不搞彻底,决不收场。五反运动后两反的具体做法,要注意总结本地区的经验,实事求是地加以运用和推广。新疆商业厅的做法,只供各地参考,不能机械搬用,特别是坦白示范大会的做法,运用不好,容易引起副作用,更应当慎重。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除"三五"计划、大三线建设等题目外,主要研究了"四清"运动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等具体政策。会议总结了前一阶段运动中存在的主要缺点,提出了城市应当划分阶级。对国内形势作出了严重的估计,提出了"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不切实的概念,认为中国要出修正主义。为防止"中国出赫鲁晓夫",毛泽东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会议讨论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同时,在这次会议上,还印发了陈伯达在天津小站和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的"四清"材料,以及中共甘肃省委和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夺权的报告。

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工作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有少数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或者企业和生产队,出现了一些歪风:追求表面的华而不实的轰轰烈烈,滋长起一股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滥用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干劲,随便加班加点,浪费、消磨和糟蹋群众的热情

和干劲；有不少领导同志不下去蹲点，不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喜欢靠没有准备的会议、繁琐的报表和冗长的文件来指导工作等等。《指示》强调，全党领导干部，必须检查、纠正任务多、会议多、报表多、文件多的现象。报刊、广播的宣传要鼓实劲，要做扎扎实实的、科学的、冷静的促进派。在继续抓紧进行"五反"、"四清"、社会主义教育和反修防修的同时，必须抓紧生产问题，一切工作都应服从生产的需要，只能促进生产，决不能妨碍生产。

6月23日，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报告》指出，甘肃省委和冶金工业部党组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去年3月，派出由高扬文（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和李泰（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副部长）两同志率领的工作组，对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进行了彻底的整顿，夺回了企业的领导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是1962年部分建成投人生产的大型联合企业。它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一个铜、硫基地，职工共有1.1万多人。前几年，这个企业的领导核心烂掉了。一个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企业变成了由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也就是地主、资产阶级所统治的企业。公司党委副书记崔国权是个坏分子，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监委书记常耀华工作一贯表现不好，公司党委第一副书记兼经理李子奇同一些坏人同流合污，思想已经蜕化变质。这些坏人把整个公司搞得乌烟瘴气，暗无天日，成了一个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统治的世界，即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统治的世界。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夺权斗争，在进行"五反"运动的大中型企业开了先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复查，这是一起冤案。1979年3月，中央批准为"白银厂事件"冤案彻底平反。

6月25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该《条例（草案）》总结了过去一段时期各地有关贫下中农组织的经验，对协会的性质、基本

任务、会员问题、组织机构问题、领导成员问题，它同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关系，同社、队组织的关系，它的经常工作，都做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共 18 条。

6 月 28 日至 7 月 25 日，刘少奇先后到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等地，同当地党政军干部座谈如何开展“四清”运动。8 月 5 日至 26 日，又先后到武汉、长沙、广州、南宁、昆明等地视察，并在广州修改《后十条》。一路上，刘少奇就“四清”运动、两种教育制度、劳动制度、反修正主义以及军队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做了多次讲话。讲话中强调对基层干部既依靠又不依靠，并不断提出“追根子”。认为地方领导干部在“四清”运动中，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对运动的领导很不力，必须大力纠正，并强调领导干部必须蹲点。提出了改变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办法，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运动方法。

9 月 1 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简称“桃园经验”)。“桃园经验”是 1963 年 11 月到 1964 年 4 月，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开展社教的经验。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联”，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再集中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经验”认为，对待基层组织和干部“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强调“四清”的内容已经不只是清工、清账、清财、清库，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中央在批转这一文件时认为，“桃园经验”是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能把它变为框框，到处套用。此

后,各地较为普遍地采取了“桃园经验”的做法。

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通知》指出,当前,必须首先抓紧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正在全国开展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他们在实际的阶级斗争中接受教育和锻炼,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科师生走出“书斋”,逐步克服长期存在的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的不良学风;才能有效地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培养出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通知》指出:从今冬开始,高等学校文科师生都应该分批下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参加运动的时间,根据专业和修业年限的不同情况,分别规定为:(1)四、五年制的中文、历史、哲学、政治、法律、财经、教育、新闻等专业师生(包括研究生),参加运动时间为一年到一年半,必须参加完一期“四清”的整个过程和一期“五反”的主要过程。(2)二、三年制的上述各专业师生,可以在一年以内,参加完一期“四清”的整个过程。(3)各专业毕业班学生(包括研究生),参加运动的时间至少半年。(4)艺术院校师生参加运动的时间,由文化部按照上述原则研究制定出具体办法。(5)外语学校和各外语专业的师生,这一期暂不下去。《通知》还要求,各高等院校的师生参加运动,必须由校和系一级的领导干部带队,在当地党委和工作队的统一领导下,负责做好师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和组织管理工作。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对《后十条》作出了重要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必须以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六个条件,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好还是不好的主要标准。二是领导人必须亲自蹲点。

三是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是不是放手发动群众，是不是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是彻底进行或者不彻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分界线。四是解决群众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团结95%以上的群众，是团结95%以上的干部的基础。五是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六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或者很不彻底的地区，必须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通知》也指出，领导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关键在于三个问题：领导人员亲自蹲点，有坚强领导的工作队，以及在运动中间放手发动群众。

10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10月11日李雪峰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反映，在两省地委书记会议上，发现几乎在每个地委召开的会议上，县委同志的思想都抵触很大。或者在这个问题上思想“通”了，到那个问题上又回生了。河北开了四十多天的会，排队还是六、三、一或七、二、一的比例，即拥护中央指示的占到六或七成，不赞成的有一成，那中间部分中还有根本不开腔、不表示态度或态度暧昧的人们，有的甚至疯狂地声言根本反对“四清”，也拒绝到会。为此，华北局决定，戳穿“怕‘左’不怕右”这种精神状态，打出反对右倾的旗帜，要求每个领导者都要考虑自己到底是马列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者？或者也可以干脆地说，你到底是愿意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反对派？还是做调和派？要准备使好些同志睡不着觉，紧张起来思考问题。中央批转李雪峰的信时指出：在目前情况下，不向党内各级干部明确地提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是不利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应当及时地要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提出反对右倾的问题，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中央明确指出：对于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应当在调查研究以后，采用信阳经验、小站经验、白银厂经验，进行夺权斗

争，发动群众，迅速加以解决。

10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指示》指出：现将江苏省委10月15日来电，和刘少奇同志9月30日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及其附件，发给你们，请你们转发给各地委、县委，并请你们以及地委、县委同志都联系实际认真地进行讨论。中央认为江渭清同志对自己的缺点和刘少奇同志的信所采取的态度是好的。正如江苏省委来电所说，这封信上批评的江渭清同志的缺点，不只是他一个人有，其他许多同志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还有一些同志则比江渭清同志更严重，其中，也包括中央的和中央各个部门的许多同志在内，中央认为所有这些同志都应当进行检查。刘少奇在信中指出：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一个原则的问题就是我们应当向谁学习，是向党内和党外群众中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不管他们的职位高低，还是向职位高的人学习，不管他们有没有真理？我们的原则，是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不只是向职位高的人学习。职位高的人的言论和行动，凡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的，都是应当学习的；凡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的，都是不应当学习的。

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教工作队编组和交流社教工作经验问题的指示》。中央指出，目前各省工作队的编组，有两种方式，第一是省委干部包一片，地委干部包一片，各县的干部也各包一片。第二是省委、地委干部和各县的干部混合编组，就是说，每一个工作团、工作队或工作组都有省委或地委的人。第二种编组方法，会有很多麻烦，各方面的人编在一起共同作战，立场、观点、作风都有些不同，在工作队内部对于每一项工作都会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做法也会不同。但是，为了工作的利

益，又首先必须统一工作队内部意见，并且统一做法，这样，就有很多好处，使省委、地委的干部更好地了解县的各级干部，也使县的干部更好地了解省委、地委的干部，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看到各种不同的做法，互相监督，互相学习，互相考验。第一种编组方法，可以省去许多麻烦，但是却有许多缺点。特别是原来的上下级在一起工作，就有些下级干部有意见也不说了，领导同志也难于了解情况和了解干部。第二种编组法，在去年，河北抚宁工作队就是这样做的，证明是好的。第一种编组法，去年有些地方也做过，证明不大好，但是各地也还可以再试验一个时期。如果继续证明这种编组法不好，就应下决心逐步改为第二种编组法。

10月2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指示》肯定了小站地区这种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即开展夺权的政治斗争，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的做法。认为"他们的经验，值得各地参考"。《指示》要求，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指示》还列举了各种类型夺权斗争的经验：在一个地委和县委，有信阳的经验；在一个农村或镇子，有小站地区的经验以及其他农村的不少经验；在一个大企业，有白银厂的经验；在一个城市，将会有贵阳市、白银市的经验。所有这些类型的经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论在信阳、小站、白银厂和贵阳，在夺权以前，都由上级派人进行了长期的工作，才确定地认识这些地方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才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出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最后，《指示》强调：这里也有一个教训，就是在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以前，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确定领导权是否在敌人手

里，才能确定这个地方的领导核心是否已经变质，才能决定是否应当进行夺权斗争。此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很多基层单位开展了夺权斗争。

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吸收社会青年参加社教工作队的注意事项的通知》。《通知》指出：据国家计委参加江苏省"四清"的工作队反映，江苏省委已经组成句容工作团，共1.2万人，但招用的退伍军人、社会知识青年占三分之二。又据广东"四清"工作总团反映，吸收参加"四清"工作队的社会知识青年，不符合条件的，有的地区达到30%。在集训期间，一些人表现不好，逛街游玩，谈恋爱，不专心学习，把津贴费用来买高级用品，抽高级香烟，购新衣服，甚至打架，影响很坏。现在广东省委已引起注意，提出招收社会知识青年必须强调质量，不要追求数量。中央同意广东省委这些意见。望各中央局和各省、市、区党委注意：一，不要过多地吸收社会青年参加工作队；二，吸收进来的要注意质量，表现不好的要送回去。

10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抓好社会主义教育同时抓好生产救灾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今年有部分地区，主要是山东、河北、河南等省的若干地区，遭到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极大的注意。各级党委必须将当前的各项工作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做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生产救灾等日常工作两不误。既要抓社会主义革命，又要抓日常工作；既要抓重点地区、重点单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抓面上的生产、分配、收购、救灾等工作。

11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试点工作由五人小组之下的运动工作队领导。五人小组成员是：张磐石（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刘仰峤（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后由侯西斌处长参加）、庞达（中央宣传部教育处副处长）、宋硕（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

长)。张磐石任工作队队长。工作队成员包括从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宣传、文教部门及高等学校抽调的250余名干部。至1965年5月,全国有23所高等院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大的社教运动试点工作持续到1965年7月。

11月12日,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批示》指出:在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地区,如果发现有的地方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有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上述三种情况,在查明确实后,经工作队批准,都可以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没有贫协组织的地方,也可以由工作队组织贫协,取而代之。

11月13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的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凡是有地委以上党委负责同志领导的工作团集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当地县委和县人委即由工作团党委领导,该县各区区委和区公所、公社党委和公社管理委员会也接受工作团分团党委和工作队党委的领导。并说明本规定原则上适用于城市和企事业单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团或工作队。

11月18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检查不合中央当前指示精神、妨碍当前运动的文件的通知》。《通知》指出:过去中央有些部门,有些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县委,对于城市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出了一些具体政策界限的规定或细则,例如:关于退赔的规定,关于处理犯错误干部党员的规定等等,其中有不少规定是同中央现在的"双十条"和中央最近发出的其他指示相抵触的、现在已经不能适用。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立即进行检查,你们过去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出了一些什么指示和条条,其中凡同中央"双十

条"和中央最近发出的其他指示有抵触者，应当宣布废除，或者进行修改和补充，而不要不加过问，让这些不合中央当前指示精神的文件妨碍当前的运动。

12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王任重同志在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央肯定了王任重的如下意见：对"四清"的提法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机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不再叫"五反"，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起搞"四清"，生产队的领导核心应当是贫协小组等。

12月5日，毛泽东在谢富治关于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上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要这样做，必须派政治上很强的工作队分期分批去做。谢富治同志这个报告可以看一看。《批示》并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主要根源"来自上边。

1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社教工作队工作方法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安子文进村40天的工作报告。批示指出：最近有一些工作队出现了一种错误的工作方法的苗头，他们在进村以后，怕犯错误，不敢放手工作，不敢接近基层干部，甚至不敢接近中农，只是冷冷清清地选根扎根，有些人进村20天还选不到一个根子，其他工作也就不敢做。有些工作队在包办代替还没有发生以前，就一般地反对包办代替。而敌人和"四不清"干部大体都采取了防御的策略，或向工作队出难题来试探工作队，不再公开地深入进攻了，工作队也就消极地等待着，而不在适当的时候采取进攻的策略。工作队的这种情绪，实际上还是一种右倾情绪。读读安子文同志的这个报告，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找到自己的缺点，也可以找到怎样工作的方法。

12月12日，毛泽东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批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

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主要矛盾、运动的性质以及做法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了公开的严厉的批评。毛泽东强调要整"当权派"，说"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刘少奇认为，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这次会议制定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17条，并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不久毛泽东对此次《纪要》不满意，又多次加以修改，最后形成《二十三条》。

12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军队抽调干部参加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本月7日，总政治部向中央及军委写出了该《报告》。《报告》反映，到目前为止，全军已抽调干部30747人，其中省军区系统15720人。师职以上各级领导干部773人，其中将军67人。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福州军区副政委卢胜、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徐国珍、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李文清和各省军区的一些负责同志，都带头下去蹲点。《报告》提出了一个五年之内抽调干部参加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规划和要求。大体上每年抽调应参加干部总数的10%，五年抽调60%左右的人，参加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参加人员，必须立场坚定、政治可靠、作风正派、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都不准参加：亲属是四类分子或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受到斗争或惩处，本人界限不清、立场模糊和进行包庇干涉者；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严重抵触情绪者；本人被揭发有严重"四不清"问题尚未认真检查和处理者；有严重右倾思想或修正主义观点者；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尚未做出结论，或虽已做出结论但政治上仍不能信任者；思想作风不正派，屡有违法乱纪行为者。《报告》也建议军队人员不担任工作团、队、组的主要领导职务，和地方干部混合编组，不单独包干一个社、队等。

12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高扬文在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蹲点报告。高扬文的报告讲了阶级斗争是核心、首先必须把阶级斗争的仗打好等七个问题。毛泽东也作了批示，认为这个报告写得很精简节约，又具体生动，又概括，是一个好报告。

1965

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中途调回参加城乡"四清"运动的干部的通知》。指出：根据城乡"四清"运动的需要，由中央一级机关和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单位调到各地参加城乡"四清"运动的一切干部，在第一期城乡试点未结束以前，不得中途调回。有特殊情况需要调回的，按以下办法处理：一、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需要调回的，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二、中央一级机关和在北京的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单位中，不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需要调回时，参加城市"四清"运动的由中央工交政治部批准，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的由中央组织部批准。三、北京以外的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单位中，不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需要调回的，由中央各主管部门的党组（党委）与省、市、自治区党委商定。四、

如果某些干部因病需要回原机关就医的，由所在工作团党委决定，不必经中央批准。

1月14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这个文件是196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的纪要。《二十三条》虽然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如指出看待干部要一分为二，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多数，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搞神秘化，强调"四清"要落实到建设上面等，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认为，当前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并规定，今后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同时规定：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要求把"这个文件发至县、团以上党委和工作团、队党委"。《二十三条》下达后，各地对工作队进行了整训，解脱了大部分基层干部。

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二十三条〉的通知》。《通知》要求，在点上和面上都进行一次广泛的宣传。在点上传达到全体工作队员，并要他们遵照执行，然后向所有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在面上由公社党委和支部向全体党员和党内外干部传达，同时，向贫下中农及其他群众传达。通过这次宣传，使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和其他群众得到支持和鼓舞，使得干部和工作队员得到教育和提高，并且会起安定人心的作用，使得极少数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更加孤立。这样，也就能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使今年的生产建设

搞得更好。并要求把这个文件印成布告，分送各省、市、区党委，发给农村的每一个支部和大队在室内张贴起来，让一切人都来看。城市的一切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支部和军队的连队也都在室内张贴起来。

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张贴和印发〈二十三条〉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规定，张贴的《二十三条》不要让外国人观看，也不要让人照相，如有人抄录不必阻止；城市工厂、商店、学校、街道没有党的支部的，可由基层党委或总支选适当地点张贴；少数民族文字是否印大张张贴，由各地根据汉文式样自行印发；为了便于教育干部和向群众宣传，各省、市、区党委和中央各部门可根据实际需要，印成小册子，发给基层干部和机关干部，但是不能公开发售。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面上对罪犯判处死刑和对犯有罪行的县委书记、县长以上干部的逮捕法办审批权限的通知》。规定：关于面上对罪犯判处死刑和对犯有罪行的县委书记、县长以上干部的逮捕法办审批权限，应该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第四条规定，一律报中央审批。

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高等学校理工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要求从1965年暑假起，分期分批组织理工科高年级师生参加一期"四清"的全部或主要过程。理工科研究生原则上也应与大学生一样参加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到1965年年底，全国有395所高等学校的师生22万余人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国性的劳模和人大代表所在的社教工作由省委直接领导的通知》。中央指出：最近，发现外贸部派去山东参加社教的工作队，对曲阜县东郭庄大队的社教工作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在那里硬找资本主义。省委和

社教总团都对工作队提了不同意见，工作队不听，仍然按照自己的意见主观办事。据了解，东郭庄大队是一个很好的大队。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亩产达到800多斤。社员收入都在百元以上。公共积累达30万元。集体经济很巩固，不比大寨差多少。大队支书郭守明同志的毛病，是近几年来参加劳动比较少一些，民主作风差一些，队干有些打骂社员的错误，但是总的说来，是一个很好的大队。郭守明同志是人大代表，这次工作队不让他出席会议。中央认为，全国类似这样的大队是有一批的，其中不少人又是全国性的劳模和人大代表。因此，请你们注意，凡是全国性的劳模和人大代表所在的大队，那里的社教工作应当由省委直接抓、任何单位派出的工作队，都必须服从省委领导。

2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在"四清"运动中吸收新党员预备期问题的意见》。中组部提出：据有些省反映，在"四清"运动中有些支部问题严重，原有支部的党员已不再任领导职务，而新发展的党员按规定又要有一年预备期。因此，这些支部领导核心建立不起来。建议那些准备担任领导工作的新党员，可以不要预备期。中央的批示指出：在农业集体化和"四清"运动中，经过考察，确实优秀、可靠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吸收入党时可以由工作队党委决定，经分团党委或者县委批准，缩短或者不要预备期。

3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城市四清运动的情况报告》。《报告》指出：去年8月以来，全市组织了1.5万人的工作队，派到133个城市基层单位开展了运动。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各工作队在工作中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缺点。归纳起来，主要是：一、有些工作队由于对运动的性质、重点认识不明确，在斗争中面宽了一些。二、工作队包办代替的现象比较普遍。三、有少数单位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违反政策。有的单位忽视说理斗争，甚至发生打人、罚站、挂牌游行等现象。个别

的还有擅自进行搜查吊赃，甚至用录音机录音诱供、监视、侦查等方法。有的单位为了追求数字，经济退赔不注意核实材料，而是靠毛估估推算，追算的时间过远。四、点面结合不够。

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对湖北、河北两省委关于今后农村四清运动部署问题的批示》。中央指出，湖北省委的安排同河北省委是不同的。湖北省委的安排是以县为单位，集中省、地、县各级党委的全力，在今冬或今冬明春在面上进行初步“四清”，解决那些能够解决的问题，并发现一些难于解决的问题，准备在以后解决。河北省委的安排仍是以地委为单位，每个地委搞几个县。但是湖北和河北省委都决定在1967年底基本完成农村“四清”运动。在农忙季节搞好县、区、社的“四清”，在冬春农闲季节，搞好两批农村“四清”。中央认为，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参考湖北省委和河北省委的报告，根据各省和各专区的情况来确定今后农村“四清”运动的部署。各省、市、自治区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来部署今后的农村“四清”运动。但是中央要求在符合六条标准的条件下尽可能快一点完成农村的“四清”运动。这对农业生产和备战都是大有好处的。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现役官兵及其家属“四不清”问题的批示》。指出：现将中南局《关于妥善处理现役官兵及其家属“四不清”问题的规定》转发给你们。关于现役官兵及其家属“四不清”问题的处理，在没有“四清”工作团的地区，由县委以上机关按此规定办理。关于官兵是否帮助犯有“四不清”错误的亲属退赔问题，除了亲属是四类分子不准帮助退赔外，其他的，帮助不帮助退赔，可由本人自行处理。4月20日，中南局作出了《关于妥善处理现役官兵及其家属“四不清”问题的规定》。规定指出：一、城乡“四清”运动中凡涉及现役官兵本人的“四不清”问题，一律由“四清”工作分团将材料认真核实，然后向有关部队的团以上政治机关反映，由部队进行教育处理。二、现役官

兵本人确属漏划的四类分子和确有严重问题，经过部队有关领导机关的批准，可以在部队清洗后，交回原大队或生产队处理。凡属一般“四不清”问题，一律不得要求现役官兵本人回到地方上处理，也不得派人或写信到部队索取退赔款。三、对现役官兵家属的“四不清”问题，应由其家属有关人员负责。家属无力退赔的，现役官兵可以给以力所能及的帮助。

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领导方法问题的指示》，并批转王任重同志报送的关于“四清”工作方法的九个材料。《指示》指出：领导干部到基层单位蹲点，了解真实情况，取得解决问题的经验，然后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解决面上的问题。这是领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方法，也是领导其他各项工作的重要方法。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今后的各项工作中，经常地坚持这种领导方法，改变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

7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高等院校、科学研究和文化单位的干部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通知》指出，这些单位，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让知识分子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加强他们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最重要的、最有效的方式。而且，对于帮助知识分子改进工作，促使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进一步为5亿农民服务等，也有极大好处。通知要求：除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以外，各单位都应当不失时机地组织干部积极投入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去；少部分人也可以参加工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单位本身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整风运动等以后再进行。

8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四清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提出了在工业交通系统开展“四清”运动的意见：一、采取适当集中力量、分期分批打歼灭战的方法，争取在1967年底基本上完成工业交通系统的“四清”任务。二、坚决按照毛泽东1964年1月提出的搞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六

条标准办事，用它来衡量工作的好坏。三、将企业分为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和性质严重的四类，分别采取不同的做法。四、凡是开展“四清”运动的企业，都要由上级机关派出工作队。五、要在运动中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大会，使它真正成为职工群众监督干部的权力机关。六、进行“四清”运动的企业，要建立民主选举干部的制度。七、要在运动中认真清查隐瞒身份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八、要在运动中组织职工进行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我教育。九、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技术人员、职工和工人，主要看本人的实际表现，不能唯成分论。十、对企业“四清”运动，必须加强领导，领导干部要继续蹲点。

9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南局对加强当前四清运动领导的几点意见》。中央指出：现将中南局《对加强当前四清运动领导的几点意见》发给你们参考，望你们同样注意当前运动中发生的问题。8月26日，中南局向中央汇报了《对加强当前四清运动领导的几点意见》。《意见》提出了当前运动需要强调注意的问题：一、训练工作队的工作，必须严格，必须认真，必须把应该解决的思想问题解决得透，解决得好。二、能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敢不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是今后运动的成败关键。不把群众发动起来，片面强调团结基层干部，片面提倡“三结合”，都是错误的。放手发动群众，是运动的灵魂，是搞好运动和一切工作的基础。三、领导干部必须坚持蹲点，亲临第一线，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南局决定：陶铸同志到广西，陈郁同志、黄永胜同志到广东，王首道同志到湖南，李一清同志到湖北武汉，金明同志到河南。另外，中南局部长、副部长、副主任以上干部17人也分别到各省（区）蹲点。

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的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

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对剧本大加挞伐。并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文章发表后，由于不了解文章的写作情况和毛泽东的态度，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没有及时通知各地报刊转载，《人民日报》等转载后又想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但在毛泽东的支持和江青等人的操纵下，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很快就发展成为一场群众性的批判运动，直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11月13日至19日，毛泽东外出视察，在济南、徐州、蚌埠、南京、上海与各省市委领导谈话，主要内容是谈打仗、备战，搞好生产，对社教已谈得很少。

11月18日，林彪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做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二、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三、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四、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1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中央写出《关于军队干部参加地方社教运动安排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切实贯彻执行主席关于军队排以上干部在两年内分期参加地方社教的指示，特对军队干部参加地方社教运动的安排问题，提出以下意见：一、这一期参加地方社教的同志，原则上在一个点从头至尾搞完一期后，一般可不再参加开辟新点的工作。二、考虑到部队备战工作的情况，今后抽调和轮换干部的办法是，前一批干部回来，后一批干部再派出去，以便交换情况，交接工作。

三、为了适应各地起止时间不一的特点，今后在组织实施方面，由各军区根据本地区运动的时间、进度，适时提出下一批参加人数，提请中央局或省、市、自治区党委作出安排。

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社教干部蹲点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现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在约占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区展开，有近200万干部参加这个运动。参加"四清"运动的干部，必须继续认真蹲点，和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不要搞特殊化，并且带着基层干部一起，好好实行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一整套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同时，为了使干部蹲点这个重要的领导方法能够真正长期坚持下去，不要使蹲点的同志因为睡眠不足、劳逸结合不好等原因，损害身体健康，以至于有些同志蹲点工作半途而废，或者时而下去，时而又病回。因此，希望各地党委和工作队领导同志，从全局和长远打算，对工作队的工作，实事求是妥善地加以安排。

1966

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广东省关于在四清运动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情况的报告》。广东省委在《报告》中指出：我省第一批点的"四清"运动，有一个新的重大特点，就是强调了突出政治，在运动中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以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改造人，以毛泽东著作直接指导运动的每一步工作。这是试点经验的新发展，"四清"运动同时成了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运动，"四清"地区成了全省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重点地区，14万工作队带着毛泽东著作下乡，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强大宣传队。为此，中央批示：广东省委关于在"四清"运动中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情况的报告很好，转发给你们参考。在"四清"运动中学习毛泽东

著作，应当是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中的有关指示，特别是近几年有关“四清”运动的许多指示，把“四清”运动搞得更好，使“四清”运动的成果更加巩固，并为今后做好其他工作创造条件。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8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件规定，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9月1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要求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联。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农村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应在农闲时专门安排一段时间把它搞好。

11月27日，谭震林就今冬明春开展农村“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几个原则性问题向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写出了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文化大革

命"与"四清"的结合,《十六条》上是两种提法。现在看来,"四清"运动中下台的干部,只要贫下中农大多数没有意见,也不准翻案,"四清"工作队也应肯定。但是,各地原来的"四清"部署和做法,还有不少框框,繁琐哲学,人海战术,包办代替等等,有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大民主的经验,就不能再按原来的一套部署去做了。应该加以改变,不改变也行不通。因之,似以明确肯定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四清"的提法为好。

12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二十三条》的原则进行。必须是群众当家作主,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问题。

1967

1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通知》指出,现在,有些农村和企业、事业单位要把"四清"工作队员揪回去斗。中央认为,"四清"运动有伟大成绩,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十条》、《二十三条》,都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这是必须肯定的。根据《十条》和《二十三条》的规定,在当时派出工作队,是正确的,不能说是错误的。至于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受形"左"实右路线的影响,犯了一些错误,主要应由错误路线的提出者负责。因此,中央决定,"四清"工作队的同志,一般的不要揪回去斗。对于"四清"工作

队的同志有意见，可以用写信、送大字报或者其他方式提出。必须保卫“四清”运动的成果，不许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下台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不许他们兴风作浪。

2月20日，中央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信中号召贫下中农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绝对不许地富反坏右分子乱说乱动，破坏生产，破坏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挑动宗派纠纷。在“四清”运动中下台的干部，必须积极参加劳动，改造自己，不许反攻倒算。

3月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通知》要求，在已经“四清”过的地方，决不允许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下台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要坚决保卫“四清”运动的成果。

12月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规定“文化大革命”要继续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即“十条”的原则进行。同时文件指出，《前十条》和《二十三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根据这两个文件进行的“四清”运动，有伟大的成绩，必须肯定。“四清”运动遗留的某些问题，可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解决。

附录二

参考书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3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4—17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8—2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二室编：《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选编》第 5 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版。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64 年。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杨存堂分卷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二十世纪通

鉴》第四册,线装书局 2002 年版。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主编:《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58—1965),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主编:《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66—1977),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编:《陈丕显文选》第 2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金冲及、黄峥主编:《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李海文主编:《彭真市长》,中共党史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黄峥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下,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版。

王光美、刘源等著,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何绍榜：《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

逄先知：《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

《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

《峥嵘岁月——刘晋峰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王铎：《五十春秋——我做民族工作的经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刘冰：《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一个红军战士走过的路——舒光才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王世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吕剑人：《我的回忆》，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萧克、李锐、龚育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

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1 年版。

李俘和主编:《当代中国的宁夏》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匡吉主编:《当代中国的广东》上,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安徽》上,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版。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山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陈沂主编:《当代中国的上海》上,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

赵海峰主编:《当代中国的青海》上,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

钱运录主编:《当代中国的湖北》上,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

张树德、侯志英主编:《当代中国的河南》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韦纯束主编:《当代中国的广西》上,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版。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社会主义建设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吕景琳、申春生:《山东五十年发展史》,齐鲁书社 1999 年版。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林蕴晖、刘勇、史柏年主编:《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中国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理事会编:《毛泽东思想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

龚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下,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版。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 1998 年版。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本社编:《仇恨的烙印》,新疆青年出版社 1965 年版。

叶曙明:《百年激荡——20 世纪广东实录》第 2 卷,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龚育之、王志强:《科学的力量》,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版。

郭德宏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3 年版。

王学启、杨树标、沈家善、姚鸿瑞:《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 2 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肖冬连:《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红旗出版社 1999 年版。

谢春涛:《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陈佩华、赵文词、安戈著,孙定国译:《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美〕莫里斯·梅斯纳著，张瑛等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

Richard Baum: Prelude to revolution: *Mao,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Question*, 1962—1966.

Ahn, Byung - joon: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6 by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四清运动实录
作者=
页数=396
SS号=11430958
出版日期=